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身体与社会理论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第二版

[英] 克里斯·希林 著 李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有关人的具身体现及其深远意涵，社会学角度的思考异彩纷呈，克里斯·希林博采众说，生动描述，为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任务。

——《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

身体研究，健康与疾病研究，甚或整个社会理论，上述领域任何文献选藏，本书皆属佳选。

——《选择》(*Choice*)

身体之为社会理论话题，生机饱满，经此一书，地位确立，再难湮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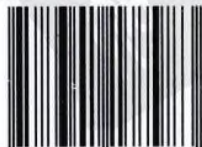
——《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在当代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身体问题在西方社会文化理论中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西方身体社会学领域的一本代表作，本书纵览该研究领域诸多研究路径的长短优劣，全面展现各路发展如何推动身体成为突破场所，探寻晚近来自女性主义、现象学、行动导向思路的身体研究，考察“身体规划”、“身体面具”和“身体潜势”等方面最新论述，分析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关系，提出了整合论的身体观，对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与启发价值。

上架建议：社会学·身体社会学·社会理论

ISBN 978-7-301-17798-3



9 787301 177983 >

定价：28.00元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身体与社会理论

李康 译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31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与社会理论 (第二版) / (英) 克里斯·希林著;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9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 ISBN 978-7-301-17798-3

I. ①身… II. ①希… ②李… III. ①身体-社会行为学 IV. ① 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233 号

Chris Shilling,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2e.

EISBN 978-0-7619-4285-6

First published 1993. Reprinted seven times. Second edition 2003. Reprinted 2004.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Chris Shilling.

书 名: 身体与社会理论 (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英] 克里斯·希林 著 李 康 译

责任编辑: 徐文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98-3/C·06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39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谢

谨对协助我研究身体问题的同事和友人致以谢忱。尤其是 Philip A. Mellor 和 Keith Tester，多年来提供的洞见、鼓励和指导弥足珍贵，而在 Chris Rojek 身上，我得到了对于一位编辑所期待的一切帮助和见识。以上各位的相关意见，以及 Ian Burkitt 和 Paul Sweetman 的敏锐观察，令本书新版受益匪浅。感谢 Mike Featherstone、Bryan S. Turner 等《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编辑团队对我的理论研究规划的一贯支持。此外，我一直想有机会感谢 XueLong Li 和 Colin Ingram 的帮助，感谢他们娴熟的技能：这两位专家在各自的领域里向我切实展示了身体是如何思考的。不过，我在研究身体时获得的最大帮助，还是来自我的妻子 Debbie。

《身体与社会理论》初版刊行十年来，研究具身体现^[1] (embodiment) 的新著层出不穷，蔚为壮观。如今再也不可能将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视为满足好奇心的奢侈玩意儿，发落到那些“奇特”话题的行列，间或引起社会学想象力的外缘的关注。身体已经进入了学术分析的核心，反映出它在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重要意涵。“身体研究” (body studies) 这块领域原本就健康有益，蓬勃发展，又受到有关具身体现的各式分析的大力补充，后者横跨了越来越多的学科，包括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运动与休闲研究、哲学乃至神学与宗教研究。身体这个主题充当着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激发点，在对于社会学传统的主流考察中，已经被承认是一股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例见 Levine, 1995）。而在那些探讨人类行动的创造性、研究人类境况 (human condition) 的一般性社会理论中，它也有奠基性的地位（例见 Archer, 2000; Joas, 1996）。这些例证都从正面展示了身体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意涵，但同样重要的是，有些理论老想着绕过阐述人的具身特性来说明社会行动，就会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理性选择理论就特别贴切地例证了这种现象。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这种理论都有广泛的影响，但对于人在身体维度上的构成，它却做出了一系列站不住脚的假设，并因此黯然失色 (Shilling and

[1] 原文为“embodiment”，这个词可以说是身体研究中最常用的词，也是最难译的词，包括了身体的具备、特征、状态、过程，乃至经验研究和理论阐述中身体视角的凸显。可以说是汉语里的“具体”与“体现”两者的综合，但这两个词已经进入日常语言，别有含义。单纯译作“具身性”或“涉身性”（国内心理学界多见此译）甚至“身体体现”（译者本人曾经使用）也不是很理想。——译注（以下凡原书注会标明“原注”及原书页码，未标明者皆为中译注，不再逐一说明）

Mellor, 2001)。^[2]

不过,在身体研究这一广阔领域中,纵然新作迭现,势头汹涌,却并没有使该主题的早期关键文本变得无足挂齿。除了布赖恩·S. 特纳的《身体与社会》(Turner, 1984),像保罗·赫斯特与潘尼·伍利的《社会关系与人的属性》(Hirst and Woolley, 1982),彼得·弗罗因德的《文明化身体》(Freund, 1982),还有约翰·奥尼尔的《身体五态》(O'Neill, 1985),都有着重要的洞见与分析,在这个领域依然没有过时。从身体对于治理的重要意义,生物学、生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对于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到身体的符号意义,他们各自讨论的这些东西,依然能够给予我们不少教益。正是在这样一些研究的背景下,我在本书初版中力图界认出一块方兴未艾的身体研究领域,并基于这些著述的见解,以及尚待充分挖掘与该领域关联的一批古典思想家和当代思想家的作品的洞察,摸索出一套研究具身体现的宽广思路。

<ix> 我如今借助该领域的后续发展,再来重读《身体与社会理论》的初版,并不打算改变自己觉得对身体研究领域仍然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自然主义的身体观(参看第三章)远远谈不上危害不再,而是在某些人的激励下重获动力,在他们眼里,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能够揭示我们的身体的基因构成如何决定着我们的特性/身份/认同^[3](identity)与命运。如今依然需要去揭示这类思维的局限性,证明社会性过程融入了人的进化,并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21世纪出生的人的健康、幸福与生命机会。

如果说面对自然主义身体观的不加节制,依然需要加以管束,那么对于在许多文化身体观、技术身体观和社会学身体观中仍很明显的那些化约论倾向(参看第四章),也是同样如此。强调我们的身体特性/身份/认同和关系是如何不能被化约为“自然”因素或“生物”因素,诚然颇有助益,但这些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还有一种倾向,想象我们的具身性存在(embodied being)在一定

[2] 在各种理性行动学说中,比较强硬的阐述往往假定,行动者在行动之前就已经从认知的角度确立了目标(并因此主张,身体的正常状态就是呆滞不应)。它们把身体看做是随时想用就可以用的行动工具(相对于其他人和所处环境而言保持自主性),并将身体化约为单纯满足偏好最大化的自我表达的媒介(从而不能充分重视人的脆弱性,启示的经验,以及生命中其他事与愿违和难以预料[unintended and unexpected]的事件)(Joas, 1996)。——原注

[3] “identity”这个词,我们将在本书中根据作者强调的是“自然”生理属性、“社会”建构过程及结果、“个体”建构过程及被建构后的结果,灵活选择几种译法中的一种或组合。

程度上可以化约为话语,化约为技术进展,或是化约为社会的结构。诸如此类的视角或许已经实现了可贵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摆脱了以下常识/共感性思维(common sense thinking):女人,男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异性恋者,还有归属不同“种族”群体的人,她/他们的身体能力中有些据说是“天生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不过,在实现这种“认识论断裂”的同时,它们却忽视了身体如何不单单是社会分类的定位场所^[4](location),其实也是社会关系与人类知识的生成因素。

初版评析了自然主义身体观与社会建构论身体观的局限,力求超越这些选择思路,勾勒了一种新的身体观,身体作为一种物质现象,既形塑着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又被后者所形塑。在我们身处这个世界,能让它“有所不同”、实施干预或践行能动作用的能力中,身体属于核心要素;而我们在身体维度上的情绪、偏好、感觉能力,乃至行动,也是所谓“社会形式”的关键源泉(虽说这些社会形式里有许多已经僵化,脱离了最初奠立它们的那些欲望和性情)。因此,当特纳(Turner, 1996, p.34)提出,“我们并不一定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身体的生理特性^[5],因为所谓‘自然态身体’(natural body)已经并将始终被注入文化的理解和社会的历史”,这样的立场蕴涵着危险,会贬低身体的物理能力,身体作为创造性行动及社会关系的生产要素,是不能从“纯粹”文化因素或社会因素的角度简单“解释清楚”的。实际上,这类论调非但没有倡导需要一种具身性的社会理论,而且蕴含危险,使我们的理论关怀远离人类身体体现的实在性与物质性,把有关人的需要与幸福的议题转变成文化偏好的问题(Soper, 1995)。基于这一背景,我依然相信,有必要回到初版第五一九章所勾勒的那种思路(其中探讨的那些著述,有助于将身体看做不可化约的物理现象,介入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有鉴于此,我决定原样保留初版主

<x>

[4] 原文为“location”,不单单是物质性、地理性的空间位置,也是社会性、符号性的定位场所,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时的南非,该词直接指黑人(或有色人种)居住区或保留地。

[5] 原文为“physicality”,全文经常出现的“physical”,我们无法译成“身体的”、“物质的”、“自然的”、“肉体的”、“生理的”,因为它不时与“corporeal”、“material”、“natural”、“physiological”(很少)等同时出现。直接译成“物理的”也有违作者本意。作者时常将其与“精神的”、“思维的”等“形而上的”要素对称,但我们显然不能将其译成“形而下的”。所以,我们根据具体场合有多种译法。

体的结构和绝大部分内容。

当然,《身体与社会理论》初版刊行以来,该领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进展。我借此新版之机,吸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进展,在某些方面更新了文本。在我完成初版之后,女性主义角度上出现了一些对于该主题的重要贡献,而行动导向的身体观与现象学身体观也逐渐流传开来。不仅如此,有些占据理论支配地位的思路曾经有助于赋予该领域某种同一性/特性(identity),但随后的发展却使身体研究趋于碎片化,人们越来越困惑,所谓“身体”究竟是什么意思。新版的“补论”会讨论这些议题,基于初版以来的相关研究,重新探讨初版中最有影响的一些主题,并加以进一步发展。此外,我还利用这篇“补论”,简单介绍了一种整体层面上的身体观,把身体看成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一种多维中介。这种身体观基于初版中提出的思路,汲取了我在该领域这些年来的研究,可以充当整合身体研究的基础。

目 录

致 谢·····	4
新版序·····	5
第一章 序 论·····	1
第二章 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	18
第三章 自然主义的身体观·····	39
第四章 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	68
第五章 身体与社会不平等·····	96
第六章 身体与身体资本·····	121
第七章 文明化身体·····	143
第八章 身体、自我认同与死亡·····	166
第九章 结 语·····	187
新版补论 具身体现、认同与理论·····	193
参考文献·····	230
中外专名索引·····	253

第一章 序 论

<1>

本书旨在从理论上概括一块迅速成长中的领域：身体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body)。以下各章，我将考察身体在社会学中地位的变化；描述并评价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所借鉴的主要视角；并从自己的角度分析我们如何能够在概念上最好地梳理当前这个时期，也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称的“晚期”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时期，身体、自我认同和死亡之间的关系。我在书中提出，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身体会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就此而言，死亡的前景具备了某种特别的意义，此前很少被社会学承认或考察，但却对我们当下有关身体的理解至关重要。本章作为全书开篇，将简要介绍这些议题，也让读者逐渐熟悉贯穿本研究的一些重要主题。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身体的研究兴趣大为兴盛。身体社会学已经成为一块别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专门面向这一主题的一份新的期刊，即《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也于1995年创立；甚至有论家提出，身体理应充当社会学的组织原则。特纳就基于这一宗旨，发明了“身体性社会”(somatic society)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身体如何已经变成“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首要领域”(Turner, 1992a, p.12, p.162)。

公众对于身体的关注也有大幅增长。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充斥着有关专题，讨论身体意象/形象^[1]，整形手术，如何让身体看上去始终青春焕发、性感十足、美丽动人，有关减肥和健身的生意现在成了千百万美元的大产业。仅在英国，

[1] 原文为“body image”，事实上，消费社会/传媒社会作用于身体的重要方式，就是将有关身体的“意象”变作“形象”，从而将其中的符号权力中立化，文化塑造成分自然化。

健身房和健康俱乐部的生意如今价值是一年大约 15 亿英镑。^[2]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身体的关注并非凭空新起。比如说,每逢战争岁月,政府传统上就会展现出对于国民的体质健康乃至体魄强健的关注。不过,身体在当代流行文化中的位置却反映出一种史无前例的趋势:身体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愈益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体型和外表,视之为个体认同的表达。按照皮埃尔·布迪厄的说法(Bourdieu, 1984),在那些“新”中产阶级当中,这种关注或许尤其敏锐。然而,近些年来,它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些狭隘的范围限制。

<2>

一、高度现代性下的身体

真正要想理解对于身体的兴趣的这种增长态势,就必须深入体察形成这种趋势所处背景的那些条件。就此而言,将某些发展趋势拿出来谈谈会很有帮助,它们与现代性相伴而生,而到了当前的高度现代性时期,更是有极端的表现。

人们用现代性来泛指某些类型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机制,它们出现在封建时代结束后的欧洲,但在 20 世纪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大致可以把现代性理解为“工业化后的世界”,尽管它包含好几种制度面向,各有其特别的演变轨迹(Giddens, 1990, Hall and Gieben, 1992)。现代性产生了诸多效应,包括协助提升了整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医学专业对于其公民的身体能够实施的控制程度,还削弱了宗教权威对身体实施规定与调控的权力(Turner, 1982)。实际上,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今对于身体的关注。

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们早就指出,虽然现代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社会生活逐渐的去神圣化,但它却未能用可堪比拟的科学的确定性来取代宗教的确定性。科学或许已经增加了我们对于生命的控制(不过有一点很关键,它尚未征服死亡),但却未能为我们提供引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念(Weber, 1948 [1919])。相反,现代性中的意义(meaning)逐渐趋于私人化。这就给越来越多的个体留下了独自承担的任务:确立并维持所需的价值,从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意义(sense)。

[2] 根据《泰晤士报》委托进行的研究(*The Times*, 2002 年 10 月 19 日),从 1994 年到 1999 年,英国健身市场增长了 81%。目前在英国有近 2000 家私人健康俱乐部,2001 年新开办的俱乐部达到创纪录的 156 家。——原注

吉登斯用“高度现代性”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些现代趋势在 20 世纪晚期的极端化态势。吉登斯认为,无论是现代性还是自我,都完全不像某些谈论后现代性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属于时代错置的社会学关注。社会生活依然受着现代关注的形塑,哪怕只是到了现在,这些关注的连带意涵才逐渐充分显露。在西方世界,正式的宗教框架原本建构并维护了寓于个体之外的那些生存确定性和本体确定性,随着这些框架逐渐衰微,随着消费文化中的身体作为符号价值的载体大举兴起,高度现代性中的人们倾向于更加重视身体作为自我的构成要素。有些人丧失了对于宗教权威和宏大政治叙事的信仰,不再从这些超人身体的意义结构那里得到清晰的世界观或自我认同。对这些人来说,身体至少开始像是能够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在现代世界中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仰赖的自我感。实际上,不妨认为,人们与其身体之间的关联方式越来越具有反思性,这正是使高度现代性成其为高度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之一。不仅如此,在这个青春、苗条/修长、性感的身体被赋予前所未有的价值的时代,象征着自我的正是身体的外部区域或者说表面。

二、不确定的身体

这些导引性的议论只是刚刚开始勾勒,身体在怎样一种背景下兴起,成为当前一项至关重要的社会议题和学术议题。虽说促成身体变得令人瞩目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有两股表面矛盾的发展趋势似乎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具备了手段,能够对身体实施程度前所未有的控制,但我们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关身体是什么、应当如何去控制它们的知识,都遭到了彻底的质疑。

从生物繁殖、基因工程、整形手术到运动科学,在五花八门的领域的发展趋势作用之下,身体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包含诸多选择可能和选择权利的现象。这些发展趋势增进了许多人控制自己身体的潜力,但也加剧了他们的身体受别人控制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全都拥有相关的资源或兴趣,有能力彻底重构我们的身体。实际上,人们力求控制自己身体时所采取的手段往往采取了更凡俗的形式,像节食和健身。不仅如此,企业经管人员和无家可归的人对于身体的关注很可能大相径庭。然而,我们眼下生活在一个媒体的时代,有关这些发展趋势的知识广为流传,有些人没有资源对自己的身体实施控制和照

看,主观上本来就感到被剥夺,掌握了这种知识,也很可能更加搓火。显然,身体有可能不再受制于曾经标志其存在状况的那些约束和限制。然而,这种情形既赋予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潜力,也会刺激个体对何为身体产生更高层次的反思性,对应当如何控制身体更不确定。科学强化了对于身体的干预程度,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何为身体的知识更不稳定,相形之下,我们对应当允许科学在多大程度上重构身体做出道德评判的能力则显得赶不上趟儿了。

如果径直提出,我们越是有能力控制并改变身体的限制,就越是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个体的身体、身体中哪些成分属于“自然”,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过度简化。比如说,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使得生育脱离了传统上规定异性经验的那些肉体关系。在英国,对于“无性生育”的道德恐慌鲜明地体现出,这些发展趋势威胁到许多人对于身体中哪些属于自然成分的认识。一贯耸人听闻的英国流行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头版抨击道,“在这项动摇家庭生活核心的规划/阴谋(scheme)中,处子之身的女性也有机会生宝宝了。”(Golden and Hope, 1991)

器官移植手术和虚拟现实之类领域中的进展蕴涵着危险,会瓦解身体与身体之间、技术与身体之间传统上存在的那些界限,从而加剧了对于身体的这种不确定感(Bell and Kennedy, 2000)。这样的情绪造成的后果是实实在在的。诚如特纳所言,在未来的社会里,当植入和移植都广为普及,大大发展,“古典哲学中有关同一/身份(identities)与部分/部位(parts)的设问就成了具有重大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议题。如果这个身体的实质已经不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还能为其行动负责吗?”(Turner, 1992a, p.37)堕胎和代孕之类的话题已经围绕身体的所有权形成了一些两难困境,而上述发展趋势势必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困境(Diprose, 1994)。

三、身体规划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有关何为身体的知识越来越以假设的形式出现:“主张很可能符合实情,但在原则上始终存在着修改的可能,甚至会有朝一日被彻底抛弃。”(Giddens, 1991, p.3)对于现代个体的自我认同感而言,这种情境可不能说无关痛痒,他们是从自己具身性的生平经历切入,反

思性地理解自我。在生活富足的西方世界,人们往往把身体看成一个处在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的实体,是一项应当致力打造的规划(project),落实为个体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对于个体形塑、打磨其身体的种种尝试,我们可以回溯到早期基督教时代,甚至回溯到古典时代(Brown, 1988; Foucault, 1988)。不过,身体规划不同于各个传统社会中对肉身(flesh)做出的那些装饰、铭刻乃至改变^[3],因为前者涉及某种反思性,完全摆脱了有关可被社会接受的身体的传统样板,那些样板是通过社群典礼中的仪式来塑造的(Rudofsky, 1986 [1971])。身体规划还会沿循社会性的分界线有所变化,尤其是社会性别的分界线,不过近些年也冒出来大量新的方式,是无论男女都会用来发展自己的身体的。

一旦意识到身体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人的一项规划,连带着就要承认,身体的外表、尺码、体型甚至内容,都有可能依照其主人的设计,接受重构。但是,把身体当成一项规划,并不一定需要每时每刻关注其全面的转型,虽说身体是有这种潜力的。不过,这里的确需要个体对其身体的管理、维护和外表有自觉的意识和主动的关切,需要切实承认,身体无论是作为个人资源,还是作为社会符号,发出有关某人自我认同的讯息,都具有重要的意涵。在这种情形下,身体变成可塑的实体,在其主人的时刻用心和艰辛劳作之下,得到形塑和打磨。 <5>

有关身体作为一项规划,最常见的例证或许要算是对于健康的身体的个人建构,它所获得的关注程度可谓史无前例(Shilling, 2002a)。我们的健康越来越受到全球性危险的威胁,当此之时,我们却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劝告,要我们投入严格的自我照看的规制^[4](regimes),以此为我们的身体担负起个体的责任。心脏病、癌症以及其他一大堆疾病都越来越被描绘成可以避免的,只是要靠个体合理饮食、停止吸烟、充分锻炼。自我照看的规制要求个体充分重视以下观念:身体是这样一项规划,其内部和外部都可以通过监管、养育和维护,保持充分的功能运转。这些规制倡导一种特定的身体意象,视之为全球系统中

[3] 原文为“altered”,在美式和澳式的英语中特指阉割或切除卵巢。

[4] 原文为“regime”,这里的译法可能与国内对福柯著述中此词的译法不尽相同,此词兼有“体制”、“生活秩序”、“生活规则”乃至“饮食起居”或“养生法”(参“regimen”)等义,本书的译法也是为了照顾作者强调身体同时作为源泉、规制、中介的说法。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制”不单单是“制约”、“控制”之“制”的否定性意涵,也有“制度”、“章法”中的肯定性意涵。

的一座安全岛，而这个全球系统的特征，恰恰是风险重重，无从逃避 (Beck, 1992)。

自我照看的规制并不只是为了预防疾病，也致力于让我们对自己身体在我和别人眼中的形象感觉良好。健康越来越维系于外表，维系于欧文·戈夫曼 (Goffman, 1969) 所称的“自我呈现” (presentation of self)。而种种自助读物、造型指南^[5]、节食副刊、锻炼计划层出不穷，也为这些关注推波助澜。消费品彼此争战，竞相要让人们的身体看着放心、感觉舒心，为人们提供各种方案，维护皮肤质量，保持肌肉弹性，通过看上去很健康，很青春，释放出健康的讯息 (Banner, 1983)。实际上，这种特别的身体规划影响非常大，就连那些烟鬼酒鬼或是药品毒品成瘾者，也会觉得很难不掂量掂量，这种行动对于自己身体的健康和外表会产生什么后果。在这个政治上强调“自力救助”和“个人责任”、文化上注重“身体之美”的时代，那些沉溺这类癖好的人已经成了新型的道德偏离之徒。话说回来，身体之所以已经成为一项依照人们的自我认同进行塑造的规划，并不只是通过罗伯特·克劳福德所称的“新式健康意识” (Crawford, 1987) 对于我们的广泛影响。

而整形手术则为个体提供了机会，以更加彻底、更加直接的方式，遵照有关青春活力、女性特质 (femininity)、男性特质 (masculinity) 的具体观念，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体。这样做的个体虽然人数比上面要少得多，但也正在迅猛增长。面部除皱术、局部吸脂术、腹部抽脂术、隆鼻术、瘦脸术之类的“活儿”，人们只要有钱，又想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体，有各式各样的手术和措施可以选择，以上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自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以来，仅在美国，对那些试图使身体更显“女人味儿”的妇女实施的隆胸手术 (breast implants) 就远超 200 万例。更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也竞相效仿，接受隆胸手术 (chest implants)，以求看上去更显肌肉强健。而那些希望花钱买一副更显“完美男子气概”的身体的，也可以选用阴茎充填术 (penile engorgement) (Grant, 1992)。

整形手术使人们有可能把脂、肉和骨注入或抽出自己的身体，从而以特别

[5] 原文为“make-up guides”，不仅仅是化妆手册，而且是通过衣着、配饰、用品、谈吐、举止乃至所谓神情、气质、品格的综合打造，“扮靓”、“装酷”乃至更加细分的“型”、“款”、“路线”。传媒社会发展至今，尤其是动漫网游、选秀节目和虚拟现实的发展，这种“制造”更包括了个人生平（“一路走来”）和“控”/“被控”之类的内容。

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何为身体？”在这一点上，许多报章杂志都登过不少文章，谈到有人做过多种手术，沉迷于根据某种理想化的自我观，改变自己身体的外表和界限。这方面最具新闻价值的实例，或许就是面目已然大相径庭的流行歌手迈克尔·杰克逊。^[6]

而对于那些不愿意或没能力冒险做手术的人来说，还可以选择健美^[7]，这项活动原本只是处在健身产业的边缘，不属于常态，如今也越来越流行。健美之所以堪称作为一项规划的身体的范例，正是因为从事健美活动的人所练就的肌肉以其质量乃至纯粹的尺码大小，挑战了何为自然的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的一些公认观念。当机器在工厂中逐渐取代传统由男人执行的体力劳动，当女人不断挑战社会中提供给她们的相夫教子之类的有限角色，建构并展示在很大程度或很高程度上“并非天生自然”规定的身体，似乎就能使人们做出强硬、公开、个人的陈述：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Fussell, 1991)。罗森研究从事健美运动的女性时，其中有一位如此说道：“我照着镜子，就会看见一个在找自己位置的人，她已经说了，社会说我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真的再也不重要了。我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并且我会为此感到自豪。”(Rosen, 1983, p.72)

现代个体越来越重视自己身体的例子不胜枚举，健康、整形手术、健美运动这几项规划只是其中三例。不过，它们至少体现出，随着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会带来哪些机会，也面临哪些局限。对身体予以投入，会赋予人们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并有可能感觉良好，增加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即使你觉得没有能力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发挥影响，至少可以对自己身体的尺码、体型和外表产生一定的效果。至于确定应当如何处置身体，甚至何为身体，并没有什么最终的标准，这或许会使这种机会的益处打些折扣，但也不能就这么轻率地否认，在现代社会中，身体作为一项规划的兴起，是能够让人们逐渐受益的。

对身体的投入也有其局限。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投在身体上的努力注定是要打水漂的。身体会逐渐老化、衰朽，死亡是一桩不可避免的现

[6] “MJ”已经成为挑战“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成人”/“孩童”等诸多“界限”(boundaries)的象征。

[7] 这个词的一个更传神的译法叫做“塑身”(bodybuilding)。

实,这似乎让现代人特别困扰,因为他们非常关注的那种自我认同,正是以身体为其核心的。说到底,比起腰围增厚、赘肉松弛乃至必然死亡这些冷峻事实,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更有效地告诉我们,我们对于青春健美、富有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理想身体的关注,其实是有局限的?

<7> 之所以说身体受到限制,不仅是因为它们终有一死,而且是因为它们常常拒绝顺着我们的意图被塑造。有许多论家已经指出,要通过控制饮食来改变体型,其实会遇到很多困难,苏西·奥尔巴赫(Orbach, 1988)和金·彻宁(Chernin, 1983)只是其中两位。而艾米丽·马丁(Martin, 1989 [1987])则揭示了女性往往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自己的身体超出了控制。显然,试图改变我们身体的尺码和体型自有其风险所在(比如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整形手术和长期节食蕴涵着危险)。我们对于身体的反思性关注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孩子的影响。人们开始对自己的体型和体重感到焦虑的年龄似乎越来越小,研究表明,就连九岁年龄组都有一大批女孩和男孩不满意自己的身体(Hall, 1992)。我们当前如此执迷于身体,而进食失调的发病率又日益增长,令人忧心,这两方面之间的关联或许并不让人奇怪(Gordon, 2001; Grogan, 1999)。

综上所述,我们的身体既有其**促动性**,因为它们依然葆有生机,又有其**约束性**,并不只是因为它们会死去。不过,我们在关注身体作为一项规划的时候,齐格蒙特·鲍曼有关身体与死亡之间关联的看法也大体适用。他在谈到健康与自我照看的规制时提出,现代对于身体的执迷“属于试图通过不断地破除身体当下遇到的**具体的限制**,以掩饰身体的**终极限制**”(Bauman, 1992a, p.18)。这种实用主义的聚焦方式就是试图拖延令人困扰的一些生存性问题:身体的**终极限制**(即死亡),身体为何应当成为我们的自我认同的显著要素,以及究竟何为身体。

身体作为一项规划的兴起还面临一点局限,即通过某种方式,利用个体有关值得欲求的身体的意象,延续既存的社会不平等。由此观之,对于某些女性而言,身体成为一项规划的方式与其说是表达了她们的个体性,似乎更像是反映了男性的设计和幻想。比如,不妨说演艺业和模特业就是在鼓励女性遵照男性的审美观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罗伯特·格伯(Gerber, 1992, p.46)指出,“今日,天生丽质或是整形变身的女性,已经成为时尚的参照。”

四、社会学与身体

基于上述原因，以及容待第二章探讨的其他一些原因，身体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然而，只是到了最近，身体才进入欧洲和澳洲的一般性理论探讨的核心，而在北美，对于这项主题的态度依然相当暧昧。对于这种姗姗来迟并且仍有很多欠缺的身体的“登场”，当前的一些说明往往认为，之所以存在这种状况，是因为古典社会学对于其研究主题，传统上采取的是一种**非具身性 (disembodied)** 思路。比如特纳就在其《管控身体》一书中持这种意见 (Turner, 1992a)。社会学受到了笛卡尔思想的深刻影响，遵循哲学中的一股古老传统，接受心身两分，并把焦点落在心智上，认为它规定了人之作为社会存在。 <8>

这种说明颇有道理，准确描述了社会学中相当的一部分往往是如何处理心身关系的。不过，它并没有完全公允地认识到，社会学也专门处理了人的具身体现，视之为有其独立理据的主题。同样不能让人满意的是，有观点认为，只要重探经典，就可以“复原”身体 (Williams and Bendelow, 1998)。如果我们打算翻新有关身体的各种古典社会学学说，至少必须做出大量的详述与推进。与上述两种思路截然不同，我认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古典社会学展现出对于身体的**双重思路 (dual approach)**。回顾历史，身体在社会学中并没有遭到彻底忽略，而是属于一种**缺席在场 (absent presence)**。古典社会学很少持续聚焦于身体，视之为有其独立理据的考察领域，就此而言，身体在这门学科中是缺席的。比如说，社会学理论很少考虑到，事实上，我们都有一副血肉之躯，使我们能够品尝，嗅闻，触碰，乃至交换体液 (Connell and Dowsett, 1992)。然而，当古典社会学关注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运作，关注人的行动的性质，势必会引导它探讨人的**具身体现**的某些重要面相。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古典社会学对于身体的关注都并非直接明了，而是间接隐曲。不仅如此，它往往还有所取舍地聚焦于人的具身体现中的某些面相。比如说，社会学会重点关注语言和意识之类的议题，却没有认识到，这些能力本身就是具身性的。按照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说法 (Elias, 1991)，我们的语言能力和意识能力寄寓于身体，从属于身体，并且受限于身体。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古典社会学未能认识到，身体是人的行动 (agency)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我们的身体，使我们能够展开行事，介入并改变日常生活流。实际上，如

果不考虑身体,就不可能在理论上充分阐述人的行动。从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讲,所谓行动的人,也就是行动的身体。

不过,尽管古典社会学尚未充分探讨人的具身体现的完整意涵,但却没有理由认为,社会学对于其研究主题,向来采取的是一种完全非具身性的思路。比如说,卡尔·马克思(Marx, 1954 [1887])就很关注身体是如何被吸纳进资本主义技术的。格奥尔格·齐美尔(Simmel, 1990 [1907]; 1950)阐述了推动人们趋向他人的那些具身性倾向,有助于维持关系的那些社会情绪,并考察了货币经济如何产生破坏效应,侵蚀了这些情感。而从马克斯·韦伯(Weber, 1985 [1904-05]; 1948 [1915])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关注身体的理性化,关注艺术、爱与情欲所提供的那些“庇护”,以摆脱物质工具主义。埃米尔·涂尔干(Durkheim (1995 [1912])注重那些神圣现象,认为其有助于将个体维系在一起,融入道德整体,而身体既是这些神圣现象的定位所在,也是其源泉所系。事实上,晚近的身体研究大多能够从古典社会学的遗产中有所借鉴并且受益良多,这本身就体现出身体在社会学中的间接在场。比如说,布迪厄研究身体的著述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和社会再生产的关注,涂尔干一脉对“集体表征”和“原始分类”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的兴趣,以及韦伯路数对于规定地位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及荣誉或耻辱之属性指派的注重(Brubaker, 1985; Shilling, 1992)。

但是,捍卫古典社会学,反击指责它对其研究主题采取完全非具身性思路的说法,显然不等于支持它对于身体的处理方式。就此而言,有必要举出一些比较晚出的社会理论家,他们成功地克服了社会学传统上对身体采取的那种双重思路。比如说,戈夫曼与福柯各自在分析“互动秩序”和规训系统的时候,就把身体置于分析的核心。

这两位论家都深深影响了当代将身体视作一种社会建构而成的现象的分析思路。不过,他们的著述大多并没有完全克服古典社会学的有关缺陷,不妨看成是以另一种形式复制了社会学往往对身体采取的那种双重思路。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往往向我们详细阐述,社会是如何侵入身体,形塑身体,对身体进行归类,让身体蕴含意义,但身体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够具备这样重要的社会意义,我们却所知甚少。身体被命名为一种理论空间,但却常常依然遭到相对忽视,没有切实成为分析的对象。实际上,把比较极端的社会建构论身体观

归类为我们现代对于身体的关注本身的症候，而不是对这种关注的分析，或许还更加准确一些。

这样应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认为，迄今为止，社会建构论的思路所提供给我们的身体观并不完全让人满意。说身体是从社会角度建构而成的，固然完全没有错，但这种说法却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关于身体的具体特征。所谓被建构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建构论并没有直面这一问题，让我们能够理解社会力量是如何形塑、打磨我们的身体自我，倒往往是从社会理论中抽出了具身性的行动者。在这一点上，我赞同特纳的有关讲法，他提出，我们需要一种基础主义的 (foundationalist) 身体观 (Turner, 1992a)。为了达成对于身体的充分分析，我们需要视之作为一种物质性、物理性、生物性的现象，不可化约到直接的社会过程或分类系统。不仅如此，我们的感觉、认知能力和行事能力，都必然关联到我们都是具身性存在这一事实。社会关系可能会深刻影响我们身体发展，几乎波及各个方面，从身体的尺码、体型，到我们如何看、听、触、闻、思 (Duroche, 1990; Elias, 1991)，但不能只是基于这些关系，就把身体“说明清楚”了。人的身体的养成与转化，的确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结果，但它们依然是物质性、物理性、生物性的实体。

<10>

五、将社会学具身化

我已经略述了贯穿本书研究的一些主要话题，接下来，我将勾勒一下本书的五大目标，并对各章做一番简介。

首先，即如本篇序论前文所述，我打算就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定位与待遇给出一种别具特色的分析，主张身体传统上在学科中属于某种缺席在场。

其次，我给自己设下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简明扼要地评述与身体社会学相关的一些主要视角与学说。不同于晚近一些研究身体的著作，我不打算按照主题来编排本研究中的篇章结构。相反，我有意将书安排成分章处理有关身体的不同视角。在我看来，晚近有关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异彩纷呈，这种方式有助于系统整理并逐一质询。这些研究并不总是被视为探讨身体的社会学著述，但我这样来介绍它们，是想说明为什么它们对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评价这些视角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对于处在社会中的身体，它们使我们能够谈些什么，又有哪些缺失，这些思路揭示了有关身体的什么东西，又在哪些地方归于沉默？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话来讲（Parson, 1968 [1937], p.17），这些视角或思路下有什么样的“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ies），即无法借助某种身体观里主要的“正面规定的范畴”来说明或阐述的那些事实或观察？比如说，某一种思路能否让我们考虑身体对于人的行动的重要性？能否阐明身体对于社会系统随历史演变而变的重要性？能否有助于说明身体为何让众多现代人如此关注？某种特定的身体视角能否让我们考察，西方世界的社会系统为何依然致力于维护以下观念：女性的身体不同于男性的身体，并且较其低劣？

<11> 有些人喜欢明确列出既定的一套标准，据以评估各路学说，他们可能会对我的这种思路提出批评。然而，这种思路的好处就在于，值此身体社会学尚未发育成熟之时，方便我们广泛概览各种身体视角的长短优劣。

本书的第三项要旨就在于，努力超越社会学中现有各种身体视角的描述与分析，初步勾勒我认为更让人满意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以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中有关身体的分析已经取得的可观成就作为基础，为此我从本书前面几章中简述的视角中博采精华，期有所成。我在描述并评估现有的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同时，面对种种深刻见解，也努力另辟蹊径，别求新声。尽管我并不打算在这本书中提出一套完整成熟的身体理论，但在这里，还是值得就我将提出的思路说上两句。

我想指出，要梳理身体这个概念，最富裨益的方式就是把身体概括为一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现象，因其进入并参与社会，而在特定的限制之下发生转化。正是这种生物性兼社会性的特征，使身体这种现象既显白无奇，又难以捉摸。一方面，尽人“皆知”，身体是由皮肤、肌肉、骨骼、血液之类要素构成的，并包含一些使我们成其为人的物种特有能力和能力。但在另一方面，即便是身体上最“天生自然”的要素，在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也会有所变化。比如说，当我们渐渐变老，我们的容颜会改变，视力会下降，骨骼会变脆，皮肤也开始松弛。身体的尺码、体型和身高会根据所得到的照看与营养而各有不同，而身体向社会关系和环境保持开放的性质也使它愈发难以捉摸。譬如说，我们的成长经历会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影响我们的身体：作为小女孩或是小男孩，从走路、说话、看人、争辩、打斗直至撒尿，我们的生长发育都有不同，端赖

于我们从自己父母以及别人那里接收到什么样的身体训练模式 (Haug, 1987)。医学及其他对于身体的技术干预也凸显了身体的生物性兼社会性, 使人们更难以准确把握究竟何为身体。

而从身体的生物性构成与社会性构成出发, 又带出了我想在本书中提出的身体研究整体思路的另一要素。社会学在试图避免生物学化约论的陷阱时, 传统上会将“自然”和“文化”视为各具特色的独立领域, 有关的分析也分属不同学科。但根据阿瑟·弗兰克的看法 (Frank, 1991), 这种分界令人遗憾地反映了身体研究文献中比比皆是自然/文化两分, 往往会假定, 无须诉诸身体的“自然”特征和倾向, 就可以对它做出分析与说明。然而, 这种自然/文化二元论的分裂既无必要, 也无助益。千万年来, 人的身体一直处在进化之中, 为社会关系构筑了真真切切的基础。有必要认识到, 与社会建构论截然不同, 身体并不只是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 或是被注入了社会关系, 而是实实在在地构筑了这些关系, 具备有助于这些关系的生产能力。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物种能力, 比如直立行走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工具使用能力, 使我们能够去锻造社会关系。而那些关系的具体形貌也有它们的一份功劳。比如说, 我们的具身体意味着我们无法同时身处两地, 这就限制了我们在任一时间能够遇到和沟通的人数 (Giddens, 1984)。诚然, 社会关系会以各种方式培养和转化我们的具身性能力, 但它们依然以人的身体为基础。 <12>

我在提出一种探讨身体的整体思路的同时, 也想要指出, 身体社会学需要对心身关系有所表态。有些社会学家往往会忽视这一主题, 只看到作为肉身的身体, 但不能发展到全面考察人的具身体现。而我偏向的立场下文会更加清楚, 我支持说心与身不可分离, 因为心寓于身。不过, 我并不打算详细探讨围绕这一主题而进行的漫长而琐碎的哲学争论, 相反, 我将借鉴乔治·拉科夫、马克·约翰逊和罗伯特·康奈尔的研究, 考察我们所使用的范畴和分类图式与我们的身体存在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哪些社会学意涵。为此, 第五章将直接探讨有关议题, 而第六—八章将间接关注心寓于身的社会学后果。

第五章属于关键性的一章, 确立了这套探讨身体的整体思路的基本框架, 力求超越我认为自然主义身体观和社会建构论身体观的那些局限。我简要考察了人的进化在赋予我们物种特有方面扮演了何等角色, 也大量借鉴了康奈尔与弗罗因德的研究。这两位论家以其所谓“社会性别态身体”和“情感态身体”

(emotional body), 做出了重要的分析。合而观之, 他们的作品表明, 社会区分是如何呈现在女性和男性的身体上的。这些社会性别态的身体又构筑了随后的社会关系的基础,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它们引发了特定的身体观念。在第六、第七两章中, 我还将提出更具争议的观点, 认为可以借用布迪厄和埃利亚斯的研究, 帮助克服自然主义身体观与社会建构主义身体观中明显存在的许多分裂: 生物/社会、心/身与自然/文化。不仅如此, 这些论家的分析并不只是提供了探讨身体的整体方法论思路, 而是还可以解读为提供给我们研究社会中的身体的实际理论。

<13> 对于布迪厄与埃利亚斯的作品, 有许多种解读方式, 但通常不会认为它们提供给我们有关身体的学说, 研究身体的社会学家们也尚未充分利用这些著述。而我在本书中的第四点要旨就是要比较详细地提出, 在他们各自著述的核心, 都有着具体的身体观点, 非常重视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的人的具身体现的社会学后果。我说过, 古典社会学对待身体采取了一种双重思路, 而这种思路肯定还是众多当代社会学的特点。当然, 也有例外, 我认为不妨把布迪厄的研究解读为提供给我们一套身体学说, 身体就是一种**身体资本** (physical capital), 而埃利亚斯的著述的核心要义, 就是要阐述我所说的有关**文明化身体** (civilized body) 的理论。这两位作者为社会学家提供了虽然相左但都有力的身体观, 有助于克服社会学传统上对身体采取的传统思路。至于身体在社会中的定位, 以及它对于人们的自我认同感的意涵, 他们也有很多议论。

布迪厄认为身体是一种身体资本, 这样的看法点出了身体的普遍商品化趋势。在这种情境下, 人的特性/身份/认同紧密关联着赋予其身体的尺码、体型与外表的那些社会价值。与此相反, 埃利亚斯向我们揭示道, 我们的身体是如何不断趋于个体化, 如今已能有助于将我们与别人相分离。他结合这一点, 分析曾经在身体与身体之间爆发的众多冲突, 由于对情绪控制的要求不断加强, 如今转而发生在具身性个体内部。在这些过程的作用下, 我们只能与自己的身体孤独自处; 我们在身体的监督、管理和外表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却丧失了曾经从肆意放纵感官享受和身体欲望中获得的满足。对于“生命态身体” (lived body), 对于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 体验自我及所处环境, 埃利亚斯的讨论比布迪厄详细得多。不过, 从这两位理论家的作品中, 都可以读出要强调一种现代趋势, 即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采取强化了反思性, 而在这种背景下, 死

亡的前景又为何会让现代个体如此困扰。

这就把我带到了本项研究的第五点即最后一点目标：倡导将死亡作为身体社会学的核心要素来分析。与现有的身体研究截然不同，我认为，只有考虑到死亡的前景，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作为具身性的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下，面临着怎样的境况。

六、勾勒身体

虽说我没有在形式上把这本书分成几个部分，但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分成四块大致关联的领域。其一，第二章概述了社会学对于身体的定位与刻画。其二，第三—五章考察了分析社会中的身体的几种方法论思路。其三，第六—九章继续考察一些彼此对立的身体观，同时探讨了在当前这段高度现代性时期，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身体会成为一项规划，并分析对于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取向有哪些局限。其四，“补论”分析了在晚近这些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在关于身体和自我认同的其他备选观念下，身体规划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并力求进一步发展本书所采取的大体思路，包括对正文主要章节中考察过的一些主要理论进行重新评价，确定我眼中身体理论概括的一种意义重大的新趋向。

<14>

第二章细致考察了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以及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兴起。我先是探讨了身体在当代社会学及古典社会学中的缺席在场，然后简述身体在社会学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些原因，包括“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兴起，西方世界人口的老齡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结构转移，以及前文提及的有关我们对于何为身体的知识的问题，这关系到身体在现代性中的理性化趋势。这股“危机”也反映在晚近的后现代主义身体研究上，尽管它们对于差异的重视颇有教益，但却在实质上放弃了对于作为物质现象的身体的理解努力。而身体在流行文化中的表征也反映了这场“危机”。

在第三、四两章中，我考察了当代身体研究所诉诸、借鉴和回应的两股最重要的思想传统。第三章集中讨论了自然主义的身体观。自然主义思路这个术语涵括广泛，统称将身体视作奠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生物性基础的一系列观点。社会源于身体，囿于身体，而身体又受到自然的不变现实的形塑。虽说自然主义观点十有八九让人想到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但它们自有其漫长而歧

异的历史，基本上是以负面的方式，影响了当代社会学家如何理解身体。在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方面，自然主义观点过去和现在都深具影响。不过，诸多受压迫群体也会对自然主义观点调整运用，以证明自己的具身体现有理由受到特别重视。

话说回来，对于自然主义的观点，晚近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绝大多数是表示抗拒的，转而借取看似迥异的另一套著述。第四章有选择地考察了一些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在这类观点看来，身体的意义、重要性乃至存在本身都属于社会现象。身体不是社会的自然基础，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关系合力而成的结果。

<15> 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身体观主要受到了四种思想源泉的影响：一是玛丽·道格拉斯的人类学；二是研究身体的社会史学家的作品；三是福柯的分析；四是戈夫曼的研究。第四章先是简要概括了这方面的研究，然后聚焦于福柯与戈夫曼。人们常常认为，福柯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身体的许多洞见。要说福柯大大促进了社会学家充分重视身体，实不必持疑。但我要指出，他认为身体只存在于话语之中，这样的认识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学是弊大于利。在结语中，我考察了当代的两种身体学说，不妨视之为基于福柯和戈夫曼的研究，一是特纳的“身体秩序”理论，一是弗兰克的“行动问题”身体观。鉴于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在此有必要谈一谈我打算如何考察特纳的身体研究。

在《管控身体》一书中，特纳表示，自己此前的三部著作（《宗教与社会理论》、《身体与社会》、《医学权力与社会知识》）构成了“身体三部曲”（Turner, 1992a, p.254）。然而，按照特纳本人的说法，他在这些研究中所采取的身体观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变化。这在《管控身体》中也同样明显。其结果，特纳提供给我们的身体观念并非一种，而是好多种，有时候还相互矛盾。我们只要看看特纳的主要作品，他已经阐述了一套重要的身体学说，还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研究身体的方法论思路。我先是在第四章中考察了他在1984年提出的“身体秩序”学说。然后，在第五章里，我简要评述了他在1992年提出的方法论，后者旨在融合基础主义的身体观与反基础主义的身体观。我的基本观点在于：特纳最初于1984年提出的学说有所局限，往往囿于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视角。相反，他最新的思路体现出对此前大多数有关身体的理论阐述有所改进，不过归根结底，却无法克服他在尝试融合基础主义身体观和反基础主义身体观

时凸显的那种二元论。

回到本书的轮廓，第五章首先提出，要弥合视身体为生物现象的自然主义观点与视身体为无限可塑的社会建构论观点。然后，我考察了康奈尔和弗罗因德的研究，这两位论家各自关于社会性别态身体和情感态身体的著述都向着这个目标有所推进。我认为，可以以某种方式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研究，有助于克服在身体研究文献中典型体现出的心/身之分和自然/文化之分。接下来，第五章简要考察了工作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具体讨论了阿莉·霍克希尔德关于“被管理的心灵”的出色研究(Hochschild, 1983)。

我在第六、七章中分析了布迪厄和埃利亚斯，打算在第五章的基础上，考察如何把研究身体的整体思路延伸到研究社会中的身体的理论。我认为，这两位论家为我们提供的身体学说是现有理论中最有力的。本篇序论之前已经说过，我也觉得，他们的研究有关现代性中的身体的讨论很有价值，与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有关自我认同和死亡的整体讨论也颇为相关。诚然，事实上，他们都并不刻意发展讨论现代性的明确学说(Bogner, 1992; Lash, 1990, pp.237-265)。<16>

第八章着重考察了高度现代性境况下，身体、自我认同和死亡之间的关系，试图以此综合本项研究的许多主题。我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思路，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死亡和身体的重要性。第一种采自哲学人类学家和彼得·伯格的研究，第二种源于吉登斯讨论现代性的作品；第三种借鉴了此前考察过的布迪厄的著述，以及更具体研讨过的埃利亚斯的作品。

社会学传统上关注的是生的议题，而非死的主题。不过，我认为，只有考虑到现代个体与死亡的对峙，才能充分理解身体在当代的重要性。在这个时代，我们见证到宗教权威及其他总体化叙事的魅力在西方世界逐渐式微，现代个体越来越与自己的身体孤零相伴，独面死亡。我们的身体作为生命的载体，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作为终有一死的凡人，却显得极其脆弱，无足轻重。

最后，在补论中，我基于本书初版刊行以来身体社会学的发展，回顾了本研究之中的一些重要主题，包括分析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重估古典社会学的贡献，更具批判性地看待结构化理论之类的当代发展。我在这儿的立意，就是要勾勒这样一种身体观的基本维度，视之为兼具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现象，能够作为社会之构成过程的多维中介来分析，从而进一步发展本书前面九章所提出的思路。

第二章 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

社会学自创建伊始，历经发展，始终对其研究主题采取一种非具身性的思路。社会理论家们逐渐习惯于将身体看做另一门学科的领地，或是人类行动一项不可或缺但却无甚可观的前提条件，又或只是社会控制的目标。至少可以说，从这些社会理论家的著述中通常可以构建出的画面就是这样。不过，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身体在社会学中具有某种双重地位。纵观历史，身体并非完全从社会学这门学科中消失，而是属于某种“缺席在场”。

社会学很少持续聚焦于具身性的人，视之为有独立存在理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身体是缺席的。人们通常认为，身体是兼具自然性和个体性的所有物，存在于这门学科合法的社会性关注范围之外。有鉴于此，始终缺席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当社会学开始质疑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分划，理论家们才开始提出，无论是对于人类行动者，还是对于社会学事业，身体都是核心要素。不过，同样也可以认为，在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身体始终是在场的。

在社会学中，身体就像人类的心智一样，往往隐而不彰，但与此同时，归根结底，它又使周遭的东西保持生机，获得滋养。社会学要关注人类社会，势必就要关注具身性的主体是如何将社会制度外化、客体化继而内化的（Berger, 1990 [1967]），哪怕只是间接的关注。尽管生理性的血肉之躯很少成为明确的社会学关注对象，但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具身体现的诸多面相（比如语言与意识，激发行动的那些倾向与情感）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当代社会学家努力探讨并克服身体在社会理论中的双重地位，也已形成越来越多的文献，要将身体带回社会学。

但这绝不等于说，古典社会学已经对身体这个概念做出了充分的梳理。本章中，我将更为详细地描述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并回溯身体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兴起过程。

只需略览一番这门学科的核心领域，就能看出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从社会流动、种族歧视、“底层阶级”的形成、健康与教育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直到全球化，这些领域的研究都间接关注了身体的运动、定位以及对于身体的照看与教育。所有这些研究领域都以不同方式关注，对于人们身体的分类与处置，即将其归属于某一特定的“种族”、性别、阶级或民族，会通过哪些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形塑着人们的社会机会和预期寿命。以健康与疾病研究为例。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的不平等态势促使社会学家追问，人们的社会存在是怎样以如此显著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身体。显然，身体不容小觑，它们足够重要，构筑起许多社会学研究的“隐性”基础。 <18>

话说回来，纵然如此，社会学家一向回避专门针对身体进行分析，直到晚近才有所改观。在上述的例子中，他们集中考察的问题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偏见与歧视，对于工作与家庭的依附，获取各类服务的渠道，以及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种种本地过程及全球过程的相互交织。即使可以说身体是社会学考察的基础，十有八九也是一种隐性的基础，理论阐述不足，被想当然地接受。以全球主义的研究为例，各类身体、身体意象和身体维修的全球流通也属于国际贸易的核心关注（例参 Phizacklea, 1990）。这里面包括了邮购新娘、曼谷买春游甚至是童奴买卖。而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贸易则是不那么耸人听闻的实例。比如说，美国篮球圈各大联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均开设有专门学校，按照克莱因的说法（Klein, 1991），正系统地掠夺这个国家的一流体育人才。这些现象彼此歧异，但都可视为身体剥削，只是程度不同，而身体剥削属于各类全球化过程的核心。可是，在有关全球化的理论阐述中，人们却很少看到身体被明确赋予它所应有的重要意义。相反，身体又一次占据了缺席在场的位置，它对于所研究的过程的重要性很少得到细致探究。

尽管人的身体或许在某些方面激发了社会学想象力，但如果社会学研究不能充分重视身体，眼界格局固然狭隘有限，研究质量也是大打折扣。教育社会学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经济发达的西方世界，教育系统几乎培养了民族国家边界之内每一位年轻人。实际上，像珍妮特·芬奇这样的社会政策分析学者，

之所以把学校视作提供福利服务的首要载体，学校教育的义务性质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Finch, 1984)。学校这类场所有能力确保孩子与致命疾病相隔绝，监控身体遭受虐待的迹象，有机会得到营养均衡的膳食，并参与体育锻炼。简言之，学校不单是教育孩子的心智的场所，也参与监控并形塑年轻人的身体。

法国顶尖社会学家布迪厄从整体上考察了学校教育在身体方面的蕴涵。他还分析了“文化资本”的发展如何通过孩童获得特定的性情、品位和能力，体现在孩童的身体上 (例见 Bourdieu, 1984, 1986)。然而，布迪厄的研究虽然影响不小，但北美和英国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有关学校教育的理论却还是聚焦于语言和心智，而不是人的具身体现的其他特征 (Shilling, 1992)。比如说，教育社会学传统上都很关注社会阶级、认知发展、意识形态、证书颁授、社会流动之间的多重关联。这种思路已经产生了有关各社会内部教育机会的丰富的重要数据，但也加剧了那种误解，即学校教育只关乎心智，只关乎一类知识，即抽象的、学院的知识。无论是往往将教育视同为智力发展的自由主义者，还是绝大多数认为学校的功能就在于向学生的心智灌输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再生理论家，他们的著述中都能找到这类提法。这些视角在其他分析方面殊少共性，但都未能充分重视学校教育的具身体现，或者说是教育知识的肉身蕴涵。老师教孩子们穿戴“得体”，要求定时如厕，以免尴尬，上课时端坐肃静，遵守晨祷或向国旗敬礼之类日常仪礼，以实现有活力、受管理、被规训的身体，而不只是会发言、能听课的身体。你不得不认为，在学校教育的日常事务中，教师的这些努力至关重要。

对于身体的学校教育中有关过程的重要性是不应被低估的。布迪厄主张 (Bourdieu, 1988a)，学校参与生产了特定形式的身体控制和身体表达，有助于从孩子和成人那里赢取一些形式的赞同，否则心智原本可能予以拒绝。社会学家如果忽略教育的这些特性，对这些机构 / 制度 (institutions) 的看法就会流于片面，有所误导。

行文至此，我集中谈的是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的一个方面，即社会学如何很少明确将身体作为研究主题重点考察。但我还要提出，不妨用特定的理念来梳理身体，使之在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占有一席之地。身体之所以很重要，其根本缘由乃是基于如下假设，即身体的各种能力、感觉、体验和管理，不仅是实施人的行动与约束时的核心要素，而且对社会系统的形成与维护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假设来自于哲学人类学的关注,以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正是这些具身体现的条件,强有力地刺激了社会学的研究。

我们的生命体验必然是以自己的身体为中介的。戈夫曼已经清楚地揭示道,我们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就是使日常事务的流动有所不同的能力,有赖于通过时间和空间来管理我们的身体。换句话说,我们都拥有身体,都以自己的身体展开行事。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无论是来自在学校学习,去往上班的地方,在办公室里工作,买东西煮饭吃,还是与伴侣做爱,都与对于自己和别人身体的体验及管理分不开。身体的出生与死亡就代表着人的生存的起点与终点,从摇篮到火葬场,个体要仰仗身体与身体之间存在的各种照看与互赖关系。人的具身体现对家庭和友谊的形成与维护中牵涉到的复杂技术至关重要。而社会的存在本身也取决于现存及新生身体的再生产。 <20>

就这样,身体已经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因为我们对于身体的体验和管理形成了赖以锻造社会生活和社会理论的部分材料。对于社会共性、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差异的理论阐述,是我们对于具身体现的体验构筑了基础。我们都拥有身体,这使我们成其为这样一种人:有能力彼此沟通,体验共同的需要、欲望、满足与受挫 (Doyal and Gough, 1991)。

话说回来,尽管人的具身体现至少提供了沟通和共享体验的潜在可能,但无论是在社会系统内部,还是不同的社会系统之间,寓于身体和对待身体的方式都是各不相同。马塞尔·莫斯早在1934年即已指出,各文化俱有特别的“身体技术”(techniques of the body),为其成员提供特性/身份/认同,支配婴儿期、青春期和老年期,并引导着休息、言谈和行走之类的活动 (Mauss, 1973 [1934])。不仅如此,就像埃利亚斯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身体差异不仅随文化不同而变,也因历史相异而变。比如说,在西方世界,我们对于身体排泄物的敏感度在最近数百年大大增加,同时出现的趋势是,把我们的体表视作自身与外在世界之间固定不变的壁垒 (Corbin, 1986; Elias, 1978b)。身体也随个体不同而变。我们都拥有身体,但我们并不都能用眼看、用耳听、用手摸、用嘴说,以及独立地移动。拥有一副身体,既具有促动性,也有其约束性。比起那些青春焕发、身体健全的人,老年人或残障人往往更会觉得受到自己身体的约束 (Campling, 1981; Featherstone, 1995)。关于个体身体的这一说法也关系到更为一般性的条件:除了凭借我们拥有 (having) 身体而存在的行动可能性,我

们还受到作为 (being) 身体这一冷峻事实的约束。身体所构成的条件, 既提供给我们生命, 也确保我们终有一死 (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21> 综上所述, 身体在社会学中既在场也缺席。之所以说在场, 是因为拥有身体与作为身体所带来的诸般机会和约束, 塑造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使其有了具身性。虽说社会学长久以来很少明确聚焦于身体, 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但它也曾考察过具身体现的特性, 探讨过具身体现的后果。比如说, 研究健康与疾病的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评价, 归根结底关系到人的具身体现的后果 (Turner, 1987, 1992a)。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以意识、知识与意识形态为其核心关注的研究 (例如 Mannheim, 1991)。诚然, 意识在身体中的定位, 意识形态、知识与身体之间的关系, 向来殊少探究 (Lakoff, 1987)。纵然如此, 也不能否认, 事实上, 社会学研究必然关系到人的具身体现的某些维度, 虽说有时只是间接的关联。

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并非意外兴起, 也非随性发展。相反, 身体作为某种缺席在场的位置属于学科的遗产, 可以回溯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在此有必要稍加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因为它有助于揭示社会学最初的发展为何会展现出对于身体的某种精神分裂式立场。尽管社会学最初的发展未能给出明确理论以奠立身体社会学, 但有关社会存在的具身体现的议论总还算颇具价值。略览这门学科的早期发展也有助于说明, 缺乏对身体的持续而明确的聚焦, 为何并不妨碍日后的社会学家借鉴社会学传统中的一些关键维度, 以打造自己对于社会中身体的研究构架。

一、古典社会学中的身体

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 在这门学科的“创建先贤”们的关注话题与研究著述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 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 以及齐美尔、费迪南·滕尼斯和卡尔·曼海姆等其他古典社会学家, 都很少聚焦于身体, 以身体的整体性质作为其考察主题。特纳甚至极而言之: “有关社会行动者的本体性地位的问题始终隐而不彰, 如果说古典社会理论家转向这类议题, 也是从行动的角度来规定人类行动者, 实际上意味着对于目的的理性选择。” (Turner, 1991a, p.7) 但在另一方面, 身体又因其太过重要, 无法从这些社会学家的著

述中被彻底排除。这些社会学家一方面关注语言和意识等具身体现的其他方面，而在有关方法论、社会系统的构成、现代性等主题的最重要的著述中，又常常出现作为社会控制的生理要素的身体。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如何使工人阶级的身体维系于并臣属于机器，涂尔干阐述支撑道德秩序之构成的基本过程，以及韦伯讨论科层制下身体的理性化，都非常明显地展现出这一点。 <22>

所以说，首先，身体的整体性质未能在社会学的创建中占据核心位置是完全有理由的。像涂尔干这样的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确定并确立一块学科领域，与自然科学截然有别，不可化约为后者。涂尔干宣称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规定社会学的兴趣与方法都迥异于心理学 (Durkheim, 1938, p. xlix)。心理学关注的是与社会相对的个体，而心理学角度的说明在涂尔干看来，也是基于他所称的“有机心理”因素。这些据说属于个体有机体的前社会性特征，乃属与生俱来，独立于各种社会影响 (Lukes, 1973, p.17)。因此，自然/社会这一二元对立就成了人的标志，在涂尔干眼里，生物性的身体被牢固地置于自然的领域。

这种观点对社会学影响深远，意味着在社会学家合法的考察领域中，自然范畴和生物范畴的东西往往被排除在外，无关紧要 (Newby, 1991)。这样一来，社会学家要把人类具身体现的特性融入自己的研究，必然会踌躇再三，因为这些特性被认为不妨让生物学或心理学等学科来给出说明。因此，社会学的创建及初期发展作为兼具社会维度和认识论维度的研究规划，严重妨碍了身体成为研究主题。

古典社会学之所以未能发展出明确宣示的身体社会学，特纳 (Turner, 1991a) 找出了四点具体原因。它们都与“创建先贤”们所贯彻的学科研究规划有关。第一，涂尔干、韦伯、齐美尔、曼海姆等社会学家一般都不怎么关注人类的历史进化，而是关注各个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以及这些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要把握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欧洲发生的那些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意义。古典社会学家们关注雇佣劳动、城市中心和机器化等方面的增长，关注政治民主与公民权的兴起，以及宗教力量的式微，价值与信仰的逐渐世俗化。这些变迁波澜壮阔，这就显得很有必要基于一些社会层面上的因素的变迁来做出说明，比如社会分工 (涂尔干)，阶级斗争与生产力 (马克思)，或是理性化和理智化 (intellectualization) 过程 (齐美尔与韦伯)。

第二，社会学往往聚焦于分别在怎样的条件下，社会中能实现秩序与控制或是社会变迁。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学者们不仅关注其功能运作，并以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社会作为焦点。但正如齐美尔与韦伯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这并不排除关注个体。不过，社会学的确蕴含着这样一种立场，基于社会性基础而非生物性基础的相互关联来构造理论。令人遗憾的是，身体常常被概括为一种“自然的”、前社会性的现象，不值得给予认真的社会学分析。

第三，人的行动所要求的那些能力开始被视同为意识与心智，而不是对于整个身体的管理。身体充其量也只是被视作社会行动的一项平淡无奇的条件。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学就是一例典型，将通过理智处理的理性行动视为真正的人类行动。身体通常被看成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容器，充当着积极主动的心智的外壳（后者被确认为使人有别于动物的特性）。与这一点相关的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于那些被视为社会学说明之核心的概念二分，古典社会学采取怎样的取向。结构/行动之间的两难困境（涂尔干注重作为“物”的社会事实，而韦伯强调理解，就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通常比有关心/身关系的议题得到更优先的考虑，后者往往被留给哲学的领域。

第四，这些认识论立场和本体论立场在理论上产生的后果就是：人类学将身体视为一种分类系统，而社会学对这种观点并不怎么感兴趣。是心智，而非身体，充当了与社会分层有关、源于社会分层的那些意象的接收器与组织者。按照特纳的说法（Turner, 1991a），这种思路最持韧的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与物化的强调。

特纳开列的这些有关“创建先贤”未能发展出一套身体社会学的原因，对于他们的某些著述的评价或许过于苛求（Shilling and Mellor, 2001），我在下文的讨论会揭示这一点。不过，它大致反映了身体理论家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研究的。不仅如此，除了特纳的这些原因，还有两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在古典传统中为何没有任何明确宣示的身体社会学。第一点牵涉到这门学科所倡导的那些方法论路数。这些路数注重的是抽象的认知探究，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视为外在于身体并完全脱离于身体而运作。比如说，涂尔干提出，职业社会学家的心智要保持开放而空旷，清除一切情感偏见之类的身体不纯，才能够把握社会事实的现实。概念思维是由社会提供的，根据定义，概念与“感觉”相对，后者以身体为有机基础。这种强调不仅往往贬低身体经验在知识积累中能够扮

演的角色，而且质疑专业外行动者知识的有效性，原因正是它很可能受到肉身存在的感染 (Bauman, 1992b)。涂尔干提出 (Durkheim, 1938)，我们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诸般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令人困惑、转瞬即逝的主观印象，没有半点科学的观念或说明性概念可言。

<24>

最后，“创建先贤”们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身体社会学，主要原因中或许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作为男人的具身体现。我在本节开头业已强调，社会学的创建既是一桩认识论规划，也是一桩社会性规划，而这规划是由男人来贯彻的。女人十月怀胎就已风险重重，一朝临盆更是死亡频发，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也成了工业革命的特征，倘若马克思、齐美尔、韦伯和涂尔干都是女人，或许会对身体给予更多的考虑，从而反映出上述问题。虽然这并不等于说知识完全可以化约为身体的直接体验，但却是承认知识与具身体现之间密切关联，不可分离。“创建先贤”们的个体生平与主导其所处社会的那些社会议题之间紧密相关，深切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学学说，如果在历史的那一刻，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与身为一名女性有关的肉身上的危险，那么他们的著述很可能会大大加强对于具身体现的这类特性的关注。

当然，要说经典社会学彻底忽视了身体，也不完全符合实情。诚然，身体常常得不到重视，成为合法的社会学关注的主要对象，但由于它在理解社会生活方面至为紧要，意味着经典社会学家不可能完全忽略它。按照特纳的讲法 (Turner, 1991a)，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韦伯的著作，又通过尼采、埃利亚斯、马尔库塞和福柯的作品的后续发展，身体自有其一段历史，虽然是边缘化的，几近于“秘史”。比如说，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很关注与自觉意识有关的肉身境况，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资本主义下的分工的有害后果，使工人的身体趋于畸形，只适合于工作场所有限的、重复的活动。与此类似，《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1970 [1846]) 关注人的物质存在、劳动与意识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一方面是受人的生活境况决定的自然，另一方面是那些境况的实际转化，人的发展就是这两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结果。身体这个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实体，始终处在成为 (becoming) 的状态，具备超越的潜能，但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才能充分实现。

涂尔干固然是将社会学看成对于“社会事实”的研究，但他也关注这些事实如何融入个体的身体倾向。在图腾社会中，集体的特性/身份/认同往往径直铭刻在

<25> 其成员的身体上。这是因为，身体“分享某种共同生活，这些成员常常是几乎出于本能地往自己身体上描绘或印刻形象，以提醒自己记住”这种生活 (Durkheim, 1995 [1912], p.233)。文身作为“确认心智交契 (communion of minds) 的最直接、最具表现力的手段”，就是这种“本能”的例证，发生在那些氏族或部落当中，“全无任何反思或计算” (Durkheim, 1995 [1912], pp.233—234)。

齐美尔的著述则可以解读为始终不懈地关注具身性生命与各类社会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 (Shilling, 2001)。这就涉及他的主张：个体的身体倾向赖以表达自身的那些形式，起初构成了生命表达的产物，但不久就逐渐稳定下来，发展成为固定的传统或制度，毫不关注新涌现的身体需要 (Simmel, 1971 [1918])。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人的身体特征的影响尤其有害。货币经济对待任何事情都看的是其交换价值，助长以手段支配目的，并就此使人们远离达成特定目的或与特定他人互动所能带来的感觉愉悦 (Simmel, 1990 [1907, pp.429—430], p.444)。在城市生活中，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差距被缩短，货币经济与这样的城市生活维系在一起，也就抑制了活力，侵蚀了有助于将人们维系到稳定关系中的那些情感。

韦伯在讨论新教伦理、社会行动、理性化、科层制“铁笼”、克里斯玛及情欲等问题的著述中也关注了身体。比如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Weber, 1985 [1904—5])，韦伯考察了加尔文宗的天职观，认为这种观念确认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伴随的那些心理状况。韦伯认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会使人们产生深切的不安，并展现为强烈的动机，要在此世过一种全面纪律化 / 规训化 (disciplined) 的虔敬生活。这尤其会将清教徒们引向工商业，可以每时每刻、没完没了地致力于积累金钱。这种“现代经济生活精神”的核心，就是自愿让身体受制于严格的例行常规。在生产领域付出辛劳努力，伴随着在消费领域力行俭省，拒绝感官享受。特纳其实就曾提出 (Turner, 1992b)，在韦伯的作品中有一点隐含的关注，就是现代性与身体之间的关系。

如此看来，在“创建先贤”们的著述中，已经牢固确立了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他们的有些作品鲜明展现了生理性、物质性的身体，而这些分析依然影响着当代有关身体的被剥削和理性化的研究。话说回来，他们所确立的社会学研究规划的整体取向却有碍于将具身性的人放到考察的核心位置。涂尔干的《自杀论》就是一例典型 (Durkheim, 1951[1897])。这项研究整个儿其实

就是关于不同形式的宗教共同体对于身体分别产生的效应，但却没有明确阐述可视为其核心的具身体现的理论。

<26>

这门学科在 20 世纪的发展依然展现出对于身体的某种精神分裂式立场。比如说，社会学继续渴望维持自身作为一块单独的研究领域的地位，所以抗拒各种生物化约论，就是在研究人的行为、社会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时候，通过它们的“自然的”生物性基础来做出说明。基于这样的抗拒立场，那些结构主义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都关注影响心智的意识形态，关注有关语言、意义和理解的问题，而对于说明身体中那些通常被视为从生物范畴来阐明的特性，依然不感兴趣。这就导致了无论是结构主义社会学还是解释性社会学都未能充分重视人的具身体现的整体性质。相反，在它们的发展中，相当片面地聚焦于人的具身体现的某些特性，而这些特性非常容易被宣称为属于社会范畴（语言与意识）。比如说，在结构主义的概念理解中，结构往往被视同为支配性价值系统的认知内化，通过使个体沦为它们毫无控制力的那些力量的产物，消解了身体其他方面的特性的因果意涵（例参 Althusser, 1971）。与此相反，解释性的研究又大多认为，行动维系于个体塑造或重塑其日常生活的心智能力与语言能力。尽管意识和语言同样有着具身性，但它们这方面的存在特性却常常遭到忽视。相反，当身体被描绘成一个消极被动的外壳，需要主体的创造性心智来激活，完整的肉身性的行动者往往消失在种种“规划”、“意向”、“视角”和“应对策略”的丛结之中（Schutz, 1970; Woods, 1980a, 1980b）。

二、身体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兴起

尽管经典社会学的关注存在局限，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却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强调身体的重要性。他们聚焦于身体，把身体在传统社会学中被赋予的那种“隐含”的重要性给挑明了，并力求使身体逐步充分融入这门学科。其结果，相关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数量稳步增长。这当中最重要的应属特纳的作品（Turner, 1984），奥尼尔的《身体五态》（O'Neill, 1985），弗罗因德（Freund, 1988）与弗兰克（Frank, 1990）的评论，以及费赫、纳达夫与塔齐合作的三卷本身体史文献汇编（Feher, Naddaff and Tazi, 1989），而费瑟斯通等合编的文集（Featherstone et al., 1991）也有助于使身体成为社会学中不容

小覷、蓬勃发展的研究对象。

<27> 这项工作致力于提高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使其从某种缺席在场的状态，逐步成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它明确指出了研究身体可能会给这门学科带来哪些好处。比如说，聚焦于身体和具身体现，就会使人对社会学家传统上关注的许多问题，比如结构 / 行动之分和宏观 / 微观之分，产生新的想法。不仅如此，由于身体处在自然 / 文化之分和生物 / 社会之分的核心，而这些二分在历史上充当了勾勒并限制学科范围的角色，因此不妨认为，充分重视身体，对于拓展学科范围，延伸到环境之类的领域，可谓至关重要。

那么，为什么在 20 世纪的后期，身体会凸显为一种被视为凭其本身就值得细究的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考察一些社会变迁和学界演变，是它们在这个时期凸显了身体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这并不等于说，身体在此前各历史时期无足轻重。其实，传统上，每逢经济危机，战乱动荡，社会剧变，身体就会成为各国政府的关注对象。比如说，在 19 世纪的美国和英国，人们普遍忧虑富人不加节制，过度肥胖，而穷人却营养不良。这些议题都牵涉到担心种族退化、社会血统下降 (Searle, 1971)。当新兵招募在人们眼中成了问题，就更强化了这种担忧。比如说，在英国，1864 年至 1867 年间，每千名应征者中就有 408 名被军方出于身体理由拒绝入伍，而在 1869 年，海军更是从 5567 位报名参军的男青年中剔除了 4410 位 (McIntosh, 1952)。布尔战争^[1]之后，这些话题依然延续，种族生理退化问题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of the Race) 领导了一系列社会改良，关注种族面临的威胁：生理上、身体上的退化。该委员会属于一股更大的“国民效能” (national efficiency) 运动，更关注的是身体而非心智。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统计发布之后，美国也表现出对于青年人身体强健状况的类似担忧。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社会整体而言的身体形貌令人瞩目。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生理学教授估测，仅纽约市民就多长了一千万磅的赘肉，而这些肉更好的用场本应是作为士兵的配给。他更指出，对于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最具爱国意味的行为应当是努力减肥。另有些论家提出，应当把从节食中省下

[1] “Boer Wars”：1899 年至 1902 年间，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布尔人（阿非利堪人）共和国之间的战争。

来的钱投放到自由公债^[2]中去 (Green, 1986; Schwartz, 1986)。身体已经成为国族强健 (fitness and health of the nation) 的隐喻, 并且绝非史上头一遭。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社会以更激进的方式利用了身体, 作为意象, 作为理念。法西斯主义, 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 以对于“勇蛮之躯” (mindless body) 的崇拜为核心, 体现在其艺术上, 而其源头则是明确宣示的值得想望的社会身体观。

所以, 只是诉诸身体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兴起, 并不能完全说明社会学家当前对于身体的兴趣。然而, 不妨认为, 身体确切的社会意涵已经开始转变。身体曾经由各国政府来赋予意义。而到晚近, 女性这方面越来越关注于“索回”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要求”, 而整体而言的人们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界定为个体的所有物, 与其自我认同不可分割。与之伴随的是序论中提到过的那些趋向, 我们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越强, 就越是质疑身体的意义。就此而言, 身体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在现代的兴起, 是以一种此前隐而不彰的方式, 与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相吻合。不仅如此, 一旦身体被承认是一种正当有效的研究对象, 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们就会越来越认识到, 本学科传统关注的那些议题其实也隐含着对于身体的关注。 <28>

更具体地说, 为当前对于身体的关注奠立背景的那些社会变迁和学界演变包括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兴起; 聚焦于西方社会中老年人需要的人口变迁; 与现代资本主义结构变迁有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 以及前文提到过的我们对于何为身体的确定性出现了“危机”。

首先, “第二波”女性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兴起及其随后的发展, 将有关生育控制和堕胎权利的议题列入了政治议程。这些趋势还奠立了女性当中更为广泛的规划的背景, 就是从男性的控制和滥用中“索回”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要求”。吉尔·柯卡普和劳丽·史密斯·凯勒指出 (Kirkup and Keller, 1992), 在这方面, 自助群体是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纳了促进女性对于其身体的了解与控制的种种努力 (例参 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 1971)。这还牵涉到一股强大的传统, 在争取投票权与反核和平运动之类的政治斗争中, 女性都曾不顾自己身体的安危。诸如此类的抗议方式并非史无前例, 也被新型社会运动采用, 比如绿色和平运动的成员为了增加公众对于身体面临

[2] “Liberty Bonds”: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发行的战时公债。

的污染危险的意识，不惜让自己暴露在相当大的生理风险之下。

女性主义者一方面将身体用作政治行动和抗议的载体，同时，她们对于妇女遭受到的压迫的分析，也将身体带入了学术上对于男权制/父权制(patriarchy)的概念阐述。许多理论将家庭界定为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位的依据，而一些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生物性的身体才是男权制的首要源泉。苏拉米斯·菲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Firestone, 1971)就是最为著名的例证。菲尔斯通此书饱受抨击，指其有些分析乃是基于生物化约论，因为该书的核心命题是，不平等的性别阶级体系是直接源于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所具备的不同的生育功能。然而，这份早期女性主义文献的重大价值之一就在于，它直接
<29> 在支配与臣属系统中讨论身体的意涵。再往后，有关男权制/父权制的更为成熟的讨论以菲尔斯通的研究为基础，将身体融于力求整合生产分析与生育/再生产分析的框架之中。例如，麦克多诺与哈里森(McDonough and Harrison, 1978)结合生育控制与性别分工来探讨男权制；海迪·哈特曼(Hartmann, 1979)试图通过考察男性对女性的性的控制，以及获取经济上更具生产力的服务，来界定男权制；而西尔维娅·沃尔比在讨论男性的暴力和性时提出的男权制模式(Walby, 1989)将其分为六块一定程度上彼此独立的结构，来探究人的具身体现的重要性。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也非常强调身体作为女性遭受压迫的基础，比如通过作为建构“强迫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定位场所(Rich, 1980)。

身体除了出现在有关男权制的一般性讨论中，女性主义者还进行了一些更具体的研究，比如在色情作品、卖淫和代孕母亲中女性身体的商品化(Singer, 1989)。她们还大力强调女孩和男孩的身体受到不同的社会化(Lees, 1984)，并着重指出，女性怀孕和生产期间对于其身体的医疗服务和处置，影响其发展的有关知识却是以男性为导向的(Greer, 1971; Martin, 1989 [1987]; Miles, 1991; Oakley, 1984)。而围绕生育和家务劳动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的有关争论，也凸显了女性作为男性身体与儿童身体的首要供应方的位置(Oakley, 1974)。比如说，尼基·查尔斯和马里昂·克尔提出(Charles and Kerr, 1988)，无论在物质意义还是符号意义上，妻子都要负责家庭的一日三餐，并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牺牲自己身体对于休息、娱乐和营养的需要，以确保老公和孩子都能吃饱喝足，有个大病小病的还得照料(亦参 David, 1980; Murcott, 1983)。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的研究清楚表明,事实上,女性往往不得不学习如何凭着一副所谓“不堪其负的身体”生活下去。按照罗森的说法,那些既要相夫教子、又得职场打拼的女性,“常常体验到情绪上和生理上的巨大压力:原因很简单,有太多彼此冲突的要求要应对,事情总是太多,时间总是不够。”(Rosen, 1989, p.213) 基于这类洞见,女性主义理论也强调,在法律角度和社会性别角度上的压迫体制中,身体也具有整体上的重要性,并考察了人们的具身性存在究竟是如何维持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Eisenstein, 1988; Griffin, 1978; Heritier-Auge, 1989)。

女性主义这样强调女性的具身性存在,不仅仅是凸显了身体如何以多重方式蕴含于不平等与压迫的社会关系。有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分、自然/文化之分、生物/社会之分的分析,开始瓦解从流俗之见到学院思想在男女两性之间设置的那些肉身性边界,至少是减少了这些边界的力量(例参 Oakley, 1972)。实际上,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也质疑了生理性别差异的本体论基础,从而有助于使“女人”与“男人”、“女性”与“男性”、“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等用语的性质本身成为问题。

<30>

这就触及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值得在此着重谈谈。女性主义思想并不总是聚焦于女性的身体而排斥男性的身体(尽管文献有时会让人产生这种印象,觉得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比男人“具身性更强”)。需要把男女两性的这些身体看成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主体,因为男性身体所实施的权力和强力大大有助于控制女性的身体。不仅如此,“男性研究”在北美和英国的发展也为研究男性特质的具身体现加了一把力。诚然,这类研究大多被指责说过于静态,只关注男性之所是,而非男性之所为(Maynard, 1990)。但是,它的确进一步推动了将身体视作社会学关注的正当对象的研究。以男性研究为名的课程数量在20世纪70、80年代取得了显著增长,并伴之以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比如普莱克与索耶1974年在美国出版的合编文集,托尔森1977年在英国出版的研究二战后男性特质问题的著作^[3](参看 Kimmel, 1987)。这股传统也包括讨论“男同性恋”之社会建构的重要著作(Bray, 1982; Weeks, 1977)。按照杰夫·赫恩与大卫·摩

[3] 书后参考文献列出的出版机构是纽约的 Harper & Row, 但此书当年亦由伦敦的 Tavistock 出版社出版。

根的说法 (Hearn and Morgan, 1990), 男性研究虽然聚焦于性, 但并不自动连带着要考察身体。可在实践当中, 这两项主题是相互关联的。而晚近对于男人、性与艾滋病传播的研究更强化了这种情形, 包括关注涉及性液渗透与交换的特定性行为被赋予的文化意义 (Connell and Kippax, 1990)。

男性研究中有一个方面与本处讨论尤其相关, 就是几位论家所完成的对于男性身体形象 / 意象的考察。比如说, 米什金提出, 男性也越来越执迷于男性身体形象 / 意象, 并维持自己所欲求的一种关于完美身体类型的理想化形象 / 意象: “英武阳刚, 胖瘦适中”^[4]。基梅尔概括了米什金的研究 (Kimmel, 1987), 找出三种导致这种执迷的社会趋势。其一, 将同性恋男子污名化为“做男人很失败”的现象有所缓和, 用健美肌肉同志男 (gay macho bodybuilder) 这一新的刻板印象, 取代了柔弱做作“娘娘腔” (limp-wristed “sissy”) 这一旧的刻板印象, 增加了男性对于身体形象 / 意象的整体关注, 也使这些关注合法化了。其二, 女性加强了对于公共领域的参与, 男女两性之间在认知、行业 and 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趋于缩小, 导致某种“男权强烈反弹” (muscular backlash)。在这种背景下, 身体形象 / 意象就成了男性可以有别于女性的少数几块领域之一。第三种相关趋势就在于, “养家糊口者”的角色在形塑男性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调消费和自我认同, 而其核心正是关注身体的外表 (Bourdieu, 1984; Ehrenreich, 1983; Featherstone, 1987)。所谓男性越来越执迷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男性身体形象 / 意象, 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杰福兹所著《美国重振“雄”风》一书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America*, Jeffords, 1989) 的支持。该书考察了这类形象 / 意象得以兴起并可加利用的具体方式及原因。杰福兹谈到, 最近几十年来, 女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收益, 在这种背景下, 男性特质的身体形象 / 意象却在文化中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些形象 / 意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越战电影热潮中尤为盛行, 倡导的是作为一系列备受推崇的品质的男性特质, 它们面临威胁, 应当通过“将女性和女性特质排斥出”公共生活来加以防卫。

如果说女性主义的兴起是凸显身体重要性的首要因素, 那么第二个因素就在于西方社会中老年人口的增多。这已经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 很大程度上是

[4] 原文为“mascular menomorph”, 指具有男性特质的中胚层体型或体育型体质。

因为这种人口趋势的经济意涵。在养老金、医疗供给、护理服务、居住等方面，人口趋于老龄化对社会政策和政府开支产生了重大影响 (Turner, 1991a)。人的身体越来越成为焦点，既是这些变迁的原因，也是这些变迁的结果。医学进展已经促成了相比上个世纪而言大大提高的预期寿命。但与此同时，医疗服务也面临着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方面的更多问题。它们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方。而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间，受到“新右翼”观念的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府权力都不断扩张，关注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公共开支的投入，更凸显了这种情形。

而社会学专业人口的老龄化也可以看成是对于身体的学术兴趣增长的原因之一，哪怕算不上重要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社会学家的生命体验与反思性使得对老年社会学的研究兴趣不断上升，而这又发展成关注更一般层面上的身体社会学，关注对于身体的社会界定如何进入“青年”和“老年”之类的整体观念，并赋予它们不同的符号价值。在当代消费文化中，青春焕发、修长苗条、充满性感的身體备受推崇，而步入老年的身体则往往从公共关注中隐退（比如说，我们极少看到它们在电影中投入性的活动）。

使身体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第三点因素在于，20 世纪下半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了转换。大体说来，强调的重点不再是生产领域的辛勤劳动，以及消费领域的俭省和否弃。相反，以倾向于储蓄并投资的劳动力为基础的那种竞争性资本主义逐渐式微，每周工时历史性地缩短，休闲导向的生产繁荣兴旺，激励着现代个体既努力工作，生产各种物品与服务，也致力于消费。与此相关，身体在消费文化中也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助长了“展演性自我” (performing self)，把身体看成是一台机器，通过定期体育锻炼、个人健康规划、多吃富含纤维食物、服饰色调搭配之类的措施，对这台机器进行精确校准、悉心照看、全面重构和细致呈现。费瑟斯通提出 (Featherstone, 1982, p.22)，在消费文化中，身体不再是罪恶的容器^[5]，而是呈现为展示的对象，无论卧室内外，私密公开，皆是如此。

<32>

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也可以把这些事件看成是 19 世纪开始的那些变迁的后续发展，当时的服饰与身体呈现从直接标示社会地位转向展现人格

[5] 原文为“vessel of sin”，在宗教的意义上，“vessel”直指作为某种精神或品质的接受者的人。

(Sennett, 1974)。曾几何时, 绚丽奢华的衣着、帽饰、化妆与假发都被视为自有其独立的意味, 与社会地位不可分离, 展演着社会地位; 时至今日, “自我的呈现”(Goffman, 1969) 被认为可以标明个体真实的性格。^[6] 在当代的消费文化里, 这有助于人们一方面体验到成为其身体, 意思是说, 从否定或肯定的角度将自己界认为身体的“外表”, 另一方面又体验到一种不时发作的焦虑, 担心如果不再坚持不懈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劳作与核查, 后者就有可能让他们垮掉或“散架”^[7]。这种身体焦虑观念深深影响了许多人如何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一项规划, 并且牵涉到感觉环境充满危险, 超出控制, 以及惧怕衰老、疾病和死亡。鲍曼指出, 考虑到“身体培育在自我构成的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 最要担心的危害就是通过渗入皮肤或与皮肤接触, 导致身体中毒或致残”(Bauman, 1992b, p.199)。晚近盛传的恐慌所聚焦的事件包括疯牛病、鸡蛋沙门氏菌感染、取食毒藻的海虾、倾倒有毒废料, 以及煎炸焙烤或微波加热的食物中致癌成分丙烯酰胺含量居高。

身体之所以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 背后的第四点因素在于序论中提到的一种趋势, 即控制我们身体的潜力渐长, 却伴随着身体的意义出现了危机。特纳 (Turner, 1992b) 在讨论现代性对身体实施的控制趋于增强时指出, 节食对于身体最初的理性化至关重要。早期的节食规划关系到宗教价值观念, 而到了 19 世纪, 随着营养科学的确立, 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饮食控制的科学文献。这些知识最初应用于社会政策领域, 以衡量囚犯和新兵之类人群所需要的食物。查尔斯·布思和西博恩·朗特利等社会改良家也采用这些知识来测量英国大城市中的贫困水平。不仅如此, 身体的理性化还与所谓“人的科学”密切相关, 后者致力于在监狱、军队和工厂车间等场所, “通过对于身体的规训和组织, 融入一套尽可能提高效率、强化监控的规制, 对心智进行再教育。” (Turner, 1992b, p.123, p.126)

由于器官移植手术、人工授精、试管婴儿、整形手术等方面的进展, 我们

[6] 要避免误读的是, 戈夫曼的用意并不在于当今文化中的个体可以更加“任性率真”地通过展示身体来展现自我, 而在于真实、真诚本身的意涵发生了变化, 进而言之, 所谓的“深度自我”转向了身体 (外表) 这一自我的外在呈现。这一点与埃利亚斯的论述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虽然戈夫曼一向被抨击缺乏历史向度。

[7] 原文为“fall apart”, 这不仅仅是担心身体这台“机器”四分五裂, 而且也关系着“identity”(同一性/认同)的整全如一, 甚至可以细化为服装乃至配饰的搭配。

控制身体的能力继续飞速增长。奥尼尔指出 (O'Neill, 1985), 现在我们的身体上没剩下几个部位是技术无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加以重构的。植发可以消除秃头, 假牙更是司空见惯, 而能够植入人体的器官种类也是越来越多。心脏移植手术已经不再具有新闻价值 (除非是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实施, 即便是这样, 新闻价值也大多在于科学干预婴儿身体的能力)。眼球移植可以恢复视觉能力。起搏器使心脏有缺陷的人恢复正常功能。各式各样的身体部位都可以使用人造材料来重新构造, 而越来越精致的假肢近年来也逐渐普及。

常被用来描述这类发展趋势的意象之一就是“机器态身体” (body as machine), 在这方面的讨论中, 很有必要指出, 这种隐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民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感知中 (Rogers, 1991)。乍看起来, 这种意象似乎有悖于以下观念, 即在 20 世纪下半叶, 个体致力于将自己的身体界定为个体所有物, 与其自我认同不可分割。所谓“机器态身体”的隐喻, 或许是说身体本质上乃属相对于自我而言的“它者”。然而, 个体可以毫无阻碍地感觉到, 身体就是自己的机器, 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定期锻炼、健康体检等善加维修、精心校准。不过, “机器态身体”之喻至少让各国政府有机会将两种身体观念维系在一起, 一是作为一项个体规划, 一是作为适应于社会控制的实体。

英国政府 1992 年颁布的白皮书《国民之健康》(*The Health of the Nation*) 就是一则耐人寻味的例证。这份白皮书与全国性报纸上的一系列广告配合发布, 描绘了掩藏在男女身体的血肉之躯下面的机器意象, 同时掀起了一场运动, 旨在“增进每一位英国人的健康, 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加长寿、更加健康”。这场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是要让人们照看自己的身体, 当做是能够加以维修、校准的资源, 以求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肺癌和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

话说回来, “机器态身体”并不仅仅是一种医学上的意象。最常看到以这种方式来领会并处置身体的领域之一就是体育运动。猛烈抨击体育运动的论家指出, 有关机器的词汇主宰了体育运动领域的语言, 认为正是通过体育运动的实践, 身体才被理解为“达成某项目的一种技术手段, 输出与生产的物化因素…… 作为一台机器, 工作就是尽最大可能输出劳作与能量” (Brohm, 1978)。在体育运动中, 身体被视为一台复杂机器, 既可能改进其表现, 也可能发生故障, 有待修理, 和其他任何机器没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形下, 运动科学早就开始完善装置, 培训技术, 身体包含的那些对竞争性成绩 / 表现 / 绩

效/展示 (performance) 而言最为重要的部件, 都被具体指明、逐一分解、更新转化。人们早就认识到, 竞技体育上的成功往往被某些国家所主导, 它们拥有特定的科学知识, 能尽善尽美地应用于作为“原材料”的运动员的身体。

要讨论身体的理性化, 就很有必要认识到, 这是一项高度社会性别化的现象。身体受制于愈益强化的规训与控制的方式之一, 就是通过科层制的规制, 具体指明具体时间里必须执行具体数量、具体品质的工作, 而不考虑工人的身体需要。生产规划有时也属于这一范畴, 如果未能保证工作日期间足够的睡眠与休息时间, 就会导致与压力相关的疾患, 无论男女皆是如此 (Hochschild, 1983)。不过, 马丁 (Martin, 1989 [1987]) 与索菲·劳斯 (Laws, 1990) 提出, 科层规制使女性身体受到的控制往往更甚于男性的身体。这是因为, “在时间与空间的组织基本不考虑以下因素的机构中”, 人们期望女性会管理并隐藏经期、孕期和绝经期有关现象 (Martin, 1989 [1987], p.94)。

行文至此, 我集中谈的是伴随着现代性中的各种理性化进程, 对于身体的控制大大增长。然而, 尽管理性化让我们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控制自己的身体, 同时也使身体受到别人的控制, 这种双刃剑的性质使我们不再那么确定, 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身体, 一副身体结束、另一副身体开始的具体边界何在。

不妨把电子传媒与电影的晚近发展趋势看成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两种表现。比如说, 所谓“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可能会消解技术与身体之间的边界。有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 关系到“遥控角先生” (teledildonics) 的概念, 就是使用者穿上紧身衣裤, 连上微型振荡器。通上电话后, 就把其他穿上类似装置的人“连到了一起”。使用者在电话交谈的同时, 会伴随着人工诱发的身体感觉, 而头戴接收装置中也会出现有关自己身体投入性接触的电脑化视觉表征 (Rheingold, 1991; Springer, 1991)。遥控角先生通过与既无具身性又经过卫生处理的“亲密关系”接触, 有希望实现安全的性的最高境界。

恐怖电影从另一个角度例证了身体的意义与边界的不稳定性。在这里, 对于身体的威胁过去常常来自外部, 而现在则往往来自体内, 原因就在于身体内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 主流趋势是把受害者刻画成容易遭到来自外敌的攻击, 比如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 (aliens)。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身体遭到恶魔附体 (possession) 的威胁, 比如《驱魔人》(The Exorcist)。《异形》(Alien) 三部曲让 John Hurt 和 Sigourney Weaver 都“生出”怪兽, 伴随着《橡

树街恶梦》(*Nightmare on Elm Street*)系列,对于身体内部稳定性的威胁在80年代继续增长。当受害者做梦之时,可怖的“弗雷迪”(Freddy)从脑海深处浮现,残害并毁灭毫无反抗之力的身体。而当机器越来越具有人性,人却越来越像是机器,《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电影则继续再现着身体内涵的不确定性。^[8]

我们有关身体的知识出现的这场危机还有一点例证,就在于社会学家想要精确指出身体究为何意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即如特纳在其1984年的作品中所言,“我在撰写这项身体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不确定身体究竟是什么”(Turner, 1984, p.7)。就此而言,我们现在有了话语性、物质性的身体(Turner, 1984),生理态、沟通态、消费态、医学态的身体(O'Neill, 1985),个体性和社会性的身体(O'Neill, 1985; Turner, 1992b),以及医疗化、性别化、规训化和谈话态的身体。我们还在德语中看到“身体”(“Leib”, 生命态身体)和“躯壳”(“Korper”, 肉体外壳)的区别(Ots, 1990),以及将这种区别进一步细化为身体的精神性、化身性与躯体性、物质性(Frankenberg, 1990)。这些区别让我们领略到,在有关身体和人类具身体现的研究中,所探索的主题丰富多彩。它们还表现出社会学家在确定身体为何时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最明确的反映,就是那些后现代主义的著述,它们已经舍弃了“认识”身体为何这一现代主义规划,而径直把身体视为“白板”或“信号接收系统”,始终保持开放,准备由外部文本或话语进行建构和重构(例参 Kroker and Kroker, 1988)。

综上所述,有四项重大社会因素塑造了相关背景,造成了身体在社会学中相对晚近的兴起。它们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兴盛;西方社会中的人口变迁,将注意力集中在老年人口的需要上;消费文化的兴起,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变迁有关;以及我们对于身体为何的知识日益陷入危机。这些因素纷繁多样,足以说明为什么身体作为一项学术探究的对象,其兴起并不仅限于社会学,而是横跨整个社会科学。考虑到有各式各样的社会因素使人们开始关注身体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许多自成一体的学科都会认为,身体对于本学科特有的关怀有着显著的意义。这些因素的多样性还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看待社会中的身体的共同思路方面无甚进展。弗罗因德(Freund,

[8] 该系列电影(从1984年的《终结者》到2009年的《终结者4》,不含外传等)的导演是卡梅隆,主角就是施瓦辛格扮演(在前三集中)的系列型号的机器人。又译《未来战士》、《魔鬼终结者》等。

1988) 和弗兰克 (Frank, 1990) 的评论表明, 有关身体和具身体现的各项研究纷繁多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统合。

<36>

三、在社会学研究中描绘身体

在本章前文中, 我讨论了身体在社会学中的双重地位, 并谈及身体在大多数当代及经典社会学中的位置变幻莫测, 力求由此刻画这样的地位。然后, 我描述了一些凸显身体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的社会因素和学术因素。这些因素涵盖广泛, 表明在社会学中可以写出许多有关身体的著作。比如说, 关于社会性别态身体的社会建构, 身体意象, 医学中的身体, 生物学与文化以哪些方式在人体生育和发育中相互关联, 以及消费文化中的身体, 这些都自有其产生重要研究的理由。不过, 在本书接下来几章, 我打算以比较宽广但不失批判的眼光, 概述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中一些最为重要、最意味的思路。我希望这将提供一些背景, 以定位这一主题的研究晚近为何兴盛, 并在此基础上, 探索一种更为充分的思路, 来梳理身体概念, 身体在社会中的位置, 以及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自然主义的身体观

<37>

身体或许在社会学中呈现一种缺席的在场，但它在社会思想和大众思想的其他传统中却占据着相当核心的位置。在这方面，自 18 世纪以降，自然主义的身体观就深深影响了人们如何领会身体、自我认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各种自然主义观点之间并非完全一致，但也不妨看成是一种统合连贯的思路，因为它们分析身体时，都视之为前社会性的、生物性的基础，自我与社会等上层结构就建立其上。

自然主义观点主张，人的身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受到的约束规定着个体，生成了标志着国家和国际生活模式的那些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物质财富、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都不是社会角度建构出来的，并非偶然生成，可以逆转，而是由生物性身体的决定力给定的，至少是由这种力量合法化的。

时至今日，自然主义思路依然形塑着流行的身体观念，尤其明显地体现在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女性“柔弱的”、“不稳定的”身体所直接造成的。自然主义观点也影响着社会学家如何概括并分析人的身体。这种影响主要是否定性的，因为社会学家往往会对自然主义观点所采取的方法表示抗拒。然而，当代女性主义有一股颇具影响的潮流，就是主张自然主义思路的方法论取向，以此塑造自己对于男权制之起源和维持的非常新颖的观点 (O'Brien, 1981)。我在本书序论中提出，除了对研究身体的不同视角做出描述和评价，我还将博采众长，以勾勒一种别具特色的身体研究思路。现在看到的这种思路，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不平等统统化约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前社会态身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很难成为富有裨益的基础。不过，自然主义观点至少非常强调，人的身体构筑了社会关系的基础，为社会关系出了一份力。本章稍后我

将考察的女性主义一脉的自然主义观点尤其如此。自然主义观点对于它们所认为的人体上的“自然”因素，强调得无疑过了头，并且引申出各种并不确凿的结论。不过，如果社会学要充分把握身体对于社会系统的重要性，的确需要重视身体对于社会关系的贡献。

接下来，我将谈一谈自然主义思路的几个实例，特别注意如何通过诉诸身体，将生理性别差异正当化。不过，在对这种思路的具体实例做出描述和评价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自然主义身体观的源起。所谓生物性身体构筑了社会和社会不平等的基础，这样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维系着某些具体的社会利益。身体史家们已经结合生理性别差异的主题，很好地刻画了这一点。

一、自然性身体的凸显

托马斯·拉克尔 (Laqueur, 1987, 1990) 曾经提出，在 18 世纪之前，人的身体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不具社会性别分化的、类属性的身体。男性的身体被视为规范 / 标准 / 正常 (norm)，而男性的所有部件，女性的身体上也都长了，只是安排的模式不同，要低一等 (Duroche, 1990)。千百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也有和男性一样的生殖器官，只是一个在体内，一个在体外。阴道被想象成朝体内长的阴茎，阴唇就是包皮，子宫就是阴囊，而卵巢则被看成是长在体内的睾丸。人们还相信，女人也会产生精子 (Laqueur, 1990)。

从古典时代到 17 世纪末，这种“一元性别 / 一元肉身”的模式支配了有关生理性别差异的思考。女性被视为低于男性一等，但这种低劣性质并非以任何具体、持续或稳定的方式，内在固有于其身体。身体是重要的，但与日后自然主义观点中的形象不同，身体被视为既是社会意义的生成器，也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

一元性别模式的悖论在于，一组组井然有序的对立暴露出了单一肉身的缺陷，前者并不固有地内在于后者。父性 / 母性、男性 / 女性、文化 / 自然、男性特质 / 女性特质、体面 / 丢脸、合法 / 非法、热 / 冷、右 / 左以及其他众多对子都被解读到身体上，但身体本身并没有明确标示出这些

区别。秩序与等级从外部强加到身体上。一元性别的身體被视为描述因素，而非决定因素，有鉴于此，无论有关差异的轴线和评价变换得多么频繁，身体都能够逐一记录并吸收。从历史上看，社会性别的分化先于生理性别的分化。

(Laqueur, 1990, p.601) ^[1]

鲁德米拉·约尔丹诺娃 (Jordanova, 1989) 提出，人们通常假定，文化与自然之别乃是一种直接明了、稳定不变的区分，并曾用来界定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各自不同的特性与角色。女性的具身体现的条件受到孕期、产期和经期等自然周期的主导。与此相反，男性的具身体现使其心智可以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这就让男性能够投入文化领域。不过，正如引文所示，从历史上看，文化 / 自然之分的涵盖范围和确切意义其实是动态的。社会性别之分在 18 世纪前还被视为是自然的，但这些区分无论是内容还是边界都不是完全稳定的，也不对应于简单的生物学对子。 <39>

拉克尔 (Laqueur, 1990) 为了说明这种情形，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生理性别差异。在文艺复兴时期，至少有两种“社会性的生理性别” (social sexes)，其权利和义务都迥然相异，但人的身体却并不具备很充分的划界，以便为这些区分提供排他性的本体论支持。照常理，将一个婴儿界认为女婴或是男婴这一看似不成问题的过程，维持了这些社会性的生理性别。长着体外阴茎的人就被宣布是男孩，被允许享有该地位的特权，而那些只长着体内阴茎的人就被发派为低一等的范畴：女孩。当然，肉身结构的变化也会使一副身体从一种法律类别（女性）转到另一种法律类别（男性）。这是因为，这些类别“乃是基于社会性别的区别，比如积极 / 消极、热 / 冷、成形 / 未成形、塑造人 / 被塑造等等，而体外阴茎或体内阴茎只是临床症状。” (Laqueur, 1990, p.135,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所以，在 18 世纪之前，自然主义观点并不盛行。男女两性的社会位置不是由各自的生物特性决定的，不管你如何理解女性及其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似乎都是些始终保持开放的身体，接受“文化的解释性要求” (Laqueur, 1990)。不过，在 18 世纪的某个时候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用“不可共度的解

[1] 原文如此，但作者名和页码似均有误。

剖学和生理学”，取代以男性女性生殖系统之相似性为基础的既存的社会差异模式 (Duroche, 1990; Laqueur, 1987)。在 18 世纪, 科学开始赋予“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以血肉 (flesh out), 把它们建立在生物性差异的基础上。相伴而来的在 18 世纪后期, 下面这种观念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性” (sexuality) 作为人的一种独具特色、至关重要的属性, 赋予人自我认同, 与对立的生理性别泾渭分明 (Laqueur, 1990: p.13)。

拉克尔 (Laqueur, 1987) 及其他身体史家都曾指出, 对于男女两性身体的概念理解的这种彻底转变, 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平等主义面临的重大悖论之一有着很大关系。启蒙运动的人体模式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 但由于启蒙运动信仰普遍、平等、不可让渡的权利, 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从没有社会性别差异的身体的源初状态, 如何可能推出男性对于女性实施支配的现实世界。悖论“至少在关注女性臣属地位的理论家眼中, 通过将生理性别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建立在不可共度的生物学基础上, 得以解决” (Laqueur, 1987, p.19)。简言之, 从自然主义角度重新解释女性的身体, 被用来解决某些意识形态问题, 即为 18、19 世纪社会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提供正当性 (Gallagher and Laqueur, 1987)。

随着 18、19 世纪科学的进步, 身体的空间布局及其确切组成变得愈益重要。不仅如此, 身体不再是自我认同和差异的某种展现, 而是越来越被视为人的特性 / 身份 / 认同和社会区分的基础。在 18 世纪, 人们逐渐开始想当然地认为, 以身体为渠道, 我们可以获得有关个体和社会的不容置疑的知识。女性身体无论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象, 还是作为一副躯体, 一套骨骼, 都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Jordanova, 1989; Schiebinger, 1987)。而这种特别关注得出的结果, 就被用来为女性的社会低下地位奠定生物学基础。

二、“女人的麻烦”

纵观历史, 总有人试图将女性“不稳定的”身体界定为支配并威胁着她们“脆弱的”心智, 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也因此不断遭受破坏。霍布斯与洛克在 17 世纪提出的主张, 还有法国大革命, 都对自然的、男性支配的社会秩序的确定性提出了置疑。然而, 18、19 世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却被用来重

新确认了男性的优等地位,确认女性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居于臣属地位乃属必然(Martin, 1989 [1987], p.32)。简言之,具身化成为一名女性的存在,就是拥有一副特别的身体与心智,没有能力经受严格的体力与智力磨炼。

到了18世纪,认为女性在生理上比较脆弱的这些观点汇聚一处,落实为一套有关健康与疾病的模型,主张生活方式和社会位置与人的身体能力密切相关。该模型告诉人们,女性的身体使她们只适于生儿育女,“通过家庭生活创造自然道德”(Jordanova, 1989, p.26)。

转到19世纪初,女性身体与男性身体的结构与功能运作之间的分划越来越明确。这就使女性的身体被概括为病态的。比如说,月经不再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过程,在男性身上也有类似表现(流血杀戮),而成了某种容易导致女性疾病的东西。女性的行为也被视为受经期主导,这种观点甚至被融入了政府的功能运作。例如,1896年,一名美国妇女被免于店铺行窃的指控,理由是她患有偷窃癖(kleptomania),这种病状后来被归结为是由“闭经”所造成的(Shuttleworth, 1990)。

回顾历史,一方面是女性多方努力要赢取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另一方面是确认女性的具身体现在生物学角度上属于劣等的那些学说重新引起人们关注,这两方面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苏珊·巴罗斯(Barrows, 1981)具体刻画了巴黎公社所引发的恐惧,以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开启的政治可能性,是如何激发出一种成熟精致的有关生理性别差异的体质人类学,用来使现状合法化。而在英国,那些反对女性争取投票权运动的人也有类似的反应。不仅如此,当女性开始发起运动,争取上大学的权利时,想要排斥她们的那些企图也是大谈特谈有关生理性别差异的达尔文式进化学说(Fedigan, 1992; Kaplan and Rogers, 1990, p.206)。反对女性上大学的人提出的话题之一,就是女性大脑的大小和容量。在法国,古斯塔夫·勒朋(心理学创建者之一,倡导颅骨测量法)总共才测量了13具头颅,1879年时就自觉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女性

代表着人类进化最低等的形式,她们更近于孩童和野人,而不是成年、开化的男性。……要想给予她们同样的教育,并因此为她们设立同样的目标,就是一种蕴含危险的幻念。

(Gustave Le Bon, 转引自 Gould, 1981, pp.104-105)

还有一种与此相关的观点，担心用脑过度会损害女性的生育能力。19世纪讨论教育的人经常鼓吹，女性的思维活动强度太大或是时间过长，会造成妇科方面某些特定的失调反应和整体上的健康受损。既然女性的自然天职就是生儿育女，学术界也就成了男性的禁脔。约翰·理查森 (Richardson, 1991) 指出，直到 20 世纪，这种观点依然影响着各类教育报告。比如说，1923 年由英国教育署发布的一份报告做出了如下声言：

女孩和成年女性先天体质就受制于周期性的紊乱，这使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注定会在心智整体效能上遭到定期发生的衰减，哪怕只是暂时性的。不仅如此，正是在学校生活最重要的那些年，这些紊乱也是最强烈、最广泛的，一旦这些紊乱中又有一次恰逢某些要紧事件，比如考试，女孩相较于男孩，就会有严重的障碍。

(Board of Education, 1923, p.86)

但如果就此觉得，将女性身体界定为低于男性身体一等的企图畅行无阻，也是一种错觉。比如说，在 19 世纪，对于女性的月经，也有些积极正面的看法，把它说成是一种健康的过程 (Martin, 1989 [1987])。同样，也并非所有将女性身体界定为低人一等的企图都只是依赖于男女两性之间的简单二分对立。人类学家已经看到，长久以来，男性对于女性的能量与生育力，就采取了巧加挪用的态度，而不是自居对立，这些做法在 19 世纪的西方科学话语和医学话语中余音不尽 (Heritier-Auge, 1989)。比如说，1823 年，于连·维雷写道，是精子的能量激活了女性的功能，并赋予已婚女性以自信和勇敢 (Virey, 1823)。女性生性敏感，不仅使她们在生物学角度上更适于养儿育女，而且也受制于胜过心智理性的危险的激情。而这些状态都是男性能主导的，因为人们认为是精子在负责孩子的生产，并激发出“不道德的欲望”。如此一来，女性合乎本分的位置就是在家里居于臣属地位。

尽管在这种观点中存在不协调一致的地方，但女性的脆弱和不稳定确实是被视为由男性来激活和捍卫的。不能说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体就这么占据着自然界中的对立两极，而是说在理论上，男女两性都回应并进一步发扬了有关亚当夏娃的圣经故事，即女性之所以获得了具身化的生命，男性功不可没。

历经 19 世纪，医学职业引领着女性身体逐渐趋向医学化，从雇佣劳动、

性、闲暇到运动等领域，在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之间树立起愈益牢固的界限 (Mangan and Park, 1987)。当然，这种医学化的实际效果基本上只限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男女老幼往往在相似的环境中生产劳动，根本顾不上女性对于休息放松的“特别”的肉身需要。

那些将女性的身体视同为“病态本性”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学说，之所以能够在 19 世纪逐渐流行开来，似乎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性。一则是工业变迁越来越危及中产阶级男性的特权和安全地位，二则是经济类比在理解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首先，19 世纪的经济变迁迅速，使男性产生恐惧，觉得不再能够控制自身的命运 (Shuttleworth, 1990)。工业运行规模越来越大，经济变迁步伐越来越快，似乎威胁到社会生活的稳定，使个体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不重要。自然主义的人体观维系着社会中既存的社会性别分化，有助于将对于经济混乱的恐惧从男性的头脑中去除，移植到女性的生物性身体上：

有关社会性别差异的观念履行着意识形态上的角色，让男性能够重振其对于个体自主和控制的信心。男性与女性不同，不会被身体力量所捕获，不会受制于映射社会循环的不确定流动的摇摆不定。相反，男性是自身的主人，不是机器人，不是整个社会机器上没有心智的组成要件，而是具有自我意志的个体，是经济学理论中理性的个体主义者和自我奋斗的男性活生生的肉身体现。对于那些扰乱性的社会力量，必须毅然决然地加以疏导和调控，以确保主宰经济领域，确保该领域中的循环得到控制。而在家庭领域中，这些力量以转喻的方式，被表征为居家女性的内部身体过程。

<43>

(Shuttleworth, 1990, p.55)

其次，19 世纪的经济变迁规模宏大，步伐迅速，也使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调用越来越多的类比来理解和说明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比如说，苏珊·桑塔格曾经提出 (Sontag, 1979)，有关肺结核之类疾病的医学观念就受到与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相关的态度影响。能量犹如储蓄，会通过鲁莽无谋、不具生产性的花费而耗尽。就社会性别差异而言，月经开始被视为“生育/生产失败”，从而对“自然的”社会性别秩序构成威胁。按照马丁的说法 (Martin,

1989 [1987], p.47), 一旦女性行经, 就会被看成具有危险, 对男性构成威胁。她们“不从事生育, 不传宗接代, 不准备在家带孩子, 不准备一个安全温暖的子宫来滋养男人的精子。”

将女性的身体界定为因其生育功能而与男性身体不同, 并且劣于男性身体, 这样的做法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依然很常见。20 世纪 60 年代, 女性要求分享机会进入工商业界领导岗位的呼声愈益高涨。与此同时, 各种医学理论和常人说法也继承了 19 世纪的前例, 主张女性的行为受其荷尔蒙控制, 在经前紧张期间, 情感上和思维上都会出现偏异, 举止无常, “难以控制” (Dalton, 1979)。诸如此类的观点也被用来捍卫男性的行业特权。比如说, 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就用这种观点来阻挠女性成为飞行员, 美国也有人用这种观点来妨碍女性当上银行经理 (Kaplan and Rogers, 1990)。

三、社会生物学

当代对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不少说明依然认为, 女性的社会位置乃是源于其身体的生育功能。但不管怎么说, 自 19 世纪对生理性别差异大加论述以来, 遗传学说也提供了额外的方法, 将女性的具身体现界定为低于男人一等。

在认为女性较为低劣的遗传学说发展的同时, 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 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这段时间里, 主张女性较为低劣的学说中影响最大的合称为社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最初是于 70 年代在哈佛大学发展起来的, 试图为人类行为确立一种生物学基础。然而, 它不久便成为达尔文进化论在当代谈论生理性别差异的一种影响很大的版本 (Grosz and Lepervanche, 1988)。它之所以迅速流行, 原因之一就是 <44> 在于, 社会生物学把社会不平等说成是自然的遗传基础的必然后果, 不仅证明了现状的正当性, 而且使自身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融为一体 (Rogers, 1988)。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是二战以后政府干预和福利服务的增强。70 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表明, 这种干预主义无济于事, 于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也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历经 70 年代, 从美国到英国, 所谓“新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潮流都曾利用过社会生物学的成分。这样的成分助长了这些正在兴起的政治群体, 后来更经由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领导而确立了权

力,力图证明竞争、父权制/男权制、同性恋和核心家庭既是合乎自然的,又是值得想望的。社会生物学通过为现状提供了正当性,也证明了自身灵活可塑。从进攻性、占地盘、智力到男性主导地位,都能“找到”相应的基因。至此,身体的基因构成成了市场和父权/男权秩序的基础,兴起为合乎自然、不可变易的上层结构。

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说明单位就是基因。基因是每个细胞核内部的遗传材料,决定了个体发色与血型之类的基本生理特征。比较复杂的特性,像一个人的“人格”,并不依赖于单一基因的作用,仅仅诉诸基因是无法说明的。然而,社会生物学恰恰是这样的逻辑。社会生物学的论证效果,就是要证明简单化约的社会范畴的正当性,理由是这些范畴既合乎自然,又值得想望。之所以说合乎自然,是因为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归结为基因结构。如此一来,就找到了单一的自然原因来说明高度复杂的社会事件。对于世界上的任何行为模式或社会事件,基因都成了终极因果要素(Kaplan and Rogers, 1990)。因此,社会生物学家提出,无论是同性恋,还是遵从,甚或上向流动,都有其特定的基因。他们还主张,基因会影响某人的初次性体验之类的事件发生在何时(Gregory, 1978; Wilson, 1975)。

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范畴和社会关系既被视为合乎自然,也被看成是值得想望的。社会生物学家采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学说,主张那些产生出最适于继续的个体特性和社会结构的基因也会在后代身上延续。因此,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特性就是值得想望的,无论它们是否显著表现出高度不平等和对少数群体的压迫。不仅如此,政治上改变这些结构的努力也非常危险,并极具误导。它们有悖于人的本性/自然,既有害处,也注定失败。康奈尔指出(Connell, 1987),社会成了自然的附生现象。它要么照录自然的意旨,要么在这个过程中“出了毛病”。

就生理性别差异这一具体事例而言,基因据说会通过影响作用于大脑的性荷尔蒙而导致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Bleier, 1984; Caplan, 1978; Rogers, 1988)。由于生理性别差异是由基因所决定的,社会生物学家就质疑女性主义者变革秩序的要求是否具备有效理据(Buffery and Gray, 1972; Tiger and Fox, 1978; Trivers, 1978; Wilson, 1975)。比如说,根据威尔逊的说法(Wilson, 1975),两性之间的分化是由生物特性所决定的,其显著程度足以导致实质性

的分工，哪怕是最具平等主义取向的社会也莫能外。因此，反对或抵制这些差异是没有任何逻辑依据的 (Kaplan and Rogers, 1990)。

这种聚焦于基因的思路有助于消解人的行为和社会结构，它们都不再是突生性的社会现象。它还使社会科学完全仰赖并臣属于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或许堪称范例。根据道金斯的看法，“个体并不是稳定的事物，而是流变的”现象，其主旨即在于充当服务于基因的“维存机器”。社会科学对人及其行为有各式各样的描述，但这些理论未能看到基因方面真正的历史推动力，对其重要性视而不见。

[基因]通过代际传承，从身体跃至另一个身体，以自己的方式、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着一个个身体，放弃一连串朽坏的身体，直至其陷于衰老和死亡……但基因不朽……而个体与群体，就如同白云苍狗，大漠尘沙。

(Dawkins, 1976, p.36)

个体就像是机器人，受着自己所及范围之外的力量的控制。可以根据基因投入继续生存的竞争而付出的成本、得到的收益乃至采取的策略，来说明人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简言之，根本不需要把社会结构看成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突生性的社会结构这码事儿。比如说，人的交配行为方面的生理性别差异，只需要从基因尽可能扩大其维存机会之利益的角度来说明。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女性/雌性据说都会比男性/雄性付出更多的生育方面的生物成本。她必须生产并养育后代，而保障这些成本的最好方式，就是找到一个靠得住的男性/雄性伴侣，协助抚养后代。然而，对于男性/雄性来说，生育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他“尽可以肆意滥交，有得而无失。”(Dawkins, 1976, p.176) 社会生物学家主张，这些五花八门的策略之所以会被采纳，就是因为能够尽量扩大基因传承到后世各代的机会。

这种自然选择观已经被用来说明人身上越来越多的特性。比如说，阿德里认为 (Ardrey, 1976)，女性之所以会发展出性高潮，就是要刺激女性的欲望，以确保男性出外狩猎后还会回来。亚历山大提出 (Alexander, 1974)，之所以会进化出绝经，或许是因为女性到了某个年龄之后，停止生育，专心抚养已有子女，可能对她们来说更有效率。莫里斯主张 (Morris, 1969)，女性之所以拥

有“始终膨大的乳房”，就是要标示出性的魅力。盖洛普认为 (Gallup, 1982)，乳房的发育就是广而告之，深具排卵潜力，以弥补排卵活动隐藏在人体内部这一事实 (Kaplan and Rogers, 1990)。这些肉身广告一旦成功，就使女性更有机会找到交配对象^[2]，更有可能使自身的基因传承到另一个身体上。

简述完社会生物学说明的主要特征，就有必要来看看，对于身体在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这种颇具影响的思路都有哪些缺陷。批评社会生物学的论家有时会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说明形式采纳了生物学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他们看来并不适于考察社会现象。然而，按照康奈尔的说法 (Connell, 1987)，这等于赋予了社会生物学某种并无根据的科学地位。社会生物学其实是伪生物学的，因为它并非基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严肃的生物学考察 (亦参 Benton, 1991)。

社会生物学尽管自称是科学说明，却经不起其理论所依据的生物因果机制的检视 (Connell, 1987, p.69)。诚然，社会生物学的确处理了可以量化的现象，但它却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之间，做出了未经证明的概括，缺乏理据的跳跃。比如说，戈德堡在《男权制的必然性》一书中 (Goldberg, 1973)，用的材料确定了男女两性荷尔蒙水平的平均差异，得出的结论却是男女两性在社会行为上的类属差异。这种思路夸大了差异，贬低了两性分享的一些共有能力，比如语言。康奈尔指出 (Connell, 1987, p.71)，如果认为“荷尔蒙水平上的差异，经由对于个体行为的情境性、个体性、集体性等复杂决定因素，依然是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终极决定因素，那这种看法就预设了一种强大的荷尔蒙控制机制，远甚于生理学研究实际发现的程度。”

社会生物学并没有建立在严肃的科学说明基础上，而是以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特定解释作为出发点，并将其投射回人类社会的某种神秘历史，但这种解释往往带有性别歧视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意味，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错误的。自然选择的过程就这样被设定，以便为这些社会安排提供正当性辩护，使之成为合乎自然和值得想望的 (Connell, 1987, p.68)。

就其传统而言，社会学或许是把焦点放在具身体现的认知特征上，对人类行动者的看法因此有失偏颇。然而，即使当社会生物学重新聚焦于身体或身体的某些组成要素，也有可能把我们化约为我们的基因，对人类的看法同样有失

[2] 原文为“mate”，今天所称的“配偶”或“伴侣”已经掩饰了或者说淡化了纯粹生物性的意蕴。

偏颇。不仅如此，尽管社会生物学假定了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却不能给出任何机制来说明人类生活与社会制度的集体性结构生成，或是社会变迁的可能方向。沃什伯恩认为 (Washburn, 1978)，“如果用适于考察神经系统非常简单的动物的问题和技术来考察人的行为，就无法把握人的行为的全部性质。”

就行为方面的生理性别差异而言，社会生物学还面临一点批评，质疑其说明社会生活的生物学构成的努力。这就涉及社会生物学说明所依赖的“男性”和“女性”等范畴是否正当有效。把人固定分隔成男性与女性这两个互斥范畴，会造成诸多问题，对此，卡普兰与罗杰斯 (Kaplan and Rogers, 1990)、斯坦利 (Stanley, 1984) 和伯克 (Birke, 1992) 等都做出了有益的概括。

新生儿通常会根据是否出生时长有小鸡鸡而被指定属于哪一种生理性别。一般来说，如果遗传物质是 XY (男性)，就会长出小鸡鸡，而如果遗传物质是 XX (女性)，就没有。到了青春期，伴随着荷尔蒙的变化，第一性征与第二性征也随之发育，而荷尔蒙的变化是受 XY 或 XX 的基因型主导的。然而，性征也会受到营养和压力之类环境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个体的基因构成并非只能分成 XY 和 XX，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基因变异可能。比如说 XO，它的特点是一种发育欠缺的女性，没有产出任何性荷尔蒙。XYY 和 XXY 是被标定为男性的另两种基因型。要是考虑到其他状况，比如睾丸雌化综合征 (testicular feminizing syndrome)，情形就更复杂了。在睾丸雌化综合征中，身体的细胞未能对睾丸素做出回应，没有分化成男性模式，即便基因型是 XY，而雄性荷尔蒙也释放出来了。这样的个体在遗传角度上属于男性，但看上去却是女性，虽说并不能生育 (Kaplan and Rogers, 1990, pp.212-213)。

性荷尔蒙也被归类为雄性和雌性。雌激素和孕酮被指为“雌”性荷尔蒙，而睾丸素则被指为“雄”性荷尔蒙。然而，女性也会从肾上腺释放睾丸素，男性也会从睾丸释放雌激素。因此，在两种生理性别之间存在相当的交叠之处，而环境的因素也会改变这种交叠的程度。

至于脑的功能，两性之间的差异还要更小。荷尔蒙对于大脑并没有直接的单向影响，而环境的因素再一次表现出对于脑部功能运作的重要影响 (Kaplan and Rogers, 1990, pp.213-217)。根据琳达·伯克的概括 (Birke, 1992, p.99)，在脑功能方面来谈生理性别差异，“充斥着大量推断和假设，远远超出明晰的证据。”

由于标志个体特征的基因型和荷尔蒙状况五花八门，所以不可能把所有人都精确地归入男性或女性这两个限制严格的范畴。事实上，吉塞拉·卡普拉和莱斯利·罗杰斯提出，没有任何生物现象是能够依据这种二元区分得到妥当安排的。她们的结论是：“非此即彼地做出严格的生理性别指定，只是一种方便起见的社会建构，而不是什么生物学现实。”(Kaplan and Rogers, 1990, p.214)伯克进而补充了这一结论，揭示了某些生理性别差异是如何随着人的生命历程而发生改变，而另一些生理性别差异又是如何具有文化特定性，即便是在同一个文化内，通过身心两方面的培训，也是可以消除的。 <48>

里兹·斯坦利 (Stanley, 1984) 扩充了卡普兰与罗杰斯的探讨，除了有关雌雄同体 (intersexuality) 的讨论引人入胜 (在这类案例中，某人所表现出的生理性别与其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或几种性征不符)，还强调有许多人类学资料能够证明，各个社会将人们归为女性和男性的方式似乎是不胜枚举的。有鉴于此，她引述了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气质》(Mead, 1963 [1935])，后者描述了彼此相邻的三种文化，但各自对何谓男人何谓女人的意见大相径庭。^[3]

人类学研究中有一项讨论特别有意思，埃里捷-奥热 (Heritier-Auge, 1989) 撰文阐述男性支配和女性生育力被挪用的状况，揭示了有关生理性别的约定俗称的界定有很多缺陷，而这样的界定却设定了男女之间普遍一致、不可变易的分划。在此值得详细引述：

在东非的努尔人 (Nuer) 当中，一个女人如果被视为不能生育，就是说她已经结婚，过了一定年数后 (或许直到绝经) 依然没有生育，就会回到娘家，此后被视为一个男人，成了自己兄弟的“兄弟”，成了自己兄弟孩子的“叔伯”。作为“叔伯”，她将有资格养上一群牲畜，就像一个男人一样，从她应得的牧群收入分成中，为自己的侄女付嫁妆。有了牧群，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的收成，她就能付得起其中一个妻子的嫁妆。她作为“丈夫”进入这些制度化的婚姻关系之中。她的妻子守候着她，

[3] 温良的阿拉佩什人 (Arapesh) 无论男女都像“我们”习惯认为的女人，凶猛的蒙杜古马人 (Mundugumor) 无论男女都像“我们”习惯认为的男人，而德昌布利人 (Tchambuli) 正好与“我们”习惯认为的男女相反。

为她劳作，尊敬她，向她致以丈夫该享有的礼节。她雇用另一个族群的一名仆人，通常来自丁卡族(Dinka)，而对于该仆人的要求中就包括为其妻子或妻子们提供性服务。

(Heritier-Auge, 1989, p.294)

埃里捷－奥热提出，在努尔人当中，显而易见的是，不能生育的女人就不是或不再称得上一个“女人”了。她被明确视之为更像一个男人而非女人。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中，构成男女两性之间差异的纯粹只是生育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生物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证据，但简而言之、一劳永逸地对个体做出非此即彼的指定，归入男性或女性的范畴，这种做法依然影响着生物学和医学的思维。比如说，有关得体行为模式的医学模型往往是男女有别的。同样的行为，表现在一个男人身上可能会被描述成愤怒或进攻性，而搁到女人身上就可能被重新界定为歇斯底里或“神经失调”，被视为需要矫正。接受药物治疗的女性比男性要多得多，显然是与这种说明相符合的(Miles, 1987)。

<49> 格罗兹与勒佩旺什指出(Grosz and Lepervanche, 1988)，生物科学和医学依然频频将女性与男性规范相比较，而后者被视为普遍性的。有些文本，比如格雷的《解剖学》，就不自觉地将各项特性的通例表述为男性的。对于女性身体的描绘只是要表明与男性如何不同。按照格罗兹与勒佩旺什的说法：“基于这些角度来判断，女性的身体只能是被视为异常的、不完备的、需要做出说明的，而男性的身体则被想当然地视为‘人’的属性的充分代表。”(Grosz and Lepervanche, 1988, p.12)

不管如何界定男性的身体，视之为“完备的”、规范的/正常的(norm)，而将女性界定为不同的、低劣的，就因为她们那不稳定的身体，人们不断试图通过这些界定方式，限制女性的公民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人们假定女性囿于其生物学角度上的局限，留在私人领域，而男性在肉身角度上更适于参与公共生活。话说回来，区分身体、将女性限制在前社会性的自然领域的主要手段还不仅仅是社会性别。自然主义的身体观也常常出现在另一些企图中，要使对于黑人的压迫及其臣属地位获得合法性。

四、危险的“它者”

在西方世界，对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历史建构不仅与身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基督教的身体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督教中，身体被视为脆弱的，充满原罪的，需要由心智施以严格的控制与调节 (Brown, 1988)。肉身、性与富于情感 (emotionality) 都被看成是具有不可控制的潜力的力量，是蕴涵巨大焦虑的源泉。

在英格兰的新教改革期间，这些态度尤为显著。16 世纪和 17 世纪早期，英国基督教关注的是个人虔敬、个体判断、自我控制与自我审察。温思罗普·乔丹提出 (Jordan, 1982, p.56)，正是在这种自我发现的背景下，英国人/英国男人 (Englishmen) 用海外的人作为“社会之镜”，倾向于从“野蛮人身上”发现那些“他们最初在自己身上发现但却不曾明确谈论”的特性。

纵观历史，英国人/英国男人不是将自己对于肉身的忧惧个体化、内在化，而是把这种焦虑向外投射到别人的身体，不仅是黑人的身体，而且是全体女性的身体 (Rutherford, 1988)。女性的身体既不稳定，也被视为诱惑之源，会使男性白人的生存理性趋于腐坏。不过，白人女性至少有一份适当的位置，就是负责健康种族的再生产/生育，既适于国内统治，也适于殖民统治 (Searle, 1971)。与此相反，黑人代表着“危险的它者”，在性的方面，生理的方面，被视为未开化的、不能控制的存在，对西方文明的道德秩序构成威胁 (Mercer and Race, 1988)。原因就在于黑人男性的性欲强盛，非洲人的阴茎粗大，据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Walvin, 1982)。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欧洲人大多认为，非洲人与猿猴之间可能存在进化上的关系，这就进一步巩固了上述观点。詹姆斯·瓦尔文描述了当时人们如何普遍相信，非洲人与猿猴之间发生性关系 (Walvin, 1982)。

<50>

要说明为何以这种方式通过其身体来界定黑种人，通常会回溯到殖民化和奴隶制下的社会关系。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某些国家里，比如英国，早在与非洲人有接触之前很久，就存在着对于“黑”和“白”的强烈观念。乔丹指出，“白与黑分别意味着纯洁与污秽、贞洁与罪恶、美德与卑劣、美丽与丑陋、仁慈与邪恶，上帝与魔鬼。” (Jordan, 1982, p.44) 这些意象不是被加以阐述，将既存白人支配合法化，而是被用来调动现成“知识”库存，应对与非洲人最初

的接触。

话虽如此，毫无疑问，凡有这些意象之处，总会因为殖民化和奴隶制的创立而得到大大的巩固和补充。诚如弗朗兹·法农所言 (Fanon, 1984 [1952])，所谓黑人的性就像动物一般，这样的神话 / 迷思就是白人奴隶主有意捏造出来的，以此减轻其忧惧，为支持殖民化的野蛮行径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辩护。这些迷思还融入了一整套特别的文献，把奴隶制的残暴行径刻画成造福于其牺牲品。比如说，欧洲从 16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非洲进行贩奴贸易，在各英属领地上长久延续，直到 1833 年方告废止。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整套文献，将非洲男女刻画成丑陋、暴烈、纵欲的野蛮人。而人种学的研究指出了黑人天生善于屈膝，甚至提到遗传性的漫游狂症 (drapetomania，即逃跑、游荡的倾向)，更进一步证明了奴隶制的正当性 (Rose, 1976)。

到了 18 世纪，奴隶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抨击，贩奴贸易商对于非洲人的描述也越来越充满诋毁。他们纯粹从与英国文化之间差异的角度来描述非洲人。英国人是文明的、理性的，而非洲人则代表着一种“前社会的”秩序，受初民部落不受约束的生物驱力所主导。

有关非洲的危险和神秘的种种意象长久流传，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的中上层男性通过非洲探险旅行来证明自身“男性气概”的举动已是蔚然成风 (Segal, 1990)。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被用来证明创建并维持英国殖民地的正当性。斯蒂文·罗斯指出 (Rose, 1976)，由于英国人就是生存竞争中的最适者，他们在国外的开化使命也就受到某种生物性律令的支持。其他的“科学证据”也被一一举将出来，以证明黑人诸民族的“它者性”和低劣性。比如说，倡导颅骨测量术的先锋白洛嘉^[4]就曾提出：

凸颌（前突）型脸，皮肤多少呈黑色，卷发，在智力和社会角度上低人一等，这些往往相互联系；而皮肤多少呈白色，直发，直颌（平直）型脸，这些是人种系列中最高群体的通常配置。……黑色皮肤的群体……从未能够自动将自身提升到文明的阶段。

（转引自 Gould, 1981, p.834）

[4] 白洛嘉 (Paul Broca, 1824—1880)，法国外科医生，法国现代体质人类学发展的重要人物。曾创办巴黎高等研究院的人类学实验室、巴黎人类学学会和巴黎人类学学院。研究人类各种族的颅骨，提供人脑功能分布（特别是言语功能）的解剖学证据。

而在美国,通过其身体来界定黑人价值的思路也被用来证明,无论是将黑人作为商品处置(从1820年到1860年,有100多万黑人被出售),还是将黑人女性用作育奴工具,都有其正当性(Marable,1983)。在对黑人施加的酷刑中,也渗透着对于黑人的性的忧惧。比如说,在1885年到1900年间对黑人施行的私刑中,强奸指控只占全部案例的三分之一。然而,对于这些私刑的正当性辩护却总是提到,要保护白人女性免遭黑人男性的兽性侵犯(Carby,1987)。对于黑人的性的这种忧惧也体现在许多私刑最终的判刑上,会将受刑者阉割,这在当代美国社会依然延续。比如,好莱坞对于黑人的性的描述一向限于强奸的意象,或是“单纯的动物能力,不能产生文明”。仅有少数例外,还是斯派克·李^[5]等黑人电影工作者的功劳(Dyer,1986, p.139; Lyman, 1990)。如若不然,更为安全的做法就是干脆否认黑人演员具有强烈的性别认同,给他们安排的角色只是“忠心耿耿的黑人仆役”这一主题的当代翻版(Lyman, 1990)。

有些艺术形式传统上允许的表达尺度要比电影更为宽松,其中的黑人身体往往被建构成让白人男性既畏惧又迷恋的客体对象。比如说,在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的摄影作品中,黑人男性既有表现其性的空间,但又被化约为仅仅是性。同志情色作品中对于黑人男性的表征也往往范围有限,要么像是性力旺盛的种马,要么成了“异域风情的东方人”(Mercer and Race, 1988)。

通过一些似乎反映出对于黑人身体的深层恐惧的社会习惯,黑人男女在当代美国所遭受的压迫得以延续并有所巩固。以司法系统为例。尽管在美国南部各州被控谋杀兼强奸的男性中有50%是白人,但因该种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却有90%是黑人。这些被判死刑的人中,绝大多数被指控强奸了白人女性,而根据斯特普尔斯的说法(Staples, 1982),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任何一名白人男性因为强奸黑人女性而被判死刑。^[6]

有必要强调,为奴隶制、殖民化和其他压迫形式提供正当性辩护的那些关于黑人的意象并非千篇一律,而是类型多样,演变各异。不过,它们往往把焦

[5] 斯派克·李(Spike Lee, 1957—),美国著名“黑人电影”导演,出生在南方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对黑人的处境和心态十分了解,立志通过电影表现黑人的社会境况和所受歧视,有《丛林热》、《马尔科姆·X》等名作。

[6] 说到死刑,有必要指出,1991年在南卡罗莱纳州被处以死刑的大卫·加斯金斯,是1944年以后被州政府以谋杀黑人受害者而处死刑的第一位白人男性。——原注

点放在身体上。姆里纳里尼·辛哈 (Sinha, 1987) 研究了 19 世纪晚期的孟加拉, 英国人有关道德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是一则耐人寻味的案例。英国通过维多利亚时代有关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 为其在孟加拉的统治提供正当性辩护, 这种意识形态框定了“女里女气” (effeminate) 的孟加拉男人这一刻板印象, 从而衬托出印度社会中的一些缺陷, 使其不适合自治。^[7] 孟加拉男人的男性气概值得怀疑, 因此不适合分享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认为, 过早的性经验会败坏男人的道德素质, 孟加拉男性没有能力约束性欲, 因此是靠不住的。童婚习俗也表现出这一点。孟加拉男性的体格也被殖民当局说成是“瘦小的” (puny) 和“矮小的” (diminutive), 当局用这些意象来取笑和嘲弄 (Sinha, 1987, p.218, p.227)。孟加拉人的身体相比于英国白人统治者, 依然被视为“它者”, 但如果与非洲人身体的意象相比较, 其身体构造的细微之处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回顾历史, 对于黑人身体的负面建构使这些身体成为与健康 and 疾病有关的各种道德恐慌的目标。在奴隶制下, 非洲黑人被视为有病的、肮脏的。对于不洁的“外国身体”的恐惧后来被移植到了移民法规中。比如说, 1905 年, 出于对英国种族“退化”的严重恐慌, 英国移民法中开始引入限制性的健康标准。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布雷德福的巴基斯坦人中爆发小规模的天花疫情, 导致英国医学会方面产生道德恐慌, 要求对黑人移民进行医疗监控。^[8] 随后, 到了 70 年代, 通过对亚裔女性的“贞洁测试” (virginity testing), 这样的设想付诸实施 (Jones, 1977; Mercer and Race, 1988)。将黑人身体与疾病相联系的举动中最为晚近也是波及最广的一次, 是由艾滋病所带来的。非洲黑人成为替罪羊, 既是这种综合征的可能病因, 也是其载体 (Alcorn, 1988)。艾滋病被称为“同志瘟疫”, 在报道中也被唤作“非洲瘟疫”, 导致在英国有人提议, 对于非洲黑人的移民和旅行甚至需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 (Frankenberg, 1990; Watney, 1988)。

种族主义的特点就在于一再企图将负面特征赋予各种人群的身体乃至整体上的肉身存在。实际上, “种族”本身的建构 (这个社会范畴在自然界中并没

[7] 这里的孟加拉是印度次大陆上的地区名, 涵盖了今日孟加拉国和印度一部分地区。

[8] “Bradford”, 英国城市名。另外文本此处的巴基斯坦人也被视同为黑人。

有任何科学基础)就有赖于处在支配地位的民族和人群根据肤色之类的肉身特征,对人进行归类。菲利普·柯亨说得很清楚(Cohen, 1988),基于某些体征(比如肤色)而不是另一些体征(像是身高)来对人群实行分类,根本不是什么合乎自然的事情。在将某些特定的人群建构为“可见的”过程中,掺进了社会因素,而界定可见性的特征也会随时间而变。比如说,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爱尔兰移民被挑出来作为“危险分子”,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迁入已很少见诸官方表示,尽管他们在迁入人数上其实超过来自新联邦^[9]的移民(Cohen, 1988)。

在19世纪70、80年代,犹太难民被描绘成“文明化不足的”、“不洁的”和“不道德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污名化的是其他群体的肉体生命。西印度群岛人作为“廉价临时工”来到英国,在人们眼里,是一群生活水平低下、不善节制、不讲道德、不守秩序的殖民地臣民。另一方面,锡克族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又似乎被概括为生居贫穷但却充满抱负的人群,与自己的邻居不仅语言有别,而且有令人陌生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往往离群索居(Jones, 1977)。到了70年代,通过对于抢劫^[10]的社会建构,黑人青年在英国进一步被罪犯化,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媒体展开了长期而密集的舆论攻势(Hall et al., 1978)。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自然主义的身体观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人一再企图通过诉诸被支配者据说较为低劣的生物性构成,证明自己所处位置的正当性。这些观点的确切内容屡经历史演变,但在当代社会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完全通过血肉之躯来界定人的价值,这样的做法还是屡见不鲜,尽管在这些有关优等与劣等的界定中,心智已经开始占据更为核心的成分(Birke, 1986; Gould, 1981; Lewontin et al., 1984; Rose, 1984)。话说回来,尽管自然主义观点通常是由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群所采纳的,但也有必要考察一些倒转这些群体的主张的努力。

[9] 新联邦(New Commonwealth),指1945年后取得自治地位的英联邦国家。这里特别指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南亚国家和众多加勒比海岛国。

[10] 抢劫(mugging),特指从后面以兜头、掐脖等方式袭击路人,将其击昏后实施抢劫,路人多不知行凶人面目,危险随时从背后袭来,故此远比正面或前方而来的拦路抢劫更令人心慌。

五、得天独厚的身体

纵观历史，将个体的价值与其身体相等同的做法一向有利于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群体。将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定位于不变的、自然的、生物性的身体上，有助于使针对现状的抵抗显得徒劳无益、无的放矢。然而，力求将个体身份 / 认同与生物性身体相等同的并不总是支配者。20 世纪 60、70 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就致力于通过颂扬黑人的肉身特性得天独厚，来倒转有关自然主义身体的那些种族主义形式 (Segal, 1990)。女性主义者也采取自然主义的思路来看待身体，借鉴了一种基于生物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有关永恒女性的一种女性主义版本” (Barrett, 1987; Eisenstein, 1984, p.106)。

菲尔斯通阐述了一种自然主义思路的早期女性主义版本。但她的分析与此前把女性身体描绘成存在固有局限的论述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菲尔斯通的主张 (Firestone, 1971) 就是基于以下预设：劳动上的性别分工自有其生物学基础。“生物学家庭”之所以普遍存在，其根基就在于人在生育方面的生物特征。而“生物学家庭”这种单元的典型特征，就是孩子对于母亲的依赖，而后者又依赖于一个男人。尽管菲尔斯通也认识到，社会制度对于维持男性支配地位十分重要，但这些社会制度的最终基础还在于人在生育方面的生物特征，这些特征使女性比男性更脆弱，依赖于男性。因此，女性要想摆脱其臣属地位，就只能通过值得信赖的避孕技术和生育手段，尽可能降低对于女性身体的使用，来克服“其生育方面的生物特征的暴政”。

<54>

艾莉森·贾加尔认为 (Jaggar, 1984)，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并没有广泛采纳菲尔斯通的分析，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女性主义者在建构有关父权制 / 男权制的其他阐述时，依旧把不变的、前社会性的生物性身体视为建构自我认同与社会的基础。这些阐述与菲尔斯通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以更为正面的眼光来看女性身体。贾加尔指出 (Jaggar, 1984)，当代激进女性主义论述经常谈什么“女性生物特征内在固有的力量”，“与女性生物特性相维系的创造力”，“女性天生才华与优等性”。她们在这些说法中反复表示，女性特有的力量就在于亲近自然，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性，就是因为能够生育。比如说，苏珊·格里芬就提出，女性与非人的自然彼此不可分离 (Griffin, 1978; Jaggar, 1984)。

这种女性主义版本的自然主义身体观还颂扬自然赋予女性的“美德”。至

于这种思路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关意涵，卡普兰与罗杰斯做出了有益的概括 (Kaplan and Rogers, 1990)。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要想实现社会平等，那些在生物学意义上属于天生固有的“才华”，比如生儿育女的能力，就需要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酬报。在这里，社会平等指的是女性与男性的工作角色不同但价值相当。卡普兰与亚当斯指出 (Kaplan and Adams, 1989)，这种说法并不新鲜，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里就有类似的平等原则。按照她们的讲法，“千百年来，男性一直在颂扬女性的美德，却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女性就此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或自由。” (Kaplan and Rogers, 1990, p.209)

在当代女性主义版本的自然主义身体观中，玛丽·奥布莱恩的论著 (O'Brien, 1979, 1981, 1989) 或许最为成熟精致。她的分析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生育是一种物质性、历史性的过程，引发生育意识，“在社会性别的角度上，以意义重大、显著明确的方式相互分化，彼此对立。” (O'Brien, 1979, p.235) 生育及其相关的“环节”，使女性通过特殊的体验与世界相关联，并产生对于世界的知识，并与男性对于世界的接触渠道截然不同。为母之道 (maternity) 和为父之道 (paternity) 的例子就体现出这些差异。

对于女性来说，生育融合了知与行，自觉意识与创造活动，时间性与延续性。而为父之道则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现象。为父之道的本质环节……是抽象的、不自觉的，必须由抽象知识而不是切身体验来赋予意义。

(O'Brien, 1989, p.14)

简言之，生育意识之所以具有社会性别化的特征，是因为事实上，男性与自然的关系以（交合中精子的）疏离 / 让渡 (alienation) 为特征，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以延续为标志。杰夫·赫恩如此概括奥布莱恩的观点：“为母之道和母亲的生育意识包含了自觉意识与不自觉的生育劳动的统合一体^[11]，而为父之道与父亲的生育意识是一个观念（原则）支配物质的过程（比如说，当上父亲的观念要先于孩子的出生）。” (Hearn, 1987, p.79) 为了克服这种疏离 / 让渡，男人在婚姻中力求通过父亲身份来利用孩子。不仅如此，父亲身份和婚姻只是“人

<55>

[11] “reproductive labour”，其中“labour”本身就有“分娩”/“生产”和“阵痛”的意思。

类制度的发展”和“有关男性首要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角度上的起点，发展到极致，便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而后者受着男性的控制（O'Brien, 1981, p.49）。

简言之，父权制 / 男权制尊崇男性对于生命和价值的界定，而这类界定的根基就是男性在生存意义上与物种延续相分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男性声称对女性的生产成果即孩子有控制权，而“没完没了地执迷于死亡和破坏”（O'Brien, 1989, pp.15—16）。

奥布莱恩的分析将父权制 / 男权制的存在与发展追溯到男性试图将她所谓的“分离出来的父亲”（abstracted father）重新整合到生育过程中。然而，尽管她对男性支配做出了批判性的分析，但这种观点与向来助长对女性压迫的那种自然主义身体观却有某些共同点。通过生育这一生物性过程，女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注定与男性不同。不过，她们的世界观却没有能力渗透入社会的结构。这是因为，以男性与生育过程之间的生物性分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父权制 / 男权制，利用并贬低了生育体验。奥布莱恩的分析意味着，男性与女性所拥有的那些导向父权制 / 男权制的知识形式，既定位在生物特征中，也定位在自然中，因此既是合乎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米歇尔·巴蕾特指出（Barrett, 1987），这种分析的危险在于，它差不多等于放弃了转变世界、降低其受传统“男性特质”价值支配的程度的规划。不仅如此，如果认为体验是一种得天独厚的探索知识的方式，基于这种观点得出的主张将会导致如下情境：单单“将自身命名为某一给定群体的成员，就等于为自己的言行宣称一种道德支撑。”（Ardill and O'Sullivan, 1986, p.33）巴蕾特主张（Barrett, 1987），在这种道德主义的政治话语中，与特定体验相维系的价值成为不言自明的东西，而人们根据自己的体验所建构的身份 / 认同也被视为不容置疑。

奥布莱恩的分析也倾向于预设一种人道主义的主体模型，主体能够完全控制接触体验知识的渠道。不过，鉴于男性和受男性控制的技术装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有关生育的界定和体验，对于从这样一种体验中孕育出来的知识，上述说法似乎过于乐观了。此外，奥布莱恩的分析还有一个问题，那些不能或不愿生孩子的女性就被边缘化了。在当代社会，这类女性依然臣属于一系列的肉身压迫，像是强奸或强奸的威胁。但依据把焦点完全放在生育体验上的身体

分析，并不能说清这些事情。

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是要否定，奥布莱恩的分析的确促进了人们将身体体验与知识相关联。社会学角度对于知识和意识的阐述常常忽略了心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但身心关系正是奥布莱恩作品的核心主题，社会学角度对于身体要想做出任何充分的阐述，都需要重视这一主题。她的分析固然存在问题，但并非因为认识到这一重要关联，而是对与生育有关的一系列身体体验过于偏重，相对忽视了肉身存在影响意识的其他一些方式。比如说，赫恩指出 (Hearn, 1987, p.83)，性对于男性意识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遗传基因上的非连续性，而且关系到身体接触、快乐与痛苦本身。

六、被扭曲的身体

女性主义对于自然主义观点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关注的是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体验如何受到支配性社会力量的扭曲。这与我们本章此前已经考察的那些身体观略有不同，不妨视之为有所改进。尽管身体为父权制 / 男权制社会关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但这些关系**本身被视为形塑了女性的身体**。自然主义观点往往只是将身体视为一种前社会性的持恒现象，而这种有关被扭曲的身体的观点却能够看到身体如何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

奥尔巴赫 (Orbach, 1988) 和彻宁 (Chernin, 1983) 出色地分析了“被扭曲的身体”，代表了女性主义文献中有关进食失调问题研究的一种愈益流行的思路 (例参 Lawrence, 1987)。这个问题现在也已经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报章杂志开始刊载固定专栏，关注女性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奥尔巴赫与彻宁都主张，女性的身体有其**自然的**尺码和体型，只是被父权制 / 男权制的力量扰乱了。

奥尔巴赫 (Orbach, 1988) 集中探讨了“强迫进食”症状，这是一种暴食与挨饿之间自我持续的循环。女性之所以陷入强迫进食，是因为自然的饥饿机制被扭曲，女性想要“瘦身”的自觉欲望被想要丰满的不自觉欲望所破坏。强迫进食就是女性遭到社会压迫所造成的结果。使女性的身体发育被扭曲的力量主要有两类，一是媒体和减肥产业给女性施加的压力，一是女性无论工作还是居家，能够承担的角色都有限制。

首先，一个女人要想为人妻，为人母，就得找个男人。这个目标对于少女 <57>

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却几乎是难以企及的。要找到个男人,女人就得把自己看成是一件商品,其价值就建立在自己的外貌和仪态基础上(Orbach, 1988, pp.29-30)。对于外貌施加的压力意味着,面对巨大的时尚和减肥产业,推广有关女性应当像个什么样子的强烈而有限制的意象,女性很难不受影响。在这些意象中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女人就应该苗条,至少绝对不能肥胖。在奥尔巴赫看来,许多女性被这些意象所引诱,陷入具有破坏性的不健康的节食循环中。话说回来,女性并非总是接受这些压力,而是常常做出反抗。实际上,许多女性通过长胖来避免被市场化或被视为理想女性(Orbach, 1988, p.31)。奥尔巴赫认为,这些女性往往会变得**不自然的胖**,因为这“履行了一种象征功能,即拒绝遵从……社会(对于她们)的扭曲,以及她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Orbach, 1988, p.44)

奥尔巴赫分析女性的发育如何被扭曲的第二阶段,就是女性把食物当做解决其他问题的方式的过程。比如说,奥尔巴赫提出,当妈的会在许多年间将老公孩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从而压制并误认自己的需要。在这些情况下,吃东西往往成了她们自己在情感上和思想上真正的需要的方便替代(亦参 James, 1990)。对于出门工作的女性来说,许多人之所以保持丰满,就是要在对自己很重要的其他人眼里,将其性别特性/身份/认同中立化。诚如奥尔巴赫所言(Orbach, 1988, p.35),女性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指望在其出门工作的职业生涯中受到重视”,而不被其男同事“轻浮地”视为性对象。在这里,这些女性渴望得到尊重的真正需要同样是通过食物满足的,只是间接而不充分。

行文至此,应该看得很清楚,奥尔巴赫认为,强迫进食其实是表现了其他的需要和受挫。未被满足的需要和食物之间的关系根源在于让人困扰的母女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被扭曲,是因为处在父权制/男权制的背景下,母亲的地位被否定,在家庭外部也不能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机会。而当食物成为母女之间斗争和冲突的对象,情况就更加恶化(Orbach, 1988, pp.36-45)。自然的饥饿机制被压制,进食成为一种对于社会压力而非生物需要的反应。

在奥尔巴赫看来,强迫进食意味着“不考虑标志饥饿的生理线索的进食……对于强迫进食者来说,食物具备了额外的重要意涵,乃至于是早就失去了其显而易见的生物学关联。”(Orbach, 1988, p.118)不过,奥尔巴赫的作品不单单是要分析女性为何会强迫进食,变得肥胖,也是某种利于减掉**不自然的**

体重的“自助指南”。减掉这些体重^[12]的关键在于把强迫进食的行为与情感相分离,与这些情感所表达的冲突相分离。用更具生产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些情感,学会倾听自然的饥饿机制,是回归自然的、平衡的尺码的应有之道。

<58>

彻宁(Chernin, 1983)也分析了强迫进食,探问西方的女性为何要面对“苗条的暴政”,限制了自身在社会和生理角度上的成长与表达。女性与男性截然相反,后者在成长过程中被教会要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而前者的社会化过程却使其讨厌自己的身体,并常常一味追求减肥(Bovey, 1989, p.48, p.229; Chernin, 1983, p.62, p.92)。这种追求的破坏性结果已经越来越广为人知,从日渐流行的整容术和吸脂术,到愈益频发的神经性厌食症。女性因面临减肥压力而导致的致死事件越来越多,正说明了在何等程度上,“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承受生活在身体中所带来的苦痛”(Chernin, 1983, p.62; 亦参 Bovey, 1989, p.48, pp.224—229)。

为了说明女性在身体上遭受的压迫,彻宁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首先,对于男性支配的文化、政治和金融等领域来说,女性被视为权力已然太多(Chernin, 1983, p.96, p.129)。男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就让女性自觉有欠缺,而这样的感觉又会转而针对身体(Chernin, 1983, p.87, p.190)。其次,男性出于自身作为孩子对母亲身体的体验,从一开始就认为女性蕴含着危险,又基于自己随后所处的社会权力位置,将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和疑虑转换成企图控制和削减女性在社会中占据的物质/生理空间(physical space)。再次,近些年来,尤其是妇女运动已经威胁到男性的支配地位之后,这些压力更趋增长。按照彻宁的说法:

对于发育过程中的女性要保持抑制,这样的要求变得更加显见,更为严格。从梅惠丝到玛丽莲(梦露),到翠姬,再到奥尔曼,^[13]逐步渐进

[12]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肥,而是把已有的体重从“不自然”的“肥”转化为“自然”的“重”。

[13] 梅惠丝(Mae West, 1893—1980)以性感喜剧起家,从百老汇发展到好莱坞,言行惊世骇俗。所编写戏剧曾被控猥亵,另一出因涉同性恋而被禁。40初上银幕,颠覆30年代电影的清教徒气氛,丰满妖艳,成为性感偶像,二战时美军飞行员将海上用的充气式救生衣形象地称为“梅惠丝”,这一词义沿用至今。

翠姬(Leslie Hornby, 1949—),靠“代表1966年的一张照片”成名,时年17岁的她身高1.67米,体重只有82斤,毫无传统意义上的曲线可言。照片上一头短发,表情略略受惊,这个雌雄同体式的新形象迅速攻占时装杂志和模特界,四年后,20岁的她结束模特(接下一页)

的轨迹明确可辨……在这个女性主义维权的时代，男性还是心仪于女性萝莉般的身心，因为小萝莉容易受伤，柔弱无助，不那么让人感到不安。真正让人不安的是熟妇的身心。

(Chernin, 1983, p.95, p.110)

奥尔巴赫和彻宁的分析在实质层面上详细阐述了在父权制/男权制的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如何受到损害。她们揭示了社会压力是如何能够被内化，并体现于进食活动中，扭曲了女性的身体。在两人的说明当中，跨越各阶级但具有社会性别特定性的过程都占有重要位置。首先，奥尔巴赫和彻宁的论著都认为，女孩所经受的社会化过程是以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成功为核心的。与此类似，这也往往会带来有助于让女人有别于男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涉及否定身体及其他方面的需要，以服务于他人 (Charles and Kerr, 1988; Murcott, 1983)，而无助于女孩将休闲的选择用作属于自己的选择 (Griffin et al., 1982, p.93)

其次，女孩身体的形貌在社会上的重要性能够影响到对于身体活动的态度。尽管在消费文化中，运动型身体 (athletic body) 越来越显著 (Featherstone, 1982)，但女性身体的可接受形式和不可接受形式之间依然存在着明确的分隔。肌肉健硕依然是不可接受的，担心肌肉发育太好会使许多女孩远离体育运动 (Bryson, 1987; Willis, 1974, 1985)。不仅如此，在女孩眼中，要身着运动服装在学校里展示自己的身体，也常常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有悖于她们自视为成熟女人的自我认同 (Griffin et al., 1982)。诚然，奥尔巴赫和彻宁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亦步亦趋地寻求遵照男性的理想来发展自己的身体。不过，这种拒绝也会使女性与自己的身体相疏离 (比如说，通过强迫进食)。因此，女性往往要么遵从传统的社会化模式，力求发育成理想的身体，要么拒绝遵照这些过程，但这又会陷于因进食失调而损害自己身体的风险。

再次，绝大多数体育活动都发生在公共生活领域。不过，女性在家庭私人领域同样面临建构其主要角色的压力。比如说，格里芬发现 (Griffin, 1985)，

(接上页) 工作，但已成为 60 年代最负盛名的模特儿。在模特界外，这个没胸没腰没臀的女性成为无数渴望真正独立自主的职业女性的偶像。“Twiggy”这个外号的词义就是嫩枝，纤细。

奥尔曼 (Christine Olman) 年仅 12 岁就成为世界名模，取代了肉感的梦露，伴随神经性厌食症一起成为新时代的象征。

女孩会丢开自己的女友，晚上和男友待在一起，以此为自己的未来储蓄，但在婚后的生活中又有可能培养起独立的运动爱好，两者之间很难协调。

最后，奥尔巴赫和彻宁凸显了男性支配的制度 / 机构在限制身体发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如说，对于男孩来而言，运动向来就被组织成要反映肌肉型男版本的男性特质的发展 (Graydon, 1983; Simon and Bradley, 1975)。体育运动在学校里依然是最具隔离性的科目，其组织依然根植于有关 (男性) 身体扩张和 (女性) 身体约束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

总之，女性主义对于自然主义思路的这种发展凸显了女性如何会与其生理特征相疏离。女性与男性截然不同，往往不能通过其生理自我充分体现其力量 / 权力 (power) (Gilroy, 1989)。这种关于被扭曲的身体的观点相比于其他自然主义身体观，也在某些方面展现出长足的改进，因为它认识到，女性的身体其实是受到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影响的。自然主义观念往往一味强调身体以某些方式引发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从而不能认识到，这些关系本身也影响到身体的形貌和发展。身体不只是社会由此兴起的基础，**本身也受社会影响**。

话说回来，尽管有关“被扭曲的身体”的这种分析做出了相当贡献，但在方法论上却颇成问题。在奥尔巴赫看来，瘦就是自然的，而胖成了扭曲的。这些身体状态涵盖了内在固有的属性。根据尼基·戴蒙德的说法，“‘胖瘦’似乎成了自然给定的对立，‘瘦’是合乎自然的状态和目标，而‘胖’倒成了病态的，成了一个问题。” (Diamond, 1985, p.54) 把胖看成是问题，等于“再生产出那些有关女性特质的文化理念，即把‘瘦’定义为理想的” (Diamond, 1985, p.47)。奥尔巴赫尽管鼓励女性“接受自身”，却认为“每个女人 (其实) 都希望苗条” (Bovey, 1989)。

而彻宁则与奥尔巴赫相反，认为丰满的^[14]女性身体才是正面的、自然的。瘦削的女性是陷入了对抗自然的斗争 (Chernin, 1983, p.9)。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减肥后又反弹，就是因为这些重量是“自然”属于她们的 (Chernin, 1983, p.30, p.54)。这样的分析固然驳斥了有关女性身体的通行的刻板印象，但它和奥尔巴赫的思路一样，都患有本质主义的毛病。无论是奥尔巴赫还是彻宁，都改进

<60>

[14] 本书中的“丰满”、“胖”和“肥胖”原文都是“fat”。与此类似，“苗条”、“瘦”和“瘦削”的原文是“slim”或“thin”。分别传递褒义、中性和贬义。

了现存的自然主义身体观，但她们的论著都没能彻底摆脱自然主义思路的基本预设。

除了奥尔巴赫和彻宁，还有其他论家也主张，女性身体具有合乎自然的体型和尺码，只是被社会所扭曲。比如说，爱泼斯坦 (Epstein, 1987) 和达纳 (Dana, 1987) 都认为，女性从自然角度上是瘦的，而暴饮暴食只是在替代其他的需要和活动。米歇尔则提出 (Mitchell, 1987)，女性的身体可能被强度较大的锻炼所扭曲。不过，所有这些论家都设定了存在某种持恒不变的自然身体，这种本体论立场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观点颇为契合，前者认为女性的身体由于其“自然”功能而比男性的身体低劣 (Connell, 1987)，后者认为加勒比裔黑人的身体天生就比白人身体更为强壮，也更具性力。

七、不堪其负的身体

在本章中，我试图简述自然主义身体观在 18 世纪的兴起，并评述了自那以后颇具影响的一些自然主义观点。

自然主义观点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支撑它们的那些基本原则始终不变，除了彻宁和奥尔巴赫有关被扭曲的身体的分析属于例外。首先，它们是化约论的。不单单是基于处在社会中的个体来说明社会的结构，而且个体的意向、行动和潜力也被说成是其生理构成或基因构成的某种特征所造成的。比如说，在社会生物学中，“因果链据说始于基因单元的层面，逐级上升到作为整体的社会” (Rose, 1984, p.44) 其次，确立了人的肉身性的基本特征之后，再将它们归类成越简单越好的社会范畴（比如男性 / 女性，黑人 / 白人，上流阶层 / 中间阶层 / 工人阶层），忽略人的各类身体之间的交叠而凸显其差异 (Birke, 1986, 1992)。然后，这些社会范畴就被物化为自然现象。

要进一步揭示这些基本原则的欠缺，不妨看看自然主义身体观的一个早期实例。根据柏拉图的讲述，共和国的公民分为三个阶层，其理据在于上帝是用三种材料塑造了他们。用银子做成的人注定成为卫戍者，用铜铁做成的人注定成为农夫和工匠。不仅如此，如果人们都老想着提高自己在生活中预先注定的位置，国家就会被毁灭。千百年后，社会生物学家复制了这种主张的逻辑，甚至照搬了内容，根据基因基础来证明现状的正当性。基因决定了哪些个体特性

和社会结构最适于维持生存。企图改变社会结构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只能使社会毁灭。在这些实例中，对于人体意涵的界定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准确的，但却被认为规定了这些人的自我认同，构成了社会。它们对于人体的社会重要性的阐述都很狭隘，不能让人信服。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以自然主义的思路聚焦身体，已经证明不能令人满意。而在这方面，身体史学家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认为在18世纪前存在一个独特的时期，当时把身体看成是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的接收器，而不是生成器。实际上，在对身体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看来，如果认为身体是开放的，似乎可以始终接受重新解释，并以此作为出发点，要比自然主义思路有道理得多。在社会学家眼里，以自然主义的思路来看女性的身体和黑人的身体，对于所谓“肉身现实”，往往说不出什么深刻的东西，远不如将身体视作极具可塑性的意识形态资源，用途极广。不过，当社会学家摒弃了自然主义观点的负面特性，也往往会忽视身体是如何莫立并作用于社会生活。自然主义观点的这一面我觉得是值得继续发扬的，但在社会建构论的身体阐述中，往往会归于湮没。

第四章 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

自然主义的思路依然对人体的流行意象发挥着重要影响。不过，当代社会理论家们一般都会觉得，如果设定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而不是生成器，这样的观念和理论更耐人寻味。有鉴于此，人们用**社会建构论**这个术语来统指那些认为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形塑、约束甚至创造的观点。

社会建构论的各种观点之所以统合在一起，就是因为共同反对如下观念：把身体纯粹当做一种生物现象，也能做出充分的分析。它们还共享如下思路：赋予身体的那些特征与意义，以及不同人群的身体之间存在的界限，并不是社会的基础，而是社会的产物。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基本共识而看不到，事实上，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五花八门，融合了许多有关身体与社会关系的说法，它们各具特色，而且并非都能相互补充。比如说，后结构主义者往往主张，语言范畴决定了我们有关具身体验的体验；而符号互动论者则更强调说，对于身体的管理和控制有赖于相对自主的人类行动者的行动。两种思路都对作用于身体的各种社会力量有所论述，但要确定这些力量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影响身体，就各有各的说法了。整体来看，身体在何等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产物，甚至是否还有可能说身体是一种生物现象，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各有不同（Vance, 1989）。

启发认为身体出自社会建构的那些观点的主要有四种影响：玛丽·道格拉斯的人类学；晚近有关人体历史的研究；米歇尔·福柯的论著；戈夫曼的研究。我将首先简述这四种影响，然后着重考察福柯和戈夫曼的研究，因为他们对于塑造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的影响特别显著。他们还构成了耐人寻味的比较，例示了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可能性，因为它们乍看上去完全不同。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的写作形式和写作风格颇有差异，也因为福柯通常被归为后结构主义者

(关注身体如何受到话语的控制),而戈夫曼一向被视为符号互动论者(感兴趣的是作为行动要素的身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福柯和戈夫曼的身体观并不像乍看上去的样子,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这是因为,他们都竭力主张,身体是具身性主体生活中的核心要素,但也坚持认为,身体的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由个体力所不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63>

在本章最后几节,我将集中探讨特纳关于社会中的身体的学说(Turner, 1984),以及弗兰克立足“行动问题”的身体分析(Frank, 1991)。这两位理论家在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各自发扬了福柯与戈夫曼的洞见。特纳博采众家之长,发展成一套关于“身体秩序”的一般理论。他的论证方式遵循了霍布斯和帕森斯的路数,但在具体内容上颇为不同,整体上关注福柯式的话题,涉及身体的生产与控制。特纳的学说中还融合了一些理论家(包括戈夫曼),但只是被用来帮助以这种福柯式的思路,分析对于身体的监控和支配。特纳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身体学说,主张政府所要应对的并不是抽象的经济与政治话题,而是由社会所给定的身体的有关问题。与此相反,弗兰克关注的是作为具身体现的行动,更直接地聚焦于身体习语的风格,以及和生命态身体相关的话题。因此,不妨把他的研究看成是在实质上进一步发展了戈夫曼有关身体管理的分析。

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社会学家传统上采取了一种双重思路来看待身体,却很少明确聚焦于身体的社会重要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将社会带入了身体,从而挑战了这种倾向。它们就此在社会学领域内多方努力,让身体成为不容小觑的考察焦点。如果说身体的确受到社会的形塑,那么有关身体的研究就不再能够完全丢给其他学科。不仅如此,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凸显社会角色、意义和资源将如何能够决定身体,身体又如何在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在社会学中提供了一条别具特色的身体研究思路。话说回来,社会建构论也有其问题。这些观点告诉我们许多身体在社会中的重要意涵,但身体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却往往不太了解。我们了解了那些建构某种被称作“身体”的东西的社会力量,却不太清楚实际被建构的东西本身。这就意味着,身体或许已经被命名为某种理论空间,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未受考察。身体本身似乎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始终被这种聚焦于其他现象的视角搁置一旁。因此,对于为什么是身体——不管身体究竟是什么——能够具备这样的重要意涵,我们其实知之甚少。

特纳后来又提出了一点相关的主张 (Turner, 1992a), 体现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他于 1984 年提出的身体秩序学说。他指出, 社会建构论的思路往往不能深究, 为什么相比于其他现象, 对于身体的建构多少可能容易一些。不仅如此, 身体的某些维度或许也比其他维度更开放一些。比如说, 社会学家业已指出, 可以把健康与疾病作为社会建构物来分析, 但他们却很少集中考虑, 有关人的身高的判断是否也有可能出自类似的概括方式 (Turner, 1992a, pp.106-107)。特纳晚近的作品也追踪了医学社会学领域中质疑社会建构论的说明力的一些争论 (例参 Bury, 1986, 1987; King, 1987; Nicholson and McLaughlin, 1987)。

因此, 社会建构论思路的潜在危险就在于, 它们可能有助于以另一种形式再生产出社会学中对于身体的双重思路, 而不是克服了它。身体被置于各式各样的社会背景之中, 但身体本身的许多维度却未被探索。接下来, 我将指出, 福柯的研究就有这种问题, 而戈夫曼和特纳的论著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过, 弗兰克将肉身态身体 (*corporeal body*) 的视角置于其分析的核心, 从而指出了克服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

一、建构人的身体

在启发了认为身体受社会建构的那些观点的四种主要影响中, 道格拉斯的人类学 (Douglas, 1966, 1970) 已经提出, 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收器, 是社会的象征。在《自然象征》中, 道格拉斯主张, 人的身体是最容易用来反映一个社会系统的意象。她并认为, 有关人体的观念密切对应于有关社会的通行观念 (Douglas, 1970)。不仅如此, 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对于身体所采取的思路, 往往会符合其所处的社会位置。比如说, 艺术家和学术人都对社会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 很可能会展现出某种对于身体的舍弃, “某种精心拿捏的、相对其所承担责任而言的不修边幅” (Douglas, 1970, p.72)。然而, 身体首先是对于整个社会的隐喻。这就意味着, 每当社会危机之时, 当国家 / 民族的边界和身份 / 认同 (national borders and identities) 遭到威胁时, 人们很可能会关注于维护既存的身体边界和身体纯洁。

按照特纳的说法 (Turner, 1992a), 在上述这个特定的意义上, 道格拉斯

的人类学并不是一种有关身体的人类学，而是有关风险的象征体系的人类学，或许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还是有关社会位置和分层的人类学。我们对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焦虑被投射到对于身体的关注上。因此，身体成为越来越多生活在乌利希·贝克所称“风险社会”中的人们的某种规划，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社会系统让无论处在什么社会位置上的个体都暴露在越来越多的环境风险和技术风险之下(Beck, 1992)。面临此情此境，对于身体的关注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

<65>

道格拉斯的研究中的整体主题就在于：社会态身体约束了人们以何种方式领会和体验生理态身体。这些感知和体验本身维持着某种特定的社会观。对于社会态身体与个人态身体之间的关系，道格拉斯的研究富于洞见。不过，它有时也暴露出将这两种身体混为一谈的危险，因为它把有关个人态身体的现象学，即人们如何活出自己的身体，体验自己的身体，领会自己的身体，化约为社会态身体所调用的那些位置与范畴。

对于认为身体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学分析，道格拉斯有着显著的影响。不过，尽管涂尔干对她的研究确有启发，社会学家却往往另寻资源，以助考察作为社会建构之实体的身体。如前所述，特纳提出(Turner, 1991a)，社会学家对于作为分类系统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然而，布迪厄却是个重要的例外。布迪厄认为，身体承载着符号价值，这种观点被整合进另一种身体分析，即认为身体是一种物质现象，既构成了社会，又被社会所构成。他的研究代表了当代对于身体的最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将在第六章详加考察。

拉克尔和约尔丹诺娃之类论家有关人体历史和身体意象的作品也深深影响了社会学研究。第三章已经简要考察了这类研究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不妨重申一遍，它揭示了人体被赋予形形色色、变动不居的意义，从而证明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项宝贵资源。这些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被用来促进知觉与嗅觉的社会基础等领域的分析(Duroche, 1990)。它们还有更具整体性的用场，让社会学家有合理理由致力于将身体作为某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现象来考察。

福柯的研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算得上非常彻底、深具影响的社会建构论思路，远不止于将身体视作社会意义的接收器。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单单是由话语赋予意义，而且是完全由话语所构成。实质上，身体作为一种生物性实体已经渐趋消散了，相反，成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不稳

定性。福柯的作品影响如此深远，乃至于现在有理由说存在一种福柯式的身体研究思路。比如说，特纳在社会理论、宗教与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开创性的身体研究，就对福柯的作品多有借重 (Turner, 1983, 1984, 1987)。而从医学知识、欲望、牙医到福利国家之类话题，其他许多有关社会建构的身体的研究，也都受到福柯的深刻影响 (例参 Armstrong, 1983, 1987; Davies, 1990; Hewitt, 1983; Lash, 1984; Nettleton, 1991, 1992)。

对于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的第四种重要影响，就是戈夫曼的研究。戈夫曼考察了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中的行为，自我的呈现，以及对于污名的管理，通过这些来研究身体在社会互动中的定位。在戈夫曼的研究中，对于维护日常接触 (encounters)、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来说，对于身体的管理至关重要，并协调着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身体成了某种资源，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进行管理，以便建构特定版本的自我。晚近对于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例参 Featherstone, 1982; Giddens, 1991)，以及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对于具身性行动者地位的分析 (Giddens, 1984, 1988)，都明显体现出戈夫曼的研究的影响。

二、权力、话语与身体

福柯式的身体思路的特点，首先是非常偏重于研究身体与支配身体的那些制度 / 机构 (institutions)，其次是在认识论上把身体看成是由话语所生成，并存在于话语之中。话语是福柯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其核心关注即在于语言，尽管不能完全化约为语言 (Foucault, 1974; Poster, 1984)。不妨把话语看成是一系列深层原则，将特定的意义构架 (grid) 融合在一起，这些意义构架支撑、生成、确立了一切所见所闻、所思所言之间的关系 (Dreyfus and Rabinow, 1982; Foucault, 1974)。

身体对于福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构筑了一部“‘身体史’，一部关于身体当中最具物质性和生命力的东西如何被贯注的历史” (Foucault, 1981, p.152)。这种历史的核心要义，就是力求勾绘“身体与施加在身体上的权力的效应”之间的关系 (Foucault, 1980, p.58)。这种做法包括考察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如何“通过愈益精细的渠道，进入个体本身，进入

其身体、其姿势乃至一切日常行动”，在现代制度形态中展开运作（Foucault, 1980, p.151）。

身体对于福柯来说，并不只是话语的焦点，而是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力的大规模组织之间的唯一一种关联（Dreyfus and Rabinow, 1982）。要描述其中某些关联所采取的形式，有必要举出福柯关于规训体系和性史的研究中的具体实例。概而言之，这些研究分析了一段变迁时期，主要关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迁，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被生产成具身性的主体，与制度 / 机构相关联。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话语所占据的社会空间也发生了一场转迁，并对个体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场转迁中，话语的目标、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血肉之躯让位于心智，后者成为新的关注焦点，话语的目标发生转换；对与死亡相关的话题的关注被对生命的安排的兴趣所取代，话语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关注于控制无名的个体转向管理分化的人口，话语的范围也发生了更替。

首先，是话语的目标发生转换。塑造主体的话语不再直接构成作为肉身的身体，而是越来越通过将身体建构为一种“心智性的身体”，间接控制着身体。与其前例不同，心智性的身体不单是肉身性的客体，还通过占有意识、意向和语言来被规定。对于身体的控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只是诉诸赤裸裸的暴力，而是更多地借助监控和激励。

从“作为肉身的身体”到“心智性的身体”，福柯 1979 年问世的对比惩罚系统的研究，明显体现出话语目标的这场转迁。在君主制的法律下，最严重的惩罚类型是要公开执刑的，要通过公开的仪式，对罪犯进行烧灼、伤害和肢解，以对主权者的权威进行象征性的展示。身体成为高度可见的惩治目标（Foucault, 1979a, p.8），犯人所受的惩罚要细致铭刻在其身体之上。与此相反，19 世纪的监狱系统则把犯人的身体置于一块经由科学管理的制度空间之中，以便深入犯人的心智。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就是其范例。这是由杰里米·边沁所倡导的一种监狱设计。全景敞视监狱是包含众多囚室的一座环形建筑，囚室中的犯人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央瞭望塔的监控。这种规训技术意味着，在监管者持续不断的凝视（gaze）下，犯人被鼓励自我监督，对其行为实施自我控制。

在福柯有关性的研究中，身体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型。在中世纪，基督徒的告解就是阐述性的场所。神父关注人们的性活动，占据支配地位的性话语关注

的是作为肉身的身体。然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引入了一些迄今仍深具影响的过程。除了人的行动，神父还开始究问人的意向，而性的位置也开始从主体的身体转向主体的心智。按照福柯的说法，性“被逐出了隐匿和受约束的状态，趋向一种话语的存在”（Foucault, 1981, p.33）。性与肉身性、生理性的身体的关联逐渐消退，而在心智中的定位却通过语言得到探究。

<68> 话语目标从身体到心智的这场转换还伴随着话语对象上的变化，政府越来越关注控制人们生命与福祉而不是死亡的权力。这里涉及关注人口的生育、健康与疾病、衣食住行的模式，以及对人们的身体习惯和风俗的整体关注（Foucault, 1981, p.25）。比如说，君主制法律下的惩罚是一种否定性的事情，关注的是压制，乃至最终消灭身体；而主导现代监狱系统的是更具生产性的关注，致力于激励犯人的“有用益的”、“生产性的”生活形式。与此类似，在性的领域，早期告解的焦点是要确认人的行动是否适于肉身死亡之后的来生。而到了18、19世纪，关注的则是政府赞成的能够生产生命的性的形式。不仅如此，到了20世纪，随着性被驾驭成为自我认同和生活风格^[1]的表达，这种趋势又有了一定的发展。

最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迁也伴随着话语范围的变化。政府的注意力从关注控制相对匿名的个人态身体转向调控整个人口。现代监狱系统越来越关注社会态身体的行为，而全景敞视监狱所提供的控制样板也扩展到学校、兵营、医院等机构/制度（Ball, 1990; Honneth and Joas, 1988, p.144）。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可以对社会中广阔得多的领域实施细致的控制，也掌握了关于整个人口的大量知识，用于政策制定和规划（比如说，学校使政府能够监管孩童的健康）。

话语范围上的变化也明显体现在性的领域。有关性的话语逐渐摆脱了个体的身体，转而将焦点放在社会态身体的生育健康上。例如，从18世纪开始，将个人态身体的性与国族人口的管理相关联的性话语大大增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是与四种重要话语形象的创造分不开的：“歇斯底里的女人”（受其

[1] 本书中的“lifestyle”在福柯、吉登斯、鲍曼等人的学说中译作“生活风格”，强调自我规划和个体选择维度；在布迪厄和传统社会学经验研究中译作“生活方式”，强调消费取向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维度。

性的限制与规定)；“手淫的孩童”(倾向于从事不道德的行为，通过消耗生命能量，对种族未来的健康构成了威胁)；“马尔萨斯主义的夫妇”(通过社会化，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养育孩子)；以及“性变态的成人”(其性本能偏离于合法规范)。这些话语形象居于支配地位，意味着“合法的异性恋夫妇”往往起到树立规范的作用，将不同的人员搭配、其他的性的形式归类为偏离(Foucault, 1981, p.105; 亦参 Connell and Dowsett, 1992)。

综合观之，话语所占据的社会空间中发生的这些变化产生了两大彼此相关的后果，对于将具身性的个体与大规模的权力系统相关联而言颇为重要。首先，它们使政府能够对个体实施的控制程度远甚于前。随着话语从涵盖个体、身体与死亡的相对有限的空间，转向融合心智、人口和生命的更为广阔的空间，人们也变得更加分离，更具差异，也就此更为可控。特纳(Turner, 1983)把这类过程说成是导致了人群的个体化。个体化包含了一系列做法，基于有关人口的知识，并结合规范的确立，通过标记、数字、符号和编码，界认和分隔个体。个体化也有助于对人群的控制与监管。比如说，教学医院对于监控国民的健康扮演了重要角色，促成了医学规范的发展，可以据此对个体进行比较和归类(Armstrong, 1983; Foucault, 1973)。与此类似，通过绘制个体生育率与总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对个体进行比较、区分、奖赏或惩罚。

其次，这些变化也伴随着实现控制的手段的变化。通过压制实现控制的手段渐趋减少，愈益转向通过激励欲望而维持控制。福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Hewitt, 1983)。比如说，经济发展开始会伴随着城市中身体的大量聚集，需要使这些身体可以提供服务，又不出乱子，这是商贸成功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权力通过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和家庭中如今会被视为“严厉、沉重、琐细、持续”的规训体制，构成了身体(Foucault, 1979a, 1979b; Gordon, 1980)。不过，在20世纪，控制身体的更具区分性的形式变得广为流行，其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也更具生产性。福柯认为，说到身体在消费文化中的表征，“我们发现了一种新型投入，不再表现为通过压制实现控制的形式，而是通过激励实现控制的形式。‘想脱就脱——但拜托要苗条瘦削、有型有款、肤色健康！’”(Foucault, 1980, p.57)

三、福柯笔下渐趋消散的身体

对于那些致力于考察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的身体的社会学家来说,福柯关于话语态身体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与前章考察的自然主义思路截然不同,福柯并不把身体看成是在自然角度上彼此不同的实体,其生物性构成持续不变地决定并限制了人类主体的能力。相反,身体是高度可塑的现象,可以贯注各式各样变动不居的权力。

<70>

这种思路特别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欢迎,她们援引福柯的研究,反对认为自然态身体是奠立个体身份/认同和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主张社会性别化的身份/认同是碎片化的,并且变动不居。与此类似,女性主义者还借用福柯来挑战社会科学学习以为常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这种区分承认,标志女性与男性特征的属性中有许多固然是社会性别化的社会化模式的结果,但其他一些差异却是自然如此,由生物特征所预定。与此相反,她们用福柯的思路来主张,那些通常被视为区分两种“生理性别”的生物属性,本身其实也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而成的,权力投入身体并通过身体来实施的具体方式,就会生产出社会性别化的具身体现形式(Brown and Adams, 1979; Diamond and Quinby, 1988; Morris and Patton, 1979; Sawicki, 1991)。这些福柯风格的分析进一步发扬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传统,包括克里斯蒂娜·德尔菲(Delphy, 1984)和莫尼克·维蒂希(Wittig, 1982)的著述,主张生物范畴只是社会范畴的某种展现,因此并不需要作为自主存在的领域进行理论概括(Fuss, 1990)。

不过,在福柯探讨身体的思路中,也存在根本性的张力,意思是说,他的研究并不能克服社会学传统上对身体所采取的双重思路。一方面,对于作为建构话语的实际产物的身体,关注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当福柯考察有关科学思想和规训技术对于身体的效应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实存体的身体。让人颇感悖谬的是,福柯在著作中更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但这却导致他把身体看成是某种跨历史、跨文化的统合一体的现象。这等于是说,身体始终是既存的,在那儿等着被话语建构。无论何时何地,身体都同样可资利用,作为接收来自外部力量的意义并由这些力量构成的定位场所。这种观点使人根本无法认识到,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人的具身体现的不同方面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重构的。杰弗里·威克斯等人主张,福柯使我们身体历史化,这样的说法如今也

很成问题了(Weeks, 1992)。

另一方面,福柯对于身体的认识论观点意味着身体作为一种物质现象或生物现象消失了。基于福柯式的思路,永远无法把握生物性、生理性或物质性的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存在方式始终被挡在话语设置的意义构架背后。在我看来,如果你读福柯的研究,觉得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非具身性的,原因就在于此。身体作为讨论话题是呈现的,但作为考察焦点却是缺席的。他老想着规训系统和性之类的东西,而在其讨论中,身体却往往消失不见,不能成为切实的、物质性的分析对象。福柯有关心/身关系的看法就是明证。一旦身体被困于现代规训系统,心智就取而代之,成为话语权力的位置所在。因此,身体往往被化约为一堆惰性的东西,受以心智为核心的话语控制。然而,心智本

<71>

身却是非具身性的,对于心智在积极活动的人体中的定位,我们毫无认识。

坦白讲,福柯作品中的身体作为肉身性的实体并不享有长久的可见性。身体被生产出来,而其自身的生产力无论体现在什么地方,都仅限于话语赋予它们的那些。如此一来,身体作为一种因果现象,消失在话语的决定力之中,而要把身体想作是社会行动的物质要素,也变得十分困难。不仅如此,福柯对于生命体验的关注也是不够的。特纳指出,尽管福柯屡屡谈到快乐和欲望,但却忽略了具身体现的现象学。“在所谓我的身体的观念中,包含着个人对于具身体现的感官体验的直接性,但这种性质却没有引起多少关注。我通过感官体验对于个人化身体的权威、享有和占据都被尽可能轻描淡写,浓墨重彩的却是从外部实施的调控性控制。”(Turner, 1984, p.245)彼得·迪尤斯认为,这种忽视严重损害了福柯的分析,因为“要是没有某种理论,让肉身范畴不单单是一张白板,就难以衡量‘施加于积极活跃的身体的精微权力’所造成的代价”(Dews, 1987, p.163)。

因此,福柯的研究并没有克服社会学对身体所采取的双重思路,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再生产出了这种思路。身体确实受到话语的影响,但对于身体如何回应话语,反过来影响话语,我们却知之甚少。虽说福柯不时提到身体会对权力和支配话语做出抵抗,但即使是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说不出做出抵抗的身体本身是什么。如果把福柯的身体观与自然主义思路相比较,福柯作品的这一特性就更明显了。

在自然范畴与社会范畴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自然主义身体观与福柯风格的

身体观可以说泾渭分明。自然主义思路认为,自然范畴是社会生活的“原材料”,在分析人的具身体现时,性差异或种族差异都被视为先在于社会差异。比如说,“女性”和“男性”都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稳定不变的客体,丝毫不可能有什么跨文化变化或跨历史变化。然而,在福柯看来,自然范畴只是社会范畴的一种建构。按照福斯的说法,身体始终已经是“文化上勾绘好了的,它从不会以纯粹的或未经编码的状态存在。”(Fuss, 1990, p.6) 这种观点的长处即在于注重社会范畴的生产,善于分析表征系统,但并不以消灭本质主义为前提。相反,自然本质主义只是被**话语本质主义**所取代,这种状况使福柯没有办法考察生物特征(或任何有关身体的物质性因素)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社会被带人身体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乃至身体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需要细致历史考察的现象趋于消失。它作为讨论话题呈现,但作为分析对象却是缺席的。既然身体就是话语把它建构成的那个样子,那么在福柯的研究中需要考察的就不是身体,而是话语。

归根结底,话语的决定性力量意味着,要说有多大可能建立理论角度上充分的身体观,福柯的研究相比于自然主义的阐述,丝毫未见进展。身体可能是被话语所环绕,通过话语被领会,但却不能化约为话语。福柯一派的学者或许会提出,这个问题不得要领,因为脱离了特定的知识系统,就无法了解身体。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根植于身体,受身体形塑**,而不是与身体相分离,那么这种反对意见本身也就不得要领了。下一章我还会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

四、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呈现

福柯把焦点放在身体如何被贯注**控制**个体的权力上,相形之下,戈夫曼的作品就显得更强调身体是人的**行动(agency)**不可或缺的要素。戈夫曼的核心关注就在于身体怎样使人能够介入并影响日常生活流。不过,在戈夫曼的研究中,具身性的个体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他分析了“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shared vocabularies of body idiom)(或约定俗成的非言语语言形式),是这些东西指引着人们对于身体的外表和展演(performance)的感知。这样的分析让我们对身体管理所面临的社会约束有了一定的了解。

戈夫曼研究身体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三点主要特征。首先,身体被视为个体所具备的一种物质属性。自然主义观点把人的行动和特性/身份/认同说成是由其生物态身体所决定的,戈夫曼与此相反,主张个体通常有能力控制并监管自己的身体展演,以有利于社会互动。在此,身体与人的行动的实施相维系,在戈夫曼的著述中呈现为一种资源,既要求人们管理其举动和外表,又为人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其次,尽管身体并非像福柯的作品中那样,的确是由社会力量生产出来的,但赋予身体的意义却是由“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所决定的,而后者并不受个体的直接控制(Goffman, 1963, p.35)。身体习语是约定俗成的非言语沟通形式,显然是公共场所中的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戈夫曼对这个词的用法是一种泛称,指“穿着、举止、运动与位置、音高、挥手或致礼等身体姿势、脸部装饰、明白的表情”(Goffman, 1963, p.33)。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不仅使我们能够对身体发出的信息进行归类,还提供了一些范畴,可以根据这种信息,给人们贴上标签,并分出三六九等。因此,这些分类深深地影响了个体采取怎样的方式,力求管理并呈现自己的身体。 <73>

戈夫曼的思路的这两大特性意味着,人体具有某种双重定位。身体的确是个体的属性,但却是被社会界定为富含外在意蕴和内在意义的。这种概括就是戈夫曼身体思路的第三点主要特征的核心所在。在戈夫曼的研究中,身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充当人的自我认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特定的身体形式与展演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往往会被内化,深刻影响个体对于自我和内在价值的感受。

戈夫曼创造了“互动秩序”这个术语,并分析了维持这种秩序要涉及哪些步骤。透过这种比较具体的分析,能看出他探讨身体的整体思路。戈夫曼把互动秩序概括为社会生活中一块相对自主的领域(其他还包括经济领域等),不应视之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在性、根本性、构成性的,具有宏观现象的形貌”(Goffman, 1983, p.4; 亦参 Burns, 1992, pp.17—47)。他对于这块生活领域的分析证明,要想成功地介入日常生活,面对可能的扰乱而维持对于某种情境的单一界定,就要求具备高度的资格能力,能控制身体的表现、运动和沟通(例参 Goffman, 1963, 1969)。我先简要讨论身体在戈夫曼关于日常接触、社会位置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的重要性,然后要谈谈他如何看待身体、社会认同与自

我认同之间的关联。

五、身体与社会互动

在戈夫曼的研究里，对于互动秩序中那些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日常接触的结构化过程，身体乃居于核心。个体在工作、休闲和家庭生活中，频频启动、进入和离开与其他人之间的日常接触，日常生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在于这些接触中既定的例行常规。在这些有焦点或无焦点的会面的每个阶段，身体的各种运动和外表都释放着人与人之间意向的讯息。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要维持有焦点的日常接触，时不时的眼神接触不可或缺，而频频看表就表示想要走人。

日常接触之所以对社会生活很重要，也是因为在这些场合下，人们都想要表演出特定的社会角色（比如说操心的妈妈，恼火的老师，体谅的社工）。戈夫曼提出，如果人们要显出对这些角色信心满满的样子，就需要遵守主导特定的日常接触的身体规则。例如，一个雄心勃勃的经理人也许会感到某次商业会议无聊乏味，但为了维持权威的形象，他就得表现出满怀兴致的样子来。店员们也会采取类似的思路。他们学得了一身“假装功夫”（make work）的好本领，也就是说，在管理者的眼皮子底下显得很忙，其实却是在专心致志地聊私事儿（Goffman, 1969）。因此，要维持日常接触顺利流动，要维护社会角色的完整/正直（integrity），关键是要做好脸面功夫（face work）和身体功夫（body work）。^[2]

在支配与臣属的社会关系的维护中，也有身体的介入，但其方式却远非身体暴力这种赤裸裸的强力。比如说，有关尊重的一些身体上的表达，像是男性为女性开门，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也不妨看成是构成了社会性别不平等

[2] 这两个词的译名定夺与中西文化差异（准确地说是与戈夫曼所依据的英美中产阶级白人文化的差异）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汉语中的“面子功夫”或“脸面文章”含有贬义，而戈夫曼并不会去剖析表情姿势之类的东西是否“真实”传递内心，或者说呈现了“真诚的”内心。但另一方面，英语中的“工作”比较强调工具理性的意味，“功夫”（更近于太极内功而非外家刚力）比较能够传递互动情境中对于情境把握的细致揣摩、尺寸拿捏（这似乎被界定为是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特色，但戈夫曼恰恰要揭示“西方”文化的这种细微之处）。

(Goffman, 1979, p.6)。按照戈夫曼的说法,“就各式各样的身体运用的‘正常/规范’能力而言,男性往往把女性当做是有欠缺的行动者/演员(actors)。”(Goffman, 1974, pp.196-197)

苏珊·巴特基援引南希·亨利有关身体政治的分析(Henley, 1977),在考察权力和社会性别化身体时,详细阐发了上述观点。巴特基认为,身体参与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再生产,但其方式一般没人关注。一个男人

的确可能为一个女人充当引导^[3],无论她去哪里:逛大街,拐弯儿,上电梯,进门厅,进餐时落座,舞场上回旋。男人的运动“并不非得沉重有力、咄咄逼人、笨拙难看,而可以温柔优雅但沉着坚定,宛如满怀自信的骑师,驾驭着训练精良的马匹。”

(Bartky, 1988, p.68)

在戈夫曼看来,这些不平等关系所采取的形式是通过身体的定位来传递的,甚至“渗入无比怜惜体贴或柔情蜜意的时刻/环节,不会明显导致紧张”(Goffman, 1979, p.9)。

对于身体的管理也参与了戈夫曼所称的**有礼貌的不关注**(civil inattention),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是当代社会陌生人之间相关的脸面功夫中最常见的基本类型。有礼貌的不关注意味着在大街上,在大型集会上,或是在典礼场合上,不仅仅运用脸面,还借助对整个身体的细致定位,来表示某种不具威胁性的呈现。比如说,陌生人在街上彼此迎面走近,通常会互相瞥视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开,表示认识到对方的呈现,但又要避免做出任何可能会被当做有威胁意味的姿态。

对于身体的管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重要意义,可以导致戈夫曼所称的“精神的科层化”^[4](Goffman, 1969)。这是因为要求个体花费大量时间“在台上演出”,在日常接触中生产出协调连贯的展演(Featherstone, 1982),

[3] 此处原文为“may literally steer a woman...”,意带双关。“literally”也作“照字义”解,而“steer”正有“驾驭”、“操纵”的意思。此时的男性就是“男士”(所以上面那句话我们一般会说“男士为女性/士”开门)。“man”成了“gentle/man”,温柔,但不可抗拒。

[4] “bureaucratization of spirits”,这里强调的恰恰是韦伯标准科层制定义之外的或不被重视的一些特点,比如前后台区分,团队协作进行印象管理,“人本”与“事本”之间界限的微妙转换等等。

并意味着个体需要在“后台”放松,可以肆意进行“动物性的放松”,像是打呵欠、打饱嗝、挠痒痒、抠鼻屎之类,“似乎提供了短暂的放松,让个体摆脱他稳定而全面的社会衣装之下体验到的那种张力”(Goffman, 1963, p.68)。

<75> 讨论至此,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身体在互动秩序中具体有着怎样的重要性,主要看两点。首先,处在某一社会中的个体会对身体外表和面部表情与姿势之类身体行动赋予类似的意义,往往还相当重视。如前所述,戈夫曼提出,我们具有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这为我们提供了共同的具身化信息归类方式(Goffman, 1963, p.35)。

身体在互动秩序中具体有着怎样的重要性,要看的第二点主要因素就是身体作为意义的生成器。参与日常接触的个体持续地展示着信息,哪怕他们沉默不语也是如此,这正是其具身体现所造成的结果。无论个体有着怎样的意向,可见的身体都陷在沟通的网中,这会对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Burns, 1992, p.38)。这就意味着,某些专业人员,比如教师、外交官和专门套取人信任的骗子,就必须成为身体管理方面的专家。

六、社会认同、身体与自我认同

我们已经看到,要想让日常接触顺利流动,要想让角色成功扮演,更一般地说,要想让一个人被接受为互动秩序的完整成员,身体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戈夫曼的作品中,一个人要想树立起作为有资格能力、有真实价值的人的自我认同,能获得接受这一点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用身体习语的哪些词汇来归类他人,也就会用这些词汇来进行自我归类。通常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外表和身体管理使其被他人归类为“有欠缺的”社会成员,就会将这种标签内化,并融入“被损害的”自我认同。戈夫曼有关污名(stigma)的分析表明(Goffman, 1990 [1963]),我们在领会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往往就像是照镜子,而镜子里给出的映像则是由社会的观点与偏见所框定的。

戈夫曼透过分析窘迫(embarrassment)和污名,具体例示了身体是如何充当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当人们展示出性格/角色(character)上的不协调一致(未能镇定自若地演出其社会角色),或当个人未能维持互动的顺利流动(主导日常接触的规则遭到破坏),就往往会导致窘迫(Schudson,

1984, p.636)。身体对于互动的这些失败而言都是关键因素,也将这些失败作为窘迫传递给“犯事者”,后者往往会感到非常不安。窘迫在身体上的展现包括口吃、脸红、音颤,以及手足无措(Goffman, 1963, 1990 [1963]; Kuzmics, 1991)。

对于一个人作为有资格能力的完整的社会成员这一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窘迫都意味着某种威胁,因为它揭示了戈夫曼所称的这些人的**虚拟社会认同**及其**实际社会认同**之间存在差距。所谓一个人的虚拟认同,指的是他如何看待自身,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他的实际社会身份/认同指的则是别人怎么看他们(Goffman, 1990 [1963], p.12)。我们有一种普遍的欲望,要把自己呈现为“正常”的人,配得上在社会中扮演完整的戏份,这种欲望往往主导着我们的虚拟社会认同。不过,历经时日,我们的实际社会认同也常常会危及虚拟社会认同。虚拟社会认同与实际社会认同之间会出现差距,并导致不时出现窘迫的情形,不过这些通常都是可以修补的。这些认同之间的差异并不是那么显著,尚不足以损害我们作为有资格能力的完整的社会成员这一自我认同。尽管如此,伯恩斯也指出(Burns, 1992, p.217),如果我们的虚拟社会认同被发现包含某些属性,远远不及初看之下那么得到赞同,那么我们的社会认同也很可能发生重大转换。无论在我们自己的眼里,还是在社会的眼里,我们都不再是一个完整而平常的人,转而成为“被污损、被贬值的人”(Goffman, 1990 [1963], p.12)。

<76>

人被赋予了污名(已经被标定为名声很坏的属性),置身于与“正常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就会面临一些问题,对其自我认同可能特别有害。如果被污名化的个体试图装作“正常人”,就会冒着发现“虚拟社会认同与实际社会认同之间存在某种歧异”的风险,会导致损害其社会认同,并使这种社会认同与社会和他们自己相隔离,这样一来,他们便孤零自处,成了“名声扫地的人,面对着一个不欢迎他们的世界”(Goffman, 1990 [1963], pp.12-13, p.31)。诚如戈夫曼所言,“污名化的个体对于认同所持的信念往往与我们相同……他从更广泛的社会中吸收来的那些标准使其对其他人眼中他的缺陷非常敏感,这必然导致他也认为,哪怕只是不时认为:自己的确是欠缺原本应当具备的某种东西。”(Goffman, 1990 [1963], pp.17-18)戈夫曼在分析污名的时候,表现出特别关注残障人士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不得不耗费大量功夫,以便被接受为完整

的社会成员 (Campling, 1981)。

我还将简短讨论一些对于戈夫曼研究身体的整体思路的批评意见。不过, 在此有必要指出, 戈夫曼在人的虚拟社会认同与其实社会认同之间设立的关联往往过于紧密。费瑟斯通和麦克·赫普沃思对于“老年化的面具”的分析 (Featherstone and Hepworth, 1991) 就凸显了这一点。两位论家提出, 上年纪的人绝非其他人眼中的他们那样, “老了”, “过气了”, 而是把老年化过程看成是某种面具或伪装, 其下掩盖的是他们依然自视为骨子里充满青春活力的自我。

七、戈夫曼笔下可管理的身体?

<77> 对于理解可管理的身体, 戈夫曼有关互动秩序的分析至关重要, 因为它让人们深刻把握个体是如何控制并监管自己的身体。而对于身体、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他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在这方面, 戈夫曼赞同说身体是构成人类行动者的生理要素, 并且对于这种观念比福柯重视得多。不过, 戈夫曼的研究也有一个重大问题, 即缺乏一些机制, 能够将位于互动秩序这一有限领域中的个体的身体管理与有关身体习语的更广泛的社会规范相联系。比如说, 戈夫曼在分析污名的时候, 认为对人的身体展演进行范畴化的归类过程先在于并独立于社会日常接触。实际上, 戈夫曼 (Goffman, 1983, p.26) 也认识到这种思路致使其作品中出现这一问题, 因为他承认, 要说明如何将他关于互动的阐述与对于其所依赖的社会秩序的更一般性的观点相关联, 存在一些困难。

戈夫曼的身体观表现出的这种二元论, 使其作品面临两点重要批评。第一点攻击的是戈夫曼研究的实质焦点, 即互动秩序中的个体身体。由于他关注作为明确分离的领域的互动秩序, 因此不妨说, 戈夫曼倾向于低估自己的身体观对于社会学中更具宏观结构色彩的问题的重要性。诚如吉登斯所言 (Giddens, 1988), 戈夫曼分析互动秩序中的身体, 这在社会学角度上具有多少重要性, 归根结底还要看它们在一般层面上的适用性。那些对千百万人产生关键影响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决策, 其实和更为凡俗的互动形式一样, 都是在身体共同在场的情形下做出的, 有鉴于此, 戈夫曼的作品理应启发我们对于结构性问题的理解。尽管如此, 戈夫曼并没有给出理论性的手段, 将自己的洞见与有关跨越广泛时空的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关联起来。的确有学者对他的作品做了如

此诠释，但也是通过涂尔干等理论家来解读戈夫曼（例参 Collins, 1988）。所谓社会分类，所谓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这样的观念都太模糊，太抽象，难以实现上述宗旨，因为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源起的，又是怎样维持下去或遭到挑战的，都无甚了解。

第二点重要批评针对的是戈夫曼认为，社会分类在给身体贴标签和分等级方面具有重要意涵。它还点出，在戈夫曼与福柯的作品之间，存在某些亲和之处。因为在这两位作者看来，身体的意涵都是由处在身体之外的源泉（无论是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还是话语）决定的，而这些源泉是受制于它们的个体力所不及的。不仅如此，它们在说明上的重要性还意味着，关于身体是什么，或者身体如何有助于人的行动，我们原本可以了解得更多。不错，我们从戈夫曼的作品中了解到身体如何打嗝、放屁、滑倒、跌倒，但对身体如何成为行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却没多少认识。身体对于个体来说意义重大，但之所以如此，主要却是因为人们彼此归类为有资格能力或无资格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分类过程。归根结底，身体的重要性是由心智对于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的接受程度所决定的。这就像在福柯那里，心智成为铭刻身体之意义的场所。 <78>

戈夫曼与福柯为我们提供的身体观彼此对立。然而，无论哪一位作者，都力图提供一套关于社会中的身体的明确学说。在这一点上，有必要看看特纳（Turner, 1984）和弗兰克（Frank, 1991）的研究。我在本章引语中已经提到，特纳的“身体秩序”学说，其形式系取自霍布斯和帕森斯，不过它的内容，它对于社会系统控制身体的需要的关注，显然受到福柯的影响。

八、身体与社会秩序

特纳的“身体秩序”理论（Turner, 1984）的出发点，就在于试图将霍布斯经典的秩序问题重新概括为身体治理（government）的问题。为此，他把霍布斯对于身体的几何形式及其运动的关注，融入帕森斯对于社会系统再生产自身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分析。特纳的分析受到了结构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的关注的影响：探讨身体的视角，就在于身体对稳定社会系统的治理设置了哪些结构问题。不过，他的研究也带有批判性的意旨。社会性别、权力和压迫等话题就是特纳的核心关注。如其所言：

任何有关身体的社会学归根结底都关系到性别分工和情感分工的性质。身体社会学已经表明，在男性实施父权/男权，对性尤其是女性的性进行控制这一问题上，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学研究。

(Turner, 1984, p.114)

特纳认为，所有的社会系统都必须解决“身体问题”，该问题具有如下四个相关维度：

- 1. 人口历经时间的再生产。
- 2. 作为一项体内问题的欲望约束。
- 3. 人口在空间中的调控。
- 4. 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表征，成为身体外表或“外部”面临的一项任务。

特纳认为，尽管(2)和(4)似乎是个体面临的任務，但这些任务的根源依然是社会层面的，对于社会系统充分发挥功能和再生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79> 确立了社会中的身体问题的这一维度体系后，特纳接着确定了社会力求管理身体治理各维度的某种制度子系统或控制模式，这些维度各自对应的一位主导理论家，以及社会强加这些任务后导致的容易“破坏”身体的典型疾病 (Turner, 1984, pp.91-114)。这样来分析疾病，反映了特纳奉行帕森斯路线的观点 (Turner, 1987)，即病患是一种社会境况，涉及个体进入社会角色的渠道。

图 4.1 特纳的身体秩序学说

人 口		身 体	
时间	再生产 / 生育 马尔萨斯 手淫或体外排精 *	约束 韦伯 歇斯底里	内部
空间	调控 卢梭 恐惧症	表征 戈夫曼 厌食症	外部

* 原词并非正文中使用的“masturbation”，而是“onanism”，故有此双义。
Adapt from B.S. Turner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Basil Blackwell; Oxford. (2nd, 1996, Sage).

图 4.1 描绘了身体问题的各个要素。挨个来看图 4.1 中的各个表格，人口再生产问题传统上是通过晚婚和父权家庭的体制来管理的，以便控制生育率。马尔萨斯这位 18 世纪的生育理论家就主张，支配人们的需要有两种：一是饮食，一是男女。不幸的是，这两种“自然法则”相互矛盾，因为生育能力很容易超出整个人口生产食物的能力。而控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除了饥荒，要么是有伤风化的（比如卖淫、堕胎），要么就不行婚嫁或晚婚晚育。马尔萨斯认为，晚婚是最理性的人口约束模式，也有助于培养持重、勤俭的积极美德（Turner, 1984, p.95）。而这些又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手淫（masturbation）开始被视为一种“疾病”，标志着面临婚前保持道德纯洁的要求，身体陷于衰弱，因此被视为浪费，不道德，需要控制。

传统上，要约束欲望，就要借助父权 / 男权的权力体制，对女性的性进行调控。社会力求控制欲望的方式包括了一套有关苦行的意识形态，以此推延性的满足。韦伯被视为探讨苦行主义的理论家，尤其指的是他关于新教伦理^[5]的分析。在这一点上，韦伯提出，一方面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新教强调“天职”、自我否弃、艰苦劳作等观念，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亲关系。因此，新教促成了“对于身体的理性安排，身体就此得到保护，摆脱了欲望的扰乱，有利于持续性的工厂生产。”（Turner, 1984, p.100）但这种提倡苦行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后果对于男性和女性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女性陷于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压力。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被视为受其性和生育功能支配，就应该把她们限制在婚姻和家庭领域中。然而，在欧洲的婚姻模式下，早婚也常常会被推延，人们认为这会使女性面临歇斯底里发作的危险。女性要想过上健康的生活，除非通过就以生儿育女为宗旨的婚姻，找一个男人结成性的关系。这种看法既有助于巩固男性高于女性一等的地位，又使任何偏离的女性都面临歇斯底里的威胁（Turner, 1987, pp.88—93）。

<80>

福柯所称的“全景敞视体制”（panopticism）已经实现了人口在空间中的调控，特纳（Turner, 1984, p.92）把这种体制界定为一种控制模式，在监控、记录保管和人口控制上普遍有所加强，对人口实行科层式的登记管理，“清除游民现象”。18 世纪以后，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都市生活方式是对居于支配

[5] 原文此处为“ethnic”，显系“ethic”之误。

地位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威胁,开始在社会空间中对人口实施调控。卢梭被认为是探讨这方面的身体问题的理论家,他提出,都市化对道德产生了有害的后果,因为它所产生的人口集聚加速破坏了人自然的同情心。都市生活所带来的焦虑集中体现在中产阶层女性身上,她们被视为容易受到都市空间在性方面的危险的伤害。当城市的治安与调控发展到一定程度,女性在城中游历倒是变得更为安全,但这又加剧了男性对于女性独立的焦虑,首次出现有关恐旷症^[6]的系统连贯的医学描述。所谓恐旷症,指的是害怕离开家门,孤身旅行,甚至不敢出门购物。特纳认为,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恐旷症患者担忧的是性诱引,要压制对于陌生人的性兴趣。妻子的恐旷症就表达出丈夫担心不能控制家庭的焦虑,但也展现了妻子对于资产阶级家庭环境的安全与地位的依赖。对于都市区域和市场的恐惧逐渐转换成一种医学状况,使丈夫对于妻子的权力获得了合法性(Turner, 1984, pp.107-108)。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战争年代对于劳力的需求增长,中产阶层女性逐步进入市场,恐旷症也逐渐退位,人口调控的典型疾病转为操心如何呈现身体外表(比如衣着、妆饰、尺码)。

最后,特纳提出,对于人们如何在社会空间中表征自身,社会会预设某种稳定性。在前现代社会里,个体的表征是通过地位与徽章(insignia)等外在标志而客观化的。在封建社会,表征寓于一个人/男人的盾牌^[7],表示某种特权性的阶级位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体的表征逐渐与制度性的角色相分离。如特纳所言,这就使人们更加注重脸面功夫和印象管理:

自我不再定位于纹章(heraldry),而必须在面对面互动中持续不断地构成。这是因为,消费主义与大众市场已经清除了社会差异和人身差异的外部标志,至少是使这些标志趋于模糊。

(Turner, 1984, p.109)

当代西方社会通过商品化这种模式,力求确保人们在呈现自身的方式上有最低限度的延续性。也就是说,管理自我的手段越来越和消费商品维系在一起,要实现社会角度和经济角度上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呈现出某种为人接受的

[6] “agoraphobia”,亦有译为“广场恐惧症”、“旷野恐惧症”、“陌生环境恐惧症”。当然,在人群高度聚集的城市中,置身陌生人流,或许能从内心的角度更深地体会到“旷野”的孤独。

[7] “shield”,也包括盾形徽章、纹章。

自我形象^[8]。在关注人们如何呈现自身的理论家中,戈夫曼堪称重镇(尽管同样有必要强调,特纳认为身体管理的问题就在于社会需要再生产出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Goffman, 1969),戈夫曼刻画了这样一副个体的形象:这些演员/行动者(actors)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舞台上进行得体的(appropriate)表演,并且始终会受到可能陷于窘迫或失败的威胁。对于身体的管理和形塑越来越成为自我形象的呈现的核心,追求健身、节食和全身保健的产业不断壮大,也支撑了上述趋势(Featherstone, 1987; Wolf, 1991)。神经性厌食症成了典型疾病,表现出身体在自我呈现的竞争压力下趋于衰弱。患上厌食症的主要是女性,如今看来,与美丽和苗条被维系在一起有密切的关联(Chernin, 1983; Lawrence, 1987)。

特纳的身体秩序理论有一个显著的长处,就是给出了一套类型体系,能够对既有的身体论著进行组织和归类,并做出社会学角度的领会。它还阐述了社会要想再生产出自身,最低限度就必须履行哪些身体方面的任务。这就揭示了社会学传统上对身体所采取的双重思路是如何未能考虑到摆在社会系统面前的身体秩序问题,从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肉身维度。

特纳的研究大大影响了随后对于社会中的身体这个问题的表述与考察(例参 Frank, 1991; Therberge, 1991)。不过,特纳的思路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空白,因此除了帕森斯、霍布斯和福柯,还需要看看其他的理论家,以创建一套理论,能完全克服社会学中探讨身体的双重思路。

特纳的身体秩序学说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比福柯更关注物质性、生理性的身体,同时也继续关注秩序、控制和性之类的议题。特纳描述了身体如何可能由于社会施加的那些类型的控制而趋于衰弱乃至患病,并明确了物质性的身体与性的结构之间,与社会接受的呈现模式之间,都有哪些关联。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种偏重于物质性身体的观点,因为我们对于身体作为一种思考着、行动着的现象,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认识。原因就在于,身体之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它呈现为有待社会系统进行管理的一个问题。不仅如此,特纳的理论在结构问题上往往谈得很透彻,但对于身体作为个体的促动性属性(enabling property),认识却要少得多。我们听来听去都是关于身体很可能受到哪些约束,

<82>

[8] 原文此处为“self-image”,“image”越来越从有深度的内在“意象”变成象征深度的外在“形象”。

而这又会如何影响到它们的能力，但对于身体以哪些方式关系到并促进了人的行动，我们听到的就少得多。这就使特纳遭到抨击，说他的理论给出的对于社会中个体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具身性**的（T. Turner, 1986）。

特纳的理论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原因部分在于其讨论范围。从核心问题入手的思路或许会确立起社会系统必须加以管理的一些基本的身体因素，但对于某些系统为什么就比其他系统更成功地应对这些问题，这种思路却没说出什么来。这种思路也不致力于确定，在哪些历史机制之下，社会系统力求解决身体问题的办法发生了转变。实际上，尽管有众多历史素材启发了核心问题的思路，但它说到底依然是一种历时态角度上静滞的学说，有关历史变迁的分析仅限于经验考察的层面。特纳理论中的这一块沉默无言煞是扎眼。

这些批评意见并不等于说全盘否定特纳的身体思路的价值。不过，它们的确意味着，这种思路的用益或许仅限于明确身体对社会系统设置的那些问题的外部因素。

九、身体与人的行动

在特纳的思路之外，弗兰克另辟蹊径，来考察身体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Frank, 1991）。弗兰克首先考虑的是个体的身体所面临的“行动问题”，而不是摆在社会系统面前的“身体秩序”任务。如其所言，“有关社会的理论概括或许就只能走到特纳的范畴划分这一步了，但这些范畴首先不能被设定为某个‘社会’的抽象需要，而应该源于身体自身的问题，即处在某一社会背景中的具身体现。”（Frank, 1991, p.48）就此而言，弗兰克比特纳更关注如何进一步发扬戈夫曼有关身体作为人的行动要素的某些洞见。

弗兰克采取社会建构论的思路来看身体，因为他认为，身体的意涵和发展都与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然而，他的“行动问题”分析又超出了许多社会建构论观点所特有的局限。这是因为，他非常重视身体作为**肉身现象**的存在，这本身就会影响到人们如何体验自己的身体。弗兰克认识到，身体“并不是从话语和制度中凸现出来的，而是来自其他身体，具体地说，就是女性的身体”。身体为人提供了行动的手段，但也对行动施加了约束。身体的肉身性“始终是牢不可摧的事实。这块血肉形成于子宫之中，一生中历经变形（无论变好

变坏),然后死去,分解。”(Frank, 1991, p.49)

认识到身体作为肉身现象,就对弗兰克的分析有了整体的初步把握。更具体地说,他提出,身体是社会“身体技术”(话语、制度和身体的肉身特性的综合)的中介和结果,而社会也是这些身体技术的中介与结果。话语并不具备它们在福柯作品中所拥有的那种决定力,而是指有关身体能力和约束的想法,在身体的体验中,这些想法已经存在着,等待自我理解。相反,所谓制度,就是定位在时空之中的物质场所。身体技术通常被体验为社会给定的,只是具体体现于身体对其他身体的实际运用中。不仅如此,身体技术也兼具约束性和促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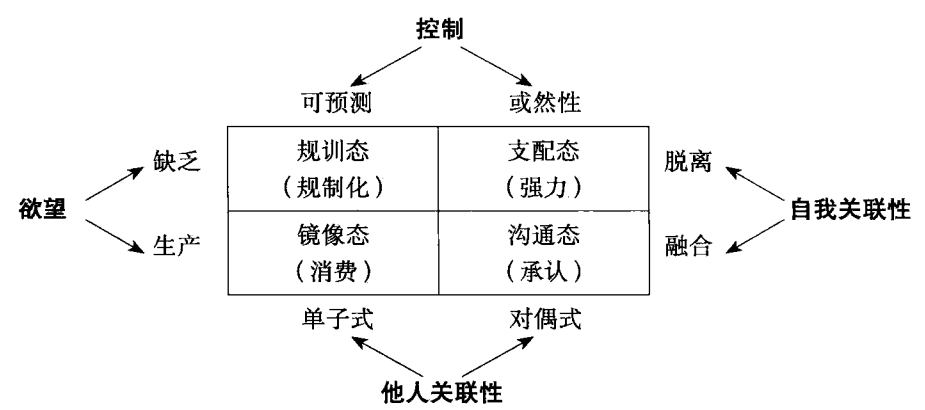
为了说明这种阐述中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意思,弗兰克以中世纪圣女的禁食这一苦行实践为例。他把这些禁食的身体定位在当时的教会制度中,也定位在有关的话语中。这些话语源自于教会的教义(关注作为圣事的禁食与作为自我放纵的禁食之间的界限),中世纪的婚姻习俗,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这个例子中,肉身特性的决定性维度设下的问题是:身体能够承受多少自我惩罚和自我剥夺?卡罗琳·拜纳姆指出(Bynum, 1987),身体实际对自身做出的惩罚程度不一,表明不单单是各种制度和话语处在流变之中,而且肉身特性本身也是灵活可变的,自有其历史的演变。

论证至此,弗兰克有选择地借鉴了特纳与吉登斯的研究,为自己的身体理论设定一些颇具启发性的影响因素。这套理论相当凝练,尚需进一步阐发,但已经给他提供了背景框架,分离出“身体在结合某个目标而采取行动时必须自问的四个问题(或行动问题)”(Frank, 1991, p.51)。这些问题借鉴了特纳的身体秩序理论并略作调整,分别关注**控制**(牵涉到展演的可预测性),**欲望**(身体缺乏欲望还是生产欲望),身体的**他人关联性**(身体是单子式的,自我封闭,还是对偶式的[dyadic],通过与他人之间的沟通关系或支配关系得以构成),以及身体的**自我关联性**(身体是身心融合,“舒适自在”,还是与其肉身特性相脱离)。

由于身体会对这四个行动问题做出回应,也就浮现出各自特有的身体习语风格。弗兰克区分出身体习语的四种理想类型,以及各自对应的活动中介,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些行动问题。这些理想类型并不意味着涵盖所有可能的身体习语类型,但却充当了启发性的引导,可以据此理解身体行为。对于规训态身体(disciplined body),中介就是**规制化**(regimentation),其样板就是修

会/修道秩序 (monastic order) 的理性化。对于镜像态身体 (mirroring body)，中介就是消费，其样板就是百货商店。对于支配态身体 (dominating body)，中介就是强力，其样板就是战争；对于沟通态身体 (communicative body)，中介就是承认，其样板就是共享叙事、共同仪式和照看关系。图 4.2 绘出了行动的身体所面临的问题，身体运用的理想类型，以及其活动的典型中介。

图 4.2 弗兰克有关行动中的身体运用的类型体系



Adapt from Arthur W. Frank,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al Review”, M. Featherstone et al. (eds)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为了说清楚如图 4.2 所示的弗兰克的身体理论，我来简单谈一下他的相关阐述：身体运用的规训类型、镜像类型、支配类型和沟通类型，是如何通过各自的活动中介，解决控制、欲望、他人关联性和自我关联性等行动问题。

规训态身体使自己成为可预测的，并力图通过规制化方案，掩盖对于自身或然性的认识。它认为自己缺乏欲望，但运用规制化来承认自身的存在。规训态身体是单子式的，孤立的，脱离于自身的外表，也脱离于与其他身体之间的任何移情。总之，规训态身体成为一种适宜于工具性用途的“工具”，没有能力给予或接收情感。在军事训练的情形下，以及中世纪由于神灵感应而禁食的女性的例子里，都可以看到规训态身体的实例 (Foucault, 1979a)。

镜像态身体也使自身可以预测，但这一次是通过反映出什么是可以被消费的。为了将自身欲望的缺乏这一点保持在无意识层面，镜像态身体通过消费，无休止地生产着浅薄的欲望。它采取单子式的他人关联性风格，因为对待外部

的客体时，纯粹看的是它们对于镜像态身体有什么用处。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身体对于自身有限的意识。实际上，消费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就是旨在促进外部客体与身体之间的相互吸收。最后一点，镜像态身体与其外表相维系。它力求与自身的外表关联在一起，并融入其中，而外表的存在就是为了被装饰。与此相反，身体的“内部”是一种隐藏的现象，只有专业的“授权人员”才能看到 (Frank, 1991, p.61)。镜像态身体的实例包括自恋主义的个体，他们否认个人担当或政治担当，把身体当做感官满足的工具，而不是把感官体验与和他人沟通关联在一起；那些追求人为虚设的生活风格的人也属于此例 (Giddens, 1991, pp.170—171, p.198; Sennett, 1974)。

支配态身体始终意识到自身的或然性。它的世界充满战争，不断受到新的情境和未知因素的威胁。这些身体的本质属性就在于把欲望建构为缺乏，一种要求得到补偿的缺乏。支配态身体的缺乏与这种身体对偶式的他人关联性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某种恐惧。这是一种向外针对他人的恐惧，要克服恐惧，就得消灭这些人。在战争情形下，支配态身体要想独力存活，他人就必须死去。最后一点，支配态身体必须与自身相脱离，以便做出惩罚，也能忍受惩罚。支配态身体主要是男性的身体，休莱特对于德国自由军团 (Freikorps) 的分析即为明证。自由军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的军事单位，旨在打击“布尔什维克”和工联主义者。官方的授权终止之后，许多成员依然作为民间准军事力量留存下来，最终汇入党卫军和冲锋队，而冲锋队的部分成员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集中营的指挥官。根据休莱特的说法，自由军团成员的动机来源，有一部分就是对自己的死亡感到恐惧，只有将被视为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的东西统统消灭，才能忍受这样的恐惧 (Frank, 1991, p.69; Theweleit, 1987, 1989)。

弗兰克的第四类身体用法就是沟通态身体，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未来的可能性。沟通态身体的或然性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系列的可能性。其本质属性就在于，这种身体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建构性互动，不断创造着自己。沟通态身体生产了欲望，但不像镜像态身体，这种欲望针对的是对偶式的表达，而不是单子式的消费。沟通态身体也关联着自身，感到舒适自在，而不是与自身相疏离。一句话，沟通态身体关乎“通过充分体现于身体的叙事共享来增进承认能力” (Frank, 1991, p.89)。弗兰克认为，在那些照看别人的人和被别人

照看的人身上，那些从事后现代舞蹈的人身上，或许能最早找到沟通态身体。

这些身体用法类型每一种都有赖于并有助于身体技术的继续。不仅如此，社会系统正是从这些身体任务赖以执行的中介中成长起来的。弗兰克指出，这“使我们能够理解身体是如何将其任务体验为由某个系统所强加的”（Frank, 1991, p.48）。

弗兰克的理论旨在凸显行动的具身体现。不妨认为，他的分析对于行动的处理要强于有关社会结构的肉身维度的分析。尽管如此，弗兰克的论证核心还在于身体必须克服的那些“行动问题”。因此，你可以期望的身体的最大意义，莫过于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既是人的行动的核心要义，又是其促进要素。“行动问题”的思路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困难和空白。尽管它提供的类型体系颇有受益，但却没怎么说明，人们为何应当选择对自己的身体采取某些特定的关系，个体如何能够在身体用法的不同风格之间做出转变，哪些更为广泛的历史条件会影响到他们采取这些而非那些风格。这都被留给了经验考察。不仅如此，弗兰克尽管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做出了有选择的借鉴，前景看好，但他关于结构与行动两者的具身体现如何相互构成的分析却还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

弗兰克的理论思路尽管聚焦于行动的具身体现，但仍可视为补充了特纳的结构主义模式。实际上，如果把两人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从个体身体面临的行动问题当中，推出社会系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话虽如此，针对这两种思路也都可以提出类似的批评，这些意见正是源于两种学说之间的相似性。尽管弗兰克也批评了特纳，但他们都采取了某种“核心问题”的思路来探讨身体，究其本质，都是功能主义者。仅仅是转移了讨论这些核心问题的层面（从社会到个体身体），丝毫无助于克服这种思路的欠缺：一是历时态维度上的阐发不足；一是难以充分地梳理人的行动概念。

十、弥合鸿沟

本章我考察了对于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最为重要的一些影响，并探讨了最为晚近的两种发展明确的身体学说的尝试。社会建构论者尽管方式不一，但都将社会带入身体，以此考察身体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意涵。这在福柯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福柯认为，身体是由话语生产出来、由话语构成的。不管怎么说，

纵然戈夫曼和特纳都表现得更关注出物质性的身体，他们的研究也都与福柯有不少相似之处。对于这些论家而言，身体之所以变得很重要，都只是因为一些外在于身体的因素所造成的，无论是社会系统（特纳），话语（福柯），还是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戈夫曼）。因此，身体远远谈不上是什么人的行动不可或缺的要素。

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的另一个共有问题，涉及身体在社会学中的缺席在场。福柯、戈夫曼和特纳都有助于恢复身体观念成为社会学中的一项讨论话题。不过，他们纯粹从社会的角度（无论怎么界定）来看待身体的重要意涵，所以是以另一种形式再生产出了这种双重思路。身体作为一项讨论事项是在场的，但作为考察对象却是缺席的。往好里说，我们有时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社会建构的背后，隐伏着某种缺席的“它者”。不过，即使是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身体角度上的“它者”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是所知甚少。

我已经提到过，尽管弗兰克是想考察行动中的身体，但他把焦点放在从事行动的身体所面临的问题上，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充分发展的观点，把身体看成人的行动不可或缺的要素。话说回来，弗兰克的思路的确有一点显著的长处，就是融入了身体作为一种肉身现象的观点。这种肉身特性之所以趋于消失，并不只是因为它定位在社会之中，而是因为它与社会关系关联在一起，从而被吸纳，发生转型。这种立场很有潜力，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中积极的一面。

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洞见，看清身体可能如何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身体如何进入有关自我的社会界定，身体如何能够发挥作为社会符号的功能。这些观点还凸显了身体如何能够被用来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而在我看来，任何探讨社会中的身体的新思路都需要利用这些洞见。不过，它们需要在充分重视身体的肉身特性的背景框架中加以利用。

第五章会告诉我们，弗兰克并非唯一一位探讨身体兼具社会现象和肉身现象的地位的论家。事实上，有不少社会学家已经进一步扩展了这种身体观，其方式开始克服社会学对身体传统上采取的那种双重思路。

第五章 身体与社会不平等

第二章里我回顾了社会学对身体传统上采取的双重思路，而在第三、第四章，我分别集中讨论了两套思路，它们对于塑造当代有关身体的社会学阐述都深具影响。一是自然主义的思路，聚焦于身体的前社会性的、生物性的定位；一是社会建构论的思路，侧重于身体的社会性。然而，这些视角都倾向于采取化约论的角度来看身体，两者都无法充分把握人的具身体现对于社会系统之构成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对现代人为何越来越重要。特纳 (Turner, 1984) 在这一点上属于某种例外，因为他表示，随着身体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越来越商品化，人们也会愈益关注身体的呈现问题。不过，特纳并没有继续深挖这一点，他主要关注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身体的重要性，而不是具身性个体的相关问题。

与这些视角相反，晚近一些社会学分析出现了新的趋向，更多地关注身体中有什么因素使它既受到社会的影响，又成为现代人的一项规划。这些研究充分重视身体作为一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现象，从而开始重新融合自然主义思路和社会建构思路。这样一来，它们一方面力图采纳社会建构论的洞见，同时主张，身体是一种肉身性的现象，不仅受到社会系统的影响，而且奠立并形塑了社会关系。身体被视为出生时尚处“未完成”状态，是一种历经个体一生不断变化发展的实体。这种思路就像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一样，也聚焦于身体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只是它不允许身体被化约为这些因素。

一、重构身体

特纳已经阐述了如何超越自然主义身体观和社会建构论身体观的局限，或

许会是这类尝试中最为人知的一个 (Turner, 1992a)。尽管我在本章将集中讨论我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富收益的一些分析, 但在这个阶段, 还是有必要谈谈这种研究身体的方法论思路。 <89>

特纳在其《管控身体》一书中, 力图超越他 1984 年提出的身体秩序理论中的问题, 他称之为“颇为死板地讨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Turner, 1992a, p.10)。他转而致力于倡导一种身体研究新思路, 避免他所称的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这两种身体研究框架之间的分隔 (这两个术语与我上文所用的自然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这两个范畴颇有相似之处, 但涵盖面更宽泛一些)。所以说, 特纳希望融合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是将身体视作一种生物有机体, 视作“生命体验”, 有助于社会关系; 另一种是把身体作为一套表征系统来分析。福柯和韦伯依然位列特纳的核心关注, 但他还希望将哲学人类学融合到自己的新思路中。

哲学人类学的出发点是预设对于“人类可变性的不变前提”, 颇有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可以谈, 并试图把生物学和动物学的有关发现融入社会科学 (Honneth and Joas, 1988 [1980], p.7)。它分析了动物和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并明确指出了动物身体与人的身体之间的重要差异, 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上述说法。

动物进入这个世界, 就带着高度专门化、方向明确坚定的驱力。其结果, 它们生到这个世界上, 其可能性多少可以说完全由其本能所决定。换句话说, 动物所拥有的是一个具有物种特定性的世界, 其所占据的地域, 所面临的危险, 都是从诞生伊始就勾勒好了的。动物的身体就是规划好了存在于其环境之中并继续下去的。

与此相反, 人出生时的本能结构不像动物那么专门化, 也不以同等的方式趋向某个物种特定性的环境。因此, 人所面临的世界就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 其内容和意义都必然是从人的行动中塑造出来的。人的世界的结构从来不可能具有标志着动物世界的结构的那种稳定性, 而人的身体和认同也只是非常宽松程度上的预先设定, 以便在其所处环境中继续下去。人要想继续下去, 必须去制造一个世界。

哲学人类学关于人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对身体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看法意味着, 人的具身体现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迫使人们对自身、他人和周遭世界有所作为。人的具身体现属于未完成状态, 因此其生存继续必然面

临重重危险，人必须在行动中摆脱这些危险。这种行动既包括身体的干预，又包括意义的赋予。由于世界为人并没有像为动物那样预先设定，人就需要处理有可能使其感官不知所措的海量信息资料。实际上，人必须为自己所处的环境灌注意义和形貌，以此为自身创造一个蕴含意义的世界。他们必须这样做，以便能够有一个可以从身体角度作用其上的世界，从而能够在其中继续生存。

同样这些条件，主导了个体对于自我的认识，也主导了他们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的身体属于未完成的实体，同样必须倾注劳作和意义。对于人而言，如果缺乏蕴含意义、富有秩序的自我、身体和世界，就不可能在身体角度上有效地干预世界。

特纳 (Turner, 1992a) 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展示了如何能够通过聚焦于人的双手，把哲学人类学应用于有关人体的社会学研究。手使人能够喂养并照看自己的孩子，提供衣食居所，从而完善了自己和别人的身体。人用自己的双手对所处环境实行劳作，也由此发展出对于自己身体的特定导向。手也使人能够创造自己的世界。比如说，对于工具的建造和使用，对于环境的探索，都离不开人手的操作技能。简言之，手“就是人所处世界的开放性的一个重要特性” (Turner, 1992a, p.114)。

手不仅有助于人在世界上继续生存并赋予其意义，还充当着分类系统的某个对象，为人们提供自我身份 / 认同和在世界上的特定位置。长久以来，手就充当着意义的承载者。罗伯特·赫兹在其《死亡与右手》一书中提出，右手之于左手，在历史上一直占有优先地位，这是一种社会制度，表达的是神圣与凡俗之间宗教性的二元对立 (Hertz, 1960 [1909])。这种宗教性的二元对立影响到社会群体如何看待身体，右手代表神圣一面，而左手代表邪恶。当代社会中还能找到这种观点的残留：“正手性^[1]让人想到优秀、敏捷、正直和美丽”，交易论定，不仅要签名盖章，还得握手示意，这项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Turner, 1992a, pp.109—110)。

不妨认为，特纳对于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推广，用于作为前倾实体的整个人体。不仅如此，特纳将哲学人类学用于身体社会学，也使他能够继续坚持

[1] 原文此处为“right-handedness”，比较“客观”的表达是“右利手”、“右撇子”。但这种“正常状态”在日常用语中非常罕见，基本只能听见“左利手”、“左撇子”之类的说法。

将身体视作一种有机客体，同时认可社会意义以各式各样的方式附着于身体。人干预世界的能力不仅像社会建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源于通行的话语形式或社会分类形式，而且也来自于身体自身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物质性关系。而且，人体固然是各个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并不是像自然主义的观点往往主张的那样，作为某种基础，决定着社会关系的确切形式。相反，身体是某种未完成的资源，要求人们对其自身以及所居处的世界施加劳作和意义。

当然，特纳倡导他所谓的“认识论实用主义”，在方法论上也是有些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他试图融合基础主义框架和反基础主义框架，却不曾改变这两种框架的任何基本维度。特纳提出，人的身体和人的活动显然都具备有机性的基础，但却觉得“丝毫没有理由怀疑身体乃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而成这一命题”（Turner, 1992a, p.16, p.26）。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但我们如果接受说特纳是在谈不同的事情，也能将它们相互调和。如果我们把第一种说法限于实存的血肉之躯，第二种说法限于有关身体的分类系统，那特纳的立场也不无道理。然而，很显然，特纳并不打算主张自己的思路中有如此程度的分离。相反，他希望在基础主义框架和反基础主义框架之间做出一定限度上的重新整合。如此看来，特纳真正实现的无非是表明，要考察的身体议题不同，所要求的方法论思路也不同。然而，他并没有提供手段来切实超越这一步认识，调和基础主义框架和反基础主义框架。事实上，他在1992年提出的身体研究思路就显著表明了一种二元论，往往是想要融合两种框架，却不曾真正提供任何充分的手段来实现这一任务。

之所以会存在这个问题，原因部分在于特纳用来描述研究身体的那些主要思路的范畴。尽管特纳宣称，这些思路乃是基于有关身体的不同的本体观，但他其实认为，基础主义思路关注身体是什么，而反基础主义思路主要关注身体如何被表征。在特纳关于手的讨论中，本体论与表征之间的这种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但在我看来，我们要想充分地探讨何为身体的问题，就必须了解有关身体的各种社会表征和社会分类都通过哪些方式，既形塑了有机的身体，又被其所形塑。但特纳并没有把焦点放在这种关系上，因此低估了身体的动态性质。我们的具身体现的现状乃是源于进化过程，而这些过程中除了生物性的因素，还融合了社会性的因素。有机的身体因为其生物性构成和社会性构成，在历史上自有其变迁，在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也有变化。

与特纳的思路相反,我更偏向指出,需要发展一种新的身体观,超越自然主义思路和社会建构思路的局限,但要以更一般性的讨论为背景,即社会学与生物学之间重新结盟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人类学非常重要的洞见,只是力求把它们纳入一种不同的身体观。

泰德·本顿在晚近有关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作品中指出(Benton, 1991, 1992),有一系列的主题和过程是不能明确定位于“社会”世界或“自然”世界之中的,社会学要想能够对这些主题和过程做出分析,就需要改变这门学科<92>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就涉及重视生物科学,但并不需要接受庸俗形式的社会生物学的那些理论与方法。比如说,本顿在讨论人与文化的进化问题时,拒绝认为可以从前社会的生物性过程的角度来看待“自然选择”,否定人的每一项特征都必然对其最终维存和生育机会做出积极贡献。相反,他强烈主张,把自然选择理解为包括那些不断演化的人口所采纳的社会生活模式(Benton, 1991, 1992; 亦参 Sharp, 1992)。

这种思路对于社会学角度有关身体的概念梳理有着重要的意涵。尽管本顿并不明确关注身体社会学,但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说明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定位在社会世界或自然世界。在这一点上,本顿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促成我们的具身体现现状的历史因素,就需要考察生物性过程与社会性过程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身体的历史进化,还是身体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发展,都是如此。由于身体千百年来不断演化,为社会关系的确立提供了不同的基础,而确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又有助于身体进一步的进化发展。有鉴于此,把身体看成是一种生物性的、前社会性的现象,与视之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后生物性的实体,同样是错误的。

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将自然与文化看成是彼此分离的领域,该由不同的学科负责分析。然而,人体的“自然”属性的发展虽然是源于进化中所包含的生物性过程以及社会性过程,但却与人的文化成就不可分离。双足直立(直立和双足行走的能力)的发展以及工具的使用最终形塑了人的身体,其方式为现代文化构筑了肉身性的背景框架。要是没有直立和使用工具这两种肉身能力,人类社会就永远不能够发展出标志其当下存在的生活方式和人工制品。

而在个体的人体身上,能找到人的“自然”构成与文化构成之间存在的关联的另一个维度。从玛丽·米奇利(Midgely, 1979)、埃利亚斯(Elias, 1991)

到保罗·赫斯特与彭妮·伍利 (Hirst and Woolley, 1982), 各路论家都曾经指出, 即便是新生儿也并非无限可塑, 随心所欲地形塑是不可能的。婴儿诞生伊始, 就具备了有着物种特定性的神经系统, 该系统关联着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大脑, 各司其职的器官、肌肉和表达手段。这些东西使婴儿能够想方设法趋向社会。实际上, 按照米奇利的说法 (Midgley, 1979, p.167), “一个物种如何能够像霍布斯假定的那样不断进化, 并在获得社会性之前就学会算计, 我们并不清楚。”因此, 人的“自然”属性并不是与社会彻底分离, 而是社会关系和文化活动的必要前提。

埃利亚斯的《符号理论》一书 (Elias, 1991) 更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些话题, 并通过具体例证来看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如何通过人的习得能力和非习得能力, 在人体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比如说, 一个孩子要能学习语言, 就只能通过生物性的成熟和社会性的习得这两个密切关联的过程。如果没有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具备特定的任务所需, 任何人都学不会极其精微的语音模式。在口头语言之前, 是脸充当着主要的沟通工具。脸进化成为某种“信号板”, 尽管面对面沟通在遗传角度上的限定性或非习得性要远甚于语言, 但也可以通过文化习得的脸部信号被大大调整。比如说, 埃利亚斯指出, 在幼儿身上, 笑完全是天生固有的。而随着人的成长, 笑变得越来越具有可塑性, 更像是文化的表达 (Elias, 1991)。

埃利亚斯的分析乃是基于如下预设: 人代表着某种进化突破, 这个物种驾驭行为的习得方式超过非习得方式而居主导地位, 在所有物种中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换言之, 文化过程和社会关系越来越能形塑身体。不过, 这并不等于否认, 事实上, 身体本身依然充当着这些社会关系的基础, 不能被化约为社会关系的某种表达。

要想超越自然主义身体观和社会建构身体观的局限, 但仍保留它们的一些洞见, 首先就要将身体作为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东西来分析, 但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比如说, 认识到社会力量 and 生物过程彼此交织在一起, 就有可能看到, 尽管社会关系、行动和分类并没有在福柯的意义上创造出身体, 但的确参与了身体发展, 从而能够获得具身性。W. B. 坎农有关“伏都之死”的分析即属此例, 在此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Cannon, 1942)。坎农提出, 对于魔神的信仰会产生极端的生理后果。如果“信徒”觉得自己已被施咒, 难逃一死, 担忧乃至

恐惧就会油然而生。假如这种状态程度足够强烈,持续足够长久,就会导致生理变化,直至严重的创伤性休克(wound shock)。这种状况的最终后果,就是循环系统的功能不可挽回地衰减,因为缺氧而致死亡(Cannon, 1942; Hirst and Woolley, 1982)。

这些意见只是最宽泛、最简略地点出,怎样一种类型的思路或许有助于融通自然主义身体观和社会建构论身体观。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充分发展的身体视角力求以本顿所提议的方式,融合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过,我将比较细致地考察康奈尔和弗罗因德的研究。这两位作者做出了重要的分析,尽管对于具身体现的强调各有侧重,但都很认真地对待身体是兼具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实体这一命题。关于心智在身体中的定位所带来的社会学后果,他们也都有所论述(Connell, 1983, 1987; Freund, 1982, 1988, 1990)。他们就此提出了一种前景看好的方法论思路,身体社会学可以循此进一步发展。

本章我将介绍康奈尔讨论社会性别态身体的研究,以及弗罗因德阐述情感态身体的作品。然后,我将从指出身体会受到工作影响的研究中选择一小部分,来看看这两位作者的分析的连带意涵。在此我将重点讨论霍克希尔德关于人的情感被商业化的分析。《被管理的心灵》(Hochschild, 1983)是一部相当有影响的著作,在有关晚期现代社会的情感功夫(emotion work)的重要讨论中位居核心。

二、建构社会性别态身体

康奈尔有关社会性别的分析(Connell, 1983, 1987)的焦点,可宽泛称之为身体的“外部”:身体的体型、尺码与肌肉系统。康奈尔的论证分为三个阶段。他一开始就承认了进化过程的重要性,然后先考察了如何通过一些特定的社会实践,将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界定为不同的身体。不符合甚至否定当前人类具身体现的现状的分类过程就属于这种社会实践。换句话说,对于那些不能通过诉诸其生物性构成获得正当性的身体,社会范畴将赋予其全新的意义。

其次,康奈尔主张,尽管社会范畴将人们的身体界定为不同的,但其他社会实践对身体的影响要更为直接。社会性别化的社会实践并不只是意味着否定身体,而是要超越身体,转变身体。它们从生理的角度切实改变了人的身体,

从而改变了这些身体的意义和性质。再次,否定的过程与超越的过程相互作用。社会性别化的范畴和实践作为物质力量在运作,有助于形塑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其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特定形象/意象。心智对于身体的理解与人们对身体的体验密切相关。

康奈尔一开始就拒弃了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身体观。为此他承认,人类进化尽管同时受到生物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影响,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物种”能力,才能出现语言、智力和想象力、双足直立、制造并使用工具、漫长的儿童期和育儿期等等现象。类似于埃利亚斯在《符号理论》中的主张,康奈尔也认为,这些共有能力和特性使我们与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同,他并描述了生物维度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因此,人类之所以具备习得能力,能够生产并维持社会生活,进化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也会赋予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染色体角度上属于男性的人也有能力生孩子了。不过,人类物种值得瞩目的并不是彼此之间存在的些许生物差异,而是他/她们共享的行动能力。事实上,相比于其他物种,人与人之间存在诸多共有能力,并且存在的些许差异也已逐渐淡化到无足轻重。 <95>

三、否定身体

确立了生物特性对于人类物种的重要性,康奈尔接着提出,社会当中主要的不平等乃是建立在社会决定的标准上,在身体上并没有任何持恒的基础。不过,这并没有妨碍生物特性充当这些区分的意识形态理据。从男性为其相对于女性的优势地位给出各色理由,到希特勒为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隔离乃至种族灭绝给出的种种辩护,在这类情形下,生物性的差异要不就是凭空捏造,要不就是夸大其词。

对于分类的社会过程及其所依赖的身体基础之间的这种矛盾,康奈尔称之为对于生物特性的否定。有必要指出,康奈尔所说的否定,并不总是意味着彻底忽略生物特性,而往往是指对生物特性的歪曲。比如说,排斥性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绝不只是自然差异的某种表达,而是基于压制身体共性,夸大身体差异。实际上,生物学角度上的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早期被赋予的社会性别认

同,在某些方面是与其生理发展相矛盾的。

对于身体共性的压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孩子很早就被强加了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而此时他/她们还远未具备生育能力,不能确认相互之间的支配性,甚至不能理解生育的相关过程(Connell, 1983, p.28; 1987, p.81)。给宝宝挑衣服,女装粉色最走红,男装蓝色最畅销,就说明了人们始终很重视要凸显身体之间的差异,哪怕此时尚不具备任何重要的差异。婴儿通常都有能力吃喝拉撒,有能力让父母睡不安稳。但他/她们还没有能力承担重要的社会任务,可以在任何简单意义上把这些任务归诸其身体的“生理性别”。对于生物特性的否定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小女孩被界定为“软弱”、“脆弱”,哪怕她们很可能比其同龄男孩更高大,更结实。而如果一个小男孩因为疼痛而哭喊,就会遭到斥责,被告知要“像个男子汉”。

<96> 简言之,如果女孩与男孩之间的差异、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异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就不需要借助衣着的性别分类之类做法,如此郑重其事、持之以恒地予以标示了。相反,应当这样来看待这类做法才更确切:

属于维持对于社会性别的社会界定的不懈努力,这种努力之所以不可或缺,恰恰是因为,生物逻辑,以及消极迟钝地回应它的做法,无法维持社会性别范畴。

(Connell, 1987, p.81)

女性和男性在身高、体重、爆发力、忍耐力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这些属性在两种生理性别之间的分布是交错重叠的(Birke, 1992)。通过把平均差异转换成绝对差异,才会生产出“女性”和“男性”这两种彼此分离、不相平等的范畴。“男人比女人体力更强壮”之类的说法,就是忽略了事实上,有许多女人比许多男性更强壮。因此,聚焦于身体而否定生物特性的社会范畴,就成了有关男女两性差异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男女身体之间的共性被忽略,差异被捏造或夸大,而生物属性的意义则被转换成新的一系列范畴与对立。

康奈尔有关否定的分析关注的是社会性别差异的生产。不过,否定也是生产其他社会区分的过程。以生物种族主义为例,根据一个群体在社会角度和文化角度上据称如此的优等性或劣等性,来评价该群体的生理属性(Cohen, 1988)。生物共性被压制,身体差异被凸显,用来支持种族主义的分类系统。

回顾历史, 否定也曾被用于区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孩子的身體, 说明就适宜于不平等的社会位置。比如 19 世纪的英国学校, 从贵族阶层到工人阶层的孩子的身体被界定为不同的身体, 并在不同的制度 / 机构中分别处置 (Simon and Bradley, 1975)。

四、转化身体

康奈尔的论证的第一部分分析了社会范畴如何通过否定人体之间存在的共性来把人界定为各有分殊。不过, 康奈尔也指出, 要考察身体的社会意涵, 这还只是刚刚起步。单单说生物特性与社会惯例之间存在简明矛盾并无济于事, 因为这样说等于预设了生物特性是固定的, 作为社会惯例的焦点, 却不被社会惯例改变。这类观点的连带意涵之一, 就是确立生物特性与社会之间的某种二元论, 仿佛这两者完全分离。另一点连带意涵就是树立心智与身体之间的二元对立, 社会性别化的意象与社会惯例通过影响人们对于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的感知, 就此只作用于心智。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康奈尔用超越这个术语来表示社会惯例如何切实转变了生物特性 (表现为身体的形式)。^[2] <97>

所谓超越, 就是认识到身体是人们作用其上的某种劳作对象, 和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其他维度没什么两样。比如说, 体操和力量训练能强身健体, 而单独关禁闭或长时间坐在字处理机^[3]前面就会导致身体退化。技术进步也能改变身体的尺码、体型和成分。要实现这一点, 可以直接通过移植手术的发展等因素, 或间接通过改变旅行和劳作所要求的体力的质与量。

超越的过程一方面建构了社会性别态身体, 同时也在此前毫无差异的地方创造出肉身性的差异。许多男人所体验到的生理意义上的男子气并不只是来自于阴茎的符号意涵, 甚至也不单是源于通俗文化常常附着于男性身体的体力的形象 / 权力的意象 (images of power)。它也来自于身体经由社会惯例 / 实践而发生的转化 (Connell, 1983, 1987)。

这一过程具体发生的方式各式各样, 包括男孩相比于女孩, 通过更受到鼓

[2] 这个时候的“社会惯例”或“社会习俗”(social practice)就更加凸显出了它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意涵。

[3] “word processor”, 作者写作时尚处上世纪 90 年代初。

励去参与艰苦的身体锻炼,投入“体魄崇拜”(cults of physicality),比如足球和力量训练,聚焦于对身体的规训化管理和对空间的占据。在青春期期间,这些差异往往会进一步扩大,在媒体的倡导下,少女更专注于比较被动地装饰自己的身体(比如通过美容化妆和珠宝配饰),而少男则应该专注于更为积极地强身健体。

诸如此类的惯例/实践会对身体产生切切实实的效应,并且不仅仅是肌肉发不发达,强不强健。洛威指出,身体活动和肌肉运用的不同模式能够影响到骨骼发育和身材的尺码与体型(Lowe, 1983)。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或许的确在于荷尔蒙的分泌水平,但后者本身又受到身体活动和社会压力的模式的影响,会左右一个人的身高。它也会通过工作和运动,以更直接的方式发生。因此,女孩和男孩参与锻炼肌肉的工作与休闲活动的机会不同,也大大影响了他/她们身体的发展和转化。

除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对于身体的建构还有许多方面具备压制性。比如说,社会赞赏女性身线苗条,男性肌肉雄健,加剧了引发饮食失调的那些压力(Turner, 1987);美国男性在青少年时期使用促蛋白合成类固醇之类非法药物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事实上,1992年,估计约有50万名学童接种兴奋剂以提高运动成绩(Wearne and Jones, 1992)。类固醇之类的药物除了给使用者带来生理上的危害,还有很多副作用,包括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倾向于暴力行径。

<98>

社会性别化的身体实践和身体意象所施加的影响并不停留在自觉意识或话语的层面上。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对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做出领会、归类和评估,无疑是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并得以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不过,社会性别化的意象与实践也可以具身化。超越中涉及的具身体现过程并非都是不可逆的,但其效应往往比较持久,有时甚至是持恒的。

五、社会性别态身体的再生产

康奈尔的论证的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否定与超越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性别的例子里,我们已经看到,有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主导概念理解是如何通过社会惯例/实践而具身化的。然而,这种具身体现本身就有有助于为原初的社会范畴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在此过程中,女性被压迫成为“两性中较为软弱的一方”。

这里有一种自证预言在起作用,因为身体有时候会发生变化,以支撑原初意象和实践的有效性。当然,有必要强调一点,这些变化通常并不是自出生就规划好的,而是随社会惯例/实践而变,并有逆转的潜在可能。这里潜在可能是一个关键词。比如说,女性在青少年时期过后,仍有可能发展出对于体育运动的爱好,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她们身体的发展可能已经限制了其参与的程度和能够展示的技能水平。因此,所谓社会性别的“训练”,就意味着许多女性的确变得比许多男性软弱,不太擅长在运动情境中管理自己的身体,从而有助于将认为女性软弱的既存观念,以及那些以女性身体较为低劣为预设的社会关系和实践合法化。

詹妮弗·哈格里夫斯基于历史视角,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层女性是如何将女性具有一副柔弱身体的支配性意象内化了的:

中产阶层女性履行着自身有关“纤弱”女性的刻板印象,三天两头卧病不起,以此确认医学中的主导说法,所谓理当如此。女人“之所以”表现出在生理和生物角度上较为低劣,就是因为她们“确实”昏过去了,“实在”吃不下去,疾病缠身,总是以各种方式表现出被动和顺从。女性接受了自身“体弱无力”的状况,就为既存的所谓“事实”添上了人道的、道德的砝码。

(Hargreaves, 1987, p.134)

兜售给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那些专家建议(Ehrenreich and English, 1988),行医者见人就开的那些镇静药物(Berridge and Edwards, 1987 [1981]),使上述情形更趋恶化。简言之,否定与超越的过程大大有助于从意识形态上证明社会性别差异的正当性,并维持所谓男性在生物学角度上优于女性的迷思:

有关男性作为权力/体力持有者的社会界定不仅被转译成心智上的身体意象和幻念,而且被转译成肌肉的紧张程度、姿势、身体的感觉和构造。这是男性的权力得以“自然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比如被视为属于自然秩序。让那些在其他方面没什么权力的男性能够维持对于男性优越性的信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压迫做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Connell, 1987, p.85)

不妨把这种主张看成是进一步补充了马克·约翰逊 (Johnson, 1987) 和乔治·拉科夫 (Lakoff, 1987, 1991) 有关意义、想象和理智的身体基础的研究。约翰逊与拉科夫考察了心智与身体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 认为这是心寓于身的结果。身体之所以一向被客观主义的知识论所忽视, 就是由于它被视为引入了主观因素, 而这类因素据说是与意义的客观性质不相干的。然而, 约翰逊却主张 (Johnson, 1987), 要想充分地阐述意义与理性, 就必须将我们赖以把握世界的具身性的理解结构置于核心地位。约翰逊着重探讨了“想象”和“范畴化”的过程。所谓想象, 指的是我们如何从某些特定的身体体验和背景中抽离出来, 移到其他一些身体体验和背景中, 以便领会新的情境。而所谓范畴化, 关注的是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分类图式如何有赖于人体的性质, 尤其是有赖于我们的知觉能力和运动技能。这样来看待知识, 拉科夫称之为“经验实在论” (experiential realism), 它基于以下预设: 经验与知识的结构来自于人体, 其安排方式意义重大, 先在于并独立于话语。因此, 根本谈不上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决定身体, 而是身体属于话语建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这项研究对于我们眼下的讨论的意义在于, 它意味着引导我们对于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理解的那些概念和分类图式并不纯粹源于我们所使用的非具身性范畴, 后者是某种身体外部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相反, 这些概念和分类图式是以我们对于具身体验的多重体验为基础的, 其具体方式意义重大。这些体验包括了对于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身体的观看、体验和想象。

这种分析进一步补充了伯杰的主张 (Berger, 1972), 即男性的呈现 (无论是捏造还是实存) 有赖于他所具身体现的权力的保证。这种权力始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力, 可以拿别人来操练, 可以左右别人。如果一个男人的生理特征不能够传递出某种权力的形象, 也就会让人觉得在场不在场无足轻重了, 就因为男性作为权力持有者的社会界定未能反映在他的具身体现之中。

有必要指出的是, 权力的具身体现并不总是纯粹通过发展一种有力的身体 (尽管这越来越成为支配性的理想类型)。它还有其他的变化形式, 融合了姿势、身高、体重、步态、衣着等要素。大腹便便的商人或许并没有一副肌肉强健的身体, 但他的尺码、衣着、举止和架势依然能够具身体现出权力的保证。

伯杰认识到, 一个男人的身体呈现或许不能传递出权力的具身体现, 这样的认识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 否定与超越的过程既不是普遍存在的, 也不是不

可避免的。比如说, 如果我们的具身体验否定了有关社会性别角色的支配性观念, 就有了创造或支持有关男女的替代性观点的基础。不仅如此, 并不是每一种社会不平等都是具身体现的, 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层面也比其他一些部位或层面更具可塑性或更不可变易 (Kelleman, 1985)。还有必要指出, 并非所有的身体都能够依照有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支配性意象 / 形象做出改变, 在许多情况下, 个体可以在不同方向上发展自己的身体。康奈尔并不关注这类抵抗中蕴含的机制, 但一旦发生抵抗, 他总会指出来。女运动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这个群体常常为有关女性特质的支配性意象 / 形象提供例外, 又给出了替代选择, 女孩要想以非传统的方式发展自己的身体, 就可以借鉴。

行文至此, 不妨概括一下以上观点。康奈尔讨论否定和超越生物特性的思路集中于身体的“外部”。他把焦点放在身体的体型、尺码、肌理和体魄上, 而另外的一些论证凸显了社会实践是如何普遍地赋予我们身体以意义并加以改变, 也支持了他的这种侧重。这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所涉及的身体既影响了社会关系, 也受社会关系影响。康奈尔的研究也刻画了身体中什么样的要素使之成为一种规划。由于身体出生时处于未完成状态, 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后, 也就陷于被形塑的持续过程。尽管康奈尔并不关注个体对于这些过程的反思性承认会有哪些连带意涵, 但他至少奠定了基础, 以便承认身体作为一项规划。

不过, 即使康奈尔谈到了这一点, 也确实倾向于将生物特性等同于可以非常笼统地说的身体的“外部”。他的思路纵然颇具价值, 却没怎么揭示具身体现的其他维度在社会中是如何呈现、如何转化的。比如说, 尽管康奈尔集中考察了身体的尺码、体型和力量, 却很少谈它们的疾病体验或不适体验。就此而言, 弗罗因德有关健康与病患的研究由于关注了身体的“安康” (well-being) 体验, 可以看成是对康奈尔论著的有益补充。

六、情感态身体

弗罗因德的研究 (Freund, 1982, 1988, 1990) 的核心关注, 就在于人们有关健康和病患的体验是如何受到支配与臣属的社会关系的形塑与转化。弗罗因德的论证有三个发展阶段。首先, 他明确了个体要实现其所谓“身体安康”所必需的一些总体层面上的前提状况, 这是一种注重身心关系的整体论健康观。

然后他提出,这些状况的实现与否,与我们经由“情感态存在”而落实的社会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他考察了这些存在样态有着怎样的社会分化。

弗罗因德的研究的核心关注在于人们有关健康、病患和疾病的体验(病患[*illness*]指的是社会建构和主观体验,疾病[*disease*]指的是生理过程)(Freund, 1982, p.40)。他就此区分了构成“身体安康”的两种彼此关联的状况。首先,身体必须有能力在“划分过度或不足状态的参数范围”内调控和维持血压、体温、荷尔蒙分泌水平和电解质平衡之类特性。尽管弗罗因德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系统的身体,但并没有把身体看成是一个自我调控的封闭系统。事实上,他提出的第二项“安康”状况就要求,个体对于身心之间存在的密切整合,必须具备充足的控制。他把这种控制叫做“保持接触”,这种状况要求自觉意识到身心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有能力监管来自内部的信息(比如疼痛)并做出解释,有能力调动身体所具备的各项资源,使其能够处理这类信息。比如说,一旦我们饿了,身体通常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对这种信息的解释会使我们能够配制并享用食物,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与自己的身体“保持接触”,就会忽视这些饥饿信号,要么胡吃海塞,要么营养不足。^[4]如果决定忽略这类信号,结果之一就像是厌食症之类的进食失调,这些人都失去了与其身体需求之间的接触(Lawrence, 1987)。

弗罗因德的论证的第二阶段表明,身体安康的实现与我们经由“情感态存在”而落实的社会存在之间,如何有着密切的关联。“情感态存在”是一种对于存在的身心体验,可能阻碍也可能促进实现我们的目标。弗罗因德追随伯伊滕戴克(Buytendijk, 1950, 1974),认为情感态存在是人的生活的基本要素,情感乃是起于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比如说,在与其他人相遇时遭到抵制,被打压,或受伤害,这样的体验就会产生令人不快的感觉(Freund, 1990, p.461)。这些方式都会让人趋于无力,这样的情形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内部”(比如通过影响我们的神经激素系统),有损于我们实现身体安康的能力。

因此,根据弗罗因德的看法,情感态存在将我们的具身性自我与社会关系相关联,其关联方式从根本上形塑了我们实现身体安康的能力。比如说,尽

<102>

[4] 各族裔群体和文化群体对特定食物都各有禁忌,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状况更趋复杂。——原注

管尚未有定论,但有证据表明,处在充满压力的社会情境中,会导致神经激素分泌上的后果,可能不利于血压(Lynch, 1985)和我们的免疫系统(Oruchow, 1979; Locke et al., 1985; Moss, 1973; Pettingale, 1985; Solomon, 1985; Suter, 1986)。过于强烈的情感经历,比如孤独寂寞(Lynch, 1979, 1985),丧亲之痛(Bartrop et al., 1977; Engel, 1971),愤怒与仇恨(Friedman and Rosenman, 1974; Harburg et al., 1973, 1979; MacDougall et al., 1985),焦虑与沮丧(Johnson and Sarason, 1978; Kelly, 1980; Lauer, 1973),以及无望感、无助感(Antonovsky, 1979, 1984, 1987; Lennerlof, 1988; Seligman, 1975),也都关联着有害的生理变化,主要涉及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后者指的是直接向血流释放荷尔蒙的腺体)。比如说,库什纳有关自杀的研究(Kushner, 1989)表明,不利的社会境况会通过血清代谢水平的变化而导致沮丧之类的情绪。他的生物—文化研究将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关注角度与有关情绪的生化研究相结合,认为社会环境会导致生化变化,后者能使一个人更容易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自杀(Freund, 1988, 1990, p.454)。

弗罗因德的分析的第三阶段详细阐发了情感态存在具有社会分化性的特点。其结果,由于我们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不同,我们实现身体安康的能力也有不同。尽管神经激素的反应因人而异,但身体“反应”的模式是可以习得的,与占据特定的社会位置有关(McCarty et al., 1988; Miller, 1979)。

弗罗因德在阐发这一点的时候指出,压力水平(他用这个术语来指情感与社会关系之间那些有碍于身体安康的关联)往往与人们能够维持其自我认同不受干扰的程度成反比。当某人觉得自己在某一情境中的表现与其一般的自我观念不相符合,压力水平往往会上升。不仅如此,在导致压力的原初事件发生后很久,受到预示原初经历的情境框架的激发,压力还有可能不断复发。

在这方面,位高权重者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会比别人少。这与人们接触霍克希尔德所称的地位防御手段(status shields, Hochschild, 1983)的机会不同有关。地位防御手段保护人们免遭对于其自尊的攻击,如果缺乏地位防御手段,就成了无力感的结构性源泉(Hochschild, 1983)。进而,那些处在臣属地位的人没有渠道获得地位防御手段,往往更容易被社会重新界定为有权者希望他们是的那种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会发现难以摆脱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在现代性的境况下,由于指望雇员付出的情感功夫增加,这些可能性也大大增长了

(Hochschild, 1983)。

弗罗因德有关情感身体的分析或许只是刚刚起步。不过，他的研究对于我们有关健康和病患的体验与社会关系如何关联在一起的概括还是相当有启发的。这样的分析超越了非具身性的情感学说，后者看待我们的肉身性往往是单维的（例参 Collins, 1975; Della Fave, 1991）。弗罗因德指出，社会学“无法承受无视人的生理特性的代价”（Freund, 1988, p.856）。而且，弗罗因德的分析不仅考察了社会形塑我们有关健康与病患的体验的某些机制，还论及这些体验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分类与社会关系。按照弗罗因德的说法，身体的外表与体验“乃作为具体例示和原型，反映何谓社会角度上得体的身体的‘观念’”，有助于维持社会分隔和不平等。这里就看到了身心关系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有关男女两性情感特性的刻板印象式观念的发展就是明显例证，这些观念被用来维持有关“男人的”工作和“女人的”工作的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观念（Collinson et al., 1990）。

康奈尔和弗罗因德考察了社会关系如何利用并转化人体的不同维度，其方式有助于支配与臣属位置的再生产。在此过程中，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身体是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现象这一观念。人的生物特性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因素形塑的。它深陷于社会关系与事件，敏于对它们做出回应，并受它们的影响。

康奈尔和弗罗因德关注了人类具身体现的不同方面。不过，他们都做出了耐人寻味的分析，可以由未来关于身体的社会学分析进一步发展，与业已融入这一领域的其他某些重要分析之间也颇为亲和（例参 Young, 1990）。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将以身体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重点，进一步探究他们的研究的某些连带意涵。

七、工作、身体与情感

社会学长久以来都忽视了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付出了多少工作/功夫。帕西·法克（Falk, 1991）指出，个中原因部分在于，西方思想一向被有关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物化观念所支配，无论是“劳动者与原材料”还是“艺术家与艺术品”（Falk, 1991, p.4）。不过，我将要谈到的身体功夫，却是人投入的

劳动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忽视身体功夫，也成了当代社会学最值得注意的特性之一。

玛格丽特·斯塔西 (Stacey, 1988) 曾经阐述过个体在自身健康的生产中必须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不妨看看个体作用于自己身体的多种方式，以进一步发展她的洞见。身体功夫 (work) 很少被称为工作 (work)，但从刷牙、洗澡、剪指甲、化妆，一直到剃腿毛或刮胡子，都是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工作。社会学家谈论过照看别人的人对别人——至少间接对别人的身体——所做的工作，但尚未深入探讨照看者对自己的身体所做的工作。比如说，如厕训练对于被训练的孩子和负责训练的成人来说，所需付出的功夫是一样的 (或几乎是一样的)！

尽管社会学未能细察身体功夫的重要性，但人们早就认识到，无论是就业还是失业，都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有害的效应。不过，对于霍克希尔德所称的情感功夫所造成的具体后果，人们的重视程度就远远不如了。情感功夫指的是对感觉的管理，以创造期望雇员展示出来的那种面部形象和身体形象 (Hochschild, 1983, p.7)。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把自己身体体验为“生命态的”至关重要，可视为弗罗因德所称“情感态存在”的一个维度。它包含三大要素：与公众之间的面对面或声对声接触；要求雇员应当在另一个人身上生产出某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以及一些培训和监管的方法，使雇主能够对雇员的情感活动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情感功夫要求雇员管理和操纵自己的情感，可视为有关职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之一。要实现对于情感的管理和操纵，可以通过逢场作戏 (surface acting)，也可以通过移情入戏 (deep acting)。逢场作戏指的是掩饰自己之所感，假装感到自己之所未感；而移情入戏指的是接收“感情生产的手段” (the levers of feeling production)，真正改变了我们之所感 (比如压抑了愤怒，代之以同情) (Hochschild, 1983, p.33)。

霍克希尔德在有关美国女性空服人员^[5]的分析中，考察了情感功夫的种种条件与后果。空服人员一向被指望要满足乘客的需求，处理他们的问题，让他

[5] 原文为“women flight attendants”。在其下的行文中，作者都直接省略了“women”的限定，一方面体现了该群体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即使对于其中的男性雇员的要求也更偏于“女性特质”。中译特意没有采用“空姐”的译名，因为它在年龄、相貌、体重乃至性感魅力的方面其实有着诸多“不言自明”的设定。

们宾至如归。这就要求空服人员特别留意自己的外表（比如保持微笑、充满自信、随叫随到），以此让乘客们情感上轻松自在。霍克希尔德认为，空服人员为了应付这种工作，要面对一些两难困境，就是如何既认同自己的角色和整个机组，又不完全陷入其中。这就要求有能力将情境去人身化，但这个岗位又是如此强调情感，因此很难做到这一点。对此的反应之一就是逢场作戏。不过，有人觉得逢场作戏属于“虚情假意”，长此以往，将丧失自尊，对这些人来说，逢场作戏就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相反，有经验的空服人员往往会升到移情入戏的境界。比如说，在对付粗鲁无礼或寻衅滋事的乘客时，这些女性说她们会想出一些理由来为乘客的行为开脱，这样自己就不会气恼，而是觉得抱歉或同情。

这样来解决空服人员所面临的两难，使她们避免了与逢场作戏相维系的不真诚感，但也不是没有后果。其中就包括感到与自己的举止和情感相疏离（因为不断地干扰自己对于事件的通常反应）。情感功夫也可能需要个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弗罗因德的分析中（Freund, 1990），不断干扰情感与其通常反应之间的关联会有害于维持身体安康，使空服人员难以对身体信号做出解释，并采取相应的适宜行动。^[6]不仅如此，脸面功夫还要求空服人员保持微笑，从而以皱纹的形式，留下永久的印记（它们本身就是老年化的标志，搁到女性身上，无论是雇主还是社会一般都评价不高）。

要求空服人员完成的工作的其他一些特性更激化了这些问题。首先，这个岗位历来对雇员的身体施加种种限制。空服人员如果超重就会被解雇，有些公司还强制她们测量腿围，往往还包括对三围的限制。这类测量完全是一视同仁

[6] 情感功夫既会干扰身体的平衡，也会破坏我们以适宜方式解释并回应身体讯息的能力。当人们体验到弗罗因德所称的**情感虚假意识**（emotional false consciousness）时，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内部心理—生理感觉在身体上的展示与自觉，另一方面是长期置身充满压力的境况，要保持强烈的反应性，当这两方面出现分裂，就会产生情感虚假意识。人们也许可以训练自己产生某种感觉，但实际却体验到非常不同的东西（Freund, 1990, p.469）。因此，当一名侍者碰上粗鲁焦躁的顾客，或一位教师试图制住不服管教的学生，在应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时可能会感到平静如常，但其实是承受着血压升高所带来的有害生理后果。更普遍地说，社会关系的生理后果也会间接有助于社会控制。比如，导致沮丧的情境（像是失业）也能建构出某种情感状态，就此钝化抵制的动机。——原注

另外这里的“适宜”（appropriate）没有像前文那样译作“得体”，因为它对于个体的身体而言可能是顺畅合宜的，但在社会互动情境下却可能恰恰是不“得体”的。——译注

的,无论骨架大小,肌肉强弱,高矮胖瘦,皆无分别。耐人寻味的是,女性在这里受制于一系列管控,规定了身体尺码的最大值,但消防员和警察等传统的男性行业却往往会规定身体尺码的最小值。就业的规则可以非常直白地“体现”出社会性别的不平等。

罗贝塔·莱索尔的研究(Lessor, 1984)也揭示了空服人员面临的诸多与岗位要求相关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空服人员要好几个小时一直站立,并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帮助乘客存取行李,还要推着硕大的免税商品车。而飞机要保持一定的角度飞行,又有规定要求她们穿皮鞋,鞋跟还不能低于一定高度,这些都无助于她们做这些事情。莱索尔的研究中所报告的慢性病或多发病包括静脉曲张、腰背酸痛、拇囊炎肿、听力衰退、肺功能衰减以及早发绝经。机舱内的干燥也导致早老症状和膀胱感染(航行期间饮水时间不足使情况更加恶化)。

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中,对空服人员备航的要求(随时听候上机)越来越频繁,比以往更难养成有规律的睡眠模式,导致空服人员中出现嗜药问题,频频使用兴奋药物和镇静药物,以管理自己的睡眠/清醒模式。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研究指出,空服人员患上进食失调的也是屡见不鲜。而对于体重的要求、机上缺乏有营养的清淡食品更加剧了这种情形(Pennington, 1991)。

对于情感功夫的要求往往意味着,雇员必须特别重视管理自己的身体。比如说,空服人员常常谈到,在航线广告中会融入有关其秀色可得的公共意象,使她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沉重(Hochschild, 1983)。更一般地说,所谓要以特定的情感状态和生理状态来执行任务,这样的要求更加剧了这些岗位中蕴含的身体功夫所导致的对于身体的压力。但她们不能一边推着免税商品车一边小声嘀咕或大声抱怨,而是被期望装点得光鲜亮丽,仿佛走秀留影。

霍克希尔德的论著(Hochschild, 1983)出于比较的目的,还包括了一项有关收债人的小型研究。情感功夫并不都是由女性来做的,也并不总是想要让客户保持信心。收债人的案例表明,它也是男性要做的事情,也可以旨在引起客户的焦虑和忧惧。收债的过程(必须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情感基调)也会影响到男性与其身体的关系,也可能对其私生活产生溢出效应。比如,收债活动需要随时展示并实现进攻性,可能会成为个人与妻儿之间的关系中时常让人感到并展示出来的一种情感。

尽管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投入情感功夫,但还是存在分工,使他/她们

的参与各自有别。霍克希尔德提出,男性往往做收债人类型的情感功夫,而女性则占据了空服人员的一边。岗位的性别类型化,女性身体和男性身体各自适于不同类型工作的相关意象,以及在指派工作岗位时依然很常见的歧视性做法,都促进了这种分隔(Collinson et al., 1990)。在康奈尔分析社会性别态身体时所描述的否定和超越的过程中,也蕴含着这样的分隔。就业歧视依靠了少男少女往往习惯于履行的那些情感功夫和各式身体发展,并有助于它们的再生产。夫妻双方往往会非常擅长一些情感技能,一方面用来打理家事和工作挣钱,另一方面用来更专门地应对公共领域。这些情感技能也符合上述分隔。

其他一些研究也明显体现出情感功夫的这种社会性别分隔中蕴含的不平等。罗斯玛丽·普林格尔(Pringle, 1989a, 1989b)刻画了秘书所执行的情感功夫与身体管理如何在象征意义上关联着妻子、母亲和女儿所做的事情。佩塔·坦克雷德—谢里夫分析了社会性别、性与劳动过程(Tancred-Sheriff, 1989),进一步例示了情感功夫如何被雇主所利用。她提出,女性的情感特性和性的特征往往被用于她所称的“辅助控制岗位”(女性占据这类岗位中的将近三分之二)。这些岗位主要有两类:行政文秘人员,帮助控制生产者;销售服务人员,帮助控制消费者。这两类辅助控制劳动者都被要求投入情感功夫,包括移情(empathy)和同情(sympathy),有时还包括对于性的调控之下的展示。

<107> 有必要指出,情感功夫的社会性别化分划并不涉及绝对的分隔。也没有什么理由假定,情感功夫的效应始终会男女有别,哪怕他/她们做类似的事情。不过,女性在社会中一般处在劣势位置,往往的确会让她们在工作时用来对抗别人的进攻性和武断性感情的地位防御手段较少。有鉴于此,她们往往特别容易被按照别人的意象重新界定。与此相反,男性在工作中或许会处在臣属位置,但他们在家庭内部却更经常占据支配位置,能够提供替代性的自尊源泉。不过,情况也有可能是,当代有关男性特质的意象里强调咄咄逼人,坚持己见,相比之下,女性在工作中被要求富于同情,敏于回应,前者会创造更多的压力。这些因素意味着,同样的岗位所可能涉及的要求与给身体带来的后果,对于男女两性可能相当不同。

要讨论正式就业中的情感功夫,有必要再指出几点。首先,雇主对于情感功夫的控制不太可能是总体性的。这是因为情感的展示依然体现在雇员身上。其结果,情感功夫的规则会遭到对抗与抵制。比如说,在霍克希尔德的研究中,

空服人员面对愈益增大的压力，回应的却是情感功夫的“放慢步调”。按其所言，空服人员们笑得不再那么明显，意思一下就收，眼中不带笑意 (Hochschild, 1983, p.127)。实际上，如果霍克希尔德现在重复她的研究，我猜她会发现，尽管头等舱的乘客还可能得到头等的情感功夫的服务，但空服人员并不需要以同样方式对待经济舱的乘客。

对于情感功夫的抵制也可以在不那么自觉的形式下显露出来。比如说，出现性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不得不随时回应别人的需要却否弃了自己的需要。在这里，不妨认为身体在被强迫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时，做出了自己的抵抗：

不妨把性的问题看成是一种前政治形式的抵抗，反对过度延伸、过度使用其传统的女性特质。这种形式的抵抗，这种对于某样十分私密的“我的”东西的守护，意味着原本属于自我的大片领地可能会被作为“不是我的”而被舍弃。

(Hochschild, 1983, p.183)

其次，无论是逢场作戏，还是移情入戏，都并不仅限于雇佣劳动。戈夫曼的研究已经出色地表明，这两者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所必需的。比如说，在婚丧嫁娶之类的典仪中，人们常常会努力让自己感到高兴或悲伤，至少要显得体验着那些情感状态。再次，人们在工作内外时常回应的那些“感觉规则”并不是明确限定的，也不一定持久不变或四海皆一。而人们回应特定事件时所体验的情感也是如此。个体即使处在同一文化框架内，面对同样的情境，也可能有十分不同的回应。有关情感功夫的上述研究并不是想说，情感是明确限定的，或因其完全属于前社会性的而属于自然的。相反，它们描绘了处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人群也可能有共同的回应，而某些工作条件可能会强烈倾向于在人身上产生类似的回应。

<108>

高度现代性状况下，随着服务业岗位的增多，像是银行、保险、旅游及其他休闲产业部门，卷入情感功夫的人也大大增多。不仅如此，卡斯·武泰已经指出 (Wouters, 1989a, 1989b)，情感功夫成为人们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鲜明特征，而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岗位类型 (参看 Hochschild, 1989)。无论居家还是上班，我们都被要求在特定的界限之内，塑造并管理自己的情感 (从倦怠到愤怒) (Elias, 1982 [1939])。比如说，与小孩子一起外出购物，对于压力

沉重的父母来说，常常就是在锻炼情感功夫，排队结账的时候，不能大声喊叫，而要保持微笑。

弗兰肯豪泽和加德尔 (Frankenhauser and Gardell, 1976) 不再拘泥于情感功夫的具体实例，认为就雇佣劳动整体而言，无论是负担过重还是负担不足，都会导致与紧张相关的荷尔蒙分泌增多。装配线工人就体现出这一点，他们患上与“紧张”相关的疾病的比例远远高于平均数。按照弗罗因德的说法，身体“成为一台机器，却无法忍受机器能忍受的程度” (Freund, 1982, p.101)。如果人们面临武断的权威，却无法表达愤怒，就极有可能出现高血压，无论什么社会阶层都是如此。就此而言，美国的黑人男性的血压往往高于白人男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Harburg et al., 1973)。

工作还以其他一些与人的社会位置密切相关的方式影响他 / 她们的身体 (Freund and McGuire, 1991)。每年大约有 10 万美国人死于职业病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工伤事故)，而每年新诊断出来的致残性职业病大约是 39 万例 (Elling, 1986)。仅工作场所事故一项，每年报告总数就达五百万例 (Hills, 1987)。地位越低的岗位，一般事故就越多些 (Dutton, 1986)。由于许多黑人男性是在高风险岗位上工作，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没什么控制力，所以患上职业病或遭受工伤的可能性要比白人^[7] 高 37% (Goldsmith and Kerr, 1982)。至于乡村地区，1984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说，美国的农场工人工作时有五分之一无法获得饮用水，三分之一没有卫生间 (Weinstein, 1985)。

基于就业的做法和社会关系或许会带来损害，而社会孤立和缺乏关系也同样是以有薪工作为基础和推动力的。比如说，长期失业所带来的孤立和沮丧也会伴随着身心疾病的高发 (Warr, 1987)。布洛克的研究形象地刻画了身体在这些过程中的角色 (Bloch, 1987)。她研究了 30 位工人阶级女性，她们步入成年后有着长期规律的有薪工作，但刚失业不久。这些女性对于“个人延续性”
<109> 的感觉遭到多余感的挑战，开始对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感到迷惑。她们不停地找事儿做，筋疲力尽，却还是觉得与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整体上相疏离。布洛克认为，她们没有能力充分阐明毛病出在哪里，但她们尚无能力通过话语表达的东西，却正由她们的身体表达出来。失业会伴随着“心身

[7] 原文如此，似应为“白人男性”。

感应性的有关精神冲突和失落的身体信号”，包括暴饮暴食、肌肉紧张、偏头痛、恶心、胃痛、食欲不振等等 (Bloch, 1987, p.438)。^[8]

八、不平等的具身体现

至今尚无一个充分发展的探讨身体的社会学视角，能够综合考虑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重要性。不过，康奈尔和弗罗因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创了新的方法论思路，认为身体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他们的分析乍看起来像是替代性的方案，其实可以说，这两位论家只是关注了我们的具身体现的不同维度。

康奈尔和弗罗因德在其研究中也间接给出了有关身体的本体论，凸显其作为未完成现象的地位。身体的体型、尺码和意义并不是出生时给定的，而身体日后对于安康的体验也是如此。身体就是一个只能通过人的劳动“完成”的实体。康奈尔和弗罗因德的论著探讨了对于生物特性的否定与超越，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社会关系、不平等与压迫的显现，不单单是接触经济、教育或文化资源的渠道有所分化，而且也是具身性的。对于社会关系的体验、理解，以及社会关系的效应，并不是一种非具身性的认知现象，而是具有彻彻底底的肉身性 (Finkler, 1989)。对于社会的社会再生产，也涉及对于得体的身体的社会再生产。

现在我打算转到讨论布迪厄和埃利亚斯的研究。康奈尔和弗罗因德刻画了如何将身体视作一项规划，作为其未完成性的结果。但对于身体为何真的被反思性地利用，变成现代人的一项规划，他们却没怎么谈。不仅如此，他们虽然给出了分析身体的方法论思路，却不太致力于提出有关社会中的身体的一般性理论。

对于布迪厄和埃利亚斯的论著，已经有了不少解读方式。但他们在身体理

[8] 不过，身体并不单单只是受到各式各样工作的影响，还能够作为肉身性的良心 (corporeal conscience)，有潜力影响人们投入某些特定任务的意愿。古斯特森有关核物理学家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 (Gusterson, 1991)。一位拒绝研发核武器的物理学家这样解释道：“这事儿跟我的胃有关。我的脑袋明白研发核武器的道理，为了核威慑之类的，可我一想到做这档子事儿，就觉得胃不舒服。”继续从事核武器项目的物理学家也不一定就是避免了这种“身体的反叛”，只是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容易出毛病的”机器 (Gusterson, 1991, p.48)。——原注

论方面的用力还有待重视。对此我提出，他们各自的关注核心就包含着有关身体的具体学说。关于身体成为高度现代性状况下越来越多人的规划，无论是具体详情还是个中原因，这两位理论家的议论都大有干系。

<110> 具体来说，布迪厄点出了我们身体的多重商品化是如何成为我们当下对于身体的关注的有力源泉。人们越是重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人们的自我认同就面临越多的压力，陷于其身体之中。与此相反，埃利亚斯强调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个体化的意义，并探讨了过去发生在身体之间的那些冲突，如今怎样移到了具身性个体内部，以应对越来越高的情绪控制要求。这种情形往往使我们与自己的身体独处：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监管和控制身体，考虑其外表，却丧失了我们曾经从身体获得的许多满足之源。

布迪厄和埃利亚斯讨论了身体资本、符号价值、品位和暴力、情感表达、情绪控制，他们的讨论都可以置于认为身体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整体思路中。这一点在埃利亚斯那里比布迪厄更适用。因为埃利亚斯在《符号理论》一书里明确探讨了生物特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品位，身体管理，以及身体的表层、纹理和外观，对于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布迪厄也都很重视，大致可以归入这一思路。

第六章 身体与身体资本

<III>

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要旨，就是关注作为符号价值之载体的身体。身体在布迪厄看来就像埃利亚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未完成的实体，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力量结合发展，也是维护社会不平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事实上，布迪厄把身体概括为一种身体资本形式，与埃利亚斯探讨文明化身体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两人都认识到，在身体的发展和人的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并都认为对于身体的管理是获取地位和区隔的核心因素。布迪厄和埃利亚斯就连用来分析身体的概念工具都有重叠之处。比如说，布迪厄使用的“惯习”（habitus）这个术语，似乎是从埃利亚斯 1939 年就用过的“社会惯习”这个词那里借来并略作调整的（Mennell, 1990）。不过，也不能过分强调两人作品之间的共性。布迪厄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中作为价值载体的身体，而埃利亚斯更侧重确定并追溯文明化身体发展中涉及的那些历史过程。因此，布迪厄的论著基本接续着第五章，聚焦于高度现代性状况下身体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相反，埃利亚斯更留意对具身性的人施加一般性效应的那些过程。

布迪厄在分析身体的时候，考察了身体在现代社会中被商品化的多重途径。这不仅仅指劳动力的买卖中涉及身体，也包含身体通过一些方式成为更加综合性的**身体资本**形式，具有权力、地位和独特性 / 区隔性的（distinctive）符号形式，是积累各类资源不可或缺的要素。身体资本的生产指的是身体以某些特定方式发展，被认为在社会场域中具有价值，而身体资本的转换指的是将工作、休闲等场域中的身体参与转译成不同的资本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身体资本会被转换成经济资本（货币、物品和服务）、文化资本（比如教育）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促成对于其成员所拥有的物品与服务的互惠诉求）（Bourdieu, 1978，

1984, 1986)。[1]

拉什 (Lash, 1990) 提出, 尽管布迪厄的著作被人批评说未能就现代化过程提出明确的理论, 但对于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 它的确做出了显著贡献。与此类似, 布迪厄关于身体资本的观点也强调了身体在高度现代性状况下越来越重要。传统社会中的权力直接由一个具身性的个体施加于另一个具身性的个体, 与此相反, 现代身体在权力的实施和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要复杂得多。不同的阶级与阶级小集团往往会发展出独特的 / 区隔性的身体取向, 由此创造出多种身体形式。在现代性境况下, 对于许多人的自我感来说, 附着于这些形式的符号价值变得特别重要, 而对于具有资源的人来说, 也越来越把身体当成一项终生的规划。

本章将力求对布迪厄有关身体的分析做出解释和阐发。尽管布迪厄没有说自己的作品就是一套有关社会中的身体的理论, 但我认为, 进一步发展他关于具身性的身体资本的分析, 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探究身体社会学的有力思路, 在许多方面堪比于埃利亚斯作品中的核心关注。我打算先看看布迪厄关于身体如何发展的分析, 然后重点来谈人们如何拥有不平等的机会, 生产各具符号价值的身体形式, 并将它们转换为其他资源。

一、身体的社会形成

布迪厄并不着意于细致考察身体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这一点。不过, 他还是明确表现出关注身体的未完成性, 并且在看待人类具身体现的物质性时, 相

[1] 布迪厄对于身体的关注乃是源于其对文化资本这种特定的资本形式的探讨 (Bourdieu, 1973;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 [1977])。文化资本这个观念使布迪厄能够说明, 为什么不同的阶级与阶级小集团 (class fractions) 会投入教育场域的资源比例不同, 又为什么它们对于自己投资的回报期望也不同 (Bourdieu, 1986;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 [1977])。不过, 布迪厄在谈文化资本时, 并不仅限于通过教育实现的制度化状态。相反, 他提出, 文化资本有三种不可彼此化约的存在形式: **客体化状态** (比如特定的照片、书籍, 作为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痕迹或落实); **制度化状态**, 原初属性被授予制度据称要保障的文化资本 (比如授予那些达到特定教育水平的人以学术资格); **具身性状态** (体现为身体与心智上的持久倾向 [dispositions]) (Bourdieu, 1986, p.243)。布迪厄也把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称为**身体资本** (Bourdieu, 1978), 拿它当一种自有其存在地位的资本形式。这样来概括身体范畴的因素更有益处, 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考察创造了其他所有资本形式的基础的那些具身体现形式。本章我就来探讨这种资本。——原注

比那些只关注语言、意识甚至血肉之躯的理论家们，始终要更全面一些。布迪厄认识到，要把身体转化为社会实体，需要付出劳动，而这些行为会影响到人们如何发展并维持自己身体的形貌，学习怎样通过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的风格来呈现自己的身体。这些东西远非自然如此，而是表征着具有高度技能和社会分化意味的成就，自诞生伊始就开始习得了。随着身体的发展，它也打上了不容辩驳的个体所属社会阶级的印记 (Bourdieu, 1984)。

更具体地说，身体之所以带有社会阶级的印记，是因为三大因素：个体的社会位置，个体惯习的形成，以及个体品位的发展。社会位置 (social locations) 指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它们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框架，并参与了他们身体的发展。组成这些位置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各色资产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属性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Bourdieu, 1984, p.114; 1985, p.724)。社会位置的测量指标还包括其“与必需 (necessity) 之间的距离”，或是与财政、文化和社会等维度上的匮乏 / 必需 (want) 之间的距离 (Bourdieu, 1985)。

参与身体发展的第二项主要因素是惯习。所谓惯习，就是“在社会中构成的认知结构与动机结构系统”，为个体提供一些有赖于阶级的预定方式，由此和熟悉的或新鲜的情境产生关联并予以归类 (Brubaker, 1985, p.758)。^[2] 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在人们的社会位置的背景框架中形成的，并以这些位置为基础，在与它们取得调和的前提下，灌输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如此一来，惯习往往会再生产既存的社会结构。它定位于身体，影响到人的具身体现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人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就“揭示了惯习的最深层的倾向” (Bourdieu, 1984, p.190)。这一点明显体现于“最不假思索的身体姿势，看似琐屑不堪的身体技术，比如走路的姿势、擤鼻子的做派、吃东西的样子、说话的方式等等，它们都关联着最为根本的建构和评价社会世界的原则。” <113>

[2] 一方面是社会场域的决定力，另一方面是个体行动的创造性，在布迪厄寻找这两方面之间中介的努力中，惯习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因此，惯习并不对应于任何一个文化场域或经济场域，而是充当着共存一时的各个场域的结构与个体行动结构之间的中介。惯习的概念也力求克服大部分社会理论所鲜明表现出的身心之间的对立。就这样，身体本身也进入了惯习的生产，既形塑社会场域的结构，也被后者所形塑。在布迪厄的概念图式中，惯习概念大有用武之地。这个概念颇有些承载过多，当被用于不同的背景，其意义往往发生侧移、偏滑，有时甚至消失。——原注

(Bourdieu, 1984, p.466)

身体的形成也要通过品位 (taste) 的培养。所谓“品位”，指的是一些实际根植于物质约束的生活方式，但个体把这些过程挪用为自愿选择和偏好。换句话说，品位从必需中制造出优点 (Bourdieu, 1984, pp.175-177)。人们逐渐培养起对于自己可以利用的东西的偏好。不妨把品位的培养看成是惯习的自觉展现。它体现于身体，并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其身体的取向。因此，布迪厄把品位界定为“一种转变成自然的阶级文化，**体现于身体**。……它是已经被融合的分类原则，主导着一切融合形式，选择并调整身体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吸收、消化并同化的一切东西。”

品位如何影响身体，并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物质定位上培养起来，食物的消费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于食物的品位都是在其相对稀缺或剩余的背景框架中培养起来的，而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人也会挪用某些特定的食物，以使自身有别于被支配者，这样的努力也影响了食物品位的培养 (Mennell, 1985)。食物的分配对身体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后果。比如说，在当代英法社会，廉价的肥胖食品更多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不仅会影响到其体型，而且导致他们的冠心病发病率高于上等阶层 (Bourdieu, 1984; Townsend et al., 1988)。事实上，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差异就非常直接地表现出阶级品位能够给身体带来何等影响。

概而言之，身体是未完成的实体，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形成，并被烙上社会阶级的标记。身体通过个体的社会位置、惯习与品位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发展。这些因素有助于使社会群体对于其身体的不同关系自然化并长久继续，对于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做出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 (Bourdieu, 1981)。

二、身体与社会差异

布迪厄主张，社会阶级会发展出可明确识别的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生产出各具特色的身体形式。这些身体形式享有的价值不同，在个体生产出的身体资本量与质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也是核心要素。本章的这一节及下一节，我将着重阐述身体的形成与社会阶级位置之间的关联。

工人阶级与其身体之间，往往会发展出一种工具性关系，因为他们没多少

时间摆脱必需。身体就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就疾病与医疗而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调整好身体”首先是一种手段,以便回到工作岗位,准备出门度假,或是能够进行运动)。工人阶级男性对于体育运动的选择也是如此(比如在足球、摩托车和拳击中,身体首先是一种寻求刺激体验的手段,虽说身体投入这些运动,会付出大量精力,容易受伤,也十分受累)。不仅如此,成天运用自己的身体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们,往往没有什么时间从事慢跑和健身之类他们视为“装腔作势”的活动。就算他们参加锻炼,“工人阶级也喜欢把精力花在举重和直接针对力量的活动上,这些都是确认体力支配地位的领域。”(Wilkes, 1990, p.118)

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性别分割,以及“贤妻良母”^[3]所面临的有薪职业工作和无薪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意味着女性发展出的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往往会比男性更具有工具性(例参 Finch, 1983a)。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女性往往没什么时间参加体育/休闲活动,除非是和工作合拍的。罗斯玛丽·迪姆等休闲社会学家指出,就连看电视这样的“低调”活动,也往往是和熨衣服、织毛衣之类的杂活儿一起干的(Deem, 1986; Green and Hebron, 1988)。

因此,工人阶级女性发展出的对于其身体的取向,带有兼顾挣钱之需和服务家庭之需的鲜明印记。布迪厄指出(Bourdieu, 1984),“贤妻良母”往往要养成特定的居家衣着方式,做饭的方式也有讲究,这都是上述说法的明证(比如说,居家的衣着“凑合就行”,要方便做家务;而费力做饭的宗旨是要把饭菜做得实惠,充分利用家庭预算)。工人阶级的“贤妻良母”要牺牲自己的身体需要(休息、娱乐甚至只是吃东西)来满足老公孩子的身体需要,这种倾向也明显体现出上述说法。这种牺牲还有一个明显例证:这类女性中有许多之所以认为自己的健康很重要,主要是从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或以其他方式为家庭经济作贡献的角度出发的(Calnan, 1987; Cornwell, 1984)。这样的立场切切实实地影响了女性的身体发展,做母亲的身体(以及心智)疾病发病率过高就能说明问题(Graham, 1984; 亦参 Miles, 1987)。

因此,整体而言,工人阶级发展身体的特点,一是“过日子”的直接需求,一是试图暂时“摆脱”这些需求的种种办法(Crawford, 1984)。就此而言,在

[3] 此处原文为“wives and mothers”,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为人妻兼为人母,这里加上引号,是想凸显“贤妻良母”这种说法本身的社会性别建构意味。

分析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常人观念时，有一点很耐人寻味：工人阶级无论男女，都会使用“身体就像机器”这一类比（Rogers, 1991）。在此，身体成为一项意义非常限定的规划，或许需要接受医学专家的服务，但只是为了保持身体的有效运转。

与此相反，支配阶级既有时间也有资源来把身体作为一项规划来处置，“具体各见差异，就看是把重点放在身体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内部功能运转上，导致对于健康长寿饮食的崇拜，还是强调身体作为可感知构型的外表，即所谓‘体格/体形’^[4]，也就是为他人而在的身体。”（Bourdieu, 1978, p.838; 1984, pp.212-213）支配阶级往往不会特别在意要制造出魁梧强壮的身体，但身体修长/苗条更“适合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实践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我呈现构成的世界”（Wilkes, 1990, p.118）。资产阶级为他人而在的身体发展有许多明证，比如特定的举止，特点是“手势、体态和步姿都是张弛有度，表现出占据多少物理空间……最重要的是，要表现出有节制、有分寸、有自信的步调”（Bourdieu, 1984, p.218）。这种自信也明显体现在资产阶级所持有的健康观和疾病观上。与工人阶级不同，有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成员相信自己更能控制自己的健康，而这是一种通过选择适宜的/得体的“生活方式”实施的控制（Calnan, 1987, p.83）。

在支配阶级内部，对身体的取向会出现更加精细的分化。比如说，上向流动的中产阶级常常从事单纯的健身训练，“在锻炼本身中获得满足，……接受说姗姗来迟的满足将会回报眼下要付出的牺牲，这就是健身训练本身存在的意义。”（Bourdieu, 1978, p.839）与此相反，文化生产领域中的专业人员，比如大学老师，倾向于从事一些特别的活动，既能满足维护身体的健康导向功能，又能融合“践行极具独特性/区隔性的活动所带来的符号性满足”，比如登山或远足。布迪厄指出（Bourdieu, 1978, p.839），这等于融合了“对于自己身体的主宰感”和“对于粗人无法接触到的风景的排他性利用”（厄里分析了中产阶级“旅游者的浪漫凝视”[romantic tourist gaze]，对这种消费要素多有阐发[Urry, 1990]）。这类活动可以“独自进行，其时间和地点也不是许多人能够办到的”（Bourdieu, 1984, p.214）。身体活动的另一种区隔面向的是所谓精英（élite），

[4] 原文为“physique”，耐人寻味的是，用于男性多半是“体格”，用于女性多半是“体形”，前者更强调面向自身的强壮程度，后者更强调面向他人的悦目程度。

即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他们往往将体育活动的保健性与高尔夫、舞蹈、射击和马球之类运动中包含的社交功能结合在一起 (Bourdieu, 1978, pp.839—840)。

尽管布迪厄并没有详细阐述社会性别化的身体取向，但我们可以发挥他这方面的洞见，认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受到鼓励，要把自己的身体发展成为他人而在的感知客体。不过，布迪厄的确非常清楚地展示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如何生产出各具特色的身体形式。这一点对于其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说很重要，因为**赋予特定身体形式的符号价值是相当不平等的**。工人阶级通常对身体采取工具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的身体就不具有符号价值。比如说，在珍视力量的特定背景下，肌肉发达的男性身体就承载着特定的符号权重。不过，工人阶级身体的整体特征（比如他们的口音、姿势和衣着）所获得的评价，普遍不像其他社会阶级生产出的身体形式那样高。

支配阶级更有意愿也有能力生产出具有最高价值的身体形式，因为形成这些身体形式要求投入大量空闲时间和金钱 (Bourdieu, 1986, p.246)。支配阶级在资金上有能力让自己孩子接受（精英）教育，想上多长时间就上多长时间，孩子们不需要从事专职工作甚至兼职工作，并被鼓励参加有利于长成社会珍视的身体的活动。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有些父母把自己女儿送到“淑女学堂”^[5]，不仅是要完成教育，而且是要打磨其衣着打扮、举止言谈，以求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某种阶级感。话说回来，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比如鼓励和资助少男少女在学前或课外参与芭蕾、网球或骑马之类活动。

三、改变身体

社会位置、惯习与品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出了各具特色、相对稳定的身体形式与身体取向。实际上，布迪厄之所以用与其惯习概念密切相关的“身体素性” (body hexus) 这个术语，就是要表示肉身的风俗习惯 (corporeal habits and customs) 是比较难以转变的。不过也有必要指出，这些取向并不总是静滞不变的。这是因为，个体的身体从来就不是“充分完成的”。身体不仅与

[5] “finishing schools”，或称“女子精修学校”，是女子在完成普通教育后进一步学习社交技能、琴棋书画的私立学校，为进入社交界做准备。

社会不可分割，而且始终受到各类社会、文化与经济过程的影响（Bourdieu, 1985）。

<117> 比如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其他形式的资本都对参与体育活动有着持续的影响，而参与体育活动又会影响到身体的发展。航海航空之类的项目通常要求参与者承担庞大的资金开销，往往限制在社会中最富裕的集团。与此类似，以精英俱乐部为核心组织的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常常要求新成员在加入之前，先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比如，申请加入素负声望的高尔夫俱乐部或网球俱乐部的人，可能会被要求与俱乐部老会员之间建立有社会交往，在本地社区内有相称地位）。在这些例子里，如果一个人的资本储备下降，选择机会可能会被勾除，可能会发展出对于其他活动的品位，最终培养起对于自己身体的新的取向。^[6]

尽管如此，在决定身体活动的分配的过程中，身体依然是核心因素，有时是最重要的因素。以排他性的运动为例：

可以看到，经济壁垒无论多么显著分明，……都不足以说明这些活动的阶级分配。家庭传统和早期训练之类更为隐蔽的进入要求，或是强制性的（穿着与行为）做派，以及社会化技术，这些都维持着这些运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封闭……维持着它们……作为反映资产阶级出身的最可靠的指标。……我们不妨假定其为一项通则：一项运动如果与某社会阶级和身体的关系在最深切、最缺乏自觉的层面上都不矛盾，就很有可能被该阶级所接纳。这个层面即身体图式（body schema），储存着整个世界观，储存着全部关于人和身体的哲学。

（Bourdieu, 1984, pp.217-18, 黑体为引者所加）

社会阶级与其身体图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各个社会中的支配阶级都会从事类似的身体活动。为了理解一项体育运动的社会组成，有必要将该运动置于整个运动场域，并且结合同一国族（nation）内的其他社会场域来考察运

[6] 另一种或许更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类人径直减少参与运动与休闲。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得花很长时间。在布迪厄看来，作为阶级典型特征的惯习的改变与其说要耗一个人的一生，不如说得费几代人的时间。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对于其身体的取向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运动的品位，与将这类偏好转化为实际参与所要求的可用资本，这两方面之间完全有可能不相匹配。——原注

动的结构 (Bourdieu, 1988a)。首先, 运动所要求的对于身体的取向, 运动的相对声望、增长速率, 及其与“举国运动”(national sport)之间的距离, 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运动场域 (Bourdieu, 1988a)。其次, 运动与其他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能够影响其参与者的社会组成。比如说, 在 19 世纪的英国贵族当中, 拳击运动甚为流行, 在私立学校中蔚然成风。学习拳击之道是打造成为“英国绅士”的必要成就之一。不管怎么说, 到了 19 世纪晚期, 当精英私立学校的学生们将拳击传给少年俱乐部中的工人阶级青少年, 还号称是要以此锻造品格、学习自控。随着 20 世纪的流逝, 拳击在工人阶级当中越来越普及 (无论业余还是职业都是如此), 而在社会中的支配阶级里面却逐渐乏人问津。虽说某些私立学校还保留此项运动, 但它已经不再耀眼可见, 不再让人趋之若鹜。

如果说社会群体与运动实践之间并无任何简明对应, 那么对于我们的具身体现的其他特征来说也不存在这种直接匹配。无论是吃吃喝喝、电影电视、服饰美容、言谈举止, 布迪厄都认为, 某人的阶级位置与这些实践之间的关系都会随着社会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各见差异。比如说, 一个社会群体之所以采取某种特定的衣着风格或饮食样式, 关系到可替代的衣着风格或饮食样式的分配与意义, 某种衣着风格或饮食样式所倡导的对于身体的取向, 以及时尚场域、饮食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在法国社会, 就饮食而言, 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已经导致对于食物消费的诸多激烈对抗的态度与习惯。随着一个人在社会等级序列上逐渐下降,

<118>

所消费的食物也越来越多 (花销越来越大, 热量越来越高), 越来越腻 (大盆肥鹅肝)。与此相反, 专业人员或高级经理人员的品位对大众品位则持负面评价, 认为其油腻而粗劣, 更偏向清淡雅致……经济上的约束不复存在, 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监督的增强, 打压粗疏和肥胖, 推崇区隔与修长/苗条。……最后, 教师的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为富足, 因此在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克制消费, 以最低廉的经济成本, 追求独特新颖, 热衷于异国风味 (意大利菜、中国菜等等), 饮食烹饪讲究质朴民风 (农家餐具)。

(Bourdieu, 1984, p.185)

布迪厄所举的食物实例, 把焦点放在当代法国的关系上。不过, 他的分析

也可以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戴维斯有一篇文章引人入胜 (Davis, 1989), 分析了衣着和时尚方面的地位含混状况, 例证了对身体的取向如何能够历时而变, 以应对时尚场域及其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

概而言之, 社会阶级深刻影响了人们以哪些方式发展自己的身体, 也影响了赋予特定身体形式的符号价值。这就是身体资本的生产。不过, 这一点的重要意义还不单单是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方式开始铭刻于其身体, 还在于这些身体“适宜于”人们从事不同的活动。改变并没有被彻底勾除, 但布迪厄认为 (Bourdieu, 1981), 社会位置 (positions) 与人的性情倾向 (dispositions) 之间往往存在密切匹配。保罗·威利斯 (Willis, 1977) 就给出了一个例证。他研究了工人阶级的青少年“哥儿们” (lads) 在学校里如何排斥脑力劳动, 倡导体力劳动。社会差异就此被融合并误识为“自然”差异, 人们参与不同形式的身体活动, 多少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这些身体活动形式被赋予的社会价值并不平等。

四、身体资本的转换

<119> 布迪厄提出, 工人阶级生产出的身体形式所构成的身体资本, 其交换价值要低于支配阶级所发展出的那种资本形式 (Bourdieu, 1978)。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完全缺乏机会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资本。比如说, 针对体力劳动的身体培训可以带来直接薪资, 让个体具备必要的技能, 可以在正式的工作场所之外, 在“隐性经济”中从事一些活计。不仅如此, 将运动视为完成特定目的的手段, 这样的工具性思路也让工人阶级有潜力通过进入职业运动生涯, 将身体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在这里, 身体被赋予的力量、速度和灵活成了交换价值的客体。不过, 这种形式的资本也对工人阶级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首先, 工人阶级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成员能够指望通过搞体育谋生。其次, 这种转换形式通常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之所以说是局部性的, 是因为工人阶级女性相比于工人阶级男性, 较少能获得这种转换机会。之所以说是暂时性的, 是因为即使对于那些成为职业选手的人来讲, 身体的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限制性因素。无论是踢足球的、打橄榄球的还是跑径赛的, 只需一次受伤就可

能终结其职业生涯。许多运动项目的职业生涯平均持续时间很短,这使得大多数职业选手在退出职业生涯之后还需要找份工作来维持余生。实际上,橄榄球或拳击之类的高风险运动易受重伤,不仅会终结一个人的运动生涯,还可能终结他们进入其他任何职业生涯的机会。再次,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在运动上耗费大量时间,可能不利于他们在学校里求取学术文凭。布鲁斯·卡林顿(Carrington, 1982)提出,这一点可能尤其适用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黑人学童。教师们的眼光带有种族色彩,觉得黑人“天生”就有运动才华,但不适合脑力劳动,所以引导黑人学童从事运动。最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以这种工具性的思路看待自己的身体,也会引导他们偏离支配阶级所从事的活动,并就此增强了他们的阶级独特性/区隔性。

如果说工人阶级将其身体形式转换成经济资本时面临着一些限制,那么在转换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时也同样如此。就文化资本而言,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0)、凯迪(Keddie, 1971)以及布迪厄与帕瑟隆(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 [1977])都曾指出,工人阶级的言谈举止往往会遭到教师的负面解读。就社会资本而言,把自己的身体打造得充满侵犯性,可能会以其勇猛好斗(Willis, 1977),或尽可能表露出成人气概或女人味道(McRobbie, 1978),而招来学校里的同龄群体的仰慕,但却基本赢不来教师的支持,以促进其学业。与此类似,在酒吧和球场之类的场景里公开表现男性暴力,可能会赢得同伴之间的声望(Clarke, 1990; Marsh et al., 1978),但却基本不能打动法庭,也毫无经济价值。

总之,工人阶级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源的努力往往会有较高的风险和机会成本。教育场域、运动场域及社会中的其他场域的结构安排方式,一般都不会给赋予工人阶级身体的那些价值提供很多机会。

<120>

与此相反,社会中的支配阶级往往拥有价值更高的机会,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物质资源,并且不用承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那些风险或机会成本。对于支配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固然不能承载同样的上向流动手段或意义,但他们有渠道接触替代性的经济资本源泉(Bourdieu, 1978, p.832)。因此,来自这些阶级家庭的孩子往往会从事一些具有社会精英意味的体育活动,强调的是举止风度,从而有助于未来获取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精英私立学校中的体育课程就反映出这种导向,与公立学校中的学童可以进行的活动大

有不同 (Salter and Tapper, 1981)。以英格兰为例,精英私立学校中可能会接触到马球和高尔夫,而在公立学校里,学童们更常被引向踢足球或玩无挡板篮球^[7]。不仅如此,培养出对于精英的体育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品位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些活动或许并不总是代表着直接通向支配阶级职业生涯的康庄大道,但其导向的社会情境却总可以间接促进进入某种专门职业^[8]或建立生意往来。

精英的体育活动也有助于为自己后代找到“门当户对的”^[9]婚姻伴侣,从而保障自己的经济资本的传承 (Bourdieu, 1986)。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指出 (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 p.85),不妨把这类群体看成是“封闭而稳定的……守住自己的特权,也小气地守住自己的女人”。在英格兰,以马术和马球之类活动为核心的精英运动领域地位显赫,或许是支配阶级中阶级内部通婚比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等阶级身体的符号价值也能转换成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带有社会精英意味的运动场合和休闲场合往往包含着严格的礼仪规则,在正式情境中展示身体上的资格能力,使精英群体的成员得以认识到,身体是一种符号,标示着承载者分享一套特定的价值(比如通过衣着样式、言谈方式、管理脸面和整体性的“身体语言”)。在这些场合中也会培养起非正式接触中的友谊,这对获取法律和金融等专业领域人士的帮助大有益处 (Allan, 1989)。身体资本也能转换成获取文化资本的机会。比如说,尽管文凭证书充当了最初的甄选手段,但在英国,对于进入一些精英性岗位、私立学校或牛津剑桥的筛选过程,面谈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而此时对于言谈和身体的管理就是至关重要的 (Dale and Pires, 1984; Moore, 1989)。

所有这些情境都体现出支配阶级在排他性社会场合中对于身体的安放与管理,在这些场合里人们如此打造彼此的接触,以求各种资源未来的积累。

<121>

五、身体资本的价值变动

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凸显了身体在不平等的形成中的重要性。不过,

[7] “netball”, 流行于英格兰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女子学校。

[8] 原文为“profession”, 特指需要长期教育背景和资格认定的医生、律师、学术人员等。

[9] 原文为“appropriate”, 也就是“得体的”。

有必要指出,特定身体形式被赋予的符号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的价值可能会发生波动(比如股份和股票会跌价,教育资格证书会因滥发文凭而贬值;Collins, 1981; Dore, 1976),与此类似,身体资本的可转换性也会发生变动。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波动,有必要考察一下布迪厄的社会场域概念。社会场域这个术语曾经被用过不少次,但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拉什(Lash, 1990, p.261)把社会场域说成是布迪厄眼中的结构。更具体地说,社会场域指的是一套动态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群体所维持的,确认社会实践(无论事关艺术、经济、饮食、时尚、运动、性、教育等等)的特定范畴并安排其秩序。每一个场域都相对独立于其他场域,并根据其内部组织赋予社会实践以价值。因此,在职业体育场域,价值被赋予实际表现(performance)、积极参与、拼搏争胜,而在艺术和设计的场域,价值会被赋予创造性和创新性。

当社会场域直接将价值赋予某种特定的身体形式、活动或展演(performance),就会有效地创造一类身体资本。当然,构成某个场域的动态原则在承认某种特定的身体资本形式后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那些被视为颇具价值的身体形式,以及附着其上的珍贵价值本身,也都有可能改变。比如说,从事各项职业运动的人们的收入会有涨有跌,而各项运动的价值也会有升有降。时尚场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的特定风格所具备的符号价值。这就意味着,一种颇具价值的身体形式在某个群体或阶级中最初的生产并不能确保其交换价值的延续。附着于特定身体的价值会因时而变;随着社会中的各个场域发生变化,它们所推崇的那些身体资本形式也会改变。

这也影响到了人们如何体验老年化,要摆脱通常让人想到慢慢变老的生物决定性。随着人们步入老年,他们生产身体资本并将其转换成资源的能力也往往会下降。但同样得说,在决定特定群体如何体验老年化过程的时候,社会阶级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一领域,费瑟斯通对布迪厄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发展:

尽管大体而言,……进入老年的过程必然涉及积累经济资本的能力逐渐丧失或衰减,特定类型的文化资本价值下降(由于所附着的那些形式的知识与风格现在被视为过时的)。与此同时,展现为言谈举止、身体态度的某些类型的(身体)资本还可能将其区隔和价值维持到老年晚

期，贵族或王室成员就是例证。

(Featherstone, 1987, p.125)

社会群体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源的能力会随年龄大小而变,不仅如此,惯习也往往会在群体内部发展出对于老年化的不同态度,端赖于他们的身体依然具有多少符号价值。费瑟斯通提出(Featherstone, 1987),工人阶级往往更能接受身体衰弱是老年带来的必然现象,而“新”中产阶级则发现趋于老年化的身体成了焦虑之源。所以他们往往采取各种身体保养技术,以抗拒衰老及其相关特征。与此相反,上等阶级往往养成特别的身体取向,能够遮盖和伪装许多老年化的效果,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老年本身“穿戴”出来,成为地位显赫的标志,而非走下坡路的象征。

不过,这些对待老年化的态度并不只是与惯习有关,也反映了人们所工作的经济场域。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和漠然接受身体衰弱分不开的是,事实上,早在人到中年,生活水平就已经下降,对未来的控制力也在减少。而中产阶级的焦虑则源自对于工作地位的不确定感(比如面临被更年轻的竞争对手取而代之的危险)。与此相反,上等阶级之所以能够自在应对,是因为早在中年时已经“真正达到人生巅峰,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一代”,有资本更轻松淡定地应对老年化过程(Featherstone, 1987, p.117)。

不过,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同形式的身体资本的价值都有其核心所在,就是支配群体有能力将其身体和生活方式界定为高人一等的、值得回报的,并且无论比喻还是实指,都是阶级的“embodiment”^[10]。这个过程重点在于寻求区隔,其间会经常爆发斗争,要界定并控制某些场域,因为它们将特定的身体形式规定为颇具价值;而针对一个社会群体内部最具价值的身体形式是什么,也会产生冲突。比如说,有关如何界定身体资本的冲突可能会有其代际基础。工人阶级男性之间的某些斗争可能会诉诸身体力量来解决,而中产阶级内部年龄群体的冲突可能会涉及抢夺何时开始算老年的界定权的斗争:

比如说,允许基于某种视角,将中年重新界定为中青年,就意味着从青年人那里挪用了年轻,而这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属性。但从老当益壮

[10] 引号为原文所无。比喻义就是已经远离源初义的“体现”,实指义就是不得已叠床架屋的“具身体现”。

者^[11]看来,这可能是他们乐意送给中年人的一种标签,因为年轻(这里让人想到的是担不起责任、办不得大事)这种属性与成熟和睿智相对立,而后两者是掌权者所需的,也是老年人力图为己独享的。无独有偶,中年人也试图把老当益壮者送入老年,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争取尽可能扩大自己的选择机会,是维持发号施令的地位,还是自己不想干就退休。与此同时,他们还要与在争取制度化的游戏中已无多少资源的老迈之辈分清距离,与垂暮老朽那些令人厌恶的特性分清距离。

<123>

(Feathertone, 1987, pp.120—121)

能够引发代际冲突的,还不仅仅是对老年化进行归类的权力。言谈风格、时尚样式、举止做派、身体管理模式等等具有多少价值,究竟是得体合宜,还是老套过时,往往是聚讼不已的话题。

费瑟斯通提出,群体之间会展开竞争,都想把自己的身体界定为具备最多的符号价值。在这场竞争中,年龄成了重要的结构化原则。话说回来,在布迪厄的研究中,阶级之间的冲突才是最为重要的。无论是支配阶级想方设法界定较低阶级的身体,认为其相关活动“粗鄙无礼”,还是工人阶级将上等阶级的做法界定为“装腔作势”,都在布迪厄探讨法国生活的论著《区隔》中占有显著位置(Bourdieu, 1984)。这场斗争波及广泛,各社会群体都试图利用特定风格的衣着服饰或体育运动,作为自己独占的财产(Bourdieu, 1985)。

这场斗争利害攸关。如前所述,争夺的目标包括各个社会群体分别具有怎样的能力,界定、发展和利用最具声望的身体形式。然而,这既不是参与者平等占有资源的所谓“公平”斗争,也不是“游戏规则”必然明示或不变的稳定斗争。原因就在于,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资本量有大小,质有分别。

社会中的支配阶级由于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并占有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因此相比于被支配阶级,也更有可能处于一些优势的职场域或社会场域,被赋予权力,去授予身体形式与身体相关活动以价值。这就意味着,即使当个体成功地上向流动,进入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有关身体资本的通行界定也依然在其

[11] 原文为“young-old”,在人口学、老年学中亦有老年早期、中老年期、早老年等说法,但字典上常见的“老当益壮者”的说法已带有刻板印象或自我塑造的成分。下文中的“老迈之辈”(“old-old”)亦有老年后期、老年晚期、老老年等说法。

身体上打着其出身标记。布迪厄这样说小资产阶级：“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乃至整个风度气场，都显得清醒乃至刻板，严肃乃至谨慎，始终显得境界局促、眼光狭隘、内蕴贫乏、气量吝啬。”(Bourdieu, 1984, p.338) 不仅如此，支配阶级也可能处在就社会资本的价值而言的优势位置。这会使他们广泛了解各个场域中的机会，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本形式。诚如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所言：

工人阶级所处的同质化社会环境从来不会提供中产阶级家庭能从其社会交往中获取的那种信息。……要获取并保住赚大钱的可能性，关键可能就在于能控制这种信息。

(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 pp.9—12)

这样一来，那些没有这类交往的人就可能不太了解，眼下都有哪些机会将身体资本转换成其他资源。而逢到时代跌宕之际，他们也很可能不太确定是什么构成了符号价值较高的身体形式，而对于那些规定是什么构成身体资本的社会场域，社会中的支配群体也往往更有权力加以改变。

六、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

支配阶级要维持自己身体所具有的符号价值，会面临一些困难，但即便没有这些困难，身体资本无论是其生产还是其转换，都不是没有问题的，也并非没有限制。首先，身体资本不能直接被传递或传承。它不像货币、股票和股份或产权，不能单单通过馈赠、遗产或交换，就从一代人转给了下一代人。相反，由于身体的未完成性，身体资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可以持续数年(Connell, 1983, pp.30—31)。不仅如此，尽管身体的发展关系到社会阶级的作用，但不可化约为后者。人们不管处于什么样的阶级位置，其身体都可能“得天独厚”或“受到诅咒”，会干扰经济资本在阶级内部的传递。布迪厄(Bourdieu, 1984)用“致命诱惑”这个术语(fatal attraction)，指身体魅力尽现，激发跨阶级关系，破坏社会阶级的封闭机制。

其次，身体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体行动者的利用能力。相反，它会随着其承载者的衰落和死亡而逐渐衰亡(Bourdieu, 1986, p.245)。因此，不妨把所具有的身体资本看成是比所具经济资本更变化不定的资源。

再次，身体资本的**购买**可不像购买一件经济商品那样简单明了。父母固然可以购买孩子的时间，使其免于雇佣劳动的必然要求，购买教育，使其有机会发展颇具价值的口音、衣着和举止风格；但他们不能确保孩子获得这些东西。相反，每一代新人要获得颇具符号价值的身体，得付出实际劳动。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体的惯习和品位意味着，他们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执行发展具备声望的身体所要求的劳动。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身体资本，要想切切实实地获取，始终是无法确保的。有些孩子尽管享有最昂贵的私立学校教育，却不能获得学业文凭，同样，有些孩子也可能没能积累起“适宜于”其精英出身的身体资本。这不仅是因为中上阶级的父母担心，在反学校的亚文化里会滋长学业上的失败（或不能获得某种文化资本）。这类文化会拒斥脑力劳动的要求，排斥被强加特定类型的身体管理与衣着要求（Hargreaves, 1969; Lacey, 1970）。

又次，即使一个人发展出了特定的身体形式，也始终会面临风险，不被承认为身体资本。如前所述，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各种身体形式的价值会升降不定。对于精英身体的承认也会随着特定的时间和不同的社会场所而有所变化（Bourdieu, 1986）。不少论家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状况下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发展，认为跨国企业助长了衣着风格和其他消费商品的大量繁生，从而参与了**差异的生产**，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被各社会群体用作身体认同的符号（例参 Hall and Jameson, 1990; Jameson, 1984, 1985; 亦参 McRobbie, 1989）。<125>

生产上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原因部分在于中产阶级在设计、时尚和广告领域中所占份额上升，而全球形式的产业重组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尽管这些变化因其可以持续赢利，而可能有利于经济资本部门，但也可能导致风格样式大量繁生，会威胁到支配阶级长久维持其身体作为最具符号价值身体的合法性的能力。费瑟斯通指出（Featherstone, 1990），引领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商品迅速国际化，迅速流通，也威胁到支配者用来标示其精英身体资本的符号的可读性。

在那些承认并维持身体资本的场域里，支配阶级实施着持续的管理与控制，而上述话题则对这些管理与控制发出了质疑。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身体意象和社会实践被呈现为构成了颇具价值的身体资本形式，充斥在场域之中，那么场域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除非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部分有能力将这些风格样式归类到既存的等级序列里去，并使这些分类系统被承认为合法有效，否则就会

威胁到“差异逻辑，基于这些逻辑，文化、消费商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活动的品位被视为具有对立结构”(Featherstone, 1990, p.12)。因此,在当代消费社会,我们可能正见证着一些过程,会让任何一个群体都很难强加有关“颇具价值的身体”的单个分类图式,赋予其霸权性,值得全社会的敬重。

与身体资本的转换有关的第五个问题在于,与某些形式的经济资本截然不同,身体资本的“交换率”并无保障,在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源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损失。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境,为了将身体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源,不得不投入本不该如此的过多努力。概而言之,颇具符号价值的身体发展必须经历的传递过程,相比于经济资本的情况,更具伪装,也更有风险(Bourdieu, 1986, p.254)。

鉴于这些问题,有必要探问,来自支配阶级的个体如果可以利用自己的物质财富,投资于其他可能更为安全的资本获取形式,又为什么要投入时间和资源来发展身体?答案之一会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付出了这等努力。个体基于自身对其他形式资本的持有情况,可以选择将投资尽量放在经济资本或是文化资本。
<126> 支配阶级中那些极具经济资本的集团可能会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持续扩大自身及其孩子对财富资源的占有上。

话说回来,支配阶级的人完全有理由继续对身体进行大量投资。这与身体资本自然的、生物性的外表大有关系。身体资本的自然化外表的后果之一,就是一代人在下一代人身上培育身体资本的尝试往往有着重重掩饰,难以显见,至少是被误识。身体资本的(间接)代际传递所需具备的社会条件,远不如经济资本的(直接)传递那么显见。因此,政府可能试图(通过税收)控制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但身体资本的发展是一种隐藏的特权形式,不过还是可以重新转换为经济资本。因此,支配阶级很可能耗费可观的时间与金钱,让自己及其孩子参与特定的精英活动,旨在尽可能扩大身体资本的生产与转换潜力。实际上,国家越是有能力防止或阻碍经济资本的正式传递,身体资本的秘密流通就越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Bourdieu, 1986, p.254)。

七、合法的身体

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某一给定时间,针对社会中被视为最具价值的那些

身体形式，围绕发展、界定和利用它们的权力，展开了哪些斗争。不过，如果围绕肉身范畴的斗争还包括界定什么算得上合法的身体，以及怎样才称为对于社会中的身体的合法使用，这种斗争就愈发显得重要了。这些斗争关系到身体资本的生产与实现，但还超越了资源的范畴，直指（教育、健康等）场域的结构本身，传递有关特定身体或身体实践是否应当存在的判断。不少对场域有特定权力的人非常在意身体，包括：

道德家，尤其是牧师；医生（特别是健康专家）；广义上的教育工作者（比如婚姻顾问）；引领时尚和品位的人……

（Bourdieu, 1978, pp.826—827）

这些群体可以宽泛地称为“身体专家”，都参与了教育身体，标定管理和体验我们身体的具体方式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偏离的。这会影响到我们是将自身及他人的身体实践承认为“正确的”、得体的，还是需要控制与矫正。

在许多社会场域中，都能发现对于合法身体和合法身体活动的界定。比如说，为了巩固性的场域中的结构，国家从历史、意识形态和物质等维度推崇特定的异性恋形式（比如一夫一妻制已婚关系），同时把同性恋界定为“不自然的”，予以惩罚（Walby, 1989）。<127>

八、小 结

布迪厄的研究之所以发展如此，是因为创造性地继承了经典社会学。他以马克思的立场关注社会再生产，以韦伯的视角关注特定生活风格及界定地位群体的荣誉属性或耻辱属性，以涂尔干的眼光关注符号形式、分类与表征的社会起源和功能，塑造成了自己的概念图式。在布迪厄进一步发展其所称以往的“利益社会学”（sociology of interest）的过程中，这些关注不可或缺。“利益社会学”的思维模式把所有社会实践（哪怕是那些看似无利益考虑的社会实践，比如对教育的追求）都理解为“经济的”，直接趋向物质利润和符号利润的最大化（Brubaker, 1985）。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的研究为我们例示了当代社会学有关身体的研究如何能够富有成效地借鉴经典社会学的遗产。不过，布迪厄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经典社会学的关注话题，尤值一提的是，他主张，身体在身体

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也属维护社会不平等之不可或缺。

布迪厄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整体理论也已经遭到了一些批评，在此有必要谈谈其中的一些，因为它们关系到他对于身体的分析。布迪厄的作品所给出的分析在共时态角度上充满动态活力，但在历时态角度上却大有挖掘余地。历史变迁的确进入了布迪厄的分析视野，但只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尽管他屡屡声称，自己的理论阐述充分考虑了变迁，但一方面是社会场域，另一方面是社会位置、惯习和品位，相互决定之下，能够在理论层面上考虑到变迁的那些机制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布迪厄关于区隔的分析可以说是个例外，意思似乎是说，各社会阶级投入对于资源的无尽斗争，由此导致历史变迁。

作为辩护，布迪厄提出，社会静态其实比社会变迁更为常见，这就证明自己研究的焦点是正当的 (Lash, 1990)。然而，布迪厄尽管让我们细致观察了特定社会中的身体形式、身体外表与身体消费，却无法充分阐述身体上发生的那类历史变迁，就像埃利亚斯在别处考察过的那样。

布迪厄作品中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强调也反映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实施能动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难以看出人们如何能够“突破”其所处的社会位置、惯习和品位为他们指定的肉身轨迹。这是因为，惯习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运作，“非意志的内省或控制之所能及” (Bourdieu, 1984, p.466)，其发生也不受代代相继的各辈人的控制。而品位也是通过从必需中做出选择来发挥功能的。因此，尽管布迪厄再三声称，身体倾向的确会发生变迁，但他的阐述却极难说明，为什么有些形式的具身体现和品位并不符合其预先指定的阶级基础。不仅如此，如此聚焦于再生产，也意味着身体基本上只是外在结构或文化符码的载体。特纳指出 (Turner, 1992a)，这等于说在布迪厄的研究中，要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生命态身体”，是没有什么余地的。

布迪厄这样处理社会阶级，也就难以重点探讨那些对于身体形成和身体资本转换很重要的跨阶级因素。比如说，在布迪厄的研究中，很难找到从方法论上给出的证明，说有必要聚焦于女性或少数族群的身体，因为影响它们的社会的核心特征不单单是资本主义，而且还包括父权制/男权制或种族歧视。布迪厄的阶级观念非常宽泛，成了“整套社会决定因素的类比” (Brubaker, 1985)。社会性别和族群性并没有隐含在这套阐述之中。比如说，对于工人阶级女性与

中产阶级女性所处的情境，对于从事或利用美容行业可以转换的身体资本，布迪厄有很多有价值的分析可说。然而，他在分析女性时的切入角度，却是与其他阶级范畴相对而言的阶级范畴归属。这就意味着布迪厄往往低估了社会性别化过程在何等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取向，碰到要分析女性与男性可以获取的身体资本形式不同的时候，分析力度就比较弱了(Shilling, 1991)。

尽管构成一个阶级(或阶级小集团)的群体五花八门，但布迪厄对于社会阶级的概念梳理却同样造成难以确定社会性别压迫的某些特性，它们会影响对于身体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横跨各阶级范畴而作用于女性(Walby, 1989)。比如说，纵贯整个社会阶级谱系，强奸或对强奸的恐惧对于女性生活的危害都远甚于男性。无论女性处在什么样的阶级位置，有关强奸的体验或威胁都会严重损害她们持续生产颇具价值的身体资本形式的能力。关于将颇具符号价值的身体转换为其他资源的可能性，还有不少话题是有着社会性别特定性的。无论女性处在什么样的阶级位置，她们要想将对于身体活动的可能参与转换成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大多数人的机会要比男性小得多。不过，当社交场合和运动场合充当了“婚姻市场”，显然也是这种趋势的例外。不管怎么说，在父权制/男权制社会里，这种转换自有其不菲的代价(Finch, 1983b)。对于女性而言，将身体资本转换成其他资源，往往也面临很多限制，个中的好处常常要通过其丈夫的中介(Wright, 1989)。

至于归属少数民族群的人们体验，也可以有类似的说法。个体的偏见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都意味着，一个人的肤色融入了置于其身体的价值。比如说，在当代英美社会，种族主义的效应横跨各阶级范畴，影响到个体有多少能力生产颇具符号价值的身体形式。具体说来，这并不排除说在美国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黑人资产阶级，但它的确使某些群体的资本积累过程比其他群体更为艰难。弗纳·基思和塞德里克·赫林分析了黑人社群中的肤色深浅与分层位置，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Keith and Herring, 1991)。基思和赫林先是援引了几项研究，指出在过去数代人期间，地位较高的黑人往往比地位较低的黑人肤色更浅一些。然后他俩提出，肤色^[12](complexion)依然会对分层结果产生显著的净效应。

布迪厄将身体视作符号价值的载体，作为一种身体资本形式，不妨把这样

[12] 此处原文为“complexion”，特指面色。

的分析看成是蕴含着这样的身体观：身体是一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现象。不过，他并没有致力于比较细致地考察生物性过程对于人类具身体现的重要性。就此而言，他的研究中对于人类具身体现的生物维度的探讨的确有欠充分。但不管怎么说，布迪厄把物质态身体置于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成功地克服了社会学探讨身体传统上采取的双重思路，即承认身体是一块理论空间，但未能充分考察该空间。事实上，布迪厄的研究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堪称身体社会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中更具潜力的一种。

透过布迪厄有关社会不平等的身体基础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身体作为一项未完成的现象，尽管已经生存于社会里面，但仍处在持续的成为过程之中。关于高度现代性境况下身体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愈益增长，他的研究也对我们大有启发。布迪厄提出，身体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价值载体，以至于它持续进入文化市场和社会市场，赋予富有声望的身体形式以价值，而不考虑人们是否从事正式工作。在这种情形下，身体对于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完全有理由变得越来越重要。身体或许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对于所有人都成为一项规划，因为身体取向随着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有变化。但无论如何，布迪厄刻画了身体对于人们整体上的重要性，尽管他们只关注身体的直接功能运作，或是把身体培养成精英地位的某种表达。

第七章 文明化身体

<131>

人的身体或许不是埃利亚斯文明化进程理论唯一的焦点(Elias, 1978a [1939], 1982 [1939]), 但对于其研究而言, 的确是至关重要。本章我将提出, 埃利亚斯的论著中隐含着我为“文明化身体”的发展的理论。而这又支撑了他对于文明化进程的更一般层面上的关注。埃利亚斯在研究身体时, 最感兴趣的切入角度是看它在行为准则和情感控制形式上的历史转型中的相关意义。更具体地说, 他考察了身体作为宫廷社会中的价值载体。不过, 他的研究还让我们以长期的视角来看身体的个体化、理性化和社会化过程, 探讨了人们与自己的身体有着怎样的关联, 并有助于说明,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具身性的个体生活究竟如何。由此观之, 相比于那些传统上采取双重思路在社会学中探讨身体的人, 埃利亚斯显然不同凡响。他不仅在论著中融合身体作为讨论主题, 还探索了人类身体的性质与能力的历史变迁。^[1]

社会建构论者往往将身体看成是一种产物, 其意义由外在的社会分类所决定。与此相反, 在埃利亚斯看来, 身体是一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实体, 在被社会充分接受之前, 需要经过漫长的教育过程。因此, 不妨认为, 埃利亚斯有关文明化进程的分析是对第五、六章中考察的某些方法与主题的进一步发展。虽说埃利亚斯的著述绝大多数其实发表于康奈尔和弗罗因德之前, 但也可以把他的分析解读为吸收这两位论家的许多洞见, 融入一套有关社会形态/形成(formation)中的身体的综合理论。

为了说明文明化身体的形成, 埃利亚斯采取进化的、发展的视角来谈身体,

[1] 埃利亚斯很谨慎地避免对自己关于欧洲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做过分的推广。就此而言, 导致文明化身体在北美发展的进程或许不同于本章所考察的那些。——原注

主张个体和社会中的长期文明化进程导致了情感表达与生理表达方面的某种转换。简言之，现代西方社会所特有的这种文明化身体是高度个体化的，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牢固划定了它的界限。文明化身体也具备能力将其情感理性化，对其实施高度控制，监管自身及他人的行动，并将有关各式情境中何为得体行为的一套精细划定的规则内化。可以拿来与文明化身体相对比的，
<132> 是中世纪早期的“未文明化 / 未开化” (uncivilized) 身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只有松散的界限划定。约束未文明化身体的行为规范屈指可数，对于情感的身体表达也是直截了当，可以无拘无束地满足身体欲望，不用考虑别人的利益。

随着个体所面临的主要忧惧发生变化，随着各社会所特有的社会控制主导类型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也逐步文明化。在相对缺乏调控的社会里担心遭受攻击，逐渐被现代社会中社会性地“担心”羞耻与窘迫所取代，而控制也不再是自外向内强力施加于人们，而是趋向自我施加。

在更细致地考察埃利亚斯的身体观之前，有必要澄清他对于“文明”这个术语的用法，以及用来考察文明化进程的方法论思路。在评价性的语境下，“文明”传统上被用来描述各个社会的经济、道德与政治进步，并排出等级序列。不过，埃利亚斯通过考察用以指文明的不同术语在历史上的用法变动，以及支撑这些术语的行为形式，给这个词附上了新意 (Elias, 1978a)。

埃利亚斯谈文明，并不诉诸不同社会之间的长短优劣，而更关注文明作为一系列过程，涵盖了一个社会中内部安定的程度；习俗的精致化；社会关系中的自我约束与反思性的程度；一个社会中的成长体验 (Kuzmics, 1988)。因此，尽管可以认为某些社会与身体形式比另一些更加文明化 (Elias, 1983)，但这并不是对于其比较价值的简单的价值评判。而且，当埃利亚斯把个体与社会说成是“文明化的”，并不是用这个词来表示某种静态的成就巅峰。相反，“文明化的”是一个关系性的用语，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比较的手段，同时也始终指向持续的变迁过程。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化进程并无明确的起点与终点。而文明化身体发展也是如此。

身体乃是未完成的实体，在社会背景下不断发展，彼此相互依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始终处在流变状态。这就是贯穿埃利亚斯所采取的方法论思路的核心观念。这种思路在埃利亚斯的著述中主要有三种体现方式。首先，身体发

展的社会背景既不是由孤立自处的个体所决定,也不是由其运作完全非人力所能及的社会事实而决定。相反,社会型构(social figurations)才是埃利亚斯著述中的基本单元。型构相对独立于特定的个体,但并不独立于个体本身。由于人们彼此结成的互赖关系波动不定,这些型构的形貌也变动不居。随着社会型构的变化,对人体发展产生效应的那些影响也会发生变化。

其次,埃利亚斯考察文明化身体发展时的思路融合了社会生成性与心理生成性(both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因为它涵括广泛,上至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下至个体的具体人格与驱力结构(Elias, 1978a [1939], p.xv, p.222; 1982 [1939], p.284)。这就既要考察社会分工方面的历史转型,又得研究人的行为细节。 <133>

再次,埃利亚斯在梳理肉身范畴变迁与社会层面变迁的概念时,其基础是认为身体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无论是人的身体还是人的历史,要是没有进化过程中的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关联,都不可能存在。话说回来,尽管人体的生物性不可化约,但进化却使人具备了能力(比如说言说与思维),使他们不再依赖于更进一步的生物变化(Elias, 1987a, 1991)。

进化过程让人具备了生物基础,能够通过符号进行沟通、思考,并建立针对现实的定位。这使人有能力基于习得知识行事,也具备了相对其他物种而言的进化优势。埃利亚斯把这叫做符号解放(symbol emancipation, Elias, 1991, p.53)。人具有独特的能力去习得并综合符号,把符号发展成一套以反思性、变异性、精确性、灵活性及高度的现实对应性为特点的语言,并以符号的形式,在代际之间传承积累起来的知识(Elias, 1991, pp.93-96)。符号解放使人能够摆脱生物变迁而对新的环境做出调适,代表着进化过程的突破,上升到一个新的“后动物性”的层次(Elias, 1991, pp.31-32, p.43)。符号解放还使人能够反思性地监管并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成为文明化身体发展的关键前提。概言之,进化过程和符号解放的优势既使人体有可能支配其他物种的身体,也促成了文明化身体发展。

我在本章序论中提出,埃利亚斯的作品能够大大有助于说明身体在现代性状况下为何越来越重要。但这个说法在几个方面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因为他的理论的核心部分写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1939年刊行,因此就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化进程而言,尚属未完成阶段。话说回来,阿瑟·博格纳探讨

了埃利亚斯的研究与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提出前者分析国际关系、对身体暴力和税收的垄断，在这些方面对后者大有助益。埃利亚斯捕捉并考察的那些过程，至今依然伴随着我们 (Bogner, 1992)。接下来，我将进一步发挥博格纳的看法，认为埃利亚斯捕捉到了一些以身体为载体和核心的过程，在当代社会依然很重要，有时更趋于强化。这些观点对于本书倒数第二章尤为重要，在第八章中我要指出，埃利亚斯所捕捉到的那些过程，到了高度现代性境况之下，已经成了人们的自我观的核心因素。

<134>

一、身体的历史发展

文明化身体在欧洲的发展并不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决定的，以回应生产与积累的要求，而是与中世纪早期的武士贵族 (warrior nobility) 向宫廷贵族 (court aristocracy) 转型有关系。本节我先概述与文明化身体的兴起有关联的变迁，然后考察这些变迁背后主要的“局部”起因和系统起因。

埃利亚斯明确指出，文明化身体发展历程并没有什么绝对的起点。不过，中世纪与宫廷绝对王权之间的时期尤其显著地见证了身体表达模式与人格结构模式的长时段变迁，而这些长时段变迁一直延续至今 (Elias, 1978a [1939], 1978b, 1982 [1939])。在中世纪早期，人格结构轻快易变，行为难以预测，常常为着看似琐屑的原因而剧烈波动，易走极端。人生苦短，食物供给往往不能保证稳定 (Mennell, 1987)，暴力乃属家常便饭，并不被视为不同寻常，甚至不被认为不值想望。酷刑折磨、残害肢体乃至取人性命都能给人带来快乐，人们不得不随时准备好自卫，准备肆意宣泄自己的情感，以便守住自己的生命财产 (Elias, 1982 [1939], p.192, pp.233-236)。^[2]

在这种情形下，要对各种驱力和身体举动进行强硬而持续的节制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更无用场。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毫无节制地满足自己，而快乐的焦点就在于肉身的直接欲望。中世纪社会的确存在苦行和弃绝的极端形式，但与这幅整体画面并不矛盾。诸如此类的“约束”也属于遁入生理特性，拜纳姆

[2] 尽管埃利亚斯屡屡谈到，中世纪缺乏对于行为的约束，但也不妨认为，人们其实只是在遵循不同的行为准则。——原注

(Bynum, 1987) 与梅勒 (Mellor, 1990, pp.56—58) 说得非常清楚, “相比于其对立面对, 即好勇斗狠, 肆意快活, 一样地激烈偏颇, 一样地彻底狂热” (Elias, 1982 [1939], p.240)。

而到晚近, 战事频仍, 杀戮无数, 破坏惨烈, 也就不难理解, 埃利亚斯会遭人抨击, 说夸大了中世纪社会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差异。然而, 在埃利亚斯看来, 重要的并不是暴力的累积结果, 而是其性质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生状况。他曾明言, 相比于我们的祖先, 我们就像是唱诗班的男孩 (Elias, 1978a [1939]), 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 战争在现代世界中已经理性化了, 相比于阿比西尼亚战士在战场上的凶猛^[3], 或是大迁移时代诸蛮族部落的狂暴^[4], “即便是文明化世界中最好战的国族, 其进攻性也似乎有所克制” (Elias, 1978a [1939], p.192, p.202; 亦参 Sica, 1984)。相比于高度现代性的境况, 前朝往世有更多的个体更直接地参与暴力举动, 肉身相搏, 比如杀戮与残肢。

中世纪充斥暴力, 缺乏对行为的抑制, 与此截然相反, 自文艺复兴以降, 我们看到了一股长期趋势, 对情感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 见证了愈益分化的身体管理准则的兴起。这些趋势与宫廷社会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自文艺复兴以来, 几乎在欧洲各个国家, 宫廷都越来越重要。到了 17、18 世纪, 在绝大多数西欧国家, 宫廷都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意涵 (Elias, 1983, pp.35—36)。

宫廷社会将高度细化的身体管理准则制度化, 用来根据人们的比较价值进行区分。那些拒绝遵从宫廷礼仪的人将招致制裁, 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愈益强化的趋势, 时刻留意并力求形塑自身及他人 (Elias, 1978a [1939], 1983)。在这种情形下, 身体被置于宫廷礼仪中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国王作为宫廷社会最重要的形象, 堪称明证。自每天早晨醒来, 国王的梳洗打扮就被分解成一系列行为 / 剧幕 (acts), 有众多重要他人参与其间, 具有某种声望价值, 象征着当时的权力分配 (Elias, 1983, pp.83—84)。

而人们生活的社会背景的变迁更助长了这些发展趋势。与中世纪截然不同,

[3] 就在埃利亚斯写作此书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 意大利与非洲东北部的阿比西尼亚 (即今埃塞俄比亚) 展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 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阿比西尼亚军队缺乏现代武器, 但士气高昂, 骁勇力搏, 意方最后不得不频频使用化学武器。

[4] “Great Migrations”, 特指公元 4—6 世纪日耳曼诸部落向南侵入罗马帝国的民族大迁移过程, 直接起因是被汉帝国击退的匈奴人转而向西侵袭东哥特人 (日耳曼人的一支)。这里的 “tribes” (部族) 史称蛮族, 在埃利亚斯笔下也是 “文明” 制造等级化对比的结果。

宫廷社会并不要求个体时刻准备着展现出高度的进攻性。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近身肉搏被宫廷阴谋所取代，生存的维持对于身体力量的依赖逐渐减少，转而借重于遵守行为准则，磨炼印象管理技能（Kuzmics, 1988）。要想获得成功，呈现好身体比借助强力征服其他身体更为重要。宫廷人士开始必须培养起“极其敏锐的感觉：基于一个人的举止、言谈、礼节或外表，应当赋予他在社会中什么样的地位和重要性”（Elias, 1983, p.55）。

对于身体的监管和控制的这种增强趋向，无论宫廷社会内外，皆呈普及之势。前后数百年间发生了一些整体变迁，包括睡眠周期的理性化，对睡眠场所的更严格禁忌。和陌生人同床越来越让人窘迫，排泄之类的生理功能开始受制于更多的禁忌，性也移到了社会生活的后台区域（有关行为礼节的文献曾经包括建议如何应对在客栈中与陌生人同床，如果在街上撞见一对男女在干事儿该怎么办）。在此之前，无论是身体还是其生理功能都不会让人心生厌恶。比如，埃利亚斯（Elias, 1978a [1939]）引述了一份16世纪中期有关良好礼节的文献，其读者对象虽说是贵族，却觉得需要花一整章来讨论如何满足身体之必需。文献中包括如下指导：

<136> 一旦撞上令人恶心的东西摊在道上，转向同行者，指给他们看这摊污物，殊为失礼。而让别人闻恶臭之物就更不允许了，因为就有人习惯这么做，俯身去闻然后说：“快来闻闻，真的很臭。”

埃利亚斯指出，如果这份文献煞费苦心地强调这种做法，以便给予谴责，那很可能就证明了它确实存在。

身体管理上的这些变化并非凭空发生，而是伴随着其他一系列趋势：人们直接从暴力中获得快乐的倾向逐渐衰减，对于暴力行径产生道德厌恶感的阈限逐渐下降，人的行为波动不定的幅度逐渐减少。社会开始限制人们所面临的身体危险，也就开始限制有关危险的符号象征。有关刀的使用的禁令逐渐增加就是一例（Elias, 1978a [1939], pp.124—125）。长久以来，刀就被用作武器，也是吃饭时唯一使用的家伙，现在成了危险和死亡的象征。它产生了不安感，导致人们约束和压制其在社会中广泛使用（Elias, 1978a [1939]）。

我们可以看到，支撑着礼节方面的这些变化的，是人们力求以一切他们觉得属于动物性或自然性的东西为对立面，来界定其具身体现。人们越来越以自

然或生物特性为对立面来界定自身，而身体的“自然机能”的参与也往往隐匿于后台。甚至食物的“动物性”也遭到压制：

曾几何时，动物尸体摆上餐桌并当场切割，其实是令人愉快的，至少一点儿也不会让人不快。从这样的感情标准发展到另一种标准，乃至于一盘肉菜都会让人想到杀了一只动物，得尽量避免。在我们的许多肉菜中，烹饪和切割的艺术大大隐藏并改变了动物原料的形式，吃的时候很少再想起其由来了。

(Elias, 1978a [1939], p.120)

对于这种整体趋势，也不妨描述成文明化身体发展牵涉到身体的愈益社会化。这里所用的身体社会化有两大特性。首先，自然机能不再与自然的节律和命令密切相关，也受到社会性的管理和组织。技术的进展也促进了这一点，比如设计与建造作为一种封闭单元的厕所，“令人非常满意地解决了将这些机能清除出社会生活、移位到幕后的问题”（Elias, 1978a [1939], p.139）。其次，随着身体开始受制于越来越宽泛的禁忌，它也转型为汇聚行为准则的场所及其表达。将身体与自然相“分离”，有助于为基于身体价值区分个体奠定基础。人们共享的身体机能越来越退出人们的视线，而区分个体的礼节与性情却越来越被当成其价值和自我认同的标志。

二、身体与对于区隔的追求

<137>

以上我描述了文明化身体发展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特性，接下来，我将更具体地确定有助于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就身体行为礼节而言，有可能勾勒出一些医学上为习俗变易辩护的理据。不过，医学上的理据想必不能导致这些发展，因为行为礼节基本上是在已经变易之后，旧的才被视为不健康的、不被社会接受的（例参 Elias, 1978a [1939], pp.114—116, p.126）。相反，埃利亚斯找出了两大系统性起因和一大“局部化”起因，即对于区隔的追求。它们都对身体管理的流变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这些变化的主要局部起因在于宫廷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区隔的追求，这种追求有助于行为准则的内化。在中世纪，自由骑士们基本不担心自己的社会位置

会遭到自下而上的威胁。因此，他们不面临什么心理压力要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混同于下等阶层。然而，宫廷社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形。一个人在宫廷社会中的等级地位首先是由其府邸和官衔所决定的。不过，贯穿并左右着这套等级体系的地位秩序，端赖于一个廷臣从国王那里得到多少宠幸。这又要看一个人在充满张力的宫廷场域中享有多少权力和重要性，这里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性。如埃利亚斯所言：

一个人在宫廷等级体系中占有的位置……极其不稳定。他所赢得的实际的敬重迫使他渴求提高其官衔等级。这方面的任何提高都必然意味着其他人的降等遭贬，因此，这样的渴求也就释放出除了奔赴沙场为国王效命之外，仍然向宫廷贵族开放的唯一一种冲突，即在宫廷等级体系内部的位置争斗。

(Elias, 1983, pp.90-91)

这样追求区隔，就对身体的管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果表现出“失礼”，会被视为令人厌恶，可能使不守礼节的人损失名誉。因此，行为准则对人的行为施加了强制影响。任何时候的行动都可能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要想在这场地位竞争中获得成功，就要求精细打磨一套印象管理技能。人们不得不“不惮琐碎地权衡其他每一个人的姿势和表情”，细心揣摩“他们一言一句的意思为何，目的何在”（Elias, 1983, p.104）。比如说，“在什么程度上孤独自处，什么程度上圆滑周旋，必须经过细致衡量；每一次致礼问候，每一场寒暄对话，都自有其玄机隐意，远甚于实际的所言所行。它们标示着人的身份地位，参与形成有关其身份地位的宫廷舆论。”（Elias, 1982 [1939], p.271）无论是“对行情看涨的某人失恭敬”，还是“对在等级体系中步步下滑的某人过分亲近”，都蕴涵着危险（Elias, 1983, p.91）。在这种情形下，情绪爆发就有很大的损害，因为它们暴露了一个人真实的感情，表示出丧失了控制。

<138>

埃利亚斯提出，宫廷生活中的地位竞争“迫使人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克制情感，注重对行为精心计算、细致拿捏”（Elias, 1983, p.111）。担心在别人面前丢脸，就会在个体心中培养起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区隔性行为再生产，培养起支撑这种再生产的严格的驱力控制（Elias, 1982 [1939], pp.254-255）。要维持受人敬重的地位和负有声望的人格特征，就要求富于远见、自我约束以及

“重重焦虑之下的小心谨慎”(Elias, 1982 [1939], p.311):

要在宫廷中争取重要性的激烈竞争中保住位置,避免遭到嘲笑、蔑视和名誉损失,就必须将自己的外表和姿态,简言之就是将整个自我,臣属于变动不定的宫廷社会规矩,这类规矩越来越强调差异,强调从属该社会的人的区隔。**必须**穿着特定的衣料、特定的鞋款。一举一动也**必须**遵照标志从属宫廷社会的人的特定方式。就连微笑也按宫廷习惯加以塑造。

(Elias, 1983, pp.231-232)

鉴于这种情形,身体管理规范开始内化。行为准则不再通过制裁的威胁由外部强加,而是一定程度上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被采纳,乃至不管有没有他人在场都会被遵守(这种情境持续至今,人们早晨起来,即使整天待在家里,根本没想到要见什么人,也通常会梳洗穿衣)。

宫廷社会中存在的地位争夺“毫不逊色于工业社会中对资本和经济权力的竞争”(Elias, 1983, p.73)。然而,宫廷社会中的竞争不是在经济市场上决定的,而是以个体对于宫廷礼仪要求的控制及在其间的位置为中介。这种情形就导致社会中的上等人试图通过行为礼节和举止风度来使自己有别于大众,将自己的标准确立为规范,别人也不得不遵循。

在宫廷社会中,相比于前朝往世,竞争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胜败不再由近身肉搏来决定,而要看地位竞争,它给礼仪的一招一式^[5]都附上一种“拜物教性质”。因此,在宫廷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对于承认、回报和地位的持续压力,“自上而下”的由这种竞争引起的忧惧,成了“精雕细琢的文明化的最强大力量之一,上等阶层的人士借以使自己有别于他人”(Mennell, 1989, p.107)。比如说,在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

来自宫廷的习惯、行为与时尚持续渗透到中上层^[6]里面,被竞相仿效,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而有或多或少的改变。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们就此丧失了作为区分出上层阶层的手段特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

<139>

[5] “every act of etiquette”, 这里的“招式”也带有演剧的意味。

[6] “upper middle classes”, 并非上层与中层的合称,只是中层中更接近于或更自认为接近于上层的那一部分。

贬值了。这就迫使那些上层的人对行为作进一步的发展和精致化。从宫廷习俗的发展,下向扩散,在社会中稍稍变形,到作为区隔标志趋于贬值,就是上述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通过上等阶层实现的行为模式持续运动。

(Elias, 1978a [1939], p.102)

纵观历史,地位竞争明显呈现出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的特点是个体主义的社会流动企图,即下层的成员效仿上层,但往往在其行为中留有印记,暴露出“个体的社会提升所要求的巨大努力”(Elias, 1983, p.186)。第二,当下等群体的社会权力上升,并以上等群体的社会权力下降为代价,各群体就倾向于夸大其差异,各自宣称是高等优越的样板(Elias, 1982 [1939], pp.311—312)。

因此,在宫廷社会中追求区隔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推动着行为准则的内化,也推动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对于身体的监管与控制。不过,除了行为规范的內化,宫廷竞争还产生了三项意外后果。首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更加巩固,也更加频繁。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中证明(Elias, 1983),要在一个竞争情境中维护甚或提升某人的社会位置,就必须用更为“心理性”的眼光来看人,包括精确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行动与表达。更加自觉地考虑自己的行为将被他人如何解释,也可以视为与他人之间达成更高水平的认同。人们被迫更加关注比此前更多的人(Goudsblom, 1987)。这种趋势的一个连带意涵就在于,相互认同有助于对他人产生程度更高的同情和移情。

而布迪厄(Bourdieu, 1984)与戈夫曼(Goffman, 1969)则点明,到了当代社会,对于区隔的追求依然是印象管理背后的重要推动力,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不妨看成是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的程度,远高于前朝往世。与这一相互认同过程相伴而来的,是羞耻与窘迫的阈限上升。当情感战胜了情感控制,逾越了内化的行为准则,就会体验到羞耻;而当其他人破坏了社会惯例,就会感到窘迫(Elias, 1982 [1939], p.296)。论述行为礼节的文献甚至致力于在个体身上培养羞耻感和窘迫感(Elias, 1978a [1939], p.134)。

其次,要更加关注他人,不仅必须以更具心理性的眼光来看别人,而且还要有能力提前筹划,基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后果,对行动做出预见。一旦如此重视意见,行动的后果就不再限于其直接效应,还必须结合其后续的连带后果来

考虑。当代工商生活中的接触往往是暂时的，迅速告终，相形之下，宫廷社会中的所有关系都“必然是持久的”，“一句无心之语就会后患无穷 (Elias, 1983, p.110)。不仅如此，在宫廷社会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缺乏明确分界，意味着身体处在更为持续的展示之中，需要始终保持警觉和管理。 <140>

宫廷社会中这种对于区隔的追求的第三项后果，在于创造出并逐渐扩大成人与孩子之间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距离。按照埃利亚斯的说法 (Elias, 1978a [1939], p. xiii)，西方社会中的“成长”过程无非就是“个体的文明化进程，作为千百年来社会的文明化进程的结果，每个年轻人都会从诞生伊始就自动受制于这一进程”。随着成人所践行的自我控制程度增加，孩子也不得不学习更多的东西，才能发展出文明化的身体，成为完整的、可被接受的社会成员。在现代，成人与孩子的行为、语言与思维之间有着“深切的歧异”，孩子要在寥寥数年内掌握高级水平的“历经千百年发展起来的羞耻、厌恶和知识” (Elias, 1978a [1939], p.140; 1991)。因此，他们的本能生活必须马上受制于严格的控制，这里就包括力度越来越大的对于性驱力的形塑 (Elias, 1978a [1939], p.140, p.182)。事实上，孩子如果未能达到社会所要求的那种程度的情感控制，会被视为“有病”、“犯罪”或干脆就是“讨厌”，这也表明了发展文明化身体的重要性 (Elias, 1978a [1939], p.141; Elias and Scotson, 1965)。

在教育和发展孩子的身体以符合文明化身体的标准的过程中，首要的行动者/代理人 (agents) 就是父母 (尤其是母亲)。比如说，父母要负责训练自己孩子如厕，教他们不要拿手擦鼻涕，教他们怎么系鞋带，还有公共场合怎么大致管理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大喊大叫，乱冲乱撞。事实上，埃利亚斯主张 (Elias, 1978a [1939], p.140, p.189)，文明化进程的要求越高，核心家庭中的父母要实现这一任务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不过话说回来，父母只是这种调控的（往往不够充分的）手段，因为总归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整个人类型构，对新的一代施加压力”。从这一分析显然可以看出，埃利亚斯拒绝接受许多心理学家提出的有关孩童期的历史分析。如果把个体看成是历经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发展，就无法理解孩子“社会化”过程中涉及的诸般问题。其实，根据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多少距离，其性质如何，有关孩童自觉意识与本能冲动的问题也会有许多变化 (Elias, 1978a [1939], p.182)。

因此，文明化进程就会使得成人身体与孩童身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与身体距

<141> 离都趋于增加。这体现于成人能够展现的表情、可预测性和控制的范围，以及他们能够事先筹划和与别人取得认同的程度。成人的身体越是受制于自我与别人的监管和控制，孩子的身体在能够被接受进入成年期之前，必须投入的工作就越多。孩童的身体不再能够即刻表达驱力与身体表达之间的关联，而是转型进入成年期，情绪冲动很少能像从前那样宣泄出来。

要说明这些差异，重要的是要记住，只有当身体兼具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地位，才能促成成人与孩童之间的鸿沟。人类之所以具备监管、控制并发展其身体行动的能力，其根源除了直接的生物变化，除了符合社会所接受的行为规范，就在于符号解放这一进化发展。

三、身体的社会互赖性

与文明化身体有关的这些变化背后，有着局部性的直接推动力，就是宫廷社会成员最初发动的对于区隔的追求。不过，支撑这些变化的还有更为广泛的系统性过程，构成发生这些变化的前提条件。第一种系统性过程在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赖链条延长。随着个体的密度加大，互动更为频繁，人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己行动及他人行动在当下和未来的效应。成功不再依赖于打斗的能力，而在于持续的反思和预见，在于更多地获取知识。

支撑身体控制与表达方面变化的第二项系统性因素，在于形成越来越有效的暴力垄断。在封建时代，人口增长和迅速消耗的可用土地供应缔造了新的情境，领主们被迫相互争战，竞夺土地。埃利亚斯指出 (Elias, 1982 [1939], p.43)，任何拒绝参与这场斗争的人“只能一味守成，而其他人都力图开疆拓土，最后必然比别人更‘小’更弱，越来越有危险俯首称臣”。不过，随着竞争逐步清除参与这场斗争的对手数量，中央集权的力量也开始增长，导致那些地方的人们面临更大的压力，要彼此和平共处。由于合法暴力的手段逐渐汇聚于宫廷或国家，具体个人所体现的威胁也变得更加可以计算了。暴力行为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情绪爆发很可能遭到中央集权的严厉惩罚。在这种情形下，“情绪的形塑和本能体系的规范”也同样逐步发生变化 (Elias, 1978a [1939], p.201)。这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危险趋于减少，并更可预测。不安定感减缓，而筹划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越来越有必要。

暴力垄断的巩固,以及互赖链条的延长,文明化身体发展,这些现象是彼此相关的。一方面,对于暴力行为的禁忌与国家暴力垄断的效力增长密切相关。人们认识到暴力行为会受到政府的惩罚,因此越来越要对进攻性的冲动进行监管和控制。实际上,长远来看,国家垄断也不能单凭强力来维持,加强驱力控制才是国家垄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身体不仅仅必须被控制,而且必须被塑造得比较驯顺。况且,人际互赖关系的增长也使暴力愈发不合宜,其效应更难逆料。另一方面,融合对暴力的垄断的那些国家形式与不断增长的分工愈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促进了城镇和行政管理机器的成长,货币的使用,以及人口的增长(Mennell, 1990, p.208)。

复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社会互赖,也激励了埃利亚斯所称的“功能民主化”(functional democratization),导致个体之间的某种“平等化”效应。这是因为,互赖越是发展,各支配阶层的位置就越是依赖于被支配阶层,后者的潜在力量就越是强大(Elias, 1978a [1939], p.210; Elias and Dunning, 1986)。内局群体内部竞夺着地位和其他回报,不得不考虑到外局群体大众的要求。^[7]这样的情形也助长了不同群体各自特有的行为准则的“交换”。这种趋势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适用于两性之间(Elias, 1987b)。比如说,埃利亚斯提出,在17、18世纪的绝对主义宫廷社会,丈夫对妻子的全面支配第一次被打破(Elias, 1987b, p.184)。这段时间里,妻子的权力迅速上升,因为社会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女性来决定的,而在地位市场上,社会舆论又是成功的关键。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暴力垄断的发展,对于回报的竞争逐渐摆脱了难以预测的强力,转向调控有度的工商贸易和印象管理等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控制、可以计算的身体管理对于获得成功也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必要了,从而成为文明化身体发展的前提条件。

[7] “established”和“outsiders”是埃利亚斯1965年发表的社区研究著作中的一对核心概念,有好几层意思,通用的译法“定居者/定居群体”和“外来者/外来群体”强调了进入社区的时间长短,进而强调对各类资源的把持和竞夺,此时可采用“(地位)既定群体/既定利益群体”和“旁观者”的译法,但埃利亚斯强调的是符号资源的塑造和竞夺(配合其“我群克里斯玛”、“他群污名”等概念),在这个“局”中,这两类群体的关系不单单是表面看似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关系。如果“局外人”拒绝玩这个“局”,这个“局”也就不存在了,至少可以说符号效果不强了。所以我们颠倒过来,译作“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以强调两类群体在行动取向上的同构性。可比照布迪厄有关场域、压迫与抵抗之辩证关系的分析。

四、文明化的身体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来概括一下文明化身体的主要特征，说明埃利亚斯的作品为什么有助于启发我们对于现代性境况下的身体的理解。文明化身体的发展涉及身体不断趋向社会化、理性化和个体化。如前所述，我所说的身体的社会化，指的是自然机能的退隐，身体转型为行为准则的场所和表达。人们越来越把身体作为社会性的东西来领会和管理，更多的身体维度与身体功能被界定为生物性或自然性的生命领域的对立面。

与此相伴的是身体的**理性化**。在中世纪，冲动即刻展现于意识与行动。然而，随着文明化身体发展，自觉意识与驱力之间的界限得到加强。文明化身体具备自我控制，表现为“道德”或“理性思维”，位于以下两方面之间，“一方面是自发性、情感性的冲动，另一方面是骨骼肌肉”，促成了满足的推延。这就防止了冲动任意表现在行动中，“而未经这些控制机制的允许”（Elias, 1978a, p.257; 1983, p.243）。身体的理性化还包括身体的愈益分化：它越来越不被视为一个“整体”，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包括许多部分的现象，可以分解开来，宜于控制。

无论是对于戈夫曼有关自我呈现和身体习语共享词汇的分析，弗罗因德有关情感态身体的考察，还是霍克希尔德有关束缚空服人员身体的社会规范的研究，埃利亚斯对于身体社会化和理性化的分析都可谓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否则前三项研究是付诸阙如的。文明化进程越是将身体社会化，身体就越是成为人们发现难以抵抗的行为准则的场所与表达。与此类似，文明化进程越是将身体理性化，人们就越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他们可能面临的控制自己身体的要求也就越多。

不仅如此，埃利亚斯有关身体理性化的分析就像韦伯关于社会理性化的分析，展示了理性化这种现象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文明化进程的演进，生命固然变得越来越不危险，但也变得越来越缺少兴奋。随着策略性思维取代了即刻的表达，自发的快乐与受控筹划的安定感之间存在某种平衡（Kuzmics, 1988, p.155）。其效果之一就是，那些不再能在人与人之间直接展现的驱力和激情，往往就在个体内部展开猛烈抗争，对抗自己身上负责监管的部分。对于孩童的严格形塑往往导致人际冲突，在有助于确定其人格结构的模式的同时，也会

有损于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 (Elias, 1978c, p.242; 1982 [1939], p.245)。日常生活中暴力的程度可能确实减少了, 但“战场却……移进了……驱力, 激情, 它们不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直接展现, 却往往在个体内部展开抗争, 对抗自身负责监管的部分, 其暴烈程度丝毫不减。” (Elias, 1982 [1939], 242)

实际上, 在个体身上负责监管的自觉意识与被监管的驱力之间, 往往不存在任何彻底的了断。两者之间的平衡经常遭到各种干扰, 从“人身上一部分反抗另一部分, 或持续萎靡不振, 使社会功能的执行甚至更加困难”, 到感到厌烦、持续躁动和不满足。要实现对于身体及其驱力的彻底控制, 外部和内部的努力也都会导致强迫行动及其他不安症候 (Elias, 1982 [1939], p.243)。简言之, “自我控制的习得……年轻人的文明化, 从来也不会一帆风顺, 全无痛苦, 而总会留下伤痕。” (Elias, 1982 [1939], p.244)

身体的理性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启发了埃利亚斯, 也启发了他和邓宁合作 (Elias and Dunning, 1986), 去研究体育运动与休闲活动在社会中的兴起及位置。首先, 埃利亚斯提出 (Elias, 1978a [1939], p.202), 文明化社会有一点别具特色, 就是观看一桩事件^[8], 甚至只是倾听一桩事件, 就要对激情的宣泄、情感的抒发进行细致调控, 这就影响到书籍、戏剧和电影的发展。回顾历史, 个体从小就被教育要避免以积极进攻的方式表达快乐, 而是要养成从观看中求快乐, 规则有序、经过协调、冷静理智、比较消极的快乐。按照法尔克的说法, 强调的重点出现了明显的转移, 从“肉身特性的表达性一面转向体验性一面” (Falk, 1985, p.115)。同时还伴随着另一场转变: 个体在公共场合如何获得兴奋才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方面, 埃利亚斯 (Elias, 1978a [1939], p.203) 引用了 1774 年出版的德·拉·萨勒的《文明新论》: “小孩子都喜欢用手去摸觉得有意思的衣服及其他东西。这种冲动必须予以矫正, 必须教会他们, 看的一切东西都只能看不能摸。”今天, 这条训言在成人那里几乎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情, 他们基于社会灌输的自我控制, 倾向于克制自己去触摸想要的东西。现在是眼睛和耳朵成了人们在公共场合的主导体验中介。

纵观历史,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相对非暴力的身体对抗形式, 其兴起也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暴力减少, 以及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在前朝往世, 不受抑

[8] 此处原文为“events”, 特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活动等。

制的驱力被疏导到暴力之中，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观看着搞笑的“模拟”对抗，在这种对抗中，人们精心确立规则，以维持适当的 / 得体的“张力平衡” (Elias and Dunning, 1986)。本职工作所要求的情感约束往往广泛渗透到人们的业余生活之中，会导致个体觉得自己“枯燥”、“单调”或“萎靡”。而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人们能够体验到兴奋的主要方式之一 (Goodger and Goodger, 1989)。观看篮球、橄榄球或足球之类的体育赛事，让个体有机会体验到“受控的情感解控” (controlled decontrolling of emotions)，而在工作等其他公共生活领域，他们很少有机会如此 (Wouters, 1986, 1987)。这些机会也使得文明化进程所造成的内在自我约束更能忍受。它们给文明化的身体提供了释放的渠道，提供了“充电”的机会，有助于身体回归支配社会的那些高度受控的行为准则。

如果说谈起文明化身体的主要特点，第一点就是身体的社会化，身体的理性化算第二点，那么身体与自我的逐步个体化就是第三点。埃利亚斯指出 (Elias, 1978a [1939], p.253), “壳中自我” (self in a case) 的观念是西方哲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而人们也真的体验到了这一点。个体往往把自己理解为与别人相分离，身体的作用就是自我的容器，或者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一个空管子，充斥的只是心智” (Wright, 1980, p.11)。照埃利亚斯看来，这种观念是如此不言自明，乃至很少被人质疑，考虑到当代社会对于自我控制的强调，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将个体区分开来的这种界限的实质“从未得到正确的说明” (Elias, 1978a [1939], p.249)。与这些预设截然相反，对于身体与自我彻底分离的观念，埃利亚斯从未有过本体论层面上的支持。相反，身体、情感与身体表达本身都是由文明化进程形成的，而文明化进程又是因符号解放而成为可能，并由社会型构塑造而成的。具体而言，自中世纪末以来，人们具备越来越强的自我超脱和情绪控制的能力，开始更多地将自身领会为个体，与他人互相分离，彼此超脱。对象 / 客体 (objects) 也呈现出外在性的表现，开始具备与人们对它的直接用途相分离的意义 (Elias, 1983, p.252)。

身体的个体化对于行为礼节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后果，因为它在人群中倡导对自己的身体更具反思性，并将自身感知为与他人不同。埃利亚斯认为，其结果便是人们开始建构“自己身体与他人身体之间的情感之墙”。比如说，手帕和男式晚礼服作为人群真正发生转型的象征而兴起，因为它们创造了自身与其

身体之间的情感之墙 (Elias, 1978a [1939])。味道、声音与行动被越来越与特定的个体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整个物种 (Duroche, 1990)。身体与身体之间开始创造出距离,人的血肉开始成为窘迫之源。就这样,人们越来越参照有关行为的社会规范来管理身体。

在文明化进程中,个体越来越意识到自身与他人是彼此分离的实体,并对自己的身体施加更多的控制。不过,与他人相“分离”、相“孤立”的体验是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个体普遍体验到的某种前社会性状态。因此,埃利亚斯才会主张,不应当把人理解为“孤立、密封的个体,而应当是相互依赖的个体,共同构筑纷繁多样的型构。” (Elias, 1978a [1939], p.261; 1983, p.209) <146>

不仅如此,文明化身体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有能力发展出其所为,无非是因为生物性过程与社会性过程的相互关联。

文明化身体的三大特征包括身体的逐渐社会化、理性化与个体化。尽管对于研究现代性境况下的身体而言,埃利亚斯分析文明化身体所针对的历史时期相关性有限,但我们不妨认为,他所捕捉到的过程依然在进行之中;我们仍要强调,身体对于现代人的自我认同观来说,意义越来越重要。文明化身体发展往往使人们孤独自处,其身体成了壁垒,阻碍与他人接触,产生蕴含意义的沟通。身体管理的标准要求人们监管并控制其身体,但这种情感控制的连带后果就是他们萎靡不振地居于体内,与体共存。正是强健有力的、跨越个体层面的社会宗教意义体系,使得宫廷社会中的人们产生了自己行动的理由。然而,在当代社会,个体越来越孤独自处,唯有以愈发增强的反思性,思索自己文明化身体的局限,却没有蕴含意义的、经社会合法化的资源,来为这种情境提供正当性理据。

文明化身体的瓦解

尽管在埃利亚斯的研究中,文明化身体发展具有某种整体方向,但文明化进程又是不均衡的,有时会陷入逆转时期。进化过程为人类提供了文明化身体发展所必需的生物性装备,但文明化身体是否真正能发展起来,还要看人们的行动。国际层面或国内层面的不同文明对于身体所产生的效应,当社会系统内部发生去文明化过程时进入的逆转时期,以及社会中存在的相对“未文明化”的外局群体,都彰显了这种或然性。

首先,在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层面上的文明化进程进度不一,这对文明化身体的维护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性的暴力控制和垄断的力度往往不如国家层面上的。埃利亚斯指出:“如果把减少相互之间的身体威胁或增进和平共处看成是确定文明程度的决定性标准,那么可以说,人类在国内事务上已经达到的文明层次要高于国际层面。”(Elias, 1988, p.181)当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最终发展为战争,身体冲突就会导致文明化身体的某些特性遭到瓦解,许多士兵在退伍后重新适应平民生活时会遇到种种困难,就是这种情形的例证。

<147> 其次,在一个国家里,当一些群体面临可能丧失其现有社会位置的威胁时,就会出现对于文明化身体的发展的期望与逆转。比如说,在中世纪晚期,当西欧旧的武士阶层中有一部分被“驯服”,转化为廷臣,未被吸纳到宫廷中的其他部分由于其社会基础遭到侵蚀,其实会变得更具暴力,更显进攻性(Mennell, 1990)。在德国自由军团所犯下的暴行中,也有类似的过程在起作用。根据埃利亚斯的解释(Elias, 1988, p.197),这些战士反对和平,因为和平威胁到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立志要毁灭这个世界,因为它拒绝认可他们的成就和宗旨,并就此显得毫无意义。”(亦参 Theweleit, 1989)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时期,由于国家支持的暴力的介入,文明化进程会被迫趋弱。

再次,在社会中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文明化身体发展可能达到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如果存在强大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界限,被社会的完整成员资格所包容或排斥,就会导致外局群体习惯使用暴力作为表达手段。内局群体在冲突中常常遵循支配性的行为准则以捍卫自身的特权,但外局群体并不都是这样。比如说,邓宁、墨菲和威廉斯(Dunning, Murphy and Williams, 1988)认为,英国或许正在经历一场去文明化的暴力回潮。尽管功能民主化进程使外局群体有可能大声疾呼其要求,但尚不足以瓦解其实现社会政治要求时遇到的障碍。

埃利亚斯和斯科特森对一个名叫“Winston Pravda”的小镇^[9]进行了社区研究,考察其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刻画了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关系中涉及的一些导致上述差异的过程。对于那些靠遗产过活的家庭,大家给予的共享界定是

[9] 这是埃利亚斯当时所在的英国莱斯特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的托名。一般拼做“Winston Parva”。

价值较低的,“几乎自动从父母延伸到孩子,影响到后者的人格发展,尤其是他们的自我意象和自我尊重。”(Elias and Scotson, 1965, p.144) 因此,尽管“外局群体的年轻人”希望获得某种能给自己带来尊重的自我认同,但要实现这一点,却只能诉诸“攻击并尽可能破坏秩序井然的世界,他们被那个世界所排斥,却不十分理解原因何在。”(Elias and Scotson, 1965, p.120)

埃利亚斯和斯科特森点明,这种研究对于文明化进程并非没有更广泛的推论意义。人的自我观念与其在社会中作为内局群体或外局群体的位置密不可分(Van Stolk and Wouters, 1987),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确立持续有效的驱力控制的能力。实际上,埃利亚斯提出(Elias, 1982 [1939]),要让人们树立并维持超我动因,稳定地控制驱力,就需要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准,比较强的安定感。这一点既适用于当代社会中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关系,也适用于数百年前的贵族群体与被剥夺群体(Kuzmics, 1988, p.173)。

正式化与非正式化的潮流波动也使文明化身体发展更显复杂。比如说,20 世纪 60 年代常常被人视为一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纷纷抛弃了情感约束,转而追捧自发的自我表达。然而,武泰却认为(Wouters, 1986, 1987),对于这一时期以及类似时期,更准确地说应该属于高度受控下的情感解控。这个时期要想推进社会的非正式性/不拘礼节(informalities)和个人的实验,就要求高度的自我约束。类似的状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就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对于生活中洗澡、跳舞和谈论自然机能之类的事情禁忌有所放松。同样,这些事件之所以可能,也只是“因为习惯成自然的、技术上和制度上趋于巩固的自我控制……整体上有所确保。这只是在业已确立的标准框架内的某种松动。”(Elias, 1978a [1939], p.140) 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就很难具体指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去文明化的过程:即使一个时期里的自我控制标准看似有所松动,或许也只是文明的某个加固期当中的一次潮流(有关具体指明这些条件的尝试,参看 Mennell, 1990)。

<148>

五、历史态身体

在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理论里,蕴含着我所称的一套有关文明化身体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类身体的历史发展。与自然主义观点截然对立,身体与

社会并不完全来自于生物或自然的前社会性领域。相反，埃利亚斯关注的是人类，其具身体现是进化发展中包含的生物性过程与社会性过程的产物。基于这一背景，埃利亚斯致力于考察以下两者之间的关联，一是“心理功能的结构，即给定期限内行为控制的特定标准”，一是“社会功能的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Elias, 1982 [1939], p.324）。因此，个体身体的变化与社会型构的变化密不可分。

如果说埃利亚斯的身体观不同于自然主义思路所采纳的角度，那么它也有悖于社会建构论者所持的主张。在埃利亚斯的作品中，身体固然越来越社会化，但这一过程本身却是由人的那些促成历史的生物特性在背后推动的。如前所述，埃利亚斯主张（Elias, 1991），进化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生物能力，即习得能力，使人类摆脱了对于进一步生物变化的依赖。人的这种非凡的习得能力，以及独特的综合能力，即通过运用符号来制造关联，再加上以符号形式在代际之间传承积累下来的知识的能力，促成了“独立于生物变化而产生迅速的社会分化，适应新环境”（Mennell, 1989, p.204）。生物性的装备使人有能力主要借助习得经验来塑造自己的行动，也赋予了人一种独特的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塑造“自己”的身体，不为其他物种所共享。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社会性、文化性的过程使生物学与历史毫不相干，埃利亚斯独树一帜，认为正是进化过程推动了生物学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埃利亚斯的研究非常重视身体的历史，为身体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富有前景的基础。本书下一章我将再次谈到他的研究的重要性。不过，针对他关于文明化身体的分析，也不妨提出几点批评。首先，与宫廷社会截然不同，要理解资本主义，不能只是诉诸于与面对面互动有关的诸项条件（Honneth and Joas, 1988 [1980]; Kuzmics, 1991）。当然，埃利亚斯非常清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施加于个体的要求也大大增加了。他更指出，随着作为资本主义标志之一的时间和空间逐渐商品化，个体对于身体的管理也更加重要（Elias, 1982 [1939]）。尽管这种立场并不直接回应相关批评，但也很有理由认为，这类脸面功夫和身体功夫属于资本主义的应有之义，吉登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持有这种立场（Giddens, 1988, 1990）。

要是说埃利亚斯过于侧重身体某些维度，带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批评或许更中肯一些。埃利亚斯强调说，由于符号解放，生物特征的重要性降低。

这种说法固然不容忽视，但未免言之过甚。符号解放之后，人的生物性构成往往被贬低为文明化进程的单纯载体。不妨把这说成是“人类例外论”的例证(human exceptionalism, Benton, 1992, p.229)。人类例外论主张，当人类进化到某个阶段，会出现一些文化能力和社会能力，取代生物机制的重要地位。而现在，埃利亚斯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对身体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它对人们施加了诸多要求，将“即刻的倾向”臣属于“压倒一切的互赖之需”，在行为中清除一切不规律之处，实现持续的自我控制(Elias, 1982 [1939], p.248)。话说回来，尽管埃利亚斯把握到这种肉身理性化是一把双刃剑，却未能充分探明这类过程会对健康和疾病造成什么影响，或者用弗罗因德的话来说，对人们的身体安康带来什么效应。考虑到埃利亚斯对于死亡和临终过程的研究兴趣(Elias, 1985)，这种缺失令人惊讶。生物特征不会单单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精致，就不再构成对于人类行动的约束。当代社会中的死亡率与发病率各见差异，意味着社会性过程和生物性过程对于人类主体的构成依然居于核心地位。

其次，不妨认为，埃利亚斯的文明概念作为一种机制比较缺乏分化，难以处理某些肉身变迁。比如说，当代资本主义对于个体施加了越来越多的规训，迫使他们调控其工作时的行为。相形之下，也可以说，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私人化，相比于宫廷社会，受制于行为准则的程度更低。埃利亚斯(Elias, 1978a [1939])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会谈论“消费技术的高度精致化”，但并没有深究这些变化的连带意涵。在当代社会，私人生活很可能更多地变成“后台”，人们在此摆脱了雇佣劳动的要求(Goffman, 1969)。速冻食品和快餐食品取代了坐侍者上菜的正式大餐，放屁、打嗝和抠鼻屎在雇佣劳动中的许多公共场合可能不为社会所接受，但在居家私人场合里，人们却往往不自觉地做这类事情。可以说还远谈不上彻底内化了行为准则，个体只是根据所居处的情境的变换，有选择地应用标准。

<150>

布迪厄认为(Bourdieu, 1984)，这些准则具体被人遵循的程度，也可能要看某人所处的社会位置。克劳福德有关自我控制和健康的研究就支持了这一观点(Crawford, 1987)。他发现，在工人阶级当中，每到雇佣劳动之外的休息时间，对于身体控制的要求就可能被视为侵犯了留给“放松”的时间，因此会遭到拒绝。无独有偶，尽管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不平等或许的确有所减少，但许多人仍会怀疑，是否无法用文明这个概念来描述依然普遍存在的女性遭男性强奸

与性骚扰。至少可以说，在文明化进程所带来的代价中，女性所承受的份额过大。男性和女性固然都加强了自己情感的监管和控制，但行为准则依然有不少重要方面有社会性别角度的差异。比如说，在男人身上会被视为“自信果断”(assertive)的言行，搁到女人身上就常常被归为“气势嚣张”(aggressive)。实际上，女性如果试图无论居家还是上班都保持对自己情感的严密控制，会造成诸多不良后果，这大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患上神经失调的女性要远远多于男性(Miles, 1988)。观察当代社会中受控的情感解控存在多少机会，或许也能看出社会性别角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女性的身体已经被通过如此多的方式呈现出来，让男性能够消费，这也不妨看成是当男性“放松”的时候，女性还在工作。

也可以简单地打发这些批评意见，说它们意味着对埃利亚斯“文明”这个术语的用法的误读。但鲍曼有关现代性、理性化和大屠杀之间关系的分析(Bauman, 1989)，却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构成了埃利亚斯立场的反题。在鲍曼笔下，促成种族灭绝和大规模破坏的机制可能与文明化进程的某些核心特征密不可分。

<151> 还有一点与此相关的是，文明化进程与文明化身体的塑造与瓦解在时期上并不完全对应。曼内尔指出(Mennell, 1990)，文明化进程积数百年之功方得以牢固确立，却有可能毁于一旦。原因何在？埃利亚斯要想说明不符合该理论的经验证据，有时似乎不得不需要全盘更改自己的理论。对于这一批评，埃利亚斯可以做出辩护，说明每一代新人的文明都有赖于人类主体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出现一段社会失序的时期，扰乱了通常的社会化模式，就能迅速破坏长期以来的文明化进程。不过，这种辩护也存在一个问题。埃利亚斯非常强调个体身上驱力控制的内化过程。这似乎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持久效应，并预设了一种稳定性，近似于布迪厄的具身性惯习观念。然而，去文明化进程要能发生，就需要使这些控制在个体身上迅速瓦解，而这种情形与其稳定内化的趋势似乎有所抵触。^[10]

第三点批评说的是，对于那些导致预期后果的具身性行动，埃利亚斯没有留出多少余地。个体的行动的总和创造出了文明化进程，但他们并不预期自己

[10] 不妨认为，这并不是埃利亚斯著作中的问题，因为行为的迅速瓦解取决于社会条件。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去文明化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原注

的行动会产生这类效应。文明化进程所产生的那些制度和身体变化既非个体所预期,也非个体所筹划(Elias, 1978a [1939], p.xvi; 1982 [1939], p.232)。对于行为的控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稳定,自个体诞生伊始就开始灌输,把他/她塑造成“机器人”。文明化进程是一种强迫力,即使人们有意识地希望反对它,也无法抵御(Elias, 1982 [1939], p.233)。概而言之,在历史进程中,在文明化身体的创造过程中,预期之外的东西支配着预期的东西。文明化进程这种秩序“比构成该秩序的个体的意志和理智更具强迫力,更为强大”(Elias, 1982 [1939], p.230)。哈费尔坎普(Haferkamp, 1987)曾经批评道,埃利亚斯未经论证就侧重于历史过程中未曾预见的那些发展趋势。他并主张,应该更加注重预期后果的可能性。对于身体也可以有类似的说法。在埃利亚斯看来,身体本身已经变成结构,影响到人践行合意图的能动作用的能力(Honneth and Joas, 1988)。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意见,相对于自然主义观点或社会建构论观点,埃利亚斯研究文明化身体的思路仍然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增进,堪称社会学传统上对身体采取的双重思路的例外。他认为这些过程分别涉及身体的社会化、理性和个体化,这种认定对于身体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愈益重要的趋势而言特别具有针对性。

第八章 身体、自我认同与死亡

本研究行文至此，我已经考察了身体在社会学中地位的变化，并评估了不同的身体学说的长短优劣。而论证重视身体的社会学的重要性则是我统领全书的宗旨。在之前诸章中，我也力求进一步发扬几位特别的论家的研究，因为他们视身体为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未完成的现象。这种身体观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颇有前景的思路的轮廓，能够超越自然主义视角与社会建构视角的化约论倾向，并有助于说明对于现代人而言，身体为什么变得特别重要。本章我将来看一看身体、自我认同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推进已经启发了本书的一些重大主题。

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研究通常关注的是有生命力的身体，很少论及具身性个体在法律和生物意义上的死亡 (demise and death, Mellor and Shilling, 1993)。然而，如果我们重视伯格的观点，认识到死亡是人类境况的一项本质属性，要求人们发展出应对它的方式，那么，忽视死亡就等于忽视了影响处在社会系统中的身体的少数几点普遍参数之一 (Berger, 1990 [1967])。实际上，只有基于身体的必有一死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其全部的社会意涵。

本章中我将考察的是：有三种方式将人定位于其环境之中，使我们能够重视死亡对于有关人的身体与自我认同的分析的重要性。对于身体的生物性构成与社会性构成，这三种方式各自有独特的洞见，哪怕各有局限。后两种方式也间接表明了身体对于现代人为何会越来越重要，以及应对死亡成为一项特殊的问题。无论现代技术进展如何，死亡在生物学角度上依然是一种必然，最终非人力控制之所能及。对于作为一项规划的身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核心，对于这些人来说，上述事实构成了特别的问题。

基于哲学人类学与伯格 1967 年初版的《神圣的帷幕》一书之间存在的关联，可以推出应对死亡和身体的第一种思路。经由哲学人类学，可以把伯格所概括的死亡问题追溯到人的进化地位。这里的论点在于：人类这一物种所处的具身体现境况，本身就迫使他们要想维持生存，就必须有所作为，并赋予自身及其行动以意义。在这种情形下，死亡的前景就构成了对于人们的“筑造世界”和“筑造自我”活动的威胁，需要社会通过提供共享意义体系加以应对。而在现代性境况下，尤其在宗教所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减的情形下，这类体系的提供越来越成问题了。 <153>

伯格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角度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的洞见，但它之所以遭到批评，恰恰是因为把人类学的常项 (constancies) 强加给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文化位置或历史位置，人都被认为具有对于意义的心理需要，正是这迫使他们有所作为 (Abercrombie, 1986; Beckford, 1989)。如特纳所言，伯格笔下的社会行动者“是背负重担的造物，要求通过文化求得解脱 (*Entlastung*)” (Berger, 1992a, p.117)。

吉登斯 (Giddens, 1991) 考察了高度现代性的境况如何使现代个体应对死亡变得特别困难，以此提供了思考死亡与身体关系的第二种思路。现代性具有彻底的非连续性，涤荡了传统的那些确定性，而后者是前现代社会的特点，使人们具备稳定的自我认同感。有鉴于此，吉登斯认为有一种趋势，现代人与其身体会越来越紧密维系，死亡的前景会对置身高度现代性的这些人提出特别的生存性问题。不过，尽管吉登斯的解释的主旨其实是在于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但他并没有彻底摆脱伯格的研究曾经遭到的那些批评。具体来说，吉登斯关于本体性安全感的分析意味着人类具有某种根本的、不变的需要，对于自身及周遭世界的基本特征要有安全感。

我所说的有关身体与死亡之间关系的第三种思路，取自前文考察过的埃利亚斯和布迪厄的研究。埃利亚斯的研究最为合用，因为他在《临终的孤寂》一书中明确阐述过死亡 (Elias, 1985)。不过，我要把当代的死亡“问题”定位于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人们对其身体所采取的各种取向上，以此同时借鉴两位理论家的研究。所以我认为，鉴于现代的具身体现形式，死亡成了人们面临的一项特殊的生存性问题，而不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着同样形式的全人类普遍问题。

这三种思路并不是任意采选的。我之所以选中它们，并以上述这种次序逐

一考察，是要结合自己关于身体、自我认同与死亡的关系的分析，进一步发展它们的洞见。这就意味着，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对于死亡的组织更加剧了身体的个体化与理性化。

<154>

一、身体的悖论

《神圣的帷幕》开篇伊始就明显能够看出哲学人类学对于伯格的影响。伯格援引盖伦和普莱斯纳而指出 (Berger, 1990 [1967], p.5), 人的生物性构成意味着他们必须既要建构自己的世界, 又要赋予这些建构物以意义。然而, 伯格将这一洞见又推进了一步, 认为在这些筑造世界和赋予意义的人类活动中, 存在一种核心悖论, 对身体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连带意涵。特纳如此概括伯格的观点:

“人”的未完成性造成所有的实在都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 但人类又要求有稳定的意义, 如果总是清醒地意识到, 日常实在都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出来的, 性质变幻不定, 就无法生存其间。他们不得不用持恒的重要意涵来包装这些确定性。

(Turner, 1992a, p.117)

关键在于, 这一悖论既指向人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也指向人们与其身体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伯格所言 (Berger, 1990 [1967], pp.5-6), 人们必须赋予其具身性的自我以意义, 但这些意义又必须具备客观实在的外观。否则, 人们就会产生生存性问题, 扰乱其自我感。在这种情形下, 共享意义体系就成了人类不可或缺的东西, 以此使自己看不到筑造世界的行动的或然性, 看不到具身性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至此, 伯格通过指出, 人由于其生物性构成导致的悖论, 需要建立意义体系, 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的洞见。回顾传统, 这些意义体系采取了不少形式。比如说, 人建构了“母亲”和“父亲”之类的社会位置, 这些位置充当了比较牢固、值得信赖的自我认同之源, 使人们能够安排其有关世界的身体体验的秩序, 并领会其意义。它们还通过代际传承而逐渐内化, 使人们具备比较固定的方式, 将自身与世界关联起来 (Berger, 1990 [1967], p.14)。

更一般地说,各项社会制度/机构,比如学校和军队,提供了牢固确立的关于世界的解释,以及有关身体管理、行为和外表的通则,以对抗人们面对世界的开放性所蕴涵的危险(Gehlen, 1969, p.97; Honneth and Joas, 1988, p.57)。不过,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传统上是宗教来提供给人们“神圣的帷幕”,以维持对于世界、身体和自我认同的共享景象^[1]。

伯格在分析这些共享意义体系如何运作,更具体地说,它们如何会被扰乱的时候,清晰展现了死亡的重要性。无论是社会位置、制度还是宗教,最初都是人的活动或外化(externalization)的产物。然而,它们历经代际传承,逐渐客观化(objectivated),并具备了实在的地位,作为“社会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最后,人开始将这些意义内化(internalize),并把它们“从客观世界的结构”转化为“主观意识的结构”(Berger, 1990 [1967], p.4)。然而,个体不可能被彻底社会化,完全接受共享意义。伯格主张,“意识先于社会化。况且,它从未被整体社会化,即使没有别的因素的介入,人对于自己身体过程的持续意识也确保了这一点。因此,社会化始终是部分程度上的。”(Berger, 1990 [1967], p.83)这就意味着人始终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筑造世界和筑造自我的活动是或然性的。

<155>

伯格采纳了雅斯贝斯的术语用法,把发生这类状况的时刻称为“边际情境”(marginal situations)。边际情境将我们推至自身生存的边界,迫使我们意识到,人的世界是不确定也不稳定的,而我们赋予自己身体及所处世界的那些意义,其基础也不比人的活动牢固半分。个体面对死亡就是一种重大的边际情境,因为这会彻底侵蚀并质疑日常生活的“认知性与规范性运作程序”(Berger, 1990 [1967], p.23)。换言之,死亡既让个体遭受到人身无意义感的恐惧,也会威胁到社会赖以组织起来的根本预设。对于日常生活中通常采取的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向来如此”的立场,死亡也构成了彻底的置疑(Berger, 1990 [1967], p.43)。

因此,在伯格看来,由于死亡有潜力挑战人们对于其具身性自我和周遭世界的实在感与意义感,所以成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死亡问题的地位也牵涉到人的身体的未完成性。我们拥有的身体积极趋向于维持生存和获得意义,提

[1] 此处原文为“vision”,亦有“想象力”、“幻象”等意涵,在宗教上更特指“显圣”。

供了“奠基性潜能”，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未来的一切文化实践形式 (Turner, 1992a, p.118)。然而，死亡固然是一种必然，我们身体的不确定性却意味着，死亡成为人所面临的一项生存性难题。鲍曼 (Bauman, 1992a, 1992c) 为了概括这一问题，诉诸他所称的“理性的终极失败”：人没有能力调和“心智的约束时间的 (time-binding) 超越力量与其受时间约束的 (time-bound) 肉身外壳的短暂无常”。鲍曼将这一问题置于人的理性，而伯格则认为它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是人类具身体现的整个境况所导致的。人的具身体现的未完成性意味着，自我之死作为一项特殊的问题，呈现于心智。

面对死亡的共享意义体系对于伯格的分析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如其所述，“无论什么社会，都无法回避有关死亡的知识，就此而言，面对死亡，将有关社会世界的实在合法化，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决定性的要求。” (Berger, 1969, pp.43—44) 不仅如此，伯格还提出 (Berger, 1969, p.51)，宗教，或者“通过人的活动创建的某种涵括一切的神圣秩序”，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提供并维持这类合法化。宗教将人们筑造世界的活动合法化，因为宗教所设立的宇宙既超越了个体，又涵纳了个体。在个体面前，宗教仿佛是庞大有力的实在，将生命定位于具有终极意义的秩序之中。个体内化了这些意义，也就超越了自己生活的或然性 / 生命的偶在性 (contingencies of their own life)。如此一来，宗教甚至使人有可能“善终” (good death)，在这种死中，个体到最后一刻依然保住了对于自己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世界的意义感 (Berger, 1990 [1967], p.26, p.32, p.44)。

因此，宗教传统上提供了自我认同的有力源泉，使个体能够将自身及其身体定位于超人身层面的意义结构之中。比如说，在基督教时代的中世纪，节食关系到精神的纯化，关系到对于肉身的支配与弃绝 (Miles, 1992)。难以预测、充满性意味的身体冲动被包含在苦行规制 (ascetic regimes) 的践行中，赞颂灵魂，释放精神 (Turner, 1982, 1984)。不过，在现代西方世界，宗教权威所占据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减。这种趋势侵蚀了社会为人们提供意义体系、使他们能够应对死亡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死亡的前景就有能力彻底破坏人们的实在感，质疑并揭示道，我们与自己身体和所处世界的关系所依据的那些即便是最根本的预设，也有着“内在固有的变幻不定的性质” (Berger, 1990 [1967], p.23)。

伯格基于哲学人类学的这些洞见，着力阐述鉴于人作为“不确定的”物种的具身性构成，个体应对死亡具有重要意涵。而对于如何理解心/身关系，他的研究也有重要意涵，因为它意味着心智之所以要探求意义，正是因为它处于未完成的身体之中。话说回来，伯格也不断遭到批评，认为他的分析里贯穿着人类学的常项。人由于其具身体现的普遍生物性条件，被迫有所作为，并要求确立起抵御死亡之恐惧的屏障。伯格还假定，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物种，除了社会的惯常化建构 (nomic constructions)，自己没有能力维持稳定的存在 (Abercrombie, 1986; Beckford, 1989)。不过按照梅勒的说法 (Mellor, 1993)，这类分析显然存在一点难题：如果我们质疑人类渴求意义这一根本预设，那么伯格的整个理论大厦似乎就非常成问题了。

支撑伯格研究的那些预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没有考虑到：人们对于超人身层面的意义结构的需要可能会随时间变化或文化不同而各见差异。这一点会产生一些非社会学意味的独特后果。梅勒 (Mellor, 1993) 就看到了其中一个后果，他指出，尽管伯格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世俗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于以社会性方式建构的实在的持续合法化产生了哪些后果，但他的分析却似乎要适用于一切社会。换句话说，伯格并不认为，在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正当化机制和维持机制之间，存在任何本质差异。

<157>

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吉登斯的研究提供了第二种思路，同样将人定位于其所处环境之中，使我们能够重视死亡对于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伯格关注的是高度一般性的层面，与此相反，吉登斯更感兴趣的是：现代社会的独特性如何将死亡作为一项特殊的生存性问题呈现于人们。

吉登斯 (Giddens, 1990, 1991) 将人们定位于其所处的当代环境，主张现代性业已涤荡了“一切传统类型的社会秩序，并且是以史无前例的方式” (Giddens, 1990, p.4)。就其变迁的速度、变迁的范围以及现代制度的性质而言，高度现代性将这些变迁进一步推向彻底。高度现代性的境况破坏了传统的意义体系，激励人们增强对于生命、意义和死亡的反思性。在这种情形下，自我认

同的形成与维持就成了现代人面临的一项特殊问题。^[2]

在传统社会,身份/认同是通过仪式活动自动接收的,这些活动将人们及其身体与长久确立的社会位置的再生产维系在一起。而高度现代性则使自我认同成为可协商的(deliberative, Lyotard, 1988)。自我不再被视为同质性的稳定内核,寓于个体体内(Shils, 1981)。相反,认同是通过提出一系列问题,通过不断重组自我叙事,以反思性的方式形成的。而这些自我叙事的核心,正是对于身体的关注(Giddens, 1991)。自我认同与身体成为“以反思性方式组织起来的规划”,必须从高度现代性提供的纷繁复杂的选择中剥离出来,但却没有应当如何选择的道德指引。

吉登斯使用了“生活风格”(lifestyle)这个概念,以说明个体置身高度现代性的境况,如何力求确立蕴含意义、可以信赖的自我认同感。生活风格指的是个体为了赋予某种特定的自我认同叙事以物质形式,选择出的一套相对整合的做法。传统越是丧失其提供给人们安全、稳定的自我感的能力,个体越是必须就各种生活风格选择进行协商权衡,并赋予这些选择以重要性(Giddens, 1991, p.2, p.5, pp.80-81)。

<158> 生活风格的概念非常契合吉登斯将自我视为某种规划的观点。生活风格始终面临个体所处社会位置提供的各种约束与机会,但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迫”采取以反思性方式建构的生活风格,以期维持我们的自我认同。生活风格影响心智,也同样影响身体,其部分原因在于,个体采取特定的身体规制(body regimes),作为其生活风格的组成部分。所谓身体规制,就是切合于培育身体习性的行为规划,这种生活秩序在西方世界已经逐渐普及。以美国为例,在专业人员组成的部分中产阶层里,健康与健身的规制的发展已经到了如许程度,乃至拒绝践行的人会被视为偏离者(Crawford, 1987)。

哲学人类学意味着身体对于个体始终是一项规划,因为人是一种独特的“向世界开放”的物种,要想维持生存,就必须完善自身,完善其所处环境。不过,

[2] 这种反思性与启蒙运动的规划密不可分。如吉登斯所言(Giddens, 1990, pp.48-49),如果倡导理性作为求知之路的力量,自有其悖论所在:“如果理性的领域完全不可动摇,那就没有任何知识能够奠立于不受质疑的基础之上,因为即便是最牢固持有的观念,也可能只是在‘原则上’或‘暂且’被视为正当有效。”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对于自我认同、意义与秩序,高度现代性用一系列追问取代了传统的答案。——原注

在吉登斯的研究基础上,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之下,人们还特别清晰地意识到其未完成性。不仅如此,许多现代个体强调其身体是自我的构成要素,这在许多方面可以视为某种退隐,远离筑造世界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对于有意义地参与社会系统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说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的生活体验就像是骑着无法驾驭的庞大战车(juggernaut, Giddens, 1990),至少身体还可以为个体提供某种“最后退隐处”,这个实体似乎是坚固的基础,能够奠定可信的自我感。这类投入的问题在于,要奠定这一自我规划,身体这种基础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充分。这是因为,身体本身蕴含于技术发展或“抽象系统”之中,后两者已经对我们有关何为身体的认识提出了置疑。^[3]

诚如戈夫曼所言,对于自我认同的维护和他人的评价而言,身体的常规化控制至关重要。然而,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对于身体的控制已经成熟。就此而言,吉登斯认为,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样一种身体观,即把身体看成是自然的“给定”特征,主宰身体的那些过程只在些微程度上受制于人的干预。技术发展专家知识已经侵入了身体,使身体可以被打磨和重构。饮食、锻炼、节欲、休养、静心、护肤等方面的自助书籍越来越多,都体现了身体从自然中的“解放”^[4]。它们也旨在“提供一种驾驭方式,平衡对于既定身体习性的依赖与抽象系统中发展出来的新信息的倾泻(源于医生……整全执行师^[5],饮食调节师等等)。”(Giddens, 1991, p.100)

身体的界限已经从自然界限转向了社会界限,身体现在有了一层“彻底可渗透的‘外皮’,任由反思性的自我规划和外部形成的抽象系统进入”(Giddens, 1991, p.218)。尽管人的身体可能从我们进化发展的很早阶段开始就是一种未完成的实体,但对于身体如何才能算“完成”,当今富裕社会的控制已经达到

<159>

[3] 抽象系统包括两部分,一是货币之类的“符号象征”(symbolic tokens),将交易与其直接背景相分离;二是“专家系统”,即技术成就或专业技能的系统,将大面积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组织起来。抽象系统有助于将社会关系移出共同在场的直接背景,因此需要从这些系统的使用者那里得到大量的信任。——原注

[4] 尽管这些生活风格或曰生活规制的宣传往往打着“回归自然”、“挖掘真正本性”的旗号。

[5] “holistic health practitioners”,提供非传统医疗,透过非侵入性的生物能量疗法,在客户(范围大于病人)的身心多层面问题上工作。以自然疗法师、医师、心理师的健康评估与诊断为基础,透过整全学科的知识与专门技术,维护或恢复客户的身心整体健康。

史无前例的程度。

现代许多个体越来越把焦点放在身体上，视之为自我的构成要素，但西方富裕社会能够对身体实施控制的程度又越来越高，这就孕育了本书序论中最初提到的那种悖论。我们现在有办法对自己的身体实施程度前所未有的控制，但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关于何为身体以及应当如何控制身体的确定性都遭到了质疑。这一悖论背后的基本动力可以追溯到现代性的反思性：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自己身体以及如何控制身体的知识越多，我们有关何为身体及应当如何控制身体的确定性就越是遭到侵蚀。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有关身体及其变动不居的局限和界限，新的信息层出不穷。我们基于这些信息，反复不断地重新考察和塑造我们的身体观念。有关身体的知识从主题、效应到原则，皆在于改变身体（Giddens, 1990）。

这些背景有助于我们说清，所谓我们有关何为身体的知识出现了危机，究竟是什么原因。借用弗兰克的观点（Frank, 1991, pp.39-40），我们不妨把现代性看成是凸显出一种自信：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知识和控制在逐渐增长。随着我们关于医学、营养以及环境对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影响的知识不断进展，身体被视为一种可以了解的客体，为自然科学乃至某些社会科学都提供了某种根基。然而，在高度现代性时期，这种确定性大部分趋于消解。随着我们越来越有力量建构和控制身体，传统上确保我们有关何为身体的知识的那些界限已经开始发生变易。

不仅如此，如果说现代性的“成功”已经削弱了身体作为自然而然、可以信赖的生命基础的地位，那么它也减轻了身体的限制。尽管现在已经取得诸多成就，但随着艾滋病的发展与迅速传播，随着医学界当前未能找到办法治愈艾滋病，甚或不能防御艾滋病毒的感染，我们对自己身体实施控制的能力也遭到了质疑。人们愈益认识到医学知识的局限，最终有可能被归结为一桩简单事实：我们尚未征服死亡；而当代社会也凸显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带来的诸多难以避免的身体危险。艾滋病的问题只是实例之一。

吉登斯的分析意味着，高度现代性将个体置于把死亡建构成一项特殊问题的环境。死亡的前景或许一直都在困扰着人们，但高度现代性境况下的反思性却使人们以新的方式面对这一前景，能够彻底质疑自己对于生活风格和身体规制的关注。换句话说，现代个体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生活在“生存性矛盾”

的情势之中，世界了无生机，但已着手对抗它（Giddens, 1984, 1991）。在这种情形下，吉登斯提醒我们注意克尔恺廓尔的说法（Kierkegaard, 1941, p.147）：我们自己的主体自我之死是一种“绝对的不确定性”，对此我们不能拥有任何内在固有的理解。

这种情形尤其令现代个体感到困扰，因为死亡恰恰代表着这样一个关节：在一个以成功实现控制为取向的世界上，人的控制宣告终结。通过采取以关注身体的生活规则为核心的生活风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自我认同，这样的能力必然以控制为旨归。然而，死亡却是“人类存在最大的外在因素”，是个体丧失对于自身及其身体的控制的零点（Giddens, 1991, p.162, p.203）。

吉登斯关于高度现代性的分析的核心关注，就在于自我认同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使我们能够充分重视死亡的社会学意涵。不仅如此，这种分析还拒绝接受任何人类学常项，而后者在伯格研究中有明显体现。至于有些论家宣称，吉登斯根本没有预设任何基本心理需要，这也未免夸大其词。事实上，吉登斯关于本体性安全感的分析似乎就完全依赖于以下观点：人类确保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的安定的需要至为根本，恒常不易。

本体性安全感指的是一个人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包括自我和社会认同的基本生存特征，都感到自信和信任，相信所见即所得。”（Giddens, 1984, p.375）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获得安全感，就等于拥有“一切人类生活都以某种方式论及的根本生存追问的‘答案’”（Giddens, 1991, p.47）。本体性安全感使人们能够采取“向来如此”的思路来看待社会生活（Giddens, 1984, p.123），但本体性安全感所提供的意义感却总会受到失序或混沌的可能性的威胁。

吉登斯借鉴了克尔恺廓尔的“忧惧”概念（dread, Kierkegaard, 1944），认为人类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面临着被焦虑吞噬的前景，焦虑自身以及周遭世界是否有意义，是否是实在。吉登斯和伯格类似，也认为死亡是个体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会面临的最具威胁的因素，因为死亡之不可摆脱、不可知晓、不可控制，能够彻底侵蚀我们认为实实在在、具有价值的一切。如吉登斯所言（Giddens, 1991, p.50），人对于死亡的自觉意识“维系着最最根本的焦虑”。

如果说吉登斯对于本体性安全感的考察不尽如人意，因为它还是带有关于基本心理需要的预设，那么他有关自然 / 文化关系的分析也是如此（Burkitt, 1992）。在吉登斯看来，人的身体已经从自然领域移到了文化领域。自然依然

有所侵入，但往往只是在生和死的边界地带如此，而生与死已经从公共凝视中退隐，被专家所接管。这里存在某种二元论，将“文化”与“自然”相分离，忽视了身体的进化如何始终融合着生物性过程与社会性过程（Benton, 1991）。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身体越来越向重构开放，但依然为促进这类重构的社会关系和技术进展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身体在何等程度上能够被按照其主人的自我认同加以重构，依然受到肉身的抵抗的切实限制。

但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有损于吉登斯的研究的重要性。相较于伯格，吉登斯更关注现代性让人们面对的意义的的问题，而不是人们普遍面对的意义的的问题。由此观之，他关于死亡、自我认同和身体的分析能够捕捉到高度现代性境况下这种关系的诸多新颖之处。

三、身体之死

使我们能够充分重视死亡对于自我认同与人的身体之间关系重要性的第三种思路，源于前文考察过的埃利亚斯与布迪厄的著述。接下来，我将简要概括他们的著述对于分析死亡所具有的意涵，然后再通过考察死亡在现代社会中的退隐，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些意涵。^[6]

埃利亚斯与布迪厄的著述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层、更为丰满的肉身基础，赖以塑造个体与死亡之间的生存性对峙，从而对伯格和吉登斯的死亡分析有所补足。这是因为，前两者分析的侧重点比较强调个体对于其身体所采取的历史取向与当代取向。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伯格所捕捉到的有关死亡的生存性问题所牵涉的，远不是什么人类作为寻求意义的物种的普遍地位，而是我们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之下，对自己的身体取向所产生的心理问题。

布迪厄凸显了身体在现代性境况下的多重商品化趋势。社会系统融合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场域，将价值赋予不同类型的身体。在这些境况下，人们的自

[6] 有关死亡的退隐的这一分析关注的是现代性境况下的主导趋势（Mellor and Shilling, 199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预先排除少数族群的其他应对死亡的反应。比如说，沃尔特就指出，“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第一代加勒比裔和亚裔移民陆续离开人世。相比于英国白人城市居民的葬礼，他们的葬礼往往要复杂得多，仪式上讲究得多。”（Walter, 1991, p.299）不过，如其所言，这种少数族群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影响现代性下其他群体的仪式。——原注

我认同会越来越维系着自己的身体。在这方面，戈夫曼有关污名的分析尽管有些过度发挥，但还是切中要害，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感很可能受到别人对于其身体的价值的判断所影响。不仅如此，费瑟斯通提出(Featherstone, 1987)，特定身体形式被赋予的价值在当代消费文化中也会迅速改变，诱发有关身体的不确定性。这些发展趋势也会强化个体对于自己身体的反思性，使人们对自己的具身性自我感到根本上的不安。 <162>

不过，在所有这些背景中，价值所赋予的都是有生机的、行动着的身体，对于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来说，老年都意味着身体的符号价值的下降。因此，如果临终的前景使现代个体深感焦虑，也不应大惊小怪。个体的自我认同已经和自己的身体紧密关联，死亡之所以令这些个体不安，原因部分在于，在这个对价值的积累亦步亦趋的世界里，死亡就代表着价值的终结。死亡代表着自我的彻底终结，一旦长眠地下或化为骨灰，就会对作为价值载体的身体施以严厉限制。个体可以努力争取，选择对自己无生机的身体^[7]的处置方式，但他们的努力归根结底依然仰赖别人的行动(Bendann, 1969)。比如说，在人体冷冻术(cryonics)中，冷冻的人体还有赖于活着的科学家找到治愈死亡的办法(Kamerman, 1988)。

布迪厄的分析也让我们有办法区分各式各样的人应对死亡前景的具体方式。伯格和吉登斯强调死亡对于人类构成的普遍生存性问题，但对于这种对峙在人群内部可能如何变异，关注就要少得多。吉登斯倒是分析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诸多差异，但却没怎么谈现代人内部的变异。然而，布迪厄的分析却意味着，现代应对死亡的方式随着个体惯习的不同而很可能有所歧异。比如说，我们可能预想得到，身体在法律角度和生物角度的死亡的前景会因人而异，因为人们投给自己作为符号价值之源的身体的时间与精力各不相同。

埃利亚斯的著述除了关注作为价值载体的身体，还分析了身体在历史维度上的社会化、理性和个体化。身体的社会化指的是我们如何变得与自己作为社会现象的身体相维系，并力求隐匿任何有关身体自然机能的痕迹。但是，即使不考虑现代性中的技术进展，我们也无法回避一桩事实：我们的身体既是社会性的实体，也是生物性的实体。具体来说，我们无法摆脱身体在法律角度和

[7] “corpse”，因为人体冷冻术打破了传统的生死界限观，所以我们在此不按传统译作“尸体”。

生物角度上的死亡的必然性。从埃利亚斯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我们越是将自己的身体界定为社会性的，对于身体规划的投入越多，要应对身体的终点就会越是艰难，越是不安。

<163> 在埃利亚斯的著述中，身体的理性化指的是现代个体对于其情感和身体行动能够实施控制的程度也愈益增强。回顾历史，理性化还包含着身体分划为越来越细密的部位与过程。鲍曼提出 (Bauman, 1992a, 1992c)，这也促进了现代人通过集中精神识别并控制当下的具体限制，从主观上回避了死亡。最后，身体的个体化指的是在西方世界，身体如何被体验为某种“躯壳”或“壁垒”，将个体彼此分离，将个体与外部世界分离。在现代性境况下，随着对于情绪控制的要求不断上升，个体为监督和管理自己的身体投入了更多的努力，但却往往丧失了许多曾经从其身体获得的满足。这些理性化和个体化过程相互关联，其效应也越来越使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只能与其身体孤独自处，更多地思考自己身体的性质。

简言之，不妨认为，布迪厄与埃利亚斯的著述谈了不少现代的趋势，即人们采取越来越强的反思性来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在这一情形下，死亡的前景为何会显得如此令人不安。具体而言，通过探讨死亡在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方式的变迁，也能更进一步探究身体的社会化、个体化和理性化。埃利亚斯认为，我们之所以与身体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原因与人们形成的变动不居的互赖网络不可分离。不过，要说到构成这些网络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类型，埃利亚斯却有些语焉不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探讨死亡在社会中的组织方式，进一步发展埃利亚斯的著述，包括对于临终体验的分析。考察死亡的组织方式的变迁，也会凸显吉登斯论述高度现代性的著述的相关性，以及意义体系对于现代个体的重要性。

四、死亡的可见性

已经涉及死亡历史的那些研究确定的几项主题与身体的个体化和理性化相关，影响到现代人应对死亡的方式。这些主题包括：死亡的组织方式逐渐私人化（或用于死亡的公共空间逐渐缩减）；就死亡体验而言的神圣范畴范围缩减；与死者和生者相关的肉身界限，无论是符号性的还是实存性的，发生根本变易。

这些发展趋势还伴随着并强化了个体对其身体所采取的取向的变易，使死亡的前景对于现代人越来越成问题。

菲利普·阿里耶斯的著述 (Ariès, 1974, 1981) 对于勾绘这些变化来说深具影响。阿里耶斯主张，在晚近之前，死亡始终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事件会产生社群反应，受到集体符号和仪式的限制。每当死亡发生，其意涵与其说标志着个体态身体的逝去，不如说标志着对于社会态身体的扰乱。这里包含着顺应了自身的死亡，承认已经无能为力。不仅如此，由于认同的根源更在于群体而非个体，死亡对于个体的威胁方式并不像在现代世界中那样 (Elias, 1982 [1939]; Walter, 1991)。死亡意味着社会已经丧失了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体丧失了社会 (Bloch and Parry, 1982)。

新教最初并没有激起更大的对于死亡的恐惧，也不曾引发令死亡从公共空间中退隐的现代欲望。不过，它的确倾向于将死亡特殊化，关注个体与死亡之间的对峙 (例参 Douglas, 1977)。赖以组织死亡的符号界限逐渐从社会态身体转移到个体态身体。焦点逐渐远离能够确保社会身体延续的社会仪式，转向能够导致个体“善终”的那些身体管理形式。尽管在这种情形下的死亡依然是一种具有重大宗教意涵的事件，但新教的去神圣化 (desacralization)，或者用韦伯的术语来说，对于大部分现实的除魔 (disenchantment)，有助于为死亡本身最终的去神圣化做好准备。新教教义使死亡更多地成为一种个体现象，也预示了死亡最终被更为彻底地清除出了公共空间。死亡如果还保留着宗教的意涵，它的私人化就不可能彻底，但随着传统宗教信念的衰微，将死亡保留在公共领域中的推动力也就减弱了。

这些事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对于死亡的态度。死亡不再是一种公开的、社群性的事件，现在成了比较隐蔽、私人的体验，其标志就是对于生者与死者的肉身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安。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很可能会与亲朋好友相分离，受制于医学话语和实践技能的专业控制。如鲍曼所言 (Bauman, 1992c)，现代境况下的死亡已经被给予了“在社会空间中自有的位置，一个被隔离出来的位置；它已经被置于自诩拥有科学文凭的筛选出来的专家监护之下。”就连殡葬业本身也被视为一种集体性的“回避人类的必死性”，而不是整个社群以蕴含意义的方式努力应对死亡 (Huntingdon and Metcalf, 1979, p.195)。比如说，不妨把给尸体敷抹防腐剂看成是想要在入土为安或化为骨灰之前，掩饰尸体的

腐坏。林赛·普赖尔指出 (Prior, 1989, pp.161-162), 只有当死亡符合被社会接受的意象/形象, 才能公开展示。传统的习惯做法是在葬礼之前, 在家里停尸数日, 但如今已越来越罕见了。

在死亡的组织方式上的这些个体化和私人化过程, 对于生者与死者身体之间界限的力量具有重要的连带意涵。它们的累积效应就是让许许多多人在应对死亡的时候, 茫然无定, 缺乏社会支持, 容易受到伤害。埃利亚斯提出 (Elias, 1985), 这使人们在与临终之人打交道时踌躇再三。不过, 他在讨论死亡的时候往往过度概括, 其议论或许不适用于每一类人, 比如得了不治之症的孩子。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整体观点依然是有效的。个体没有能力直面自己身体在法律角度和生物角度上的死亡的现实, 别人身体呈现出的死亡也往往会使自己的自我认同变得不太安定。这会导致生者和临终之人的身体之界限增强, 并倾向于回避临终之人:

(我们) 没有能力给予临终之人在告别其他人时最需要的帮助与关爱, 正因为一个人的死亡提醒了另一个人, 自己也是要死的。

(Elias, 1985, p.10)

埃利亚斯指出, 人们往往不情愿触碰临终之人, 潜意识里担心死亡会以某种方式传染。医疗卫生的发展和饮食的改善都意味着, 死亡现在可以被推入我们心智的黑暗角落, 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死亡时刻都很可能相隔遥远, 尽管艾滋病现象使这一趋势又显得复杂起来。临终之人使死亡成为切实、即刻的呈现, 因此人们往往要从情感上和空间上切断自身与临终之人, 将后者定位于医院, 远离日常生活。埃利亚斯指出, “人们临终之时, 从来没有像在今天这些社会里这样安静而卫生, 从来不曾处在如此助长孤寂的社会境况之中。” (Elias, 1985, p.85)

死亡的这种医疗化趋势非常显著地展现了死亡从公共领域中的消失。尽管有关死亡的讨论还是占据着公共空间 (Walter, 1991), 但不妨把医院看成是以制度/机构的形式, 表达了让疾患与死亡的身体迹象从公共凝视中退隐这一现代欲望。把无生机的身体隐藏于医院, 并在细致调控之下, 从医院中转移出去, 都巩固了这一表达形式。殡仪馆的空间组织也有助于实现不让刚刚丧失亲友的人看到尸体的任何直接可见的标志 (Illich, 1976)。将病人送进医院, 死者送

入后台，意味着许多人不得不通过自主选择才能遭遇到腐坏的身体。甚至在临终关怀医院^[8]的实例中也保留了这种组织方式，依然是将临终之人移出其亲朋好友和地方社区。

但是，就在死亡从公共凝视中隐身的同时，对于死亡的表征的需要也愈益增长：从战争纪录片和新闻报道，到镜头老是出现医院急诊室的暴力电影和电视剧。实际的死亡不断移出公共领域，仿佛倒刺激了对于有关死亡的麻醉化“认知”（anaesthetized “knowledge”）的要求。我们每年要从电视上看到数以千计的死亡，或许成了对于我们依然生存于世的空洞证明。

五、死亡的延缓

在现代性境况下对于死亡的组织巩固了生者与临终之人的身体之间的界限，也增强了身体的个体化。不过，对于现代人与临终之人打交道会踌躇再三，以及死亡的医疗化，也可以从鲍曼所称的“维存策略”（Bauman, 1992a）的角度来看。维存策略的特点是通过富于策略地操纵各种生命选择，尝试遏制住死亡的影响范围。人们为了否认死亡的存在，全神贯注于各种旨在确保自身维持生存的规划，越来越把焦点放在维护自己身体的健康上。 <166>

可以说，宗教传统上就服务于维存策略的宗旨。鲍曼注意到，宗教一向致力于想方设法否认死亡的终极必然性质。比如说，在印度教的模式里，死亡被私人化，但又以集体性的不朽来补偿，这种永生的观念将生死关系相对化，以至于不妨视生死为“永生轮替”（Bauman, 1992a, p.2）。基督教对于死亡的否定则是通过主张个人不朽、至少是灵魂不朽来实现的。只要信奉上帝，就能让基督徒相信身体之死并非人之死，从而超越其身体限制（Bauman, 1992a, p.13），而随着基督复临，身体亦将复活。简言之，置信于上帝是一招特别见效的维存策略。不过，一旦这种信念遭到质疑，基督教也就丧失了它让人重新确信死亡蕴含意义的潜能。

鲍曼提出，在今天，比较缺乏宗教应对死亡的维存策略，可以由自我照

[8] 此处原文为“hospices”，注意此词原本用来指历史上出现的救济院、济贫院等机构。在福柯的治理术思路下，这些机构也带有设立后台、制造退隐的意味。

看^[9]的策略加以补偿 (Bauman, 1992a, p.18)。这种策略的重点并不在于身体终有一死, 而在于如何通过我前文所说的身体规划, 克服这些局部化的具体限制。这种维存策略的一个主要特点, 就是普遍关注与健康 and 身体有关的话题。如鲍曼所言 (Bauman, 1992c, p.141), 如果将死亡一笔勾销当做生命目的不切实际, 那么终生健康总是可以追求的。

将身体状况维持在健康有型, 是一项很耗时间的东西, 要求对各种健康风险时刻保持警惕, 在体育馆或健身房里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这让人们没什么时间去思考死亡本身了。当鲍曼说“因自然原因而死越来越罕见”的时候 (Bauman, 1992a, p.19), 他是在告诉我们, 事实上, 如今每一桩死亡都有个人性的说明。死亡已经如此私人化, 如此个体化, 乃至每一桩死亡都被理解为是出于某种特定原因, 比如肺癌、心力衰竭、血栓、肾衰竭等等。如果不经成功确定 (理论上可以防止的) 死因的验尸, 没有任何死亡会被视为彻底终结。

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 这些过程促进了看待无生机的身体方式的普遍理性化。普赖尔指出, “‘死亡率’的性质被没完没了、琐碎不堪地拆分为细之又细的部分……通过越来越复杂的手段加以测量, 比如粗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职业病死亡率、成年比、性别比、标准比。” (Prior, 1989, p.8) 如今我们可能会听到所谓死者的类别, 但按照鲍曼的说法, “我们并不会听到说某人死于死亡率” (Bauman, 1992a, p.5; 1992c, p.138)。这种态度鼓励了现代人戒烟、少吃肥胖食品、开始加强锻炼, 同时又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没看到事实上, 这些东西归根到底都是徒劳无益的。最终我们都难免一死。

所以, 这样将死亡化约为个体性的事件, 有着个体性的原因, 再一次表征了身体的个体化和理性化, 表征了死亡在现代的退隐。对于现代人的感情而言, “死因不明”等于是丑闻, 因为人们不再认识到凡人皆难免一死 (Bauman, 1992a, p.20), 而是力求把每一桩死亡事例都纳入一种特定的医学解释。现代性已经使死亡成为彻底非自然的故事。

在此有必要重申伯格和吉登斯的观点: 个体有关“边际情境”或“决定命运的时刻”的体验使主观上对于死亡的推延成为必然带有或然性, 必然是成问题的。而埃利亚斯的著述使我们能够略微不同地看待这种情形: 尽管身体的理

[9] “self-care”, 关于这个词的基督教历史渊源, 参看福柯《性史》。

性化和个体化或能有助于推延主体与死亡之间的对峙，但它也会导致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只能与自己的身体孤独自处。关注健康和健身的身体规划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投入身体，能够有助于推延思索死亡。然而，当这些规划开始势所难免地出现问题，当身体拒绝遵照其主人的设计被重构，那这种对于身体的投入本身就会促使死亡的前景变得特别切实，特别可怕。

六、死亡与自恋型身体

第四章考察的弗兰克的“行动问题”身体学说，包括一套有关人们对自己身体采取的不同取向的类型体系。这些取向中有一种就是“镜像态身体”，这个概念取自克里斯多弗·拉希的自恋型人格。拉希主张，自恋型人格或许是现代性境况下兴起的主导类型，在此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拉希的研究。自恋型人格可以看成是采取某种特定的身体取向，该取向同时受到埃利亚斯所捕捉到的死亡的退隐过程，以及身体的社会化、理性化和个体化等过程的非常深切的影响。

拉希讨论了当代美国文化中自我认同形成中的一些主导趋势，它们非常重视青春朝气的身体。拉希指出，老年“对于今天的人们成了特别可怕的东西”（Lasch, 1991, p.207）。尽管有理由假定，众生男女始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害怕死亡，但当宗教和神圣范畴所占据的空间大为缩减，人们更推崇青春朝气、面向未来，而不是更注重子孙后代，在这样的社会里，这种恐惧就会特别强烈。死亡的前景无法轻易纳入这类背景框架，因为在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化里，它所表征的恰恰是没有未来。拉希就此点出了一种可能的后果，认为对于老年和死亡的忧惧会产生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欲望，要永葆青春，拒绝接受自己逐渐衰老。对于代际之间的关系，拉希给出的看法阴郁悲观，认为对于子孙后代缺乏兴趣会导致对青春朝气抱以某种暧昧的态度：

<168>

因为老年人不再自视会来世再生，不认为通过子孙后代实现替代性的不朽，也就不会体面让位于年轻人。人们把着青春的幻念不放，直至再也维持不下去，到那一刻，他们要么接受自己已成多余的地位，要么陷入全然的绝望。

（Lasch, 1991, p.213）

老年人渴望永葆青春，但却对年轻人青春朝气的具身体现心怀怨恨。这些态度最充分的表现，就是拉希眼中我们时代的主导人格类型——“自恋型人格”。

自恋型人格“对生育感到浑身不自在”，这不仅是因为生儿育女会扰乱以反思性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生活规划，而且也是由于生孩子会让他们直面自己的死亡(Featherstone and Hepworth, 1983; Hepworth and Featherstone, 1982)。自恋型人格的发展条件，就是在高度现代性时期，置身道德剥夺的境况，这种境况与神圣范畴在现代生活中范围缩减紧密相关。它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他人之间塑造深切或持久的关系，其实也无力如此，力图以此回避对于死亡的恐惧。如果没有形成任何重大依恋，自然也就无法体验到任何重大失落。

在自恋型人格的核心，是一种特别的身体取向：身体是自我的构成要素，朝气蓬勃，长青不老。自恋型身体向新的体验开放，但只要能够轻松挪用并消费这些新的体验，就会增强身体本身对于自我的认识：神圣而不朽(Frank, 1991)。旧的关系与责任被新的能够确证这种自我认识的接触与机会所取代。自恋型人格并不仅限于年轻人，在社会越来越鼓励上年纪的人借鉴的治疗机制和心理机制中，这种人格是一种显著类型：

宣扬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心理学将奋力维存说成是精神的进步，而退休成了新生。如果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觉得难以积累起对抗老年的体验与知识（更不用说钱财了），或是将积累起来的体验传给后人，成长专家就会使问题更加复杂，敦促人们自信四十一枝花，斩断过去的一切羁绊，开启新的职业生涯，确立新的婚姻生活（“创造性离婚”），培养新的爱好，轻松去旅行，不要停下来。

(Lasch, 1991, p.214)

<169> 不过，结合吉登斯的想法，我们可以对这种分析中一以贯之的阴郁悲观提出质疑：拉希把个体描绘成消极被动的行动者，任外部社会力量和现代专家系统摆布(Giddens, 1991, p.175)。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生活的确使人的行动陷于贫乏，但与此同时，它也助长了新的可能性与机遇。吉登斯还谨慎承认，即使像这样斩断过去的一切羁绊，拉希觉得颇为令人担忧，但许多人却会体验到深深的解放感，而不仅仅是那些必然符合自恋型人格的人（比如过去困于压迫性、暴力性关系中的女性）。当然，聚焦于斩断社会羁绊、培养自我和青春

朝气的身体的那些视角与实践，一般也不太可能很充分地说明死亡，因为死亡是如此彻底地摧毁了倡导运动和成长的精神。如果留下的只有自我，也不会剩下任何真能为生活提供正当理据的外在指涉。如鲍曼所言 (Bauman, 1992c, p.40)，只有当有别人赋予自我以意义，自我的延续存在才能有意义。

在这种情形下，艾滋病的现象很可能让自恋型人格深感困扰。艾滋病已经证明对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样致命，并且原因恰恰是长久以来被视为个人满足之主要源泉的性活动。性与死之间的这种关联让富于生机、感官敏锐的身体不得不直面自身死亡的前景。它揭示了作为“终极”欢悦之源的肉身与作为腐坏死亡之源的肉身之间的亲密关联。它让即便是自恋型人格也不得不直面这样的现实：除了拥有身体所孕育的能动机，人还受限于作为身体这一无情事实。

而诉诸死亡的退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与艾滋病相关的恐惧。当死亡与老年维系在一起，自恋型人格可以推延相关的思考，直至那一刻的到来。然而，当人们开始意识到，死亡或许已经潜伏在自己体内，潜伏在自己的性伴侣体内，死亡的现实就变得更加紧迫了。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死亡不再只是呈现于生命的终点，而恰恰就在我们确认生命、创造生命的那些时刻，向我们致言。

七、爱、性、死

撇开拉希关于自恋型人格的具体分析，充满爱恋与情欲的关系开始被视为现代性境况下新的焦点，吸引大量的个人情感投入 (Giddens, 1991, p.205)。在此，主体可以通过向所爱的另一主体投入希望和意义，来寻求推延死亡。不过，按照鲍曼的主张，“爱恋关系的双方都面临着终结的危险” (Bauman, 1992c, p.29)。被爱的一方只是另一个必朽的造物，其生存本身也只是一如寻常地提醒着身体的脆弱与必朽。

用爱作为“维存策略”的做法所存在的矛盾，在性的繁衍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170>

通过性的繁殖这种方法，物种以其个体成员的必朽为代价，保留了自己的不朽。物种的狡计留给自身难以磨灭的印记，有鉴于此，情欲伴侣关系彻底不适于担当个体超越死亡之载体的角色。

(Bauman, 1992c, p.29)

对于作为推延主体与死亡相对峙的一种手段的爱恋关系，老年化身体构成了新的问题。老年化身体力量渐弱，精力渐衰，身体魅力渐褪，在两大方面不利于其所有者：其一，老年身体从公共关注中退隐；其二，由于身体规划的反思性建构与要求最终会遭到肉身的抵抗，老年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态度也成了问题。

如果说身体的衰微 (decline) 与现代性下情欲关系的优先化有所抵触，那身体的衰亡 (demise) 就更是如此了。就此而言，死亡通过艾滋病与性捆绑一体，会是那么不和谐。艾滋病所带来的破坏不仅告诉人们，他们投入其性爱关系中的意义并无法保护他们避开死亡之现实，而且让他们得知，这种投入的焦点本身现在恰恰成了死亡进入其生活的渠道。对于置身决定命运的时刻的现代个体，这种情境凸显的悖论或许就是：生命正是死亡的终极致因 (Bauman, 1992a)。

八、临终之孤寂

埃利亚斯讨论过临终之人所处的孤寂，表现为他们被移出家庭，去往医院，表现为亲朋好友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逐渐疏离，只要临终之人的状况为人所知，他们就不得不忍受这一点。人们觉得不知道该对一个临终之人说些什么，原因部分在于，那些关于维持生存的语言对他们已经不再有用了 (Bauman, 1992c, p.130)。话说回来，在当代西方社会，死亡之所以如此令人惊悚，并不只是因为现代性已经剥夺了越来越多的人容纳死亡的手段，将其置于一个君临万物、具有生存意义的仪式结构中，而是因为历史角度和社会角度发展起来的各种身体取向使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只能与自己身体孤独自处。由此观之，面对死亡时“我们的生存性追问乃是根源于身体的生平历史，从它们生存于世，到它们告别此世” (Turner, 1991a, p.246)。

勒克曼提出，神圣范畴在今天的主导表征，其源泉与指涉都在于个体生存之域 (Luckmann, 1967, p.107)。在这些表征之中，无论是年老还是死亡都不曾显形 (figure)，因为带有现代本质特征的个体朝气蓬勃，长青不老 (Luckmann, 1967, p.114)。神圣范畴的范围从广袤宇宙化减为个体生存的领域，
<171> 不折不扣地反映了死亡的意涵从社会态身体转移到个体态身体。意义和体验的这种普遍私人化趋势，让具身性的个体独自承受着艰难的任务：建构并维护相关价值，以引导他们从生走来，向死走去。

第九章 结 语

<172>

我在分析身体在社会学中的位置时已经指出，这门学科传统上对身体采取了双重思路。该学科很少将重点置于作为独立自在的考察领域的身体，就此而言，身体在社会学中是缺席的。然而，身体虽说很少成为社会学明确关注的话题，但对于工业社会结构和组织的研究兴趣却必然导致社会学要去处理人类具身体现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经典社会学也并未完全忽视人的身体。马克思关于分工的研究和韦伯论述理性化的著述都证明，人的身体太过重要，无法彻底忽略。

而戈夫曼和福柯之类更为晚近的论家则为矫正这种双重思路的某些特征做了不少工作。话说回来，尽管身体在他们的作品里占据了一块理论空间，但这块空间却往往在考察上有欠深入，理论概括上也不充分。比如说，福柯花了很大力气阐述权力如何投入于身体，但我们在他的研究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权力的声音，而有关身体本身却说得很少。这种思路的问题所在，更一般地说，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的问题所在，就是往往将人的身体化约为社会力量。福柯认为身体只存在于话语之中，这种认识论观点就是明证。

当然，如果我们认识到，身体在诞生伊始是未完成的，那么所有的身体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而成的。社会范畴标定了身体，社会控制的饮食影响着身体的尺码、健康与身高，家庭与学校参与了“身体技术”的培育。尽管如此，单单说身体是以社会性的方式建构而成的，并不能告诉我们被建构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只是考虑到身体在相当程度上受社会性方式的建构，但我们的具身体现的某些维度或许比其他维度更易于受到社会的干预。

社会思想的其他一些传统更加集中地考察了身体。不过，我在第二章中指

出，这些传统往往不尽如人意。在自然主义观点中，身体外在于社会，成了前社会性的、纯生物性的基础，建立起种种社会关系与不平等。所以，我在本书中力求强调，有必要重视身体的物质性、生物性和生理性维度。话说回来，有关生物性的身体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自然主义观点既有言过其实之处，又有言犹不及之处。它们假定，可以把社会现象看成是身体的直接产物，无需其他中介，这就是高估了身体的影响。而它们又未能领会到，社会不平等也有其具身体现，这就是低估了身体的影响。

面对社会建构论身体观和自然主义身体观当中显而易见的化约论倾向，晚近有几项社会学研究致力于在这些倾向之间筑造某种桥梁，或者更准确地说，疏通一条道路。康奈尔与弗罗因德的研究就认识到，尽管身体不能完全通过社会因素就解释清楚，但也不能把它当成超越于社会或外在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来分析。更准确地讲，要承认身体是一种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的现象。我建议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人体诞生伊始就是进化过程的产物，既受生物性过程影响，也受社会性过程影响。
2. 随着身体的发展，它逐渐受到社会因素的左右和转化，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3. 身体不仅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也为社会关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并融入了建构过程。

这种身体观意味着，社会学如果要开始把握身体的全部社会意涵，就需要拓展其学科边界。

第五章所考察的康奈尔、弗罗因德和霍克希尔德三人的研究证明，传统上主导社会学的笛卡尔式心身二元论是有欠缺的。不妨认为，他们的研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证明了马克·约翰逊与拉科夫有关知觉与社会范畴之身体基础的重要见解。心智并不与身体相互分离，而是寓于身体之内，与身体密不可分。我们所使用并塑造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活的那些范畴和意象，并非独立于我们的肉身存在，而是牢固地以其为基础。

我在关注作为一项规划的身体时，康奈尔、弗罗因德和霍克希尔德的研究也很有相关性。他们考察了身体的未完成性，从而提供了理据，接受说身体可

以由有关个体和社会系统加以监管和形塑。不仅如此，他们还都指出了人们将自己身体作为规划来处置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有许多变项能够影响个体对其身体所采取的取向，职业位置、社会性别与族群归属只是其中三种。与此类似，如果人们像吉登斯所称的那样，对自己的身体有反思性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那些处在臣属位置的人们，没有培育自己身体所需的时间或资源，会非常容易感到疏离和不满。实际上，在马丁研究女性的重要作品中，已经翔实记录了这些情感 (Martin, 1989 [1987])。

我关于高度现代性境况下作为规划的身体的分析包含了两项初始命题：其一，在富裕的西方世界，我们现在拥有干预并实质改变身体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能力；其二，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身体是一种未完成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生活风格的选择而被形塑和“完成”。视身体为规划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意愿或能力彻底转化其身体。但这种观念的确预设人们一般都知道这些转化性的发展，而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境况下也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即人们越来越与自己的身体维系在一起，关注自己的身体。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人头一批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伯纳德·鲁道夫斯基指出 (Rudofsky, 1986)，不少文化群体和部落群体早就开始将其身份/认同铭刻在成员的身体上。不过，在前现代的社会里，身体往往会在仪式化的场景下被标示上传统的记号，而现代性里的身体则与此截然不同，更多的情况是被当做可以形塑、装饰和训练的现象，以表达个体的认同。

<174>

一、结构化理论中的精神分裂式身体

吉登斯将自我看成是反思性建构而成的现象，这一分析富有启发。我在考察身体规划观念的时候，力求在新的方向上发展这一思路。近些年来，吉登斯的研究经受了细致的核查，令人惊奇的是，尚未有论家比较细致地考察他的身体观（例见 Bryant and Jary, 1991; Clark, Modgil and Modgil, 1990; Cohen, 1989; Craib, 1992）。由于吉登斯的身体观与我在本项研究中始终致力于发展的那种宽泛思路恰成对比，也由于身体构成了对于结构化理论的某种批评，我打算在本书的结语部分首先来矫正这一疏失。

吉登斯最近的理论著述可以分为彼此相关的两大类：对于结构化理论的

进一步完善与辩护；有关现代性的原创分析的进一步发展。结构化理论旨在克服主导社会科学的许多二元论，首要关注的就是克服结构 / 行动之分。对于这一问题，吉登斯的解决之道在于主张，“结构”与“行动”（agency）并非构成某种二元论（dualism），而是形成一种二元性（duality）。“结构”既是社会交往（intercourse）的中介，也是其结果（Giddens, 1979, p.5; 1981, p.171; 1984, p.26）。“结构”并不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而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interaction）中加以利用并就此再生产出来的一系列“规则”与“资源”。

<175> 在某种意义上，吉登斯有关身体的看法是对其结构 / 行动关系观的进一步补充。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人的（再生产 / 生育）劳动的中介与结果。不仅如此，身体既约束着人的行动，也赋予我们干预并改变日常生活流的手段。不过，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一点局限，即未能具体说明我们如何确定，身体分别在哪些条件下约束行动或促进行动。实际上，吉登斯的著述交替着向我们展示了意愿论的身体观与决定论的身体观。

特纳则集中探讨了结构化理论的决定论倾向，指出身体主要被处理成“对于行动的约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外在于’行动者”（Turner, 1992a, p.87）。而吉登斯明确提出，身体是一种“生理约束”，强加给“人类行动者”的运动能力与感知能力以严格限制，这种观点也佐证了特纳的说法（Giddens, 1984, p.111; 1990, p.258）。不过，特纳进而认为结构化理论将身体贬为“约束性环境的一种属性”（Turner, 1992a, p.87），这就说过了。吉登斯说得很清楚（Giddens, 1984），身体既是约束性的，又是促动性的。

我认为，更准确的讲法，是认为吉登斯有关结构化理论的主要作品主要展现的是决定论的身体观。与此相反，他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其中从实质层面考察了结构化理论的核心理论关怀）却展示了一种意愿论的身体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在决定论与意愿论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根子可见于吉登斯有关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概括。如果我们比较《社会的构成》（Giddens, 1984）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Giddens, 1991），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

尽管《社会的构成》将作为有机体的身体定位于自然的领域，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却主张，自然与身体已经被社会和反思性动员起来的自我所殖民化。身体“越来越不是一种外在‘给定的’东西，在内在指涉的现代性系统之外进行功能运作，而是本身受到反思性的动员。”（Giddens, 1991, p.7）在传

统社会里,“身体曾经是自然的一个特性,一些仅仅在边缘意义上受制于人类干预的过程从根本上主导着身体。”它是一种“给定的东西”(Giddens, 1991, p.218)。与此相反,身体在高度现代性境况下变得越来越具有可塑性,“我们开始负责设计自己的身体”(Giddens, 1991, p.102)。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有效确立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Burkitt, 1992),但这种区分对于分析身体既不必要,也无助益。自然往往只是在生与死这两个极点侵入高度现代性。然而,如果我们打算既把身体看成是构筑了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又将身体看成是为人类行动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机遇,那就需要认识到,身体作为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现象,自有其历史。由于千百年来,人类身体正是通过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的相互关联,一路演化而来,它才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行动机遇。尽管身体始终兼具最广泛意义上的约束性和促动性,但我们如果要确定这些特性之间的平衡状况,就需要考察人类在其发展的各个特定阶段的具身体现。

富裕西方世界中的许多人对其身体的控制程度可谓史无前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已经变得可以无限重构。贝克指出(Beck, 1992),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里,我们的身体健康所面临的危险在某些方面已经变得难以计算。核反应堆、食品添加剂、杀虫剂、臭氧层破坏,这些都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对我们重构自己身体的种种尝试视若无物。实际上,科学知识具有不断突破定论的性质,这就大大阻碍了我们采纳的身体规划获得成功。我坚持跑步已经好些年了,因为相信这会帮助我强身健体。可后来我了解到,锻炼的磨损会对我的臀部造成永久损伤。所以我就力行低脂饮食来保障健康,可又听说人造奶油里用的一些添加成分可能会诱发心脏病。单单因为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增加了我们改变自己身体的能力,并不意味着身体的生物性构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176>

这些简要讨论并没有改变身体兼具促动性与约束性这一事实。这其实也是我在本书通篇探讨的主题之一。不过,我们如果要更精确地考察,在特定的历史局势下,对于不同的人群而言,身体的约束性和促动性的具体程度受到哪些条件的影响,就需要考察康奈尔、弗罗因德、埃利亚斯和布迪厄之类论家的研究。

二、重归完整的身体

本书第五章的分析中不乏对于作为规划的身体的洞见，并大致勾勒了一种社会学角度看待身体的整体思路。埃利亚斯与布迪厄的研究也同样可以这么说。这两位理论家都坚持认为，身体是一种物质性和生理性的现象，但也细致探讨了身体如何被种种社会关系所包裹和转化。埃利亚斯分析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型构导致身体的社会化、理性和个体化，布迪厄则分析了作为身体资本的一种形式的身体，两人都富于洞见地分析了身体为何会成为现代人的一项规划，也让我们能够区分人们具体在何等程度上倾向于将其身体作为规划来处置。布迪厄的办法是分析受惯习推动的身体倾向，埃利亚斯的切入角度则是更加强调历史的发展和变迁。

出生与死亡这两个时点代表着人进入与退出社会生活。尽管女性主义论家已经细致核查了历史上围绕受孕、妊娠和生产各阶段的由男性主导的过程，但对于死亡这一主题，有关的理论研究要少得多。但不管怎么说，死亡对于身体社会学其实尤为重要。普赖尔 (Prior, 1989) 已经指出，对于宗教话语、医学话语和社会话语来说，无生机的身体都代表着一个焦点。不过，我在本书第八章中的关注点与其说是无生机的身体，不如说是具身性个体与死亡之间的对峙。在这里，埃利亚斯的著述又一次特别有能力刻画，人们的身体取向是如何能够影响他们应对死亡的方式。对于身体的技术干预或许对我们较为确定地界定身体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但可以肯定，我们对自己身体已经发展起来的那些个体化取向，使我们在面对死亡之时，越来越得与自己的身体孤独自处。

身体社会学只是初临人世，本研究如果企望发展出一套全面综合的身体理论，或许有欠明智。相反，我力求描述并发挥现有的一些研究，以求初步勾勒一种有关人类具身体现的思路，让社会学家未来进行身体研究时可以有所借鉴并且富有成果。在有关自我认同的追问中，在社会不平等的建构与维护中，在各社会类型的构成与发展中，身体都具有核心的关联意义。这项主题太过重要，不容得社会学家丢给自然科学。

新版补论 具身体现、认同与理论

<178>

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撰写《身体与社会理论》一书时，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当时我认为，有必要尝试勾勒一块我们现在或可称为“身体研究”的领域，并凸显既存的一些理论资源，它们都比较重视身体的社会意涵。我还力图提出一套研究具身体现的宽泛的理论思路，能够重视人类身体特性的物质性，为此我选择进一步探讨布迪厄、吉登斯以及埃利亚斯的著述，最后一位也最为重要。而在这篇新版补论中，我还要结合该领域一些非常重要的晚近发展趋势，在分析角度上进一步探讨初版中的三项核心主题。这些主题与该领域当前的争论最为扣合，很能回应我目前有关该主题的研究，对于打造一种充分具身化的社会学的持续努力而言，也凸显了个中的一些独特维度。依照我在本章处理这些主题的次序，它们分别是身体在社会思想中的“缺席在场”，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从理论上推进有关社会中的身体的研究。

这三项主题彼此相关，因为在研究文献中有关自我认同的主导观念中，把身体搞成缺席在场的概念梳理路数依然普遍存在，尚有待在一般性身体理论中充分克服。这类问题更使人认识到，近些年来，对于身体的理论概括陷入了某种僵局。而研究身体的主导思路往往表现为一般性理论，但其实只是围绕着有关具身体现的各种看法来进行概念梳理，这些看法完全不同，但常常同样片面。有鉴于此，僵局也就愈发难以破解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改善这种局面，就需要认识到这些思路各执一端，但又不抛弃它们已经取得的货真价实的收益；我们还要承认，在认同与社会的构成之中，身体是充分在场的。基于这一背景，我引入一套宽泛的框架，筑造更为综合的理论，以便进一步发展我在初版中提出的立场（一方面承认身体作为一种生理现象，在社会行动中有着核心位置，

既塑造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又被后者所塑造；同时又要避免自然主义思路和建构主义思路的本质主义），初步奠定基础，打造坚实的身体研究。

一、缺席在场的身体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批书探讨了与身体 / 社会关系有关的诸多话题，从而为身体研究这一领域的确立铺平了道路（例见 Feher, Naddaff and Tazi, 1989; Freund, 1982; Hirst and Woolley, 1982; Johnson, 1983; Martin, 1989; O'Neill, 1985, 1989; Turner, 1984）。这些分析各具特色，但对于将身体确立为理论关怀的合法主题却是居功至伟。不过，它们在研究议程上也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归根结底，使身体的物质性和感官性臣属于其他因素。具体像是把身体看成被主宰的客体，并致力于将这种身体观融入一套社会系统学说（如特纳开创一片新天地的“核心问题”理论 [Turner, 1984]）；基于某一特定的子学科视角来看身体（如弗罗因德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意涵的出色分析 [Freund, 1982]）；通过身体来确立社会学、生物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对话（如赫斯特和伍利合著的未受应有重视的《社会关系与人的属性》一书 [Hirst and Woolley, 1982]）。诚然，这类论著的成就无可置疑，但身体往往被臣属于或受限于其他这些关怀。身体在理论写作中的“缺席在场”依然是个切实存在的问题：尽管身体已经毫无疑问地刺激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但依然往往淡出视线，以方便更为传统的分析焦点。

当然，这种缺席在场并不新鲜。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中的主导哲学思路始终推崇思考着的心智，将其置于物质性的肉身之上。有关身体的著述一直在和这类思路作斗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在某个层面上就蕴含着对于一切身体感觉的拒弃。他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主张，“我……就是思考着的那个东西”，“我的心智……完全地、确定地有别于我的身体，没有身体也可以存在”，我们的身体会使我们趋向非理性的情感与冲动（Descartes, 1974, p.105, p.156）。不过，这种对于身体的贬毁也有其例外。蒙田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就认为，“我们的人性的一部分就在于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情承担责任”，并致力于限制抽象思维的真理诉求（Toulmin, 1990, p.40）。但不管怎么说，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要考察到身体，往往只是因为它妨碍了据

说是超验性的心智之力。因此,康德会主张(Kant, 1985[1797]),身体激情与情感是对自决行动的阻碍,并认为道德取向乃是源于人类内在固有的能力:超越欲望,遵循普遍“绝对律令”。所以说,身体在这些作品中并没有完全缺席,但却遭到种种怀疑,相对于据称具有自决力的心智,往往被边缘化。 <180>

经典社会学感兴趣的是工业社会的运作,现代人的生活,以及支撑这些现象的基本过程,因此,它会更积极正面地关注有关具身体现的话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说,涂尔干把自然态身体说成是凡俗的,但也主张,历史上围绕人的肉身和体液进行的仪式活动意味着,身体“深处隐藏着某种神圣原则,会在特定的情势下迸发出表面”(Durkheim, 1912 [1995], p.138)。这些迸发通过切割、牺牲、文身、描绘或其他形式的装饰来展示,确认了诸个体在某个共享道德整体中的共有(communion),从而有助于将社会维系一体(Durkheim, 1912 [1995], p.138, p.233)。在经典社会学中,这样直接讨论身体并非仅此一例。不过,这些直接探讨并没有解决身体缺席在场的问题,因为具身性主体的总体性往往散成碎片,淡出视线。比如说,从孔德、涂尔干、韦伯到齐美尔,从“欢腾依恋”(effervescent attachments)、“道德情感”、“生机能量”、“情感行动”、“前社会”成分、“心理反应”、“激情”到其他相关现象,已经留给我们丰富多彩的分析。这些分析力求说明人们如何被驱向或疏离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何为身体以及有关具身体现的生命体验产生了明显的效果(Shilling and Mellor, 2001)。不过,这类概念也往往事与愿违,助长人们疏漏了身体其他方面特征的概念意涵,常常暗度陈仓,让人们能够将身体归入社会系统、大都市、分工协调之类“实际的”关注话题。帕森斯这位社会学传统的伟大梦想家,他的研究就是上述趋向的典型例证。他把有机体说成是社会学的“单位参照点”(unit point of reference)、“忽视它必然带来危险”(Parsons, 1991 [1951], pp.541-542; 1969, p.13),但又主张,身体的社会意涵是由社会所赋予的。基于这一背景,帕森斯才能够认为,健康并不主要是生物性身体的一种属性,而是指个体能够贡献于社会的生产性资源的“潜在能力”(Parsons, 1991 [1951]; 1978, p.21, p.81)。

当然,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当代,身体对于个体、群体和国族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经典著述毫无用处。无论如何,至少有必要回顾经典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述,阐明其中隐含的有关具身体现的学

<181> 说,并作进一步的发挥。多年来我在这一领域用力不辍,核心宗旨就在于此(Shilling, 2001, 2002a, 2002b, 2003, 2004)。还有必要认识到,身体研究显然一味注重社会性的所指(无论关注的是性的文化理解,精英的体育运动,还是人的生理特性的商品化),非常容易将有关人的身体特性的讨论剥离我们的血肉、骨骼、感官,趋向非具身性的视角,注重组织、技术或其他方面的因素。晚近该领域的许多发展趋势依然明显存在这一问题。

徒具其表的身体

如果说哲学赋予身体的内涵颇具负面意味,经典社会学又没有能力让人的身体特性充分回归概念景观,这就给致力于赋予身体更具理论生产潜力的意义的当代论家们留下了相当的运作空间。实际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身体成了一个确定性不足的概念,有能力作为颇具可塑性的能指,“替代”一切,除了自身。不同的理论竞相以彼此对立的方式界定身体,赋予其相互抵触的角色。在研究消费文化的理论家眼里,身体就是一种表面现象,已经成为颇具可塑性的商业价值标志,受制于变幻不定的时尚。在女性主义者眼里,身体就是一种性别化的客体,被用作证明女性臣属地位之正当性的手段。在分析治理术的学者眼里,身体是一种被变动不居的控制模式弄得消极被动的客体。如果关注的是随着“半机械人”(cyborg)的发展,肉体与机器趋于汇合,那么身体就变成了前技术时代文化的残余,前途难卜,甚至正迅速消失。而如果关注的是发展一套新的普遍伦理体系,身体的脆弱性就成了它的规定性特征。如果各路论家只是一门心思在各自学科内部探讨问题,身体甚至会被化约为一种正面肯定的概念范畴(即能够说明此前被某种理论边缘化的现象的范畴)。

在这种情形下,“身体”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不稳定、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有关身体的分析成了某种思想战场,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社会生物学、社会学到文化研究,各自的主张在这块战场上打得不亦乐乎(例参Howson and Inglis, 2001^[1])。身体被捆绑上彼此竞争的研究议程,变得几近一种隐喻,经此再去分别追求特定的关怀。身体成了各说各话的东西,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概念梳理,似乎不存在任何共识。不过,当身体被捆绑到这

[1] 此书在书后参考文献中未能补上,应为Howson, A and D. Inglis, 2001 "The Body in Sociology: Tensions Inside and Outside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Sociological Review*.

些研究议程上，它的身体物质性不仅属于这些议程，而且常常在理论视野中消失了。朱迪斯·巴特勒就是明证。她在分析有关性的文化强制时，试图通过“异性恋基型”（heterosexual matrix）这一概念，将身体置于分析的核心。巴特勒通过“展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观念来推进其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社会性别化的身体“除了构成其实的各式表演（act），别无本体性地位”（Butler, 1990, p.136）。这类思路最终将导致我们的具身性存在丧失其肉身物质性。巴特勒本人也承认（Butler, 1993, p.ix, p.29, p.68），原本是想考察身体的物质性，结果却发现自己移向了其他领域，“依然没能把握该主题”。<182>

身体的这种淡化趋向反复呈现于不少论著，它们把人的身体特性完全概括为一种定位场所，各类结构、文化或关系在上面打上自己的“印记”，“铭刻”自己的效应，或是“欢迎”主体归来。如果按照如今那么多身体理论依然奉为圭臬的那种观点，身体“始终已经”被赋予各种话语，受到社会的结构安排，那么把焦点放到这些肉身之外的因素上，也就完全是合法正当的了。然而，我们不当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思路还算是对人的身体的肉身物质性真的感兴趣，或能够非常正面地探讨。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身体如何能够不仅成为各类“社会形式”的定位场所，而且还能成为其源泉（哪怕其中有些“形式”已经僵化，脱离了奠定它们的那些欲望和性情倾向），那我希望重申我在本书初版中提出的主张。要想克服身体在社会思想中缺席在场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身体处理成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现象，既受当代种种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形塑，又不能化约为这些社会关系和结构。相反，如果剥离了身体自身的历史和特征，就等于无视我们的具身性存在如何使我们能够重塑周遭的世界，并以此重塑我们自身。

二、身体与自我认同

听任身体成为缺席的在场会产生许多有害的后果，并不仅限于有关身体研究的内涵与活力的抽象理论争论，还直接涉及本篇补论的第二项主题：对于自我认同的概念梳理。在刺激身体论述的争论当中，有关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属于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争论之一，干扰了好几种学术流派的信念。要说明这一点，不妨来分析和比较启发该领域众多争论的三种思路。

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操心自己身体的外表、尺码、体型、气质和表现。而身体在消费文化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更加剧了这种趋势 (Featherstone, 1982)。在这种文化中，青春朝气、有型有款、性感十足的身体似乎被偶像化为蕴涵神圣意味，只想暗示我们，其实我们人人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可是，这样一种身体观似乎进一步凸显了将人的身体特性视为某种缺席在场时带来的一个问题：它完全无法应对任何以肉身及其值得想望的性质为核心的文化或认同。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这样来诊断身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近些年发表的有关身体体验现象学的研究中，最有力的一些实例恰恰倡导缺席在场的身体。就此而言，我希望在本节开头首先来考察德鲁·莱德的潜势态身体 (latent body) 学说，因为它反映了一种传统理论观点：“正常”情形下，身体处于我们的自我认识的边缘。这种观点在西方哲学中非常流行，而在当代许多社会思想中依然颇具影响。然而，莱德一书的批判质询却凸显了这种探讨具身体现的思路的问题。然后，我将转而论述作为“规划”、“选择”和“规制”的身体（这些彼此相关的认同观念在某些方面与莱德的分析恰成对比）。再接下来，我将考察两种彼此对立的“作为面具的身体”观点。结尾一节我将分析一些一般性的根本过程，不妨认为，正是这些过程形塑了人们如何追求各式各样的具身性认同。

三、自我认同与潜势态身体

莱德在其《潜势态身体》(Leder, 1990) 一书中勾勒的自我认同概念，乃是以下述观点为前提：支配着我们现代生活的行动往往是合目的行动，当个体从事这类行动的时候，身体对于他们来说保持潜势的状态。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乃是基于现象学与解构主义这一看似不太可能的组合。莱德的出发点就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Merleau-Ponty, 1962)，聚焦于我们给定身体的奠基性体验：我们身体的习性与惯例提供给我们“生存其中的载体”，以及我们必然片面的对于世界的“观点”^[2]。不过，莱德同时又借了解构主义的主张，即任何在场都有赖于相对应的缺席，从而提出，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既不是“有血

[2] 原文此处为“point of view”，强调的是观看之点，因此必然是局部性的。

有肉的饱满身躯”(比如它忽视了内部器官之类我们身体的“隐性”特征),也不能使我们理解肉身缺席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造成的重要后果。关于肉身缺席的这个话题对于莱德的命题尤其重要。

由于现代世界倡导并奖赏结果导向的理性行动,我们无论是职业生活还是休闲活动都忙着追求外在于我们身体的目标。我们可能忙着写作业,在客服中心回答投诉,或是在球场上射门得分,但当我们不假思索地与物质客体或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却很少明确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相反,它们逸出了视线,从自觉意识中消失了:

每当我埋头读书或是陷入沉思……我就感到像是沉浸在观念的世界里,很少注意我的身体感觉或姿势。但这种遗忘也不仅限于高层次沉思的时刻。我可能会进行某种剧烈运动,肌肉紧绷,随时准备回应对手的一举一动。但我的注意力所在,恰恰是这个对手,这场比赛,而不是我自己的具身体现。

(Leder, 1990, p.1)

有好几项因素促成了这种肉身缺席的状况。首先,我们通常会对自己的身体发出实践命令,使我们能够执行走路、谈话和阅读等行动,却不曾思考身体本身。其次,这种想当然的实践命令也适用于专业的工作技能或运动技能(Leder, 1990, p.33)。比如说,一个合格的/有资格能力的(competent)网球运动员会在球场上灵活地移动击球,而无需自觉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再次,投入任何活动的过程,比如读一本书,都要求将无数的技能和运动方案保持在停用状态。实际上,在感觉周遭世界的一般过程中,“知觉器官置身被领会的东西中间,保持在缺席或无用的状态”(Leder, 1990, pp.13-26)。最后,我们的内部脏器也例证了“深度的消隐”(depth disappearance)。比如说,我们可能患上了危险的高血压或高血脂,却对我们的状况浑然不觉,只要它们不对我们的读书或运动造成任何干扰。因此,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带给我们的“所见”^[3]不同,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我们的内部器官“却以区域开口为

<184>

[3] 原文此处为“view”,当然,我们日常所表述的“看法”、“观点”、“见解”等,都带有视觉中心主义的意味。

标志,这些器官尽管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但无法通过身体感受来领会”(Leder, 1990, p.26, p.43, p.53)。^[4]正因为如此,才必须训练医生解读身体的细微迹象,那可能是更深层的问题的征候。

但是,这些说法都不等于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消失了。身体依然是我们的“肉身背景”的一部分,只是通常隐没于我们生命体验的背景之中。不过,即使说功能运作正常的身体从我们的自觉意识中隐退,莱德也认识到,“失足跌倒”或“笨手笨脚”^[5]所导致的疼痛、疾病或窘迫(Goffman, 1956)也会使身体以复仇的姿态复显(reappear)。

1. 病显或复显的身体

莱德借用希腊语的前缀“dys”(表示“坏”、“难”或“病”,变形后可用于“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之类的词汇),用病显(dys-appearance)这个术语来指身体复显为我们的体验的主题焦点和感觉焦点,但却是以生物学意义上病态的或社会意义上偏离的形式(Leder, 1990, p.84)。与我们通常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截然相反,病显使我们与社会世界相疏离,把我们重新抛回属于自己身体的有限世界。

透过疼痛这个实例,我们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这种病显或复显。突如其来的疼痛能“让我们屏住呼吸”,彻底撇开我们正从事的活动。剧痛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要寻找痛源和痛因。身体不再是前台行动的后台中介,我们会迷失在疼痛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高度受限的身体意象,感到阵阵的烧灼、刺痛(Scarry, 1985)。我们的首要目标就在于清除这种疼痛,摆脱身体的病显,恢复正常功能运作的状态,那时的身体是从我们的思维和经验中退隐不显的。

[4] 用生理学的术语来说,我们的**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即我们的肌肉、关节、韧带中的本体感受器以及内耳所提供的平衡感、位置感和肌肉紧张感)提供给我们有关世界的关键信息,以及如何利用与世界打交道的不同模式的选择,但在我们现象学意义上的生命体验中却是隐没不显的。考虑到我们的**内感受**(interoception,即我们的内部器官的感觉)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这种缺席就更为明显,它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我们身体和外部世界的描绘只是泛泛的,延时的,不精确的(Leder, 1990, pp.41—43)。比如说,从饮食不健康到导致心脏病,或者从吸烟到导致血栓或癌症,妨碍我们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可能要过好多年。——原注

[5] 原文此处为“slip”和“graffe”,通常可译为疏漏、闪失等,这里保留其身体(出问题、失调)的意涵。

疼痛并不是导致这种身体复显的唯一感觉。在性的激情面前，或是置身恐惧之类其他强烈情感的背景中，我们的理性计算会被情感态身体彻底淹没 (Smith, 1992)。突如其来的感觉或身体事变也会导致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体的某一特定方面。为此莱德举例，当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却又难以置信，就会揉揉眼睛，眯缝着调整焦距再看。乍遇初潮，猛然失声，亦皆可为例证。在这些例子里，特定的身体“状况”突入我们经验与认同的前台（例参 Prendergast, 2000）。

<185>

这种充满疼痛或情感的身体病显还有一种社会等价表现，当社会互动被扰乱时，就会出现对于身体的自觉意识。戈夫曼 (Goffman, 1956) 在这一点上尤具洞见。他提出，互动的有序流动一旦被打破，像是因为姿势不妥或表达不当，冒犯者就会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窘迫往往随之而来，并伴随着口干舌燥，肌肉发紧，微微颤抖，最后导致社会日常接触被扰乱 (Goffman, 1956)。当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调适出现断裂，对偶组 (dyad) 被拆散，日常接触被削减为两个孤立自处、笨拙尴尬的身体，个体就清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病显。社会病显的效应并不仅限于窘迫和互动受扰，甚至会导致疾病 (Leder, 1990, p.99)。比如说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前者维系着对于女性要实现“理想”类型的文化压力，后者则维系着一个特定社会中的诸多张力，因为这个社会既推崇生产劳动又倡导享乐主义消费，其中涉及的身体活动彼此对立 (Bordo, 1993, Turner, 1984)。

不少著述力求让相对持续的身体感受成为人们自我认同的核心，对于它们来说，莱德关于潜势态身体的分析构成了彻底的挑战。不妨认为，他的研究意味着身体在当代成了人们的自我感中比较不重要的因素：在个体赖以获得并发展其认同的那些外在活动和社会角色中，身体往往是缺席的。至少可以说，莱德的研究提供给我们一种成熟的现象学理解：纵观历史，西方哲学如何扬心智而抑身体，使我们成其为人类和道德行动者。如果说在深思之时，身体退出视线，那么抽象思辨的哲学关怀会贬低身体的重要意涵，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莱德有关潜势态身体的见解尽管看似激进，但与社会学传统中最为传统的一些人物之间，还是有着强烈的回应的。说到结合合目的行动的受扰来梳理疾病和疼痛概念，莱德并非始作俑者。帕森斯 (Parsons, 1991 [1951]) 将疾患联系到正常社会角色的功能顺利运作受到扰乱，并预料个体会寻求帮助，以便让功能

<186> 失调的身体不显。实际上,莱德的命题所起的效果,就是为经典的现代性观念,即现代性作为一套以合目的行动者的协调与整合为标志的系统,提供一种肉身理据。

2. 解构潜势态身体

采取解构主义的思路来探讨身体,尽管会有颠覆性的效应,但由于揭示了它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使具身体现的某些特定特征成为可见(或不可见),因此这种思路本身也会被解构。在莱德看来,当身体忙于合目的行动,它就是不可见的。但他又提出,“恰恰是因为正常的、健康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不显了,身体的直接体验才偏向于功能失调的时刻”,这样的主张似乎是基于那些正当中年的异性恋健康男性的体验。实际上,莱德(Leder, 1990, p.86)援引了扬的观点(Young, 1990, pp.147-148, p.163),即女性的身体往往不像男性的身体那样不显,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对于女性来说,所谓超越性,也负载着内在性。以怀孕为例。这是主体的“加倍”:界限与身体形象发生转换,经历流变,但“意识到我的身体臃肿不堪,沉重至极,也并不妨碍实现我的目标”(Young, 1990, p.163, p.165)。不过,莱德的核心命题依然不受触动。这里并没有什么意思要说,身体在其正常状态会变成一个重大且持久的关注焦点。

这一命题的问题就在于,有些人的身体通常会凸显于前台,作为这些人身份/认同的本质组成部分,而该命题却往往将这些人边缘化。种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效果,就是让那些受影响的人对自己的肤色产生深切的自觉和不安(Fanon, 1984 [1952])。无独有偶,研究性问题的理论家们已经指出,那些不遵从异性恋认同的支配性规范的个体,会被塑造成自感与其外表和行动相疏离,必然时常自责所作所为,以求得个人的安定感(Diprose, 1994)。那些经历过/体验到(have experienced)明显的上向流动或下向流动的个体,也常常会对自己的做派和外表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是在与不熟悉的社会环境和新的身体习语词汇进行协商(Goffman, 1963)。事实上,布迪厄(Bourdieu, 1984)把这类不自在归为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根本特性,这个群体对上等人的身体举止满怀敬意,一心渴求,自己又没有办法比较自如或自信地达到这种境界。不过,莱德并没有进一步扩展这类例证的意涵,他似乎假定,在人们的身体惯习与他们所居处的社会场域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契合。

这种肉身潜势观也没有考虑到,近些年来,身体有可能已经变成一种规划。相反,在莱德看来,身体会变成一项规划的重大的时刻,就是当疼痛的必然要求引起个体的注意。这就又提出了关于文化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的问题, <187> 这构成了莱德的分析的背景,尽管已然隐退其中。对于全球各地千百万人来说,饥饿、疾病和恐惧是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内容,进入了他们身体的“正常”状态。在此,谈论功能充分运作的健康身体的兴起作为复显而不是不显的过程,或许更为适用。^[6] 不仅如此,从早期、中世纪到现代早期的基督教政权/规制(regimes),都提倡持续监管肉身,哪怕方式各异,而这同样不能轻易用来支持所谓正常身体缺席的观念(Mellor and Shilling, 1997)。某些运动能力受损的人的体验也对支撑莱德分析的那些预设提出了质疑。比如关节炎患者,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体验为长期功能失调,习以为常地将自己四肢的运动置于前台,结合每一次迈步、每一次跳跃、每一段斜坡、每一处扶手,看似反应过度的衍生意向,要把四肢用作蹦跳或攀缘的支架。而在更为凡俗的层面上,饿、渴、累、烦、憋、涨,吃喝拉撒的循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标志,都在例示着身体是多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意识。

当然,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潜势态身体的观念还是对身体研究领域提出了强劲挑战,并大大有助于说明身体的某种特别的现象学经验。莱德的著述业已启发了健康与疾病社会学中的重要研究,并有助于说明社会理论为什么有时会有所取舍地聚焦于具身体现的特定方面,比如视觉,这种聚焦促使人们的具身性认同的其他特性趋于不显。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打算考察身体对于人们如何能更加持久地凸显于前台,不妨转向另外一些彼此密切相关的分析:身体作为“规划”,作为“选择”,作为“规制”。

四、身体作为规划、选择和规制

如果认为,人们通常都会参与身体规划或身体选择,有些人还曾经耽于身

[6] 还有一个问题与此相关,就是采用莱德的来分析来阐述慢性病,考察当身体从病显状态回归重新具身体现的状态时涉及的生平叙事工作。患者谈论的往往是重新找回或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但莱德有关生命态身体的观念却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说法,因为它把正常的生命态身体看成是不显的身体,而非复显的身体。——原注

体制制的要求，这样的想法就与所谓我们的身体自我处于潜势态的观念直接对立。这是因为，这些身体认同观念都意味着，从肉身的尺寸、体型、外表到感官体验等等，都是我们有关自身的形象的不可或缺之要素。在这三种观念中，身体都被当成一项事业，有待依照发展中的自我观，施以作用，加以改变。鉴于身体规划观是《身体与社会理论》初版的核心主题，而我又和梅勒在《重塑身体之形》(*Re-forming the Body*)一书中，对身体选择和身体体制制的观念做了发挥，因此在这里，我不打算再花很多时间来详述这些观念。不过，出于比较的目的，还是有必要概括一下它们的主要特征，阐明并推进它们的理论基础。

<188>

1. 身体规划

身体规划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了吉登斯(Giddens, 1991)的观点，即在当代这一“高度现代性”时期，自我业已成为一种以反思性方式组织的建构；以及韦伯有关理性行动的非理性后果的考察(Weber, 1991 [1904—05], 1948 [1919])。概言之，吉登斯认为，晚期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在于，技术控制获得了质的进展，对于消费的关注大大强化，身体在其中成为自在成立的核心培育对象。莱德所讨论的那种合目的的、外在导向的理性行动，已经向内转为蕴含了身体作为一种关注对象。与此相反，韦伯关注理性行动的非理性后果，提请我们注意到，如果现代世界的典型特征就是此前影响人们如何发展其具身性认同的那些道德标准的缺失，那么合目的地干预身体如何会变得毫无意义。随着身体成为一项规划，莱德所指出的干预的有限所指（比如基于清除身体疼痛）就发生了大规模扩张，开始脱离固定目标，遭受变幻不定的时尚的影响。

高度现代的世界的两大特征对身体的这种愈益凸显的地位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其一，那些宗教、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宏大叙事”，曾经结合来世或共产主义之类的某种超验总体性，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意义，而今这些“宏大叙事”皆已衰微。而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主掌北美英伦的右翼政府的继替，占有性个体主义^[7]兴起，更增强了这种发展趋势。其二，当代似乎越来越“无法控制”(Giddens, 1990)。在这种情形下，身体被视为个体还能施加影响的某种最后

[7] 此处原文为“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出自C. B. 麦克弗森，亦译“持具性个人主义”或“拥占性个人主义”。

的“原材料”。身体受制于其程度前所未有的理性化，如今被从基因、血压、血脂、尺码、体型、外表、有氧能力(aerobic capacity)、肤色、体重及其他一大堆变项来看待并施以干预。如此一来，它们就像是提供了牢固的基础，赖以在现代世界中建构值得信赖、富有意义的自我感。

对于有机体的理性化干预的非理性成分和局限也影响到身体的这种愈益凸显的地位。纵然是在富裕人群中，增强身体控制的潜力也始终受到牵制，因为关于人们应当如何对待自己作为一项规划的身体，缺乏终极纲领。因此，尽管现代性提供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干预并改变我们的具身性自我，但它也激发了一种长期持续的反思性，使得人们更加难以解答我们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做出这类改变的问题(Weber, 1948 [1919])。而我们的身体存在还有一些方面依然不属于科学的能力所及，它们也限制着增强身体控制所能得到的好处。比如说，尽管新型生育技术颇多进展，但不生孩子依然是一个不容小觑并且还在加剧的问题。身体还常常拒绝依照我们的意向被塑造。节食期间减掉的体重，超过95%会重新长回来，而身体更会降低卡路里的消耗速率，贮存更多的脂肪，以防御未来的“饥饿”期，就这样对节食做出反应。因此，身体规划也会产生非理性的后果，使得所欲求的身体理想更加难以实现。广而言之，所有的身体都会老去，腐坏，死亡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在这个迷恋身体的现代，这些都显得尤其令人困扰。在长跑的撞击之下，我们的臀部废了；但我们可以告慰自己的是，转向严格的饮食规制，定期的健身锻炼；然后是各种损伤找上我们，我们不得不转向游泳；再往后，或许是肌肉拉伤中断了这项活动，我们开始接受一项看似沉思冥想但依然很累人的规训——太极拳。当然，会有一些短期逆转，但身体的逐渐衰退依然持续，随着我们慢慢变老，越来越难以找到办法，让血肉之躯重新焕发出青春。 <189>

不过，无论身体规划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们也不太可能“退回后台”。实际上，晚近的技术进展会通过创造出**身体选择**，进一步增强这种对于身体的聚焦。身体选择作为彻底的身体转化形式，或许会使身体规划中涉及的“酸甜苦辣”变得过时。

2. 身体选择

身体选择可以界定为受技术启发的重构人类具身体现的方法，它通过直接

而彻底地进击与作为一副身体相关联的限制,拓展了与拥有一副身体相维系的可能性(参看 Mellor and Shilling, 1997)。比较单调平实的身体规划帮助我们探索生活在一个身体中的可能性,而与虚拟现实和电脑技术维系在一起的那些选择则让我们看到,未来有可能探索甚至占据多个身体,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实质的变化。

这些发展趋势中有一些在于未来,还有些有待充分实现,但已经有了一种可能性,即有朝一日,一个身体在其一生之中会被彻底重构好几次。纳米技术就有潜力提供微型机械,投放到我们的血管中,进行动脉修复或分解血脂淤积(Rucker et al., 1993)。而将电脑芯片移植到大脑中的可能性发展到极致,也可能让我们掌握新的语言,有能力每秒进行数百万次数学运算,能够在刹那之间处理并展示海量数据(Tomas, 1991)。虚拟现实很可能在朝夕之间就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变迁(Benedikt, 1991; Rheingold, 1994)。通过一台电脑与其他人相联结,受与电子图像相关联的紧身衣反应的激发,就可以在午饭前偷空穿上一套“虚拟装束”,扮作一个追逐星际战舰企业号的博格族人,打上一仗,晚餐前参加一场以古罗马为背景的狂欢,最后,在一天结束、上床睡觉之前,还可以扮成玛丽莲·梦露,和非德尔·卡斯特罗安静地喝上一杯。

身体选择的社交潜力可以借助让·布希亚有关“符码”的讨论(Baudrillard, 1993)来挖掘。从这个术语可以看出,布希亚认为技术在理论上有能力清除确定、绝对和对立。从我们的行文宗旨来说,最好认为符码属于某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场景,此时自然已经被社会技术程序和制度控制并吸纳。不过,在生物学的DNA编码、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电视和录音的数字编码中,已经可以找到这种意涵的当代例证。这些符码都深具潜力,仅仅需要通过生产或模拟来复制或仿造客体,让我们已有的能力变得过时。事实上,符码已经使“原创”的复制成为可能。

原创性的这种再生产通过人工进化之类的技术实施运作(Kelly, 1994),最终能够使人类生活完全具备自我指涉性,一切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外在于我们的复制能力(Robins, 1995, p.144)。我们被告知,如果科学获得了通过低温技术或单细胞技术复活生命的能力,就连死亡有朝一日也可能变得过时(Kimbrell, 1993)。用布罗代尔的术语来说(Braudel, 1973),个体时间将能战胜属于长时段的进化时间。身体选择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灵活可

变，这也破坏了所谓“独一无二的身体”，从而挑战了当我们说作为一个个体时所维系的那些传统特征。按照伊安·瓦特的说法(Watt, 1957)，启蒙运动思想所接受的那种个体性原则自有其前提，依赖于有可能撇除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而确定一个人的独特性。而身体选择如果发展到逻辑上的极致，则有可能清除任何诸如此类的连续性。有朝一日，一个个体从一个场合到另一个场合，在尺码、外表、性情甚至生理性别上都可能不再类似于他/她自己。

不过，我们在被身体选择的新颖别致迷住之前，先有必要认识到，它们也可能只是加剧了与身体规划相关的那些问题。身体选择使人们能够利用的选择方案数量大增，频率猛升，也造成了威胁，使个体对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方案和已经确定的选择方案感到不满意，同时也觉得不安适、不自在。有必要指出，即便是社会学家所探索的最令人称奇的案例（例如 Featherstone and Burrows, 1995），也是基于此前在建筑、温控、交通等方面的创造发明，能让人们摆脱其气候、环境和邻里，增加对其身体环境可以实施的控制程度(Sennett, 1994)。最终或许可能难以区分人和机器，但人们通过改造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早就已经改造了自身(Marx and Engels, 1970)。实际上，人们早就开始投入与当代的身体规划显著类似的一些实践活动，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世纪曾经作为确立自我认同结构的流行方式的那些规制，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191>

3. 身体规制

形成中世纪的惯习的那种环境，其典型特征便是暴力、疾病与食物匮乏，这显然不利于采纳旨在培育“身体之美”的习惯(Elias, 2000 [1939])。不过，肉身也能成为追求宗教性的身体规制的场所，就是对身体进行规训的结构化方案，这在基督教中由来已久。早期基督徒已经“把握住”身体，认为这象征着基督战胜死亡，战胜古老而腐坏的人类秩序。基督徒通过受洗而加入基督教共同体，包括禁食、节欲、守夜、祈祷、驱魔等(Miles, 1992)。不过，也正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将这些规制精致化为一般化程度更高的身体规训方案，包括节食、祈祷和严苛苦行的生活方式。

与现代身体规划恰好相反，中世纪的身体规制常常表现为以憎恨乃至摧残肉身为核心。要抗击某人的原罪，可以包括自我鞭笞，钉子戳进肉身，衣服穿上身后到处走动，就会不断引发痛感。坎波雷西把这些行为与当代文化中的规

范相比较,认为“环顾今日之大众美感文化和肉身特性的升华,没有任何人会准备自愿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形木偶,虽生若死,布满蛆虫。”(Camporesi, 1988, p.43)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虔诚的苦行忏悔者“甘受灼烧……渴望以尽可能令人厌恶的方式,绝灭自己的身体自我。”(同上引)然而,尽管表面上与当代的做法截然不同,但中世纪宗教对于充满原罪的肉身的聚焦却并非导致逃离身体,而是促使信徒逃入身体特性,其强度与其现代对手相比毫不逊色(Bynum, 1987; Mellor, 1991)。不仅如此,当我们想到现在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认同,不惜忍受某些化学处理和手术处理,为了“净化”自己体内“原罪般的”脂肪、酒精和尼古丁,随时准备进行长时间的艰苦锻炼和节食挨饿,那这两类做法之间的差距就变得更小了。比如说,狂热节食之类的做法不能说展示了对于身体的单纯“憎恨”,而是意味着参与对身体的重构,不妨描述为关系到几近宗教性的献身于某种理想自我。

<192> 中世纪身体规制可能与身体规划形式有着惊人的类似,不仅是它们都执迷于身体,而且都使某些个体可以重构其自我认同。即如拜纳姆所言(Bynum, 1987),禁食,宗教事工,还有“迷狂”状态的身体体验,使得一些女性能够摆脱生儿育女的角色,并且避开某些形式的教权控制。这些认同虽说面临重重危险(男性神父可以判断宗教迷狂属于虚伪做作甚或魔鬼附身),但也刻画出女性如何利用宗教传统,并将其整合到个人的生平叙事之中,后者提供了地位和宗教“生涯”,并挑战男性等级秩序。进而言之,如果个体力求在“失控的世界”里稳定其认同,可以利用身体规划(Giddens, 1990),那么过去的人们也常常利用身体规制来抗衡中世纪对于身体之**不稳定的**焦虑。千百年来,蛆虫一直让人想到原罪与腐坏,在中世纪,更常常被认为寓于身体之内,属于原罪的明证(Ariès, 1974, p.42),而苦行式的身体规制则被认为能将其破坏效应降至最低。

身体作为规划/选择/规制这几种观念,与潜势态身体的观念截然不同,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套有关身体体验的一般性理论。不过,不妨把它们看成是对于后者的概念颠覆。身体并没有退隐到合目的活动的后台,而是成为合目的活动的前台。某些部位和感觉或许相比于其他部位和感觉依然暗淡无光,但在身体规划/选择/规制的观念的挑战之下,用“不显”和“病显”来对当代身体取向进行分类已经不合适了。一旦讨论到穷人、无家可归者、食不果腹者的身体,

而这些人成天想的就是维持生存，再要认为身体对于人们的认同具有积极正面的核心意义，显然是有局限的（尽管这些人自有其执迷于身体的角度）。然而，它的确把握到了身体如何能够成为人们的认同的必然要素。话说回来，身体作为规划和作为选择的观念与莱德的潜势态身体观念并非彻底对立。鉴于它们强调身体的认知监控（与身体规制所特有的有关肉身的肉体知识相对立），有人认为，身体规划和身体选择低估了身体在何等程度上侵入了我们的认同，而无论我们的自觉设计具体如何（Mellor and Shilling, 1997）。比如说，关于身体选择，有些更具未来取向的见解似乎忽视了一点：我们身体的基本需要和能力本身是如何塑造并限制了虚拟环境的发展（有关这一点，详参 Heim, 1995; Sobchak, 1995）。

利用身体作为规划或选择的观念来梳理当代自我的观念，这种路数是否充分，还有另一点需要关注，或许还更为重要。要进入中世纪的身体规制，乃是基于宗教标准，充盈着神圣的意义。进入该规制的那些人很清楚它们的规范根源，而它们的变迁步调也是比较缓慢的。不仅如此，在这些规制之外，还有一些方便可行的替代选择。比如说，狂欢（Carnivals）就可能曾经和宗教目的密切相关，即某种肉体的（carnal）放纵，以求让身体一泻通畅。但这些节庆活动展示的是对离奇出位的东西（the grotesque）的肉身颂扬，是个体摆脱教会目标的感官超越（Bakhtin, 1984）。与此相反，和身体规划相维系的身体理想越来越广为扩散，从而提出了谁有能力控制“值得想望的意象”的问题。

如果社会规范和分类体系渗透进了我们在身体角度上的自我意象，那么我们塑造自己身体的用力方向与其说在于践行创造性行动，不如说在于力求符合有关外表的支配性规范：这些规范使人们纠缠于别人的意指实践之中，或许助长了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Pfohl, 1993）。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冒出了大量的处理程序，“淡化”或“漂白”黑人的肤色、面色与长相。“被当做”白人，其实或许还包括“被当做”中产阶级或具有男性特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些技术进展只是提供了手段，对人体进行更彻底、更有害的“种族化”重构，强化了一种新式的肉身帝国主义。简言之，有些规范充当着标准，个体力图对照这些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而谁控制了这些规范的问题就引出了一种可能性：有关身体之美的意象或许成了某个人群强加于另一人群的压迫性的面具（Bartky, 1988; Bordo, 1989）。或者，在这些规范的里里外外，是否可能

留有足够的余地，让身体意象被用作灵活可变的“面具”，个体可戴可脱，以此践行能动作用，尽可能扩大自我表达的机会？

五、身体作为面具

不少有关社会性别化认同、种族认同和代际认同的学说提出，外表的视觉规范助长了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压迫或制造劣势。这些学说中明显可以看出**身体作为面具**的意象。而在社会建构论的启发下，也有一系列论著关注个体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以便向他人“释放”特定的印象，重点是具身体现中轻松愉快、灵活可变、未有定论的特性。身体作为面具的意象在这些论著中也颇为流行。这些思路殊途同归，都意味着身体外表构成了“第二层皮肤”（Fanon, 1970），成了我们的生物态身体的中介，承载着符号意义。前一类思路指的是这样一些场合，身体的“面具化”牵涉到强加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人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清晰的自觉意识。在这里，身体成为某种**紧身衣**，在极端情况下，就是一座**囚牢**。^[8]与此相反，后一类思路则意味着在呈现方式上技能娴熟的个体精心建构并管理着外观，根据社会情境的需要，向他人投射一系列的认同。在这里，身体成为某种**展演**，是践行能动作用的不可或缺之要素（尽管展演必然还要考虑情境规范）。

<194> 因此，无论是面具作为紧身衣还是面具作为展演，这些观点尽管彼此对立，但都聚焦于与身体外表相维系的符号意义，聚焦于个体感到自己对那种外表所拥有的程度不同的自我觉知，控制与选择，强加与约束。它们也意味着外表与视像已经成为建构、巩固和再生产现代社会关系的**唯一中介**（Evans and Hall, 1999）。

1. 作为紧身衣的面具

法农在分析黑人性（blackness）的建构与殖民主义之间关系的时候，考察了“作为面具的身体”如何能够成为压迫性的“第二层皮肤”，由一个人群强加于另一人群（Fanon, 1984 [1952]）。法农讨论了男性白人的殖民凝视如何有助

[8] 本书中“紧身衣”的原文为“straitjacket”，最初指对付疯子或犯人的拘束衣。在某种意义上，如今它可以“普遍化”、“美观化”地称为“紧身衣”或者“束身衣”（比如各种纤维内衣）了。

于创造一块社会视觉空间，黑人在这块空间中被等同于、化约为其身体。身体在此无法不显，也毫无希望将身体视为能动性的规划。相反，一种负面刻板印象化的“黑人性”成为自我的本质内涵，这是一种透过“白面具”被看到的本质，充满了羞耻与自卑。比如说，法农在自述经历时，提到过作为“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白人如何以极具压迫性的方式，将其身体存在反馈回他。他解释道：“我的黑人性就在那儿，肤色黝黑 / 希望黯淡（dark），不容置疑。这一点令我备受折磨，久经困扰，大为愤怒。”（Fanon, 1984 [1952], p.117）

更一般地说，以殖民主义的思路将黑人性联系到淫荡好色，野蛮残忍，不讲道德，意味着“有色人种在其身体图式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对于身体的自觉意识成了“纯粹否定性的活动”，让身体所占据的空间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充斥着“第三方的自觉意识”，就连搞包烟、搞盒火柴的过程都成了充满笨拙尴尬的活动（Fanon, 1984 [1952], p.110）。将这类“白面具”强加于黑人，是与各种曝露和隐藏的策略分不开的。比如说，法农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决心概括为立意“征服女人；我们必须上那儿去，揭开她们掩藏其后的面纱，进入男人隐藏她们的房屋，找到她们”（Fanon, 1970, pp.37—38）。在这里，殖民凝视力图穿透所有那些可能阻碍白面具强加于黑身体的空间。或者，在许多西非国家里，“殖民者对于面纱的攻势被传教士对于胸部的攻势所取代。”在这里，“正是身体的曝露，毫不羞赧的展示”，“在西方人的脑子里”，标志着“非洲人 / 男人原始的乱交性和占有欲”（Fanon, 1970; Kanneh, 1992, p.347）。不管怎么说，即使根本不存在单一的殖民面具，也有着同样的逻辑：要剥夺被殖民的身体的自主性，让他们受制于殖民者的身体规范和行为规范。

法农所分析的社会性别化的殖民主义特征也有助于将我们引向某些女性主义论著，它们把身体面具作为本质上具有父权 / 男权意味的东西来考察。埃弗拉特·泽龙主张（Tseelon, 1995, p.124），女性始终要努力应对一副规范性的面具，它反映的是男性对于女性本质的观念。女性所“陷入”的视觉空间是从其身体和外表的角度来界定她们的，但却将这种本质与高出一等的属于心智的男性精神相对立。泽龙把这种面具的原型特征追溯到潘多拉、夏娃与莉莉丝^[9]

<195>

[9] “Lillith”，犹太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任妻子，也可指闪族神话中的女妖，后引申为中世纪观念中的女巫。前面的潘多拉则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夏娃。

(Lillith), 认为女人身份的面具被框定为一种操纵性的本质, 躲在“虚伪的装饰”背后, 演着假面舞剧: 它的“美丽与精致”充当了某种“载体, 让男人为之目眩心移, 直至自取灭亡”(Tseelon, 1995, p.12)。在这种情形下, 女性的“本质”始终呈现为以肉身为重点的规范性、化约论的评判。

这种面具化的过程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产生了重大的不良影响。如果像女性主义者所称的那样, 左右女性如何看待自身的“一般化他人”是某种“具有男性特质的他人”, 那么女孩子所面临的对于自己身体外表的压力, 从一开始就比男孩子沉重。而她们的后续发展也深陷于对立两端之间: 一端是要获得美丽外表的文化要求, 另一端是指责那种外表证明道德品质败坏。在这种情形下, 也就自然会看到, 有关身体意象的研究始终会发现, 对于自己的身体魅力、体重、外表, 女性比男性更加关注, 更不满意。有那么多十来岁的少女甚至是半大不小的女童就已经陷入节食的恶性循环, 即为明证 (Grogan, 2000)。

分析对于老年化的社会反应, 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身体作为压迫性面具的观念得以发展的另一块领域。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思主张 (Featherstone and Hepworth, 1991), 人们在体验老年时, 往往拿它当一种顽固的面具, 掩盖了个体真实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也体现于 J. B. 普莱斯利有关变老的感觉的阐述:

就好像一个毛头小伙子, 走在夏夫茨伯里街上^[10], 突然被人绑架, 冲进一家剧院, 被强行套上灰白假发, 搞出皱纹, 还有别的什么上岁数人的特点, 然后坐着轮椅上台。在老年人的外表背后, 我人还是那个人, 脑子还是那个脑子, 和年轻时没两样儿。

(转引自 Puner, 1978, p.7)

我们常听人说, 七老八十的人了, “心还很年轻”, 但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思强调, 老年化也受到另一种体验的塑造, 就是被戴上衰老皮肤的面具, 当个体深陷于消费文化, 而该文化赋予青春的相关价值巨大的符号资本, 这种面具就会引发他们的负面反应。因此, 我们有些人有时觉得宛如大学新生 (越来越耽于回想曾经能够狂欢派对到深夜, 然后世界恢复平静, 邀三两好友, 举杯小酌,

[10] “Shaftesbury Avenue”, 伦敦街名, 以街边剧院林立闻名。

或咖啡相伴,长夜直至天明,然后还能逛去本地公园,轻松慢跑,看朝阳冉冉升起)。不幸的是,剃须刮胡或是涂唇描眉之时,对镜相望,我们看到的却是额头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还有眼袋。当然,我们可以重新让自己相信,“沧桑”(lived-in)的脸也是性格的迹象,但不能只是生存过的迹象,标志着死亡离我们越来越近,令我们困扰不安。老年化的肉身迹象充盈着负面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又似乎决意要让我们的老年化体验干瘪僵化。

有关“老年化面具”的观念凸显了三项核心话题,都对这种将身体视作紧身衣的思路具有整体上的相关意义。其一,“面具的意象提请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是脸面与身体及其履行功能的能力的外观,另一方面是内在的或主观的有关个人身份/认同的感受或体验,这两方面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或张力,随着我们逐渐变老,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Featherstone and Hepworth, 1991, p.382)其二,人们赋予老年化身体的面具有助于将人们“固定”在有限角色上,比如祖父母辈,不为个体性和多样性留出什么空间(同上引;Fairhurst, 1998)。其三,尽管面具的意象似乎能够准确把握当前这一代许多人的老年化体验,但也有迹象表明,“一种新的老年化语言正在逐步兴起,其表现范围要宽广得多”(Featherstone and Hepworth, 1991, p.383)。<196>

相较于考察将否定性的“面具”强加于黑人和女性皮肤的那些研究,这种分析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这些研究认为,身体并没有促进出于自愿的展演,而是成为污名化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污名化这个术语源于污名这个词,后者指“一些身体符号,旨在曝露有关能指之道德地位的某种异乎寻常的、不好的东西”,前者现在往往指“不具备被社会完整接受之资格的个体的处境”(Goffman, 1990 [1963], p.9, p.11)。戈夫曼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污名类型(身体“异常”,性格缺陷,以及种族身份之类的部落污名),但又强调,决定什么被污名化、什么不被污名化的是社会关系。一种属性“将某一类占有者污名化,同时能确认另一类占有者的寻常性,因此无论是值得赞扬还是不值得赞扬,都不是本身的原因”(Goffman, 1990 [1963], p.13)。因此,污名是“属性与刻板印象之间一种特别的关系”(Goffman, 1990 [1963], p.14)。因此,面具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事实上,如果社会关系是决定什么样的身体特性/身份/认同会被污名化的关键因素,那我们可以想见,一旦群体之间的权力比重和互赖程度发生变化,那些种族意味的、社会性别化的和代际意味的面具的意义也会相应改变。

就此而言, 保罗·吉尔罗伊有个观点耐人寻味, 他认为 (Gilroy, 2000, p.23), 大批黑人运动员和艺人的出现已经开始促成变化, 黑人性从一种“受侮辱的标记”变成“越来越有力”的声望能指。而在近些年来, 将“黑人性”与流行音乐、街头时尚、青年认同方面最具声望的形式维系在一起的做法也大为增多。

2. 作为展演的面具

<197> 关注作为紧身衣的身体外表的论家从“约束”的角度来梳理肉身概念, 而关注作为展演的外表^①的论家则把重点放在与我们的视觉自我相维系的能动力上。从他们对于拟剧意象的广泛使用, 对于戈夫曼作品的解读方式, 就能明显看出这一点。戈夫曼的作品有一个特点, 就是概念层出不穷, 比如“假装功夫”, 比如“有礼貌的不关注”, 描述了个体如何管理其外表与行动, 以便将特定的印象传递给他人。使用道具 (比如以报纸挡面, 以遮掩失礼之笑), 记忆 (专注回想过去一桩悲痛事件, 以便在当下表现出庄重沉痛), 化妆或整容手术 (掩藏老年化迹象, 凸显青春活力外观), 关于身体如何能够充当面具, 投射特定外表, 例子比比皆是, 以上仅举三例 (Goffman, 1969 [1959], 1990 [1963])。

除了外表这一显而易见的重要意涵, 对于脸部与身体的面具的建构与展示, 还有两个背景因素特别重要, 分别对应于两类展演。其一, 戈夫曼提出, 存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理解, 我们看人们就当所见即所得, 至少在有相反证据出现之前是如此, 并且会投入交互性的“轮流来” (turn taking), 甚至是互动性的“修补功夫”, 以帮助呈现性的展演顺利进行。其二, 尽管一个个体面对不同的受众, 可能会建构并投射出不同的身体面具, 并且能够在“后台”放松自己, 与所有这些面具或身份/认同都保持距离, 但是, 对于同一群受众, 展演如果想要被视为真诚, 还是需要保持连贯一致 (Goffman, 1983, 1990 [1963])。因此, 要创造出不同的身份/认同面具并且获得成功, 关键不仅在于具身性行动者和受众之间的协调, 而且在于空间和场所的管理 (Tseelon, 1995)。

身体作为面具, 供自我呈现之用, 这种身体观念是否意味着个体老想着欺骗和操纵别人, 可谓众说纷纭。比如说, 泽龙 (Tseelon, 1992) 就讨论了“印象管理研究者”的作品, 后者分析了身体的“面具式”属性, 认为个体如果试图错误呈现 (misrepresent) 自身, 以从他人处得利, 这类属性就是不可或缺的 (例参 Baumeister, 1986; Snyder, 1987)。这些研究者的意思其实是说, 在不

同面具的穿戴所投射出的变动不定的身份/认同背后,存在着某种私己的、真诚的自我,而这些面具只是为了创造出有关某个个体的社会地位、经济价值或道德信誉的虚假印象。与此相反,后现代身份/认同观会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真诚如一的自我,社会生活恰恰有赖于我们向各种受众投射出不同的具身性认同(Gergen, 1991; Tseelon, 1992)。这两类思路都采纳了戈夫曼的著述来支持其观点,这既证明了其作品的创造性,或许也表明了它的暧昧性(Tseelon, 1995)。

将身体作为面具来管理,究竟会产生什么道德后果,对于这一点尚存争议,即便如此,森内特(Sennett^[11], 1992)指出,所谓社会生活象征着一座剧院,人们在舞台上展演自身,这一观念是最古老的社会观之一。柏拉图认为人类生活就像一场众神导演的木偶剧,彼特隆纽斯把社会当做一个剧场来分析^[12],而基督教思想则认为,上帝旁观其子民在下界演出的这些假面舞剧,极度痛楚。再到晚近,巴尔扎克、波德莱尔、托马斯·曼甚至弗洛伊德,都曾把剧场和社会视同一物(Sennett, 1992, pp.34-35)。森内特考察了生活在18世纪的人们通过哪些过程,开始将彼此而非上帝视为自己展演的受众。人们的衣着、外表和社会展演都如同演戏,矫揉造作,供人欣赏,哪怕颇有些玩世不恭的风气。比如说,在18世纪中叶的巴黎,身体被当成模特儿,“假发、礼帽及其他各种妆饰竞相往上穿戴”,以求创造出对于角色特征的认识和公共认可的面目,便于陌生人之间的沟通(Sennett, 1992, pp.40-41)。

<198>

森内特的历史视角揭示了在18世纪,将身体当做面具的处置方式是如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禁奢令(sumptuary laws)力图限制社会特权阶层穿着某些织料和样式,但这些法令几乎形同虚设。因此,身体的面具成了灵活可变的手段,针对不同的公共受众或私密受众,呈现不同的面目。话说回来,即使森内特为戈夫曼对于自我呈现的关注提供了历史背景,他对于当前与外表相维系的意义却不那么看好。他提出,到了19世纪末,身体面具开始被视为人们的人格固定标示。颅相学(phrenology,试图根据头颅形状来推断人的品性)为这种视角转迁出了一份力,外科手术的进展也是如此,后者将身体视为通向

[11] 此处原文作“Sennet”,应系错误。

[12] “Petronius”,古罗马时代散文家,所存《萨蒂利孔》残篇描述了意大利城市享乐生活,手法夸张戏谑。

人类本质的道路。再有就是达尔文所提出的个体情感会直接展现于身体外表。根据森内特的看法,这些发展意味着身体的面具不再为个体提供公众场合沟通的手段,而是变成曝露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不再灵活可变的囚牢。

身体面具作为展演的意象凸显了身体自我的能动潜力,其方式与身体规划的观念颇为类似。在这两种观念中,身体都被看成是人的自我认同中比较灵活可变的特性,但又是核心的特性。不过,这两种分析认为身体意义重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外表而如此,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却没有充分回答):赖以评价身体的标准是谁设立的。而研究种族、社会性别、残障和老年(以及其他赖以安排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项)的理论家们在思考身体作为紧身衣的问题时,正是把这些规范作为核心要素。无论如何,除了某些例外,这些著述往往都未能充分重视到,身体其实不能被化约为有关身体的表征,也忽略了个体其实拥有相当的身体能力,即使身处最不同寻常、最具压迫性的环境,也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所处情势。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思考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

<199>

六、互补性质与身体意象

身体作为潜势态,作为规划/选择/规制,作为面具,这些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相互替代的方案,但也能产生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如果我们认识到,在这些观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质,可以用来拓展各自的解释力,就能推进这类对话。而如果我们承认,任何特定的身体取向的发展都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的过程,并且这些过程至少能使这些取向中更具生命力的成分被视作具有文化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的具身体现形式,就可以提升这类对话。

1. 接触点

潜势态身体把焦点放在正常/规范态身体上,视之为安分无争的身体(receding body),这种思路虽有些徒劳无益,但就各种思路之间的局部互补性而言,它依然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具身体现的某些特性会摆脱身体规划的关注。如果创造性地运用潜势态身体、身体规划和身体作为面具等观念,取长补短,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从事着例行化的身体活动,却不曾充分自觉地投入其

间。比如说,黛布拉·吉姆林(Gimlin, 2002)分析了女性如何涉入美容行业的不同成分,认为对于身体的例行化工作(比如定期参加有氧健身课程)能让人心安理得地不遵照身体规范,也使人的身体至少在某些场合下,在一定程度上,退入背景。诚如吉姆林所言,“女性通过投入身体功夫,有能力降低其未能遵照文化戒令的人身责任,在多种规范认同之间进行协调”(Gimlin, 2002, p.6)。

但要转向作为紧身衣的身体面具观念,就可以把这种压迫性的强加解释成身体的社会病显(尽管其形式受到符码的中介),决定了附着于各种身体规划的地位。最后,也不妨认为,身体作为面具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连带意涵,因为身体某些方面的性质在功能“正常”运作的时候也有可能退入背景;并且,这种观念还揭示了维系着有关身体之美和污名化的标准的那些社会关系和权力不平等,正是在这些东西的启发引导下,人们才有动机着手进行特定的身体规划。

如果可以有所取舍地借鉴这些身体意象,以便矫正各自的某些空白与不足,那么它们都可以用于有关现代性的分析。它们或许只是以多种方式聚焦于现代时期,视之为合目的的、反思性的,或是一座舞台,外表在这里成了能与压迫的核心要素。但这些都属于同一个现代体系的不同特性(哪怕它们并不仅限于这一体系)。在现代性这个时期,优先考虑的是合目的的、生产性的活动,但也激发出了程度很高的反思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以欧美对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化和肉身贬损/抹黑(*corporeal denigration*)为前提的(Connell, 1997)。

<200>

2. 身体图式

除了让这些身体认同观念展开相互对话,还有可能借鉴有关**身体图式**或**身体意象**的已有研究,由此考察可以让这些观念都有所发展的共有基础。提出身体图式的概念,是要讨论我们如何能够协调自己的身体以执行行动,同时并不完全关注它们或自觉监控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个概念认为,自我认同与社会行动都有赖于我们针对自己的肉身外观、尺码和能力,塑造出某种非自觉的心理图景,从而奠定基础,让我们能够协调自己各种感官能力和运动能力。即如格罗兹所称,我们的身体图式“统合并协调各种姿态、触觉、动觉(*kinaesthetic*)和视觉方面的感觉,以便透过这些感觉体验到一个主体与一个单一空间取得协调”(Grosz, 1994, p.83)。

身体图式主要是从两个源泉中发展出来的。首先,随着生理态的身体“撞进”周遭世界,学着应对这个世界,并解决遇上问题,它的感觉、知觉和运动也慢慢滋养出了身体图式。不过,身体图式并不等同于这些体验,而神经生理学也早就确立地位(通过考察“幻肢”[phantom limbs]之类的病案,即截肢者自述已失掉的手或足有疼痛或感觉),并非单纯复制生理态身体的解剖学。^[13]而当我们认识到,手杖或衣装之类的物理客体也能被纳入我们的身体图式,就更强化了这一认识。齐美尔在讨论技术发展如何能够扩展我们的感觉能力时间接指出(Simmel, 1971 [1918], p.356),这类图式的形成意味着我们已经在社会的角度上“超越了自己自然态存在的范围”。而与身体图式发展相维系的第二项因素就是社会互动。这就涉及前语言阶段的婴儿与早期看护者之间角色扮演的的基本结构(以及这种互动中蕴含的效果和表达)(Joas, 1983, 1997; Mead, 1938; Schilder, 1935)。因此,我们对自己身体所拥有的体验和意象并不完全是由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体验所赋予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别人的身体(以及他们/它们^[14]对我们身体的反应)所拥有的体验和意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身体图式的这两大源泉特别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一方面,生物态身体开放地接受文化意义的影响,而文化意义聚焦于特定的身体部位或外表,以符号的形式界定它们;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身体与环境的有形物质性(physical materiality)。按照乔治·赫伯特·米德的主张,身体图式的发展乃是基于实践性的主体间性(Joas, 1997),也就是诸身体自我在投入对于有形的东西的操弄时,彼此产生的互动效应(Mead, 1932, p.169)。

<201>

人们已经借鉴了米德的著述来确定身体图式的形成中涉及的过程,而如果我们希望考察个体为何会发展出特定的具身性认同,他的研究依然有参考价值。在米德看来,作为身体图式发展中核心因素的实践性的主体间性,是由个体调

[13] 这种研究源于20世纪初的神经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认为,身体协调自己行动的能力有赖于身体非自觉的三维体位模型。这种模型记录个体身体所体验到的过去与当下的感觉信息,以及与其他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Grosz, 1994; Head, 1920)。有关身体图式的生理学研究 and 心理学研究考察幻肢、疑病症(hypochondria)、歇斯底里,以及有关体内所感特定刺激的具体情形与方位的其他困扰,不断取得发展。——原注

[14] 此处原文为最普通不过的“their”,但是,究竟是译成“他们”,还是“它们”即“他们的身体”,理论立场上有着不小的差异,关乎自我呈现和认同形成的重大关节。鉴于前面的“别人的身体”并没有明确后面的指代,中译在此保留这种暧昧。

整自身行动以适应群体行动的需要所主导的。这样的调适激发出某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使个体能够从其他人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身体存在。即如米德所言,“个体体验自身为个体……乃是基于同一群体中其他个体成员的特定立场,或是基于自己从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一般立场”(Mead, 1934, p.138)。米德把这种群体立场的主体内化称为“一般化他人”,这种他人为具身性认同的发展充当了审查员和过滤器。话说回来,个体发展出一套连贯协调的具身性自我认同的过程,并不只是将群体态度径直内化,而是“客我”(其他人赋予我们的身份/认同)与“主我”(我们对于这种身份/认同的主体反思)之间的内部对话(Mead, 1934)。[15] 我们也必须记住,这种受群体影响的特定的身体身份/认同是否具有延续性,也要看是否有能力促进对于物质环境的成功干预。比如说,有些人在一个共同体中因为某种身体残障而遭污名化,可能会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被损害的身份/认同”(spoiled identity),发现自己比社会假定的能干得多,从而拒绝接受自己的身体身份/认同,转而选择彻底不同的替代方案。

对于身体作为潜势态,作为规划/选择/规制,作为面具,这些洞见都具有重要的连带意涵。它们意味着,各种具身体现形式分别具有怎样的相关性与应用性,都将有赖于通过实践互动锻造而成的主体性,有赖于它们相对于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效力。如果说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是殖民群体或父权/男权群体,那些臣属于这种压迫的人就很可能发展出受限制的、约束性的(restricted and constraining)身体意象,妨碍其践行能动作用的机会。“一般化他人”的观念启发了法农有关殖民空间中将白面具强加给黑人的观念,其实绝非偶然。与此相反,身体规划的观念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社会背景占据主导地位,其中非常推崇个体主义,乃至期待人们既要管理并增进自己所致力物品和服务的价值,也要管理并增进自身的价值,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没有关于如何实现这一任务的持久方针。最后,潜势态身体观念背后的现象学经验(尽管有些言过其实)可以解读为受某种特定的互动背景所推动,该背景更推崇心智与合目的行动,而贬抑身体与感官经验。因此,不应当将潜势态身体、身体规划与身体面具之类的观念给物化,认为它们所标示的身体思路具有同等相关性,而无视其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身体对于个体所拥有的自我感的共有互动意涵

[15] 米德这一对概念“I/Me”亦有“主体我/客体我”、“主我/宾我”的译法。

<202> 本身就会导致众多认同, 根据一个共同体中被视为神圣的做法与价值, 在历史角度和跨文化角度上都会出现根本性的差异 (Shilling, 1999, 2003)。如此一来, 对于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这些关于自我认同的分析, 如果看成是分别代表类型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 或许会更具建设性 (尽管莱德的命题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并不是因为身体长期缺席, 而是因为该命题有助于说明, 为什么身体某些方面的特性会在某些时候退入后台)。也就是说, 不妨把这些分析看成是分别切近具身性认同的不同形式, 长期来看, 多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当然, 几乎肯定需要进一步补充有关身体和认同的其他见解。

七、身体理论新趋向

这样来讨论支撑身体图式发展的共有过程, 凸显了具身体现的三个维度, 我想要指出, 这三个维度都是身体理论新趋向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在形象化的身体图式的发展过程中, 生理态身体既是自我认同的产生源泉 (包含体验、感觉和知觉), 也是社会效应的作用场所 (群体规范渗透入个体的自我感, 并对这种自我感做出评估^[16])。身体持续卷入对于物质环境的实践干预, 促使人们不断改变对于认同的认识, 或对该认同的担当的认识, 同时构成了一种中介, 人们借此依附到其所处的社会情境, 或被后者所排斥。这样把身体看成是多维现象, 不仅使我们能够分析身体与认同之间的关系, 而且建构了一种有关社会之构成的社会学观点, 比该领域现存的各种视角更有具身性。这不单是因为它在个体层面上展开分析, 因此可以外推到也应当外推到社会系统的层面, 而是因为它把握到了身体的生产能力和接受能力的富有生机、不可化约、可以推广的维度。本节我将首先考察并评估在过去十年依然流行或开始主导的那些视角, 然后来勾勒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分析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路。

尽管身体理论纷繁多样, 但在该领域目前影响最大的就是三种。一是针对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论分析, 二是针对生命态身体的行动思路或现象学思路, 三是结构化理论中的身体观念。在过去十年, 这三种思路不仅让该领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特性, 而且提供了有关身体的社会意涵的宝贵洞见, 并继续确立着

[16] 原文此处为“evalation”, 似为“evaluation”之误。

研究议程,引导着该领域的大部分著述。不过,纵然取得如许成就,它们也都暴露出理论上的严重局限,对于身体的看法彼此迥异,使这一主题非但没有逐渐清晰,反而更加扑朔迷离。我在本书主体部分已经考察过其中的第一种和第三种学说,所以接下来的讨论会仅限于简要分析它们的发展趋势和依然存在的局限,虽说也有必要指出,对于结构化理论在分析上的价值,我所采取的观点比初版中表现出的更具批判性。

<203>

1. 有关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论分析

在社会建构论有关秩序化身体的分析中,人的身体特性被视为由政治、规范和话语等方面的规制生产与调控的客体对象。发展这种思路的研究大大激发并巩固了社会理论中的肉身转向所采取的形式。因此,特纳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身体与社会》(Turner, 1984),以及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研究,比如巴特勒的《性别麻烦》(Butler, 1990)和《身体之重》(Butler, 1993),将对于身体的治理(governmental management)确立为破解社会行动得以发生的外部环境的关键。

特纳与巴特勒的分析或许看似殊少共性,特纳更曾对巴特勒的身体观提出批评(Turner, 1996)。但是,他们的分析却有会通之处,因为在特纳所确定的那些系统问题当中,巴特勒重点探讨过两项,一是对于欲望的约束,一是自我的呈现(Butler, 1990, 1993)。巴特勒个人特有的兴趣或许是在文化上对于异性恋的强制推行,但她与特纳一样,也关注对于身体的秩序化和调控。在这些研究中,福柯的影响也是一望可知。福柯把身体看成是“事件铭刻其上的表层”,“彻底被历史所刻印”(Foucault, 1977)。不存在任何不可化约的“本质”,能够随时随刻界定人们的身份/认同或行动,唯有认同的“铭刻”在历时而变。

话说回来,关注控制身体的治理环境的理论家们也并非一味追随福柯,而是将他的洞见与方法和其他思想家的成就相融合。比如说特纳的研究(Turner, 1984),就受到帕森斯的很深影响(还有霍布斯和福柯)。对于帕森斯的用法尤其具有创意。在特纳看来,行为有机体不再是帕森斯眼中行动的子系统之一,而成了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总体环境的模型。这使特纳既能够借鉴福柯之类富于创新的思想家,同时又把他们的分析容纳在帕森斯的框架内,从而遏制了这些分析的激进后果。无独有偶,巴特勒关注“异性恋基型”(Butler, 1993),认

为身体成了社会性别化权力关系的对象与目标,也借鉴了阿尔都塞的说法,主张个体被“询唤”去履行特定的主体位置。对于一种看似激进的理论,趋向秩序的冲动再一次得到牢固确立。

要点明身体是如何被权力关系确立秩序、加以铭刻的,这些理论或许颇见成效,但要说到具身性行动的“生命体验”究竟如何,它们却往往保持沉默。比如说,特纳就指责现象学是“从主体的视点出发,以个体主义的方式来阐述具身体现”,“基本上缺乏历史内涵和社会学内涵”(Turner, 1984, p.54)。他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应当将“身体”作为“以社会性的方式被建构、被体验”的东西来考察(同上引)。身体依然是一种客体对象,归根结底,是在一些身体毫无控制的结构和基型的单纯强迫下,附着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

2. 有关“生命态身体”的现象学研究和行动导向研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作为对上述研究空白的回应,兴起了有关“身体对于其具身体现的自有体验”的研究,认为行动所面临的诸般机会和约束都是源于“身体本身的问题”(Frank, 1991, p.43)。正如我们所见,莱德(Leder, 1990)对于工具理性行动的体验的重点考察,以及扬(Young, 1990)的女性主义现象学,就是这种风格的重要例证;而弗兰克(Frank, 1995)则创造性地借鉴了有关患病期间身体凸显的体验阐述,以分析“苦难教育”(pedagogy of suffering)是怎样导致有关与他人关系的一套持续的新型伦理。这些阐述以及类似的研究借鉴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互动论的资源。不过,在塑造这些对于“肉身社会学”的呼吁中,还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发挥的影响最大。所谓“肉身”社会学的根本预设就在于:“所谓‘自我’、‘社会’和‘符号秩序’都是通过身体的工作而构成的”(Crossley, 1995, p.43)。克罗斯利的呼吁恰逢其时,因为正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尽管身体学说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躯壳(Körper, 身体存在的结构性、客观化特征),但尚未充分把握身体(Lieb, 身体存在的生命的、感觉的、感官的、情感的特征)(Csordas, 1994; Stoller, 1997)。而在梅洛—庞蒂看来(Merleau-Ponty, 1962, p.136),具身性主体基于他们对其所处环境的实践介入,并通过因为具身性存在的情境性而发展起来的意向性,发展出导向与宗旨。

这样强调我们的具身体现的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性,强调意义与知识的普

遍身体基础，就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实际上，不妨认为，行动导向思路和现象学思路所留下的遗产，有一部分就在于，针对“社会背景中的身体”，出现了越来越多各具特色的经验探索，它们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于身体理论的抽象性质的不满，希望倾听人们谈论自己的身体（例参 Evans and Lee, 2002; Gimlin, 2002; Nettleton and Watson, 1998）。话说回来，尽管现象学表面宣称聚焦于“生命态身体”，但却有着内在的矛盾。这一传统被解读为分析人们如何体验自己的身体，其实关注的却是体验的身体基础。莱德的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Leder, 1990）。以现象学的方式阐述人们对于世界的实际体验，身体还是很有可能隐退不显，忽视了身体差异的重要性，也未能重视结构有时如何形塑了我们的身体倾向。

3. 有关身体的结构化理论

<205>

关于秩序化身体和“生命态”身体的这些分析，为该领域提供了替代性的发展路线，但要说到许多人视为徒耗元气的区分，即社会学长久以来突出表现的结构学说和行动学说之间的区分（Dawe, 1979），上述分析也是重蹈覆辙。而结构化理论的发展则是作为克服这种对立的手段。结构化理论在看待社会时，其基本预设就是社会结构与行动具有相互构成的性质，因此身体成了核心的要素。布迪厄和吉登斯是这种社会生活理论的倡导者中最具影响的两位，而格罗兹则提供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女性主义分析，看身体与有关性的支配规范是如何相互构成的。抛开彼此的差异不谈，这些理论家都主张，身体既是社会实践的被动接受者，也是其所处情境的积极创造者。

在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身体既被阶级不平等所形塑，也再生产着阶级不平等。人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具身性倾向“不断地将必然转化为策略，将约束转化为偏好”（Bourdieu, 1984, p.190）。至于吉登斯（Giddens, 1991）的“高度现代性”观念，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身体与社会所特有的重要社会原则是如何相互决定的。当代社会世界的或然性被身体的或然性所吸纳并增强。现代性控制身体的能力使个体有潜力改变其身体外表和能力，而现代性对于种种确定性的破坏则维系着个体的“持续反思性”，刺激他们不断寻求新的生平叙事，新的关系，以及对于重大生存议题的新的答案（Shilling and Mellor, 1996）。格罗兹讨论性别态身体（sexual body）既具有构成性，又是被

构成的,同样别开生面(Grosz, 1994)。她借用拉康采纳过的麦比乌斯带(mobius strip, 倒转的三维8字型)这一拓扑学意象,探讨身体如何提供了性别差异的形态学基础,但也受到性别规范的铭刻权力的结构化作用(包括外在和内在)。

在社会建构论关于治理术的阐述和现象学角度有关“生命体验”的阐述之间,上述结构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中间道路”,就布迪厄和吉登斯而言,也意在启发经验研究。不过,它们提供给我们的替代选择是否具有竞争力,则又另当别论。布迪厄固然明言,身体倾向其实变动不居,但他又主张,惯习在无意识层面上运作(Bourdieu, 1984, p.466),这就使人难以看出,个体如何能够摆脱指派给他们的倾向轨迹。与此相反,吉登斯后期的著述强调可变性和反思性,赋予了身体不太可能享有的“存在之轻”,成了一种极具可塑性的资源,而不是脆弱不堪却又难以摆脱的生存要素,能够由个体在反思性构成自我叙事的同时,重新创造出来。最后一点,尽管格罗兹致力于确定变化的可能性,但她聚焦于身体的性别特定性,聚焦于社会对身体的内部与外部额外做出的“差异投入”,似乎确保了彼此对立的男性身份/认同与女性身份/认同继续存在。

4. 调和理论、调和身体

这三种思路或许已经证明了身体是一项无处不在的主题,并赋予该领域某种理论上的统一特性,但又各自为有关具身体现和社会的分析添上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要意涵。社会建构论关于秩序化身体的学说提请我们注意,权力是如何以身体为目标和渠道而实施的,并使有关具身体现的社会学思考远离自然主义的、生物学化约论的分析,从而实现了可贵的认识论突破。简言之,身体是一块重要的定位场所,社会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并以此为渠道,施行影响和权力。而行动导向与现象学的思路则证明,身体作为人类能动作用的基础,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生命体验的基础,十分重要。它们认为,社会学如果只是把身体看成一种物质对象,就不能把握其复杂性,还需要认识到,透过有机体这个载体,我们才生存于居处其间的这个世界,体验并创造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既看到这一点,又充分领会到某些进化发展和身体能力如何可能超出了现象学内省之所能及,就能体会到身体是创造社会的生机源泉。结构化理论中的身体观念力图将人的身体特性置于联结个体与社会的通道的核心。社会行动者既通过其身体的各项能力与装备,创造出自己所处的社会情境,同时

又受到所处社会场所对其身体施加影响的形塑。简言之，以身体为手段，个体依附于社会，或与社会相分离。

以上见解无疑都很深刻，在这些学说中硬要舍此取彼，或是全盘否定，或许皆属鲁莽之举。不过，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其实是在阐述具身体现的不同维度。用我在此使用的语言来讲，它们分别聚焦于不同的议题，关注身体作为源泉、定位或手段，以将具身性主体依附于社会（或被其所排斥）。但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思路充分认识到身体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的意涵。所以说，谈秩序化身体的学说任个体所拥有的积极主动的、被体验的身体淡出视线；受现象学启发的学说往往屏蔽了结构对于个体体验的影响，悖谬的是，有时还认为身体在合目的行动时不显，从而与结构主义的思路合流了；而结构化理论则迫使身体在结构的滞重与反思性选择的轻灵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情形，有好几种应对方式。首先，可以径直赞成其中一种思路，视之为本质“正确”，其他思路是错误的，尝试如此把握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误导，应当抛弃。这种选择最简单不过，也并非全无是处。它会使我们能够坚定奉行单一研究议程，不断修润，或许不时在某处加以拓展，以应对某些难以处理的剩余范畴，从而不断推进这一理论范式。 Crossley (1995, 2001) 就采取了这种策略，把梅洛—庞蒂说成是一位思路灵活的理论家，通过他将身体同时处理成主体与客体的手法，只要我们在他的思想当中，再添上一些哈贝马斯、福柯和布迪厄之类各具特色的理论家作为佐料，就能够调和有关身体的社会学理论中明显表现出的那些二元论。其次，可以全盘拒绝这些思路，重起炉灶，基于另一种哲学出发点，摸索一套相当不同的方案，对身体及其社会后果做出全新的界定（例参 Turner, 1999）。然而，这些应对方式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肯定要忽视这一领域现有主要身体理论已经取得的某些进展，也有损于身体研究已经发展出的统一特性。

<207>

应对身体研究领域目前这种异彩纷呈的局面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承认身体在社会思想中难以捉摸，并认识到它这种扑朔迷离的性质对多元理论传统的发展大为有益。不妨认为，这些传统提供了不同的资源，赖以追求不同的分析任务。这种选择自有其长处可道。把焦点放在身体上，已经导致了多个研究领域的进展，并且为向来被边缘化的思考模式，比如“酷儿研究”和“女同性恋研究”，提供了一种实质载体，由此可以更加宽广地认识到其努力的重要性。身体理论

的这种繁盛局面也提供了看似齐整的许多视角，可以量体裁衣，用于考察众多主题。不过，如果说像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达到了需要理论统合的程度，那么，一味支持身体研究在数量和范围上单纯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四种推进方式是努力将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各种思路里最有用益的特性，融合成更为全面综合的框架，避免各自的有害局限。但只将彼此难以通约的范式“兼容并蓄”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特纳 [Turner, 1996, p.33] 的主张就有这个问题，他融合了对于“体验现象学”的聚焦，来矫正其《身体和社会》中“潜在的结构主义”）。也必须避免相关的问题，就是把身体的各种独特的能力混为一谈，这一步跨出去，就会丧失理论上的手段来说明这些能力之间的互动，说明历史变迁 (Archer, 2000)。最后一点，还需要将一种特定的身体观置于其核心，以摒弃这些主导思路在理论上的过犹不及之处，即把身体视为某种兼具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现象，既是社会环境的结构与轮廓的定位场所，也是社会的持续源泉（参看第九章及 Burkitt, 1999）。

<208>

我自己所偏好的是这第四种选择。并且我相信，可以通过发展一种特别的身体观，视之为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同时作为社会之源泉，社会之定位，以及将个体定位于社会的手段），以实现这种选择。这一框架旨在确立某种综合理论的基本要素，同时也为有关社会中的身体的经验研究提供指导方针。身体作为源泉、作为定位、作为依附/排斥之手段的地位，被认为是身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三项核心维度。或许我们不得不聚焦于其中某一项要素作为出发点，但重要的是要留出空间来考察其中每一项要素的长期效应。

这种思路在身体研究的领域中尚未发展成熟，但也不需要我们从头开始。^[17]实际上，可以通过批判性地借鉴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和埃利亚斯的著述，来阐述这种思路的轮廓（参看 Shilling, 2004）。他们的研究所源自的理论传统相当不同，难以契合，但却可能从他们的著述中捕捉到某种关注兴趣上的会通：身体作为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某种多维中介。因此，涂尔干的特点固然是一开始就赋予集合体以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首要性，并考察一种能够为发达资本主义提供合适框架的道德个体主义是否可能兴起 (Durkheim, 1984

[17] 弗兰克 (Frank, 1991) 把自己的身体理论说成是为各具特色的行动形式充当中介，但其实是提出了一种有关具身体现的核心问题思路，但把调子定在个体层面而非社会系统层面。——原注

[1893]),但他也把身体看成是某种集体象征体系的源泉兼接收方,而该体系有能力将个体融入群体的道德生活。与此类似,齐美尔的特点固然是将理论上和道德上的首要性赋予(彼此互动的)个体,但他也分析了货币经济对于具身性认同愈益普遍渗透的影响,同时也把身体确定为某些特定倾向的源泉,这些倾向有利于形成此时尚处萌芽的某些社会形式,后者会在个体身上激发出具有社会束结力的情感。马克思将来自不同理论传统的成分融合在一起,聚焦于社会阶级、竞争性个体主义的市场、集体解放的可能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他也把身体看成是经济关系的源泉,并对资本主义给身体造成的破坏效应产生了深切关注。这些效应会使工人“适合于”市场上限制性的工作岗位,但也形成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的基础。最后,埃利亚斯拒绝了哲学,也拒绝了大多数社会学传统,但其过程性思路也认识到,身体是自然与社会之间富有生产性的关联,是历史上导致人们身体认同发生重大变更的那些型构的定位场所。他的核心关注在于,个体身处当代西方世界,要想成功地依附于和平共处的社会型构,如何有赖于此前由外部权威机构维持的控制的内化。埃利亚斯更进而提出,身体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定位场所,维系着越来越多的代价,这就推进了马克思、涂尔干和齐美尔提出的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具体而言,它要求我们考虑到,具身性个体的产品有可能开始支配我们,限制我们的身体目前以怎样的方式形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209>

但是,这些人物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意味着对待这一会通命题要非常小心。重申一遍,关键并不在于他们整体上的社会理论是相互契合的,而在于他们在建构各具特色的社会生活观时,对于身体的分析共享了某些要素。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和埃利亚斯都认识到,身体构成了社会的源泉,就此赋予了身体一些超越性的属性,使我们的身体自我能够暂时摆脱个体存在与自然生活的约束,被置于与社会关系形态之间的生产性关系之中。他们将身体视为社会的定位场所,从而都认识到,这些关系的发展方式会使身体注定进入一个内在性的阶段,受到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的限制与形塑。这些人物将身体视作使人们依附于或远离于所处社会情境的手段,也分享了对于作为具身性现象的社会后果的关注。在梳理社会后果这个概念时,视之为纯粹认知性的过程是不充分的,而是需要考虑到,人们对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取向是如何受到了身体倾向、欲望、习惯和偏好的形塑。

这种将身体视为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的宽广思路尚待充分阐释，但在在我看来，它的长处在于既捕捉到任何特定身体理论中的本质要素，又让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具体分析导向都保持灵活可变。经典理论家的著述中存在的那种有限会通并不是政治上的会通，并不预先规定我们应当如何评判社会。它只是主张，在社会关系的构成与维持过程中，在具有能动力的个体被置于这些关系的定位过程中，身体都处于前台。我也认为，这种理论思路乃是直接基于本书初版中勾勒的路线，而不是彻底分道扬镳。在初版中，我关注的是将身体分析从各种形式的生物化约论和话语化约论中拯救出来，前者是诸多自然主义思路的特征，后者则是社会学对于该主题的许多思路的特征。同时我也强调，有必要把身体理解作为一种特别的物质现象，既形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也被后者所形塑。至于身体作为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的观念，就是以这一点作为其基本预设，努力打造一种视社会为彻底具身性现象的社会理论。与此同时，它也保留了身体研究领域中之已发展起来的那些主导理论思路所真正取得的进展。

<210> 这种思路把身体理解为社会之源，借鉴了行动导向和现象学思路的洞见，即认为社会是经由身体的工作而构成的，同时补充以其他社会学角度的身体分析，视身体为兼具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实体，形塑了社会情境的轮廓与内容 (Benton, 1991; Burkitt, 1999; Hirst and Woolley, 1981)。因为它认识到，身体具备潜力，使其能够超越自然世界和个体生存。这种思路也把身体理解为社会之效应的定位场所，认识到一旦社会规范和制度得以确立，就会为后续社会行动的发生框定基本特征，并切实影响到受制于它们的人的身体存在。这些效应会改变人们的身体倾向和行动能力。结合这一背景，并且在本体论层面上将身体视为生产性的有形现象，不可化约为话语，就有可能让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治理学说所提供的有益见解善尽其用。它们都认为身体具有社会角度上的内在性，有时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严密的约束、形塑和限制。这种思路还把身体看成是将个体定位于其社会情境中的手段，借鉴结构化理论的洞见，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迁的过程都受到身体的中介。社会变迁并不会自动发生，而它的发生也不只是出于纯粹智识推动的行动。相反，人们对于社会结构有着怎样的体验和回应，在显著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感觉自我和感官自我 (sensory and sensual selves) 的形塑。这些变项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对于人们是否感到自

在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并往往会再生产出自己最为熟悉的那些“规则”、“资源”或“社会场域”,或者是在情感上将这些结构体验为令人不快、不值想望、需要转化的。这就认识到要以彻底具身性的眼光来看社会后果,摒弃某种哲学性的眼光,即决定人们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如何关联的是心智,是与任何身体品味或倾向相分离的心智。

八、结 语

本篇新版“补论”旨在重探我初版中的三项主题,并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三项主题与该领域现有争论最为扣合,也最能回应建构一种充分具身性的社会学的不懈努力。身体在社会思想中的“缺席在场”,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理论上推进社会中的身体的研究,这些话题彼此关联。在我看来,我们只有扭转当前的趋势,即物质态身体其实在我们的考虑中是缺席的,才能实现实质的理论推进。身体构成了不可化约的社会之源泉:正是具身性的人所具有的各种属性与能力,奠定了巩固与改变各种认同与社会关系所依据的肉身基础。社会的结构性效应也会赋予身体以标记和轮廓,但身体依然是其所处社会情境的持续源泉。最后一点,在我们定位于所居处的社会文化世界<211>的过程中,我们的具身性存在也有着核心的关联意义。人们被其所处环境的不同要素所吸引或排斥,这往往是一种颇具感官性和体认性^[18]的事情。但正是这些反应,而不仅仅是看似“非具身性”的智识评估,为社会系统的维护、发展和转化提供了基本的动力。

对于过去 20 年来的理论研究以及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身体已经充当了具有丰硕成果的关注焦点。但这种趋势所导致的研究领域不仅是百花齐放,也越来越成一盘散沙。如果我们要把这种竞相创新的态势转化为某种更为持久的成就,那么现在就该是理论统合的时候了。社会学的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揭示,在一般层面上,在特定情势下,社会之构成过程中彻底的身体维度分别是如何运作的。

[18] 此处原文为“visceral”,兼有“内脏的”、“肺腑的”、“内心的”、“受本能驱动的”等含意,但今日语言中所谓“发自肺腑”、“冷暖自知”、“善于体谅”、“将心比心”,已经越来越趋向情感、感知、思维的一面,远离肉体、感官的一面,甚至以“形而上”克制“形而下”。

参考文献

- Abercrombie, N. (1986) 'Knowledge, order and human anatomy', in J. Hunter and S. Ainley (eds), *Making Sense of Modern Times, Peter L. Berger and the Vision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London: RKP.
- Adams, P. and Minson, J. (1978) 'The "subject" of feminism', *m/f*: 43–61.
- Alcorn, K. (1988) 'Illness, metaphor and AIDS', in P. Aggleton and H. Homans (eds), *Social Aspects of AIDS*. London: Falmer.
- Alexander, R. (1974)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5: 325–83.
- Allan, G. (1989) *Friendship, Developing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 Althusser (ed.),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ntonovsky, A. (1979) *Health, Stress and Coping*.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Antonovsky, A. (1984) 'The sense of coher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health', *Advances*, 1: 37–50.
- Antonovsky, A. (1987) *Unravelling the Mystery of Health: How People Manage Stress and Stay Well*.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Archer, M. (2000) *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dill, S. and O'Sullivan, S. (1986) 'Upsetting an apple cart: difference, desire and lesbian sadomasochism', *Feminist Review*, 23: 31–57.
- Ardrey, R. (1976) *The Hunting Hypothesis*. London: Collins.
- Ariès, P.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riès, P. (1981) *The Hour of Our Death*. London: Penguin.
- Armstrong, D. (1983)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 Medical Knowledge in Brita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mstrong, D. (1987) 'Bodies of knowledge: Foucault and the problem of human anatomy', in G. Scambler (ed.),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Tavistock.
- Atkinson, P. (1987) 'The feminist physiqu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in J. Mangan and R. Park (eds), *From 'Fair Sex' to Feminism*. London: Tavistock.
- Baber, Z. (1991) 'Beyond the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an evaluation of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

- 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61(2): 219–30.
- Bakhtin, M. (1984 [1965])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all, S. (ed.) (1990) *Foucault and Education: Disciplines and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Banner, L. (1983) *American Beauty*. New York: Knopf.
- Barrett, M. (1987) 'The concept of "difference"', *Feminist Review*, 26: 29–41.
- Barrows, S. (1981) *Distorting Mirrors: Visions of the Crowd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artky, S. (1988) 'Foucault, feminism and patriarchal power', in I. Diamond and L. Quinby (eds),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Boston, Ma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Bartrop, R., Lazarus, W., Luckhurst, L., Kiloh, L. and Penny, R. (1977) 'Repressed Lymphocyte function after bereavement', *Lancet*, 1: 834–6.
- Baudrillard, J.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 Bauman, Z.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man, Z. (1992a) 'Survival as a social construc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9(1): 1–36.
- Bauman, Z. (1992b) *Intimations of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Bauman, Z. (1992c) *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aumeister, R. (1986) *Public Self and Private Self*. New York: Springer.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ckford, J. (1989) *Religion and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 Bell, D. and Kennedy, B. (eds) (2000) *The Cybercultur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Bendann, E. (1969) *Death Customs*. London: Dawsons.
- Benedikt, M. (1991) 'Cyberspace: some proposals', in M. Benedikt (ed.), *Cyberspace: First Steps*. London: MIT Press.
- Benton, T. (1991)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wh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should be given a (cautious) welcome', *Sociology*, 25(1): 1–29.
- Benton, T. (1992) 'Why the welcome needs to be cautious: a reply to Keith Sharp', *Sociology*, 26: 225–32.
-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erger, P. (1990 [1967])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Allen Lane.
- Bernstein, B. (1970)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 London: RKP.
- Berridge, V. and Edwards, G. (1987 [1981]) *Opium and the People: Opiate U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rthelot, J. (1986) 'Sociological discourse and the bod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 155–64.
- Birke, L. (1986) *Women, Feminism and Biology*. Brighton: Wheatsheaf.
- Birke, L. (1992) 'In pursuit of difference: scientific studies of women and men', in G. Kirkup and L.S. Keller (eds), *Inventing Wo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leier, R. (1984) *Science and Gender: A Critique of Biology and its Theories on Women*. Oxford: Pergamon Press.
- Bloch, C. (1987) 'Everyday life, sensuality, and body cultur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0(4): 433–42.
- Bloch, M. and Parry, J. (eds) (1982) *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ard of Education (1923) *Report of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n Differentiation of the*

- Curriculum for Boys and Girls Respectively in Secondary Schools*. London: HMSO.
- Bogner, A. (1992) 'The theory of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9: 23–53.
- Bordo, S. (1988) Anorexia nervosa', in I. Diamond and L. Quinby (eds),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Boston, MD: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Bordo, S. (1989) 'Reading the slender body', in M. Jacobus, E. Fox Keller and S. Shuttleworth (eds), *Women, Science and the Body Politic*. New York: Methuen.
- 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ston Women's Health Collective (1971) *Our Bodies, Our Selv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Bourdieu, P. (1973)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R. Brown (ed.),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Tavistock.
- Bourdieu, P. (1974) 'The school as a conservative force: scholastic and cultural inequalities', in J. Eggleton (ed.),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 Bourdieu, P. (1978) '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7: 819–40.
- Bourdieu, P. (1981) 'Men and machines', in K. Knorr-Cetina and A.Y.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RKP.
- <214>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85)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14(6): 723–44.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 (1988a) 'Program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5: 153–61.
- Bourdieu, P. (1988b) *Homo Academicu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ean-Claude (1990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n. London: Sage.
- Bovey, S. (1989) *Being Fat is not a Sin*. London: Pandora.
- Braudel, F. (1973)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Bray, A. (1982) *Homosexualit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Gay Men's Press.
- Brittan, A. (1981) *Masculinity and Pow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rohm, J.-M. (1978) *Sport: A Prison of Measured Time*. London: Ink Books.
- Brown, B. and Adams, P. (1979) 'The feminine body and feminist politics', *m/f*, 3: 35–50.
- Brown, P. (1988)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Brubaker, R.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14(6): 745–75.
- Bryant, C. and Jary, D. (1991)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ryson, L. (1987) 'Spor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sculine hegemon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0: 349–60.
- Buffery, A. and Gray, J. (1972) 'Sex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 and linguistic skills', in C. Ounsted and D. Taylor (eds), *Gender Differences: Their Ontogeny and Significance*. Edinburgh: Churchill Livingstone.
- Burkitt, I. (1991) *Social Selves: Theories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London: Sage.
- Burkitt, I. (1992) 'Beyond the "iron cage": Anthony Giddens on modernity and the self',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5: 71–9.
- Burkitt, I. (1999) *Bodies of Thought*. London: Sage.
- Burns, T. (1992) *Erving Goffman*. London: Routledge.

- Bury, M. (1986)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8: 137-69.
- Bury, M. (1987)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medical sociology: a rejoinder to Nicolson and McLaught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9: 439-41.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 Buytendijk, F. (1950)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feeling and emotions', in M. Reymert (ed),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e Mooseheart Symposium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ew York: McGraw-Hill.
- Buytendijk, F. (1974) *Prolegomena to an Anthropological Physiology*.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 Bynum, C. (1987) *Holy Feast and the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lnan, M. (1987) *Health and Illness - The Lay Perspective*. London: Tavistock.
- Campling, I. (ed.) (1981) *Images of Ourselves.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Talking*. London: RKP.
- Camporesi, P. (1988) *The Incorruptible Fle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nnon, W.B. (1942) 'Voodoo death',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
- Caplan, A. (ed.) (1978)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Readings on Ethical and Scientific Issu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Carby, H. (1987) "'On the threshold of women's era": lynching, empire and sexuality in black feminist theory', in H. Gates (ed.), *Figures in Bl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rington, B. (1982) 'Sport as a sidetrack', in L. Barton and S. Walker (eds), *Race, Class and Education*. London: Croom Helm.
- Chapman, R. and Rutherford, J. (eds) (1988) *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15>
- Charles, N. and Kerr, M. (1988) *Women, Food and Famil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ernin, K. (1983) *Womansize.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Clark, J., Modgil, C. and Modgil, S. (1990) (eds) *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ewes: Falmer Press.
- Clarke, J. (1990) 'The skinheads and the magical recovery of working class community', in 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2nd edn. London: Hutchinson.
- Cohen, I. (1989) *Structuration Theory. Anthony Gidde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London: Macmillan.
- Cohen, P. (1988) 'The perversions of inheritance: 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multi-racist Britain', in P. Cohen and H.S. Bains (eds), *Multi-Racist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 Collins, R. (1975)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 (1981)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llins, R. (1988) 'Theoretical continuities in Goffman's work',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llinson, D., Knights, D. and Collinson, M. (1990) *Managing to Discriminate*. London: Routledge.
- Connell, R. (1983) *Which Way Is Up?* Sydney: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Connell, R. (1987) *Gender and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nnell, R.W. (1997)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6): 1511–1557.
- Connell, R. and Dowsett, G. (1992) 'The unclear motion of the generative parts: frameworks in Western thought on sexuality', in R. Connell and G. Dowsett (eds), *Rethinking Sex: Social Theory and Sexuality Research*.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 and Kippax, S. (1990) 'Sexuality in the AIDS crisis: patterns of sexual practice and pleasure in a sample of Australian gay and bisexual me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7(2): 167–98.
- Corbin, A. (1986)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rnwell, J. (1984) *Hard Earned Lives—Accounts of Health and Illness from East London*. London: Tavistock.
- Craib, I. (1989)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Theory: The Limits of Sociology*.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Craib, I. (1992) *Anthony Giddens*. London: Routledge.
- Crawford, R. (1977) 'You are dangerous to your health: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victim bla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7(4): 663–80.
- Crawford, R. (1984) 'A cultural account of "health": control, release, and the social body', in J. McKinlay (ed.), *Issu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Care*. London: Tavistock.
- Crawford, R. (1987) 'Cultural influences on preven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health consciousness', in N. Weinstein (ed), *Taking Care: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ing Self-Protective Behavi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ssley, N. (1995) 'Merleau-Ponty, the elusive body and carnal sociology', *Body and Society*, 1(1): 43–66.
- Crossley, N. (2001) *The Social Body: Habit, Identity and Desire*. London: Sage.
- Csordas, T.J. (1994) (ed.)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The Existential Ground of Culture and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le, R. and Pires, E. (1984) 'Linking people and jobs: the indeterminate place of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in P. Broadfoot (ed.) *Selection, Certification and Control*. Lewes: Falmer.
- Dalton, K (1979) *Once a Month*. London: Fontana.
- Dana, M. (1987) 'Boundaries: One-way mirror to the self, in M. Lawrence (ed.), *Fed Up and Hungry*.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David, M. (1980) *The State,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London: RKP.
- <216> Davies, B. (1989) 'Education for sexism.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ex/gender bias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1: 1–19.
- Davies, B. (1990) 'The problem of desire', *Social Problems*, 37(4): 501–16.
- Davis, F. (1989) 'Of maids' uniforms and blue jeans: the drama of status ambivalences in clothing and fashion', *Qualitative Sociology*, 12(4): 337–55.
- Dawe, A. (1979) 'The two sociolog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1 (2): 207–18.
- Dawkins, R. (1976) *The Selfish Gene*. London: Paladin.
- De Swaan, A. (1990) *The Management of Normality: Critical Essays in Health and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 Deem, R. (1986) *All Work and No Play? The Sociology of Women and Leisure*. Milton Keynes: Open

- University Press.
- Della Fave, L.R. (1991) 'Ritual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inequal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 21–38.
- Delphy, C. (1984)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 Descartes, R. (1974)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 Trans. E. Haldene and G.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ws, P. (1987)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Verso.
- Diamond, I. and Quinby, L. (eds) (1988)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Boston, Ma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N. (1985) Thin is the feminist issue', *Feminist Review*, 19: 46–64.
- Dore, R. (1976) *The Diploma Diseas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Douglas, A. (1977)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 Kopf.
-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KP.
- Douglas, M.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The Cresset Press.
- Douglas, M. and Isherwood, B. (1979)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Allen Lane.
- Doyal, L. and Gough, I. (1991) *A Theory of Human Need*. Houndmills: Macmillan.
- Dreyfus, H. and Rabinow, P. (1982)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 Dull, D. and West, C. (1991) 'Accounting for cosmetic surgery: the accomplishment of gender', *Social Problems*, 38(1): 54–70.
- Dunning, E., Murphy, P. and Williams, J. (1988) *The Roots of Football Hooliganism*. London: RKP
- Durkheim, E. (1938) *The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 Durkheim, E. (1951 [1897])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Durkheim, E. (1984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Durkheim, (1995 [1912])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Free Press.
- Duroche, L. (1990) 'Male perception as a social construct', in J. Hearn and D. Morgan (eds),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Hyman.
- Dutton, D. (1986) 'Social class, health and illness', in I. Aitkin and D. Mechanic (eds), *Applications of Social Science to Clinical Medicine and Health Polic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Dyer, R. (1986) *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Ehrenreich, B. (1983)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ir Flight from Commitment*. London: Pluto.
- Ehrenreich, B. and English, D. (1988) *For Her Own Good. 150 Years of the Expert's Advice to Women*. London: Pluto.
- Eisenstein, H. (1984)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Eisenstein, Z. (1988)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Law*.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lias, N. (1978a [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lias, N. (1978b) 'The civilizing process revisited', *Theory and Society*, 5: 243–53.
- Elias, N. (1978c) 'On transformations of aggressiveness', *Theory and Society*, 5: 229–42.
- Elias, N. (1978d) *What is Sociology?* London: Hutchinson.
- Elias, N. (1982 [1939])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lias, N. (1983) *The Court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lias, N.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lias, N. (1987a) 'On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motions: a process sociological essa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339–61.
- Elias, N. (1987b)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sexes - a process-sociological study: the example of the Ancient Roman Stat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287–316.
- Elias, N. (1988)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the state monopoly of physical violence and its infringement', in J. Keane (ed.),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 Elias, N. (1991) *The Symbol Theory*. London: Sage.
- Elias, N. and Dunning, E. (1986)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lias, N. and Scotson, J. (1965)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London: Frank Cass.
- Elling, R. (1986) *The Struggle for Workers' Health: A Study of Six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Farmingdale, NY: Baywood.
- Engel, G. (1971) 'Sudden and rapid death during psychological stress: folklore of a folk wisdom',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74: 771–82.
- Epstein, B. (1987) 'Women's anger and compulsive eating', in M. Lawrence (ed.), *Fed Up and Hungry*.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Evans, J. and Hall, S. (1999) *Visual Culture: The Reader*. London: Sage.
- Evans, M. and Lee, E. (2002) *Real Bodies*. Houndmills: Palgrave.
- Fairhurst, E. (1998) "'Growing old gracefully" as opposed to "mutton dressed as lamb"', in S. Nettleton and J. Watson (eds), *The Body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Falk, P. (1985) 'Corporeality and its fates in history', *Acta Sociologica*, 28: 115–36.
- Falk, P. (1991) 'Le Livre de la chair', in C. Garnier (ed.), *Le corps rassemble*. Montreal/Quebec,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eal, Editions D'Arc.
- Fanon, F. (1970) *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 Fanon, F. (1984 [195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Press.
- Featherstone, M. (1982) 'The body in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 18–33.
- Featherstone, M. (1987) 'Leisure, symbolic power and the life course', in J. Horne, D. Jary and A. Tomlinson (eds), *Sport, Leis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RKP.
- Featherstone, M. (1990) 'Perspectives on consumer culture', *Sociology*, 24(1): 5–22.
- Featherstone, M.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Featherstone, M. (1995) 'Post-bodies, ageing and virtual reality', in M. Featherstone and A. Wernick (eds), *Images of Ageing*. London: Routledge.
- Featherstone, M. and Burrows, R. (1995)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an introduction', *Body and Society*, 1(3–4): 1–20.
- Featherstone, M. and Hepworth, M. (1983) 'The midlifestyle of "George and Lyn": notes on a

- popular strip',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 85–92.
- Featherstone, M. and Hepworth, M. (1988) 'Ageing and old age: reflections on the postmodern life-course', in B. Blytheway, T. Keit, P. Allatt and A. Byrman (eds), *Becoming and Being Old*. London: Sage.
- Featherstone, M. and Hepworth, M. (1991) 'The mask of ageing and the postmodern life course', in M.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and B.S. Turner (eds),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M. and Turner, B. (eds) (1991)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 Fedigan, L. (1992) 'The changing role of women in models of human evolution', in G. Kirkup and L. Smith Keller (eds), *Inventing Wo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18>
- Feher, M., Naddaff, R. and Tazi, N. (1989a)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 New York: Zone.
- Feher, M., Naddaff, R. and Tazi, N. (1989b)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 New York: Zone.
- Feher, M., Naddaff, R. and Tazi, N. (1989c)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I. New York: Zone.
- Ferrer, G. (1992) 'A double-breasted boost', *The Guardian*, 22 January.
- Finch, J. (1983a) 'Dividing the rough and respectable: working class women and pre-school playgroups', in E. Garmarnikow, D. Morgan, J. Purvis and D. Taylorson (eds),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Finch, J. (1983b) *Married to the Job*.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Finch, J. (1984) *Education as Social Policy*. London: Longman.
- Finkler, K. (1989) 'The universality of nerves', in D. Davis and S. Low (eds), *Gender, Health and Illness: The Case of Nerves*.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Firestone, S.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London: Jonathan Cape.
- Fletcher, S. (1984) *Women First: The Female Tradition in English Physical Education 1880–1980*.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 Foucault, M.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London: Tavistock.
- Foucault, M. (1974)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 Foucault, M. (1977)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Oxford: Blackwell.
- Foucault, M. (1979a)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oucault, M. (1979b) 'Governmentality',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6: 5–22.
- Foucault, M. (1980) 'Body/Power', in C. Gordon (ed.),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Brighton: Harvester.
- Foucault, M. (1981)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 Dreyfuss and P.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 Frank, A. (1990) 'Bringing bodies back in: a decade review',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131–62.
- Frank, A. (1991)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al review', in M.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and B. Turner (eds),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 Frank, A. (1995)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ankenberg, R. (1990) 'Review article: Disease, literature and the body in the era of AIDS—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2(3): 351–60.
- Frankenberg, R. 'Risk: anthropolog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narratives of prevention', in S. Lindenbaum and M. Lock (eds), *Knowledge, Power and Practice in Medicine and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Frankenhauser, M. and Gardell, B. (1976) 'Underload and overload in working life: outline of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Stress*, 2: 35–46.
- Freund, P. (1982) *The Civilized Body: Social Domination, Control and Health*.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reund, P. (1988) 'Understanding socialized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Society*, 17: 839–64.
- Freund, P. (1990) 'The expressive body: a common ground for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nd health and illnes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2(4): 454–77.
- Freund, P. and McGuire, M. (1991) *Health, Illness and the Social Bod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Friday, N. (1991) *Women on Top*. London: Hutchinson.
- Friedman, M. and Rosenman, R. (1974) *Type A Behaviour and Your Heart*. New York: Fawcett Crest.
- <219> Fuss, D. (1990)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Fussell, S. (1991) *Muscle: Confessions of an Unlikely Body Builder*. New York: Poseidon Press.
- Gallagher, C. and Laqueur, T. (eds) (1987)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ody. Sexualit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llup, G. (1982) 'Permanent breast enlargement in human females: a sociobi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1: 597–601.
- Game, A. (1991) *Undoing the Social: Towards a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Garland, D. (1990)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hlen, A. (1969) *Moral and Hypermoral*. Frankfurt: Athenaeum.
- Gerber, R. (1992) 'Manipulated lady',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2 July, 44–6.
- Gergen, K. (1991)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Hutchinson.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Houndmills: Macmillan.
- Giddens, A. (1981) 'Agency, institution and time-space analysis', in K. Knorr-Cetina and A.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ondon: RKP.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87) 'Structur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A. Giddens and J.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88) 'Goffman as a systematic social theorist',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lmore, D. (1990)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ilroy, P. (2000) *Between Camps: Nations, Cultures and the Allure of Race*. London: Penguin.

- Gilroy, S. (1989) 'The emBody-ment of power: gender and physical activity', *Leisure Studies*, 8: 163–71.
- Gimlin, D. (2002) *Body Work: Beauty and Self-Image in American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56) 'Embarrassment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LXII(3): 264–71.
- Goffman, E. (1963)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offman, E. (1968)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offman, E. (196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offman, E. (1977)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sexes', *Theory and Society*, 4: 301–31.
- Goffman, E. (1979) *Gender Advertisements*. London: Macmillan.
- Goffman, E. (1983)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17.
- Goffman, E. (1987)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sexes', in M. Deegan and M. Hill (eds), *Interaction*. Winchester, Mass.: Allen and Unwin.
- Goffman, E. (1990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 Goldberg, S. (1973) *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Golden, J. and Hope I. (1991) 'Storm over virgin births', *Daily Mail*, 11 March.
- Goldsmith, F. and Kerr, L. (1982)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 Goodger, J. and Goodger, B. (1989) 'Excitement and representation: toward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port in modern society', *Quest*, 41 (3): 257–72.
- Gordon, C. (1980)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Gordon, R. (2001) 'Eating disorders East and West: a culture bound system unbound', in M. Nasser, M. Katzman and R. Gordon (eds), *Eating Disorders and Cultures in Transition*. East Sussex: Brunner-Routledge. <220>
- Gordon, S. (1985) 'Micro-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emotion', in S. Helle and S. Eisenstadt (eds), *Micro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 London: Sage.
- Goudsblom, J. (1987) 'The domestication of fire as a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457–76.
- Gould, S.J. (1981) *The Mismeasure of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raham, H. (1984) *Women, Health and the Family*. Brighton: Wheatsheaf.
- Grant, L. (1992) 'A distor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12 January.
- Graydon, J. (1983) "'But it's more than a game. It's an institutio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port', *Feminist Review*, 13: 5–16.
- Green, E. and Hebron, S. (1988) 'Leisure and male partners', in E. Wimbush and M. Talbot (eds), *Relative Freedoms: Women and Leis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Green, H. (1986) *Fit for America: Health, Fitness, Sport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 Greer, G. (1971)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Paladin.
- Gregory, M. (1978) 'Epilogue', in M. Gregory, A. Silvers and D. Sutch (eds),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Bass.
- Griffin, C. (1985) *Typical Girls?* London: RKP.

- Griffin, C, Hobson, D., Macintosh, S. and McCabe, T. (1982) 'Women and leisure', in J. Hargreaves (ed.), *Sport, Culture and Ideology*. London: RKP.
- Griffin, S. (1978) *Wome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rogan, S. (1999) *Body Image*. London: Routledge.
- Grosz, E. (1990) 'A note on essentialism and difference', in S. Gunew (ed.), *Feminist Knowledge. Critique and Construct*. London: Routledge.
- Grosz, E.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rosz, E. and Lepervanche, M. (1988) 'Feminism and science', in B. Caine et al. (eds), *Crossing Boundaries: Feminisms and the Critique of Knowledge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Gruchow, W. (1979) 'Catecholamine activit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episodes', *Journal of Human Stress*, 5: 11-17.
- Gusterson, H. (1991) 'Nuclear war, the gulf war, and the disappearing body', *Journal of Urban and Cultural Studies*, 245-55.
- Haferkamp, H. (1987) 'Reply to Stephen Mennell',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562.
- Hall, C. (1992) 'Girls aged nine "are obsessed by weight"', *The Independent*, 10 April.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Houndmills: Macmillan.
- Hall, S. and Gieben, B.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 S. and Jameson, F. (1990) 'Clinging to the wreckage', *Marxism Today*, September, pp. 28-31.
- Harburg, E., Blake-lock, E. and Roeper, P. (1979) 'Resentful and reflective coping with arbitrary authority and blood pressure', *Psychosomatic Medicine*, 41: 189-202.
- Harburg, E., Haunstein, L., Chare, C, Schull, W. and Short, M. (1973) 'Socio-ecological stress, suppressed hostility, skin color and black-white male blood pressure: Detroit',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5: 276.
- Hargreaves, D. (1969) *Social Relations in a Secondary School*. London: RKP.
- Hargreaves, J. (1986) *Sport, Power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rgreaves, J.A. (1987) 'Victorian familialism an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female sport', in J.A.Mangan and R. L. Park (eds) , *From 'Fair Sex' to Feminism: Spor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s*. London: Frank Casso.
- Hargreaves, J.A. (1990) 'Changing images of the sporting female', *Sport and Leisure*, July-August, pp. 14-17.
- Harker, R., Mahar, C. and Wilkes, C. (eds)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 <221> Hartmann, H. (1979)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and Class*, 8: 1-33.
- Hartwig, A. and Eckland, J. (1990) 'Current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policy for HIV-positive children: a national study', *The Urban Review*, 22(3): 221-38.
- Harvey, J. and Sparks, R. (1991)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Quest*, 43(2): 164-89.
- Haug, F. (1987) *Female Sexualization*. London: Verso.
- Head, H. (1920) *Studies in Neur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arn, J. (1987) *The Gender of Oppression: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Critique of Marxism*.

- Brighton: Wheatsheaf.
- Hearn, J. and Morgan, O. (eds) (1990)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Unwin.
- Hyman. Heim, M. (1995) 'The design of virtual reality', *Body and Society*, 1(3): 65-77.
- Helm, D. (1982) 'Talk's forms: comments on Goffman's *Forms of Talk*', *Human Studies*, 5: 147-57.
- Henley, N. (1977) *Body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Hepworth, M. and Featherstone, M. (1982) *Surviving Middle 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eritier-Auge, F. (1989) 'Older women, stout-hearted women, women of substance', in M. Feher, R. Naddaff and N. Tazi (eds),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I. New York: Zone.
- Hertz, R. (1960 [1909]) *Death and the Right Hand*. London: Cohen and West.
- Hewitt, M. (1983) 'Bio-politics and social policy: Foucault's account of welfa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67-84.
- Hills, S. (ed.) (1987) *Corporate Violence*.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Hirst, P. and Woolley, P. (1982)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Attributes*. London: Tavistock.
-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 (1989) 'Reply to Cas Wouter's review essay on the Managed Hear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3): 439-45.
- Hoff, L.A. (1990) *Battered Women As Survivors*. London: Routledge.
- Honneth, A. and Joas, H. (1988 [1980]) *Social Action and Human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don, R. and Metcalf, P. (1979) *Celebrations of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llich, I. (1976) *Limits to Medicine*. London: Marion Boyars.
- Jaggar, A. (1984) 'Human biology in feminist theory: sexual equality reconsidered', in C. Gould (ed.), *Beyond Domination*. NJ: Rowman and Allenheld.
- James, A. (1990)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delicious: the role of confectionery in British socie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8(4): 666-88.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 Jameson, F. (1985) 'Postmodernism an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 Jary, D. (1987)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563-70.
- Jeffords, S. (1989)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America: Gender and the Vietnam War*.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as, H. (1983) 'The intersubjective constitution of the body-image', *Human Studies*, 6: 197-204.
- Joas, H.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 Joas, H. (1997) *G.H. Mead: A Contemporary Re-examination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Johnson, D. (1983) *Body*. Boston: Beacon Press.
- Johnson, J. and Sarason, I. (1978) 'Life stres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of a moderator variab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2: 205-8.

- <222>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nes, C. (1977) *Immigr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London: Tavistock.
- Jordan, W. (1982) 'First impressions: initial English confrontations with Africans', in C. Husband (ed.), *'Race' in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Jordanova, L. (1989) *Sexual Visions: Images of Gender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Between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Kammerman, I. (1988) *Death in the Midst of Lif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Kanneh, K. (1992) 'Feminism and the Colonial Body', in B. Ashcro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Kant, I. (1985 [1797]) *Foundations of the Physics of Morals*. London: Macmillan.
- Kaplan, G. and Adams, C. (1989) 'Early women supporters of National Socialism: the reaction to feminism and to male-defined sexuality', in J. Milfull (ed.), *The Attractions of Fascism*. New York: Berg.
- Kaplan, G. and Rogers, L. (1990) 'The definition of male and female. Biological reductionism and the sanctions of normality', in S. Gunew (ed.), *Feminist Knowledge, Critique and Construct*. London: Routledge.
- Keddie, N. (1971) 'Classroom knowledge', in M.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 Keith, V. and Herring, C. (1991) 'Skin tone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760-78.
- Kelleman, S. (1985) *Emotional Anatomy: Th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Berkeley, CA: Center Press.
- Kelly, D. (1980) *Anxiety and Emotions*.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 Kelly, K. (1994)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London: Fourth Estate.
- Kierkegaard, S. (1941)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erkegaard, S. (1944) *The Concept of Dread*. London: Macmillan.
- Kimbrell, K. (1993) *The Human Boy Shop*. London: Harper Collins.
- Kimmel, M. (ed.) (1987)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King, D. (1987)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medical knowledge: the case of transsexualism',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9: 351-77.
- Kirkup, G. and Keller, L.S. (1992) *Inventing Wo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issling, E. (1991)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dieting and love the body', *Quest*, 43: 135-47.
- Klein, A. (1991) *Sugarball: The American Game, the Dominican Drea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roker, A. and Kroker, M. (1988) *Body Invaders: Sex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 Kushner, H. (1989) *Self Destruction in the Promised Land: A Psychocultural Biology of American Suicid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Kuzmics, H. (1987) 'Civilization, state and bourgeois society: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Norbert

- Elia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515–37.
- Kuzmics, H. (1988)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J. Keane (ed.),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Verso.
- Kuzmics, H. (1991) 'Embarrassment and civilization: on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work of Goffman and Elia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8: 1–30.
- Lacey, C. (1970) *Hightown Gramma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91)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Journal of Urban and Cultural Studies*, 2(1): 59–72.
- Laqueur, T. (1987) 'Orgasm, gene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ve biology', in C. Gallagher, and T. Laqueur (eds),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ody. Sexualit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23>
- Laqueur, T. (1989) "'Amor veneris, vel dulcedo appetitur'", in M. Feher, R. Naddaff and N. Tazi (eds),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I. New York: Zone.
- Laqueur, T. (1990)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sch, C. (1991)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Norton.
- Lash, S. (1984) 'Genealogy and the body: Foucault/Deluze/Nietzsch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1–18.
- Lash, S. (1990)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Lauer, R. (1973)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scale and anxiety: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7: 171–4.
- Lawrence, M. (ed.) (1987) *Fed Up and Hungry. Women, Oppression and Food*.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Laws, S. (1990) *Issues of Blood: The Politics of Menstruation*. Houndmills: Macmillan.
- Leder, D. (1990) *The Absent Bo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dham, R. (1991) 'Is this the short cut to perfection?' *The Guardian*, 6 September.
- Lees, S. (1984) *Losing Out. Sex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London: Hutchinson.
- Lennerlof, L. (1988) 'Learned helplessness at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tudies*, 18: 207–22.
- Lenskyj, H. (1986) *Out of Bounds: Women, Sport and Sexuality*. Toronto: The Women's Press.
- Lessor, R. (1984) 'Consciousness of time and ti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health awareness among women flight attendant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6: 191–213.
- Levine, D. (1995)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wontin, R. et al. (1984) *Not In Our Gen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Livesay, J. (1989)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the unacknowledged conditions of acti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 263–92.
- Lock, M. (eds), *Knowledge, Power and Practice in Medicine and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Locke, S. et al. (eds) (1985) *Foundations of Psychoneuroimmunology*. New York: Aldine.
- Lowe, M. (1983) 'The dialectic of biology and culture', in M. Lowe and R. Hubbard (eds), *Women's Natur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Luckmann, T. (1967) *The Invisible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Lukes, S. (1973)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Allen Lane.

Lyman, S. (1990) 'Race, sex, and servitude: images of blacks in American cinem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4(1): 49-77.

Lynch, J. (1979) *The Broken Heart*. New York: Basic Books.

Lynch, J. (1985) *The Language of the Heart*. New York: Basic Books.

Lyotard, J.-F. (1988) *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 Correspondance, 1982-1985*. Paris: Galilée.

MacDougall, J., Dembroski, T., Dimsdale, J. and Hackett, T. (1985) 'Components of type A, hostility, and anger-in: Further relationships to angiographic findings', *Health Psychology*, 4: 137-52.

Mackenzie, J. (1987) 'The imperial pioneer and hunter and the British masculine stereotype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times', in J. Mangan and J. Walvin (eds),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gan, J. (1987) 'Social Darwinism and upper-class education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in J. Mangan and J. Walvin (eds),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gan, J. and Park, R. (eds) (1987) *From 'Fair Sex' to Feminism: Sport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Industrial and Post-Industrial Eras*. London: Cass.

<224> Mangan, J. and Walvin, J. (1987)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nheim, K. (1991)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Marable, M. (1983) *How Capitalism Underdeveloped Black America*. London: Pluto.

Marsh, P., Rosser, E. and Harre, R. (1978) *The Rules of Disorder*. London: RKP.

Martin, E. (1989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54 [1887]) *Capital*, vol. 1.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 and Engels, F. (1970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uss, M. (1973 [1934])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 2: 70-88.

Maynard, M. (1990) 'The re-shaping of sociolog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gender', *Sociology*, 24(2): 269-90.

McCarty, R., Horwath, K. and Konarska, M. (1988) 'Chronic stress and sympathetic-adrenal medullary responsivenes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6: 333-41.

McCrone, K. (1988) *Sport and the Physical Emancipation of English Women 1870-1914*. London: Routledge.

McDonough, R. and Harrison, R. (1978) 'Patriarchy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A. Kuhn and A.M. Wolpe (eds),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London: RKP.

McIntosh, P. (1952) *Physical Education in England Since 1800*. London: G. Bell and Sons.

McIntosh, P. (1981)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PE since World War Two', in P. McIntosh et al. (eds),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London: RKP.

McLaren, P. (1988) 'Schooling the postmodern body: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enflesh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 170(3): 53-99.

McRobbie, A. (1978) 'Working 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nity', in CCCS Women's Study Group (eds), *Women Take Issue*. London: Hutchinson.

McRobbie, A. (ed.) (1989) *Zoot Suits and Second Hand Dresses*. London: Macmillan.

- Mead, G.H. (1907) 'Concerning animal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4: 383–90.
- Mead, G.H. (1932)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ed. A.E. Murphy. Chicago, IL: La Salle.
- Mead, G.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ad, G.H. (1938)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ad, M. (1963 [1935])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Morrow.
- Mellor, P. (1990) 'Self and suffering: deconstruction and reflexive definition in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Studies*, 27: 49–63.
- Mellor, P. (1993) 'Death in high modernity: the contemporary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death', in D. Clark (ed.), *The Sociology of Death*. Oxford: Blackwell.
- Mellor, P. and Shilling, C. (1993) 'Modernity, self-identity and the sequestration of death', *Sociology*, 27(3).
- Mellor, P.A. and Shilling, C. (1997) *Re-forming the Body: Religion, Community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Mennell, S. (1985) *All Manners of Food. Eating and Taste in England and France from the Middle-Ag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ennell, S. (1987) 'On the civilizing of appetit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373–403.
- Mennell, S. (1989)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ennell, S. (1990) 'Decivilising processe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some lines of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2): 205–23.
- Mercer, K. and Race, I. (1988) 'Sexual politics and black masculinity: A dossier', in R. Chapman and I. Rutherford (eds), *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Merleau-Ponty, M. (1962) *Th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 Messner, M. (1987) 'The life of a man's seasons. Male identity in the life course of the jock', in M. Kimmel (ed.),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Metcalf, P. and Huntington, R. (1991) *Celebrations of Death: The Anthropology of Mortuary Ritual*,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dgely, M. (1979) *Beast and Man: The Roots of Human Nature*. London: Methuen.
- Miles, A. (1987) *The Mentally Il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iles, A. (1988) *Women and Mental Illness: The Social Context of Female Neurosis*. Brighton: Wheatsheaf.
- Miles, A. (1991) *Women, Health and Medicin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iles, M. (1992) *Carnal Knowledge*. Tunbridge Wells: Burns and Oakes.
- Miller, N. (1979) 'Psychosomatic effects of learning', in E. Meyer and J. Brady (eds), *Research in the Psychobiology of Human Behaviou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J. (1987) "'Going for the burn" and "pumping iron": What's healthy about the current fitness boom?', in M. Lawrence (ed.), *Fed Up and Hungry. Women, Oppression and Food*.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 Monks, J. and Frankenberg, R. (1994) "'Being ill and being me": self, body, and time in MS narratives', in B. Ingsted and S. White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bility*. 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R. (1989)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recruitment', in B. Cosin, M. Flude and M. Hales (eds), *School, Work and Equality*.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Morris, D. (1969) *The Naked Ape*. St Albans: Panther.

- Morris, M. and Patton, P. (eds) (1979) *The Pirate's Fiancée: Michel Foucault: Power, Truth and Strategy*. Sydney: Feral.
- Moss, G. (1973) *Illness, Immun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Munrow, A. (1981)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SA', in P. McIntosh et al. (eds),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London: RKP.
- Murcott, A. (1983) "'It's a pleasure to cook for him': Food, mealtimes and gender in some South Wales households", in E. Gamarnikow et al. (eds),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London: Heinemann.
- Nead, L. (1992) 'Framing and freeing: Utopias of the female body', *Radical Philosophy*, 60 (Spring): 12–15.
- Nettleton, S. (1991) 'Wisdom, diligence and teeth: discursive practices and the creation of mother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3(1): 98–111.
- Nettleton, S. (1992) *Power, Pain and Dentistr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Nettleton, S. and Watson, J. (1998) (eds) *The Body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Newby, H. (1991) 'One world, two cultures: soc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Network*, 50 (February).
- Nicholson, M. and McLaughlin, C. (1987)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medical sociology: a reply to M.R. Bury',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9: 107–26.
- O'Brien, M. (1979) 'Reproducing Marxist man', in L. Clark and L. Lange (eds), *The Sexism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O'Brien, M.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London: RKP.
- O'Brien, M. (1989) *Reproducing the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O'Neill, J. (1985)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Neill, J. (1989) *The Communicative Bod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Oakes, G. (1991) *The Soul of the Salesman*. Atlanta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 Oakley, A. (1972) *Sex, Gender and Society*. London: Temple Smith.
- Oakley, A. (1974)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 Oakley, A. (1984) *The Captured Womb: A History of the Medical Care of Pregnant Wome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Orbach, S. (1988 [1978]) *Fat is a Feminist Issue*. London: Arrow Books.
- Ostrander, G. (1988) 'Foucault's disappearing body', in A. Kroker and M. Kroker (eds), *Body Invaders. Sex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London: Macmillan.
- Ots, T. (1990) 'The silent Körper - the loud Leib'. Draft paper for AES Spring Meeting, Atlanta, Georgia, cited in R. Frankenberg, 'Review article: Disease, literature and the body in the era of AIDS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2: 351–60.
- Park, R. (1985) 'Sport, gender and society in a transatlantic Victorian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History*, 2: 5–28.
- <226> Parsons, T. (1968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sons, T. (1969)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sons, T. (1978) *Action Theor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sons, T. (1991 [1951])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Pennington, S. (1991) 'Chewing out the fat', *The Guardian*, 23 May.
- Pettingale, K. (1985) 'Towards a psychosocial model of cancer: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 779-87.
- Pfohl, S. (1993) 'Venus in microsoft: male mas(s)ochism and cybernetics', in A. Kroger and M. Kroger (eds), *The Last Sex: Feminism and Outlaw Bod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Phizacklea, A. (1990) *Unpacking the Fashion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 Pleck, E. and Pleck, J. (eds) (1980) *The American Ma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leck, J. and Sawyer, J. (eds) (1974) *Men and Masculin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oster, M. (1984)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rendergast, S. (2000) "'To become dizzy in our turning": girls, body-maps and gender as childhood ends', in A. Prout (ed), *The Body Childhood and Society*. Houndmills: Macmillan.
- Pringle, R. (1989a) *Secretaries Talk: Sexuality, Power and Work*. London: Verso.
- Pringle, R. (1989b) 'Bureaucracy, rationality and sexuality: the case of secretaries', in J. Hearn, D. Shepard, P. Tancred-Sheriff and G. Burrell (eds), *The Sexuality of Organization*. London: Sage.
- Prior, L. (1989)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eath*. London: Macmillan.
- Puner, M. (1978) *To the Good Long Life*. London: Macmillan.
- Rheingold, H. (1991) *Virtual Realit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 Rheingold, H. (1994) *The Virtual Communit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 Rich, A. (1976) *Of Woman Born*. New York: Norton.
- Rich, A. (1980)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perience', *Signs*, 5: 631-60.
- Richardson, J. (1991)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student learning',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2(3): 317-40.
- Robins, K. (1995) 'Cyberspac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Body and Society*, 1(3-4): 135-55.
- Robertson, R. (1990) 'Mapping the global condition: globalization as the central concep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3-2): 15-30.
- Rogers, L. (1988) 'Biology, the popular weapon: sex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function', in B. Caine et al. (eds), *Crossing Boundaries: Feminisms and the Critique of Knowledg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Rogers, W. (1991) *Explaining Health and Illnes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 Rose, N. (1989)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Routledge.
- Rose, S. (1976) 'Scientific racism and ideology: the IQ racket from Galton to Jensen', in H. Rose and S. Rose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 Rose, S. (1984) 'Biological reductionism: its roots and social functions', in L. Birke and J. Silvertown (eds), *More than the Parts*. London: Pluto.
- Rosen, B. (1989) *Women, Work and Achievement*. London: Macmillan.
- Rosen, T. (1983) *Strong and Sexy: The New Body Beautiful*. London: Columbus Books.
- Rosenzweig, M. and Schultz, T. (1991) 'Who receives medical care? Income, implicit pri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services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6(3).
- Rothfield, P. (1990) 'Feminism, subjectivity and sexual experience', in S. Gunew (ed.), *Feminist Knowledge, Critique and Construct*. London: Routledge.
- Rouselle, A. (1989) 'Personal status and sexual practice in the Roman Empire', in M. Feher, R. Naddaff

- and N. Tazi (eds),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I. New York: Zone.
- Rucker, R., Sirius, R. and Queen, M. (eds) (1993) *Mondo 2000: A User's Guide to the New Edg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Rudofsky, B. (1986 [1971]) *The Unfashionable Human Body*. New York: Prentice-Hall.
- <227> Rutherford, I. (1988) 'Who's that man', in R. Chapman and J. Rutherford (eds), *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Salter, B. and Tapper, T. (1981) *Educatio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London: Grant McIntyre.
- Sawicki, J. (1991) *Disciplining Foucault: Feminism, Power and the Body*. New York: Routledge.
- Scarry, E. (1985) *The Body in P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iebinger, L. (1987)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he first illustrations of the female skeleton in eighteenth-century 'anatomy'', in C. Gallagher and T. Laqueur (eds),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Body: Sexualit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ilder, P. (1978 [1935]) *The Image and Appearance of the Human Body: Studies in the Constructive Energies of the Psych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Schudson, M. (1984) 'Embarrassment and Erving Goffman's idea of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Society*, 13: 633–48.
- Schutz, A. (1970)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H. (1986) *Never Satisfi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Diets, Fantasies and Fats*. New York: Free Press.
- Searle, G. (1971) *The Quest for National Efficien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egal, L. (1990)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London: Virago.
- Seligman, M. (1975) *Helplessness: On Depression, Development and Death*.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Sennett, R. (1974) *The Fall of Public 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nnett, R. (1992 [1974])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 Sennett, R. (1994)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Sharp, K. (1992)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 reply to Ted Benton', *Sociology*, 26: 219–24.
- Shilling, C. (1991) 'Educating the body: physical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inequalities', *Sociology*, 25: 653–72.
- Shilling, C. (1992) 'School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Discourse*, 13(1): 1–19.
- Shilling, C. (1999) 'Towards an embod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agency relationshi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4): 543–62.
- Shilling, C. (2001) 'Embodiment, experience and theory: in defence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9(3): 327–44.
- Shilling, C. (2002a) 'Culture, the "sick rol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ealt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4): 621–38.
- Shilling, C. (2002b) 'The two tradi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in J. Barbalet (ed.),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Series. Oxford: Blackwell.
- Shilling, C. (2003) 'Embodiment, emotion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order: Durkheim's enduring contribution', in J. Alexander and P.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e Durkhe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lling, C. (2004) *The Body i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 Shilling, C. and Mellor, P.A. (1996) 'Embodiment,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modernity: mind/body dualism and the repression of sensuality', *Body and Society*, 2(4): 1-15.
- Shilling, C. and Mellor, P.A. (2001) *The Sociological Ambition: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London: Sage.
- Shils, E. (1981) *Tradi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Shuttleworth, S. (1990) 'Female circulation: medical discourse and popular advertising in the mid-Victorian era', in M. Jacobus, E. Keller and S. Shuttleworth (eds), *Body/Politics: Women and the Discourses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Sica, A. (1984) 'Sociogenesis versus psychogenesis: the unique sociology of Norbert Elias', *Mid 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9: 49-78.
- Simmel, G.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Glencoe, IL: Free Press.
- Simmel, G. (1971 [1918]) 'The conflict in modern culture', in D. 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mmel, G. (1990 [1907])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 Simon, B. and Bradley, I. (eds) (1975) *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228>
- Singer, L. (1989) 'Bodies, pleasures, powers', *Differences*, 1: 45-65.
- Sinha, M. (1987) 'Gender and imperialism: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ideology of moral imperialism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engal' in M. Kimmel (ed.),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Smith, T.S. (1992) *Strong Intera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nyder, M. (1987) *Public Appearances, Private Realities: The Psychology of Self-Monitoring*. New York: W.H. Freeman.
- Solomon, G. (1985) 'The emerging field of psychoneuroimmunology', *Advances: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 2: 6-19.
- Sontag, S. (1979) *Illness as Metaphor*. New York: Vintage.
- Soper, K. (1995) *What is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 Springer, C. (1991) 'The pleasure of the interface', *Screen*, 32(3): 303-23.
- Stacey, M. (1988)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Healing*. London: Unwin Hyman.
- Stanley, L. (1984) 'Should "sex" really be "gender" - or "gender" really be "sex"', in R. Anderson and W. Shurrock (eds), *Applie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Staples, R. (1982) *Black Masculinity: The Black Male's Role in American Society*. San Francisco: Black Scholar Press.
- Stoller, P. (1997) *Sensuous Scholarship*.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uter, S. (1986) *Health Psychophysiology: Mind-Body Interaction in Wellness and Illness*. Hillsdale, NJ: Lawrence.
- Tancred-Sheriff, P. (1989)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labour process', in J. Hearn, D. Shppard, P. Tancred-Sheriff and G. Burrell (eds), *The Sexuality of Organization*. London: Sage.
- Therberge, N. (1991) 'Reflections on the body in the sociology of sport', *Quest*, 43: 123-34.
- Theweleit, K. (1987 (1977)) *Male Fantasies vol. 1: Women, Floods, Bodies, Histo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heweleit, K. (1989 (1978)) *Male Fantasies vol. 2: Male Bodies: Psychoanalysing the White Terro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iefer, L. (1987) 'In pursuit of the perfect penis: the medicalization of male sexuality', in M. Kimmel (ed.), *Changing Men.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 Tiger, L. and Fox, R. (1978) 'The human biogram', in A. Caplan (ed.),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olson, A. (1977) *The Limits of Masculinity: Male Identity and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omas, D. (1991) 'Old rituals for new space', in M. Benedikt (ed.), *Cyberspace: First Steps*. London: MIT Press.
- Toulmin, S. (1990)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ownsend, P., Davidson, N. and Whitehead, M. (1988) *Inequalities in Health: 'The Black Report and The Health Divide'*. Harmondsworth: Pelican.
- Trivers, R. (1978)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in A. Caplan (ed.), *The Sociobiology Debat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seelon, E. (1992) 'Is the presented self sincere) Goffman,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the postmodern self',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9: 115-28.
- Tseelon, E. (1995) *The Masque of Femininity*. London: Sage.
- Turner, B.S. (1982) 'The discourse of die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 23-32.
- Turner, B.S. (1983) *Relig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 Turner, B.S.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Turner, B.S. (1987) *Medical Power and Social Knowledge*. London: Sage.
- <229> Turner, B.S. (1991a)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 in M.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and B. Turner (eds),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 Turner, B.S. (1991b)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conference on *Health and Society*, April.
- Turner, B.S. (1992a)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B.S. (1992b) *Max Weber: From History to 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B.S. (1996)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The Body and Society*, 2nd edn. London: Sage.
- Turner, B.S. (1999) 'An outline of a general sociology of the body', in B.S. Turn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 Turner, T. (1986) 'Review of the body and society -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211-13.
- Urry, J. (1990) 'The "consumption" of tourism', *Sociology*, 24: 23-35.
- Van der Vliet, R. (1991) 'Love without ties: A new phase in the sexual life course',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7(2): 67-79.
- Van Stolk, B. and Wouters, C. (1987) 'Power changes and self-respect: a comparison of two cases of established-outsider relation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477-88.
- Vance, C. (1984)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Pandora.
- Vance, C. (1989)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 van Kooten Nierker and T. van der Meer (eds), *Homosexuality, which Homosexuality?* London: GMP

Publishers.

- Vigarello, G. (1989) The upward training of the body from the age of chivalry to courtly civility', in M. Feher, R. Naddaff and N. Tazi (eds),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 New York: Zone.
- Virey, J. (1823) *De la Femme, Sous Ses Rapports Physiologique, Moral et Litteraire*, Paris, cited in F. Heritier-Auge, (1989) 'Older women, stout-hearted women, women of substance', in M. Feher, R. Naddaff and N. Tazi (eds), *Fragments for a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Part III. New York: Zone.
- Walby, S. (1989) Theorizing patriarchy', *Sociology*, 23: 213–34.
- Walter, T. (1991) 'Modern death: taboo or not taboo?', *Sociology*, 25: 293–310.
- Walvin, J. (1982) 'Black caricature: the roots of racialism', in C. Husband (ed.), *'Race' In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Walvin, J. (1987) 'Symbols of moral superiority: slavery, sport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1800–1950', in J. Mangan and I. Walvin (eds),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arr, P. (1987) *Work, Un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shburn, S. (1978) Animal behaviour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 Gregory, A. Silvers and D. Sutch (eds),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Watney, S. (1988) 'Visual AIDS - advertising ignorance', in P. Aggleton and H. Homans (eds), *Social Aspects of AIDS*. London: Falmer.
- Watt, I. (1957) *The Rise of the Novel*.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Wearne, P. and Jones, J. (1992) 'Use it or loss it', *The Guardian*, 27–28 June, pp. 12–13.
- Weber, M. (1948 [1919])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H. Gerth and C.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London: Routledge.
- Weber, M. (1985 [1904–5])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Counterpoint.
- Weeks, J. (1977)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Quartet.
- Weeks, I. (1992) The body and sexuality', in R. Bockock and K. Thompson (eds),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egner, G. (1991) 'Schooling for a new mythos: race, anti-semitism and the curriculum materials of a Nazi race educ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27: 189–213.
- Weinstein, H. (1985) The health threat in the fields', *Nation*, 240: 558–60.
- Whitbeck, C. (1984) 'A different reality: feminist ontology', in C. Gould (ed.), *Beyond Domina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Philosophy*.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230>
- White, A. (1989) *Poles Apart? The Experience of Gender*. London: J.M. Dent and Sons.
- Wilkes, C. (1990) 'Bourdieu's class', in J. Harker, C. Mahar and C. Wilkes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Houndmills: Macmillan.
- William, S. and Bandelow, G. (1998) *The Lived Body*. London: Routledge.
- Willis, P. (1974)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 a sociocultural view of women in sport', in I. Glaister (ed.), *Physical Education - An Integrating Force*. London: ATCDE.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 Willis, P. (1985) 'Women in sport in ideology', in J. Hargreaves (ed.), *Sport,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KP.

- Wilson, E.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E. (1978a) *On Human Nature*. London: Tavistock.
- Wilson, E. (1978b) 'Introduction: What is sociobiology?', in M. Gregory, A. Silvers and D. Sutch (eds), *Sociobiology and Human Natur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Wittig, M. (1982) 'The category of sex', *Feminist Issues*, Fall, pp. 63–8.
- Wolf, N. (1991) *The Beauty Myth*. London: Vintage.
- Woods, P. (1980a) *Teacher Strategies*. Beckenham: Croom Helm.
- Woods, P. (1980b) *Pupil Strategies*. Beckenham: Croom Helm.
- Wouters, C. (1986) 'Formalization and informalization: changing tension balances in civilizing processe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2): 1–18.
- Wouters, C. (1987) 'Developments in the behavioural codes between the sexes: the formalization of informaliz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930–85',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4: 405–27.
- Wouters, C. (1989a)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nd flight attendants: Hochschild's managed hear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1): 95–123.
- Wouters, C. (1989b) 'Response to Hochschild's repl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6(3): 447–50.
- Wouters, C. (1990)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formaliz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69–90.
- Wright, E. (1989)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in E. Wright et al. (eds),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 Wright, G.H. Von (1980) *Culture and Value*. Oxford: Blackwell.
- Young, I.M. (1990) *Throwing Like a Girl*.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中外专名索引

(本索引保留了原著主题索引与人名索引混编的形式,但做了汉语拼音排序的转换处理,并增添了原著缺漏的一些条目。)

A

- 阿伯克龙比 Abercrombie, N. 153, 156
阿彻尔 Archer, M. viii, 207
阿德里 Ardrey, R. 45
阿尔迪尔 Ardill, S. 55
阿尔都塞 Althusser, L. 26
阿里耶斯 Ariès, P. 163, 192
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D. 66, 69
埃里捷-奥热 Heritier-Auge, F. 29, 42
埃利亚斯 Elias, N. 178, 191, 208
 论文明化身体 on civilized body
 131-133, 142-148
 历史发展与历史态身体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body 20, 134-136, 148-151
 对于区隔的追求 search for
 distinction 137-141
 社会互赖 social interdependence
 141-143
论死亡 on death 149, 153, 161-165
论情感 on emotion 108
论个体化与身体发展 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ody 10, 92-93
论语言与意识 on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8
埃林 Elling, R. 108
埃伦赖希 Ehreulich, B. 31, 98
艾伦 Allan, C. 120

- 爱泼斯坦 Epstein, B. 60
爱森斯坦 Eisenstein, H. 53
爱与死 love, and death 169-170;
 see also sexuality
艾滋病与艾滋病毒 AIDS and HIV
 30, 52, 159, 165, 169, 170
奥布莱恩 O'Brien, M. 37, 54, 55
奥茨 Ots, T. 35
澳大利亚的歧视现象 Australia,
 discrimination in 43
奥尔巴赫 Orbach, S. 7, 56-60
奥尔康 Alcorn, K. 52
奥尔曼 Olman, C. 58
奥克利 Oakley, A. 29
奥尼尔 O'Neill, J. viii, 33, 35, 179
奥沙利文 O'Sullivan, S. 55

B

- 巴顿 Patton, P. 70
巴赫金 Bakhtin, M. 192
巴雷特 Barrett, M. 13, 55
巴罗斯 Barrows, S. 41
巴特基 Bartky, S. 74, 193
巴特勒 Butler, J. 181, 182, 203
巴特罗普 Bartrop, R. 102
白洛嘉 Broca, P. 50
柏拉图 Plato 60
拜纳姆 Bynum, C. 83, 134, 191
班纳 Banner, L. 5

保健 keep-fit *see* sport

鲍尔 Ball, S. 68

暴力 violence

暴力与内局群体 / 外局群体关系 and
established-outsider relations 147

日常生活中的暴力 in everyday
life 134-135

暴力与种族灭绝 genocide 150

暴力与运动 and sport 145

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 state monopoly
of 134, 141, 146-147

对于女性的暴力 towards women

参见 强奸 *see* rape

亦见 强力 *see also* force

暴力带来的快乐 pleasure in violence 134-136

鲍曼 Bauman, Z. 24, 32

论死亡 on death 7, 150, 155,
162, 166-167, 170

贝尔 Bell, D. 4

贝克 Beck, U. S. 64-65, 176

贝克福德 Beckford, J. 153, 156

被夸大的社会性别化身体差异 differences
in gendered body exaggerated 95-96

贝里奇 Berridge, V. 98

被扭曲的身体 distorted body 56-60

亦见 食物 项下 进食失调 *see also*
eating disorders under food

被压制的社会性别化身体共性 similarities
in gendered body suppressed 95-96

本丹 Bendann, E. 162

本德洛 Bendelow, C. 8

本顿 Benton, T. 46, 91, 92, 149

本尼迪克特 Benedikt, M. 189

本体性安全感 ontological security 160-161

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 178

话语本质主义 discursive 70-71

“边际情境” ‘marginal situations’ 155-156

亦见 死亡 *see also* death

边沁 Bentham, J. 67

标定 labelling 77, 126-127 *see also* stigma

表征作为身体用法理想型 representation
of body in social space 78-81

亦见 身体意象 / 形象 *see also* image,
body

伯恩斯 Burns, T. 73, 75, 76

伯恩斯坦 Bernstein, B. 119

博尔多 Bordo, S. 185, 193

伯格 Berger, P. 16, 17, 21, 152-156, 161

博格纳 Bogner, A. 15, 133

伯基特 Burkitt, I. 160, 175, 207, 210

伯杰 Berger, J. 99-100

伯克 Birke, L. 47, 60, 96

伯里 Bury, M. 64

伯罗斯 Burrows, R. 190

博维 Bovey, S. 58-59

伯伊滕戴克 Buytendijk, F. 101

布迪厄 Bourdieu, P. 178

论社会再生产 on social reproduction
9, 176, 186, 205

论文化资本与学校培养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ing 19, 130

论死亡 death 153, 161-163

论身体的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of body 1

论男性身体意象 male body images 31

论符号价值与身体资本 symbolic
value and physical capital
13, 65, 109-112, 126

与改变身体 changing
bodies 116-118

与身体资本的转换 conversion
of physical capital 118-20

与合法的身体 legitimate body 126

与社会阶级与不平等 social class
and inequalities 114-116,
120, 123-126, 150-151

与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128

与社会形成 / 形态 social
formation 121-122

与运动 sport 112-114, 117-120, 123
与 structuration theory 205

论身体资本的传递与控制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of physical capital 124-126

布弗利 Buffery, A. 45

布莱德雷 Bradley, I. 59, 96
 布莱恩特 Bryant, C. 174
 布莱尔 Bleier, R. 45
 布赖森 Bryson, L. 59
 布朗 Brown, B. 70
 布朗 Brown, P. 49
 布雷 Bray, A. 30
 布鲁贝克 Brubaker, R. 9, 113, 127-128
 布罗姆 Brohm, J.-M. 34
 布洛赫 Bloch, M. 164
 布洛克 Bloch, C. 108
 布思 Booth, C. 32
 布希亚 Baudrillard, J. 190
 不堪其负的身体 overburdened body 29, 60-61
 不平等 inequalities
 参见 社会性别化身体; 社会不平等
 see gendered body; social inequalities
 不确定的身体 uncertain body 3-4
 亦参 知识的危机 *see also*
 crisis of knowledge
 不朽 immortality 166-167

C

残障 disability 23, 76
 亦见 污名 *see also* stigma
 查尔斯 Charles, N. 39, 58
 超越性 transcendence
 参看 转化身体 *see* transforming body
 彻宁 Chernin, K. 7, 56-60, 81
 惩罚 punishment 67-68, 141
 自我惩罚 of self 参看 自我
 否认 *see* self-denial
 承认作为身体用法理想型 recognition
 as ideal type of body usage 83-84
 城市化 urbanization 80
 抽象系统 abstract systems 158, 171
 从自然中获得解放 emancipation
 from nature 158
 符号解放 symbol 133-134, 140
 翠姬 Twiggy 58

D

达顿 Dutton, D. 108
 达尔顿 Dalton, K. 43
 达尔文 Darwin, C.
 与达尔文主义 and Darwinism 41, 43-44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50-51
 达娜 Dana, M. 60
 大卫 David, M. 29
 代际冲突 generations, conflict
 between 122, 123
 亦参 老年化; 孩童 *see also* ageing;
 children
 代孕母亲 surrogate motherhood 29
 戴尔 Dale, R. 120
 戴尔 Dyer, R. 51
 戴蒙德 Diamond, I. 70
 戴蒙德 Diamond, N. 59
 戴维斯 Davies, B. 66
 戴维斯 Davis, F. 1, 18
 刀 knife 136
 道 Dawe, A. 205
 道格拉斯 Douglas, A. 164
 道格拉斯 Douglas, M. 63, 64, 120
 道金斯 Dawkins, R. 45
 德·拉·萨勒 De La Salle, 144
 德尔菲 Delphy, C. 70
 德拉法韦 Della Fave, L.R. 103
 德雷弗斯 Dreyfuss, H. 66
 得天独厚的身体 privileged body 53-56
 邓宁 Dunning, E. 142, 144, 147
 笛卡尔 Descartes, R. 179
 迪罗什 Duroche, L. 10, 38, 39, 65, 145
 迪姆 Deem, R. 114
 迪普罗斯 Diprose, R. 4, 186
 迪尤斯 Dews, P. 71
 地位竞争 competition, status 137-139
 地位竞争 status competition 138-139
 与面具 / 屏障 masks/shields
 79-80, 102-103
 亦参 社会阶级 / 阶层 *see also*
 social class
 动态组织原则(社会场域) organizing

- principles, dynamic (social field) 121-124
 动物 animals 89
 对于区隔的追求 distinction
 search for 128, 137-141
 对于身体的约束 constraints on body 20, 176
 亦参 老年化, 身体秩序, 死亡, 残障 *see also* ageing,
 bodily order death; disability
 多尔 Dore, R. 121
 多赛特 Dowsett, G. 8, 68
 多亚尔 Doyal, L. 20

E

- 厄里 Urry, I. 115
 恩格尔 Engel, G. 102
 恩格斯 Engels, F. 190

F

- 法尔克 Falk, P. 103, 144
 法农 Fanon, F. 50, 186, 192, 193, 194
 法西斯主义 Fascism 54
 反思性 reflexivity 3-5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3, 145-146
 与死亡 and death 157-160
 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99
 犯罪、罪犯化与种族主义 crime,
 criminalization and racism 52-53
 费尔斯通 Firestone, S. 28, 53
 非具身化思路 disembodied approach
 参看 古典社会学 *see* classical sociology
 非言语沟通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72-78
 菲扎克利亚 Phizaclea, A. 18
 非洲人与自然主义身体 Africans
 and naturalistic body 49-52
 肥胖 fatness
 参看 瘦身 *see* slimming
 费迪甘 Fedigan, L. 49
 费赫 Feher, M. 26, 179
 费瑟斯通 Featherstone, M. 20, 26, 76
 论老年化 on ageing 122-125, 195, 196
 论死亡 on death 161, 168

- 论意象与自我认同 on image and self-
 identity 31, 32, 66, 182, 190
 芬克勒 Finkler, K. 108
 分离状态 separateness
 参看 个体化, 私人化
 see individualization; privatization
 芬奇 Finch, J. 114, 128
 “风险社会” ‘risk societies’ 64
 否定身体 negating body 95-97
 弗兰克 Frank, A. 26, 35, 204
 论死亡 on death 159
 论人的行动与身体 on human
 action and body 63, 81-86
 论自然 / 文化二分 on nature/
 culture bifurcation 11
 弗兰肯伯格 Frankenberg, R. 35, 52
 弗兰肯豪泽 Frankenhauser, M. 108
 弗里德曼 Friedman, M. 102
 弗罗因德 Freund, P. 26, 35, 94, 100,
 101, 105, 108, 110, 179
 福柯 Foucault, M. 9, 67-72, 203
 福克斯 Fox, R. 45
 福赛尔 Fussell, S. 6
 福斯 Fuss, D. 70, 71
 父权制 / 男权制 patriarchy 28-29
 女性主义对于父权制 / 男权制的威
 胁 feminism as threat to 58-59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37, 44, 46, 53-54
 被扭曲的身体 distorted body 56-60
 父权制 / 男权制家庭 patriarchal
 household 78-80
 亦参 男性 *see also* men

G

- 改变身体与身体资本 changing body
 and physical capital 116-118
 改变身体资本的价值 changing value
 of physical capital 121-124
 盖伦 Gehlen, A. 154
 盖洛普 Gallup, G. 46
 感觉 feeling

亦参 情感 *see* emotion
 高夫 Gough, I. 20
 戈德堡 Goldberg, S. 46
 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 F. 108
 戈登 Gordon, C. 69
 戈登 Gordon, R. 7
 戈尔登 Golden, J. 4
 戈夫曼 Goffman, E. 5, 32, 66, 72-78,
 150, 158, 184, 185, 186, 197
 格伯 Gerber, R. 7
 格根 Gergen, K. 197
 格兰特 Grant, L. 6
 格雷 Gray, J. 45
 格雷顿 Graydon, J. 59
 格雷厄姆 Graham, H. 115
 格雷戈里 Gregory, M. 49
 格里尔 Greer, G. 29
 格里芬 Griffin, C. 58, 59
 格里芬 Griffin, S. 54
 格林 Green, E. 114
 格林 Green, H. 27
 格罗根 Grogan, S. 7, 195
 格罗兹 Grosz, E. 43, 48, 49, 200, 205-206
 工具的使用 tools, use of 90, 92-93, 95
 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es 42
 工人阶级的控制 control of 21-22, 25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15
 改变身体 changing body 116-120
 改变工人阶级的价值 changing
 value of 121-123
 转换 conversion 118-120
 宫廷社会 court society 131, 134-140
 工作 work
 工作的投入 investment 94-110
 共享意义体系 shared meaning
 systems 154-157
 沟通态身体与行动 communicating
 body and action 84-86
 孤寂 solitude
 亦参 临终的孤寂 *see* loneliness
 古尔德 Gould, S. J. 41, 51, 53

古杰 Goodger, B. 144
 古杰 Goodger, J. 144
 古斯特森 Gusterson, H. 110
 古兹布洛姆 Goudsblom, J. 139
 关系 relationships
 亦参 婚姻, 社会互动, 社会
 关系 *see* marriage;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relationships
 关于身体的知识的危机 crisis of knowledge
 about body 14, 28, 32-35, 159
 惯习 habitus 111, 124, 127, 128, 130, 151-162
 被界定的惯习 defined 113
 规训 discipline disciplined body
 and action 84-85
 福柯论规训 Foucault on 14, 66-71
 规制化作为身体用法理想型 regimentation
 as ideal type of body usage 83-84
 国家与政府控制 state and government
 control 1, 2, 26-27
 与文化资本 and cultural capital 130
 对暴力的垄断 monopoly of
 violence 133-144, 141-142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7-69

H

哈尔伯格 Harburg, E. 108
 哈费尔坎普 Haferkamp, H. 151
 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D. 124
 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J.A. 98
 哈里森 Harrison, R. 29
 哈特曼 Hartmann, H. 29
 孩童 children 68
 与成人之间的身体距离和心理距
 离 bodily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from adults 140, 143-144
 孩童与节食 and dieting 7
 孩童的语言习得 language learning 92-95
 新生儿的性别 new-born, sex of 47-48
 亦参 生育, 社会化 *see also*
 birth; socialization
 海姆 Heim, M. 192

行动与意义 action, and meaning 152-154

行为 behaviour 135-141

行为礼节 manners 134-140

行业 occupation

参看 工作 see work

豪格 Haug, F. 11

豪森 Howson, A. 181

荷尔蒙 hormones 44-47

亦参 绝经, 经期, 怀孕 see also
menopause; menstruation; pregnancy

赫布龙 Hebron, S. 114

赫恩 Hearn, J. 30, 55, 56

赫林 Herring, C. 129

赫普沃思 Hepworth, M. 76, 168, 195, 196

赫斯特 Hirst, P. 92, 93, 179

赫兹 Hertz, R. 90

亨利 Henley, N. 74

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62

亦参 福柯 see also Foucault

互动 interaction 9

社会互动 social 72-81

互赖网络 interdependencies, web of 163

化约论 reductionism 60-61

亦参 自然主义身体, 社会建构的
身体 see also naturalistic body;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怀孕 pregnancy 34, 38-39

亦参 生育 see also birth

婚姻与家庭 marriage and family

晚婚晚育 delayed 78-79

作为女性的目标 as goal for women 57, 80

合法的婚姻与家庭 legitimate 127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53-58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20, 121, 127-128

与运动 and sport 119-120, 128

亦参 孩童 see also children

霍布斯 Hobbes, T. 40, 78, 89, 92

霍尔 Hall, C. 7

霍尔 Hall, S. 2, 53, 125

霍克希尔德 Hochschild, A.

15, 34, 94, 102-108

霍耐特 Honneth, A. 68, 149, 151, 154

霍普 Hope, J. 4

J

基础主义思路与反基础主义思

路 foundationalist and anti-

foundationalist approaches 10, 89-91

基督教 Christianity

与控制 and control 49

与死亡 and death 155-156, 163-166

与性 and sexuality 67-68

亦参 新教徒 see also Protestants

基梅尔 Kimmel, M. 30

基帕克斯 Kippax, S. 30

机器态身体 machine, body as 32-33

身体受制于机器 body subordinated to 21

基思 Keith, V. 129

疾病 disease, illness

参看 健康与疾病 see health and illness

吉登斯 Giddens, A. 12, 66, 85, 153, 157-

161, 169, 171, 174, 178, 185, 188, 192

吉尔罗伊 Gilroy, P. 196

吉尔罗伊 Gilroy, S. 59

吉姆林 Gimlin, D. 199, 204

加德尔 Gardell, B. 108

加拉格尔 Gallagher, C. 40

加斯金斯 Gaskins, D. 61n.1

家务 housework 29

贾加尔 Jaggar, A. 54

监控 surveillance

参看 全景敞视体制 see panopticism

建构论 constructionism

参看 社会建构的身体 see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健康恐慌 panics, health 33

健康与疾病 health and illness 4-6,

18, 21, 30-33, 158-159, 176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50

健康的改善 improvements

参看 运动 (与健身健美) see sport
(and keep-fit and bodybuilding)

-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41-45, 52
健康恐慌 panics 32-34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16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100-106, 107-109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8, 79-81
压力 stress 34, 80-81, 101-102
与战争 and war 1
亦参 医疗与医学话语 / 模式 *see also*
medicine and medical discourse/ model
- 渐趋消散的身体 vanishing body 69-72
- 焦虑与恐惧 anxiety and fear 32
针对老年化 about ageing 122, 168-170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2
与死亡 and death 162, 168-170
男性对于女性的焦虑与恐惧 of
men about women 58-59
与肤色 and skin colour
亦参 都市地区的种族主义
see racism of urban areas 80
女性对于体型的焦虑与恐惧 of
women about body shape
亦参 食物 项下 进食失调
see eating disorders under food
亦参 身体意象 / 形象
see also image, body
- 教育 education 18, 19
与控制 and control 69
与社会性别 and gender 41
体育 physical 19, 59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20-124
- 阶级 class
亦参 社会阶级 / 阶层 *see social class*
- 杰福兹 Jeffords, S. 31
- 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 66, 174-176
结构化理论中的精神分裂式身
体 schizophrenic body in structuration
theory 174-176, 205-206
- 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20-21
- 节食 diet
亦参 食物, 瘦身 *see food; slimming*
- 金 King, D. 64
- 进化 evolution 50, 152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1-133, 146-149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1-95
与社会生物学 and sociobiology 43-46
亦参 历史 *see also history*
- 禁忌与文明化身体 taboos and civilized
body 135-136, 141, 146-147
亦参 私人化 *see also privatization*
- 进食 eating
亦参 食物 *see food*
- 禁食 fasting 83-85
- 经典社会学 classical sociology 7-10, 21-26
- 经济资本 economic capital 111,
118-120, 124-126
- 经期 menstruation 34, 38, 40-41, 44
- 精神的科层化 bureaucratization of spirit 74
- 精英 élite
亦参 支配阶级 *see dominant classes*
- 镜像态身体 mirroring body 84-85, 167-169
“野蛮人”作为镜子 ‘savages’
as mirrors 49
- 窘迫与羞耻 embarrassment and
shame 75-76, 145-146
- 就业 employment
亦参 工作 *see work*
- 具身化行动 agency, embodied
参看 行动 *see action*
- 绝经 menopause 34, 46
- K**
- 卡尔比 Carby, H. 51
- 卡尔南 Calnan, M. 115
- 卡林顿 Carrington, B. 119
- 卡默曼 Kamerman, J. 162
- 卡普兰 Caplan, A. 45
- 卡普兰 Kaplan, G. 41, 47, 54
- 凯迪 Keddie, N. 119
- 凯勒 Keller, L.S. 28

凯勒曼 Kelleman, S. 100
 凯利 Kelly, D. 102
 坎波雷西 Camposi, P. 191
 坎内 Kanneh, K. 194
 坎农 Cannon, W.B. 93
 坎普林 Campling, J. 20
 康德 Kant, I. 179
 康奈尔 Connell, R. 8, 30, 44,
 46-48, 60, 94-100
 康韦尔 Cornwell, J. 115
 科层制 bureaucracy 22, 34
 科尔班 Corbin, A. 20
 柯亨 Cohen, P. 52
 柯卡普 Kirkup, G. 28
 柯林森 Collinson, D. 103, 106
 柯林斯 Collins, R. 77, 103, 121
 可管理的身体 manageable body 76-78
 可管理的心灵 managed heart
 亦参 霍克希尔德 *see* Hochschild
 克尔 Kerr, L. 158
 克尔 Kerr, M. 29, 58
 克尔恺廓尔 Kierkegaard, S. 160
 克拉克 Clark, J. 174
 克拉克 Clarke, J. 119
 克莱因 Klein, A. 18
 克劳福德 Crawford, R. 5, 115, 158
 克雷布 Craib, I. 174
 克罗克尔 Kroker, A. 35
 克罗克尔 Kroker, M. 35
 クロス利 Crossley, N. 204, 207
 肯尼迪 Kennedy, B. 4
 恐怖电影 horror films 34, 35
 孔德 Comte, A. 180
 恐惧 fear
 亦参 焦虑与恐惧 *see* anxiety and fear
 恐旷症 agoraphobia 80
 控制 control 24, 25
 作为行动问题 as action problem 83-85
 与死亡 and death 158-160
 与意义 and meaning 3, 4, 28
 自我施加的控制 self-imposed
 亦参 文明化身体, 自我否弃 *see*

civilized body; self-denial
 亦参 身体秩序, 规训, 身体意
 象, 医疗, 权力, 国家 *see also*
 bodily order; discipline; image,
 body; medicine; power; state
 苦行意识形态 ideology, asceticism
 79, 83-85, 134, 155-156
 亦参 宗教 *see also* religion
 苦行主义 asceticism 79, 83-85, 134, 155-156
 库什纳 Kushner, H., 102
 库兹米兹 Kuzmics, H. 75, 132, 143, 147
 昆比 Quinby, L. 70

L

拉比诺 Rabinow, P. 66 [原书误作 Rabonow]
 拉科夫 Lakoff, G. 99
 拉克尔 Laqueur, T. 38-40
 拉什 Lash, S. 15, 111, 121
 拉希 Lasch, C. 167, 168
 莱德 Leder, D. 183-187, 204
 莱曼 Lyman, S. 51
 莱索尔 Lessor, R. 105
 莱文 Levine, D. xiii
 莱西 Lacey, C. 124
 莱茵戈德 Rheingold, H. 34, 189
 赖特 Wright, C.H. von 145
 赖特 Wright, E. 129
 朗特利 Rowntree, S. 32
 劳尔 Lauer, R. 102
 劳伦斯 Lawrence, M. 81, 101
 劳斯 Laws, S. 34
 老年化 ageing 14, 20, 28, 31, 35
 与死亡 and death 162, 168-170
 老年化的面具 mask of 76, 195-196
 与身体资本 physical capital 121-123
 老年人 elderly, old people
 亦参 老年化 *see* ageing
 勒佩旺什 Lepervanche, M. 43, 48, 49
 勒朋 Le Bon, G. 41
 勒旺丹 Lewontin, R. 53
 雷斯 Race, I. 49, 51, 52
 李 Lee, S. 51

理查森 Richardson, I. 41
 里奇 Rich, A. 29
 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 theory viii, x
 历史 History 163-164
 文明化身体的历史 of civilized
 body 134-136
 自然主义身体的历史 of naturalistic
 body 38-40, 49-53
 性的历史 of sexuality 66-68
 社会建构的身体的历史 of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4-68
 亦参 进化 *see also* evolution
 利斯 Lees, S. 29
 利益社会学 interest, sociology of
 参看 身体资本 *see* physical capital
 脸面 face 93
 脸面功夫 work
 参看 非言语沟通 *see* non-
 verbal communication
 林奇 Lynch, I. 102
 临终 dying
 参看 死亡 *see* death
 临终的孤寂 loneliness of dying 165, 170
 流动 mobility
 参看 社会流动 *see* social mobility
 颅骨测量术 craniometry 41, 50
 卢克 Luke, S. 22
 卢曼 Luckmann, T. 21
 卢瑟福德 Rutherford, I. 49
 鲁道夫斯基 Rudofsky, B. 4, 174
 伦纳勒夫 Lennerlof, L. 102
 罗宾斯 Robins, K. 190
 罗杰斯 Rogers, L. 43-45
 罗杰斯 Rogers, W. 33, 115
 罗森 Rosen, B. 29
 罗森 Rosen, T. 6
 罗森曼 Rosenman, R. 102
 罗斯 Rose, S. 50, 53, 60
 洛克 Locke, J. 40
 洛威 Lowe, 97

M

马丁 Martin, E. 7, 29, 34, 40, 41, 43, 173
 马克思 Marx, K. 8, 190
 马拉布尔 Marable, M. 51
 马什 Marsh, P. 118
 迈尔斯 Miles, A. 29, 48, 115, 150
 麦圭尔 McGuire, M. 108
 麦金托什 McIntosh, P. 27
 麦卡锡 McCarty, R. 102
 麦克杜格尔 MacDougall, J. 102
 麦克多诺 McDonough, R. 29
 麦克劳林 McLaughlin, C. 64
 麦克罗比 McRobbie, A. 119, 125
 卖淫 prostitution 29
 曼海姆 Mannheim, K. 21
 曼加 Manga, J. 42
 媒介 media 1
 与身体意象 / 形象 and body image 5-6
 与死亡 and death 165
 与种族主义 and racism 51
 遥控角先生 teledildonics 34
 与不确定性 and uncertainty 34-35
 亦参 消费文化 *see also*
 consumer culture
 梅勒 Mellor, P.A. 23, 152, 156,
 171, 180, 187, 192
 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M. 183, 204
 梅纳德 Maynard, M. 30
 梅普尔索普 Maplethorpe, R. 51
 梅特卡夫 Metcalf, P. 189
 美 beauty
 参看 意象 *see* image
 门内尔 Mennell, S.
 论文明化身体 on civilized
 body 142, 148, 150
 论身体资本 on physical capital 113
 梦露 Monroe, M. 58
 孟买 Bengal 51
 米德 Mead, G.H. 200-201
 米德 Mead, M. 48
 米勒 Miller, N. 102
 米奇利 Midgley, M. 92

- 米切尔 Mitchell, J. 60
 米什金 Mishkind 30
 面试 interviews 120
 摩根 Morgan, O. 31
 莫里斯 Morris, D. 45
 莫里斯 Morris, M. 70
 莫斯 Mauss, M. 20
 莫斯 Moss, G. 102
 墨菲 Murphy, P. 147
 默克特 Murcott, A. 29, 58
 默瑟 Mercer, K. 49, 51, 52
 母女关系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57-58
 穆尔 Moore, R. 120

N

- 纳达夫 Nadaff, R. 26
 男性 men
 与身体意象 and body image 6, 30
 男性研究 men's studies 30
 自然主义身体作为规范并高于女性一等 naturalistic body as norm and superior to female 38, 40-43, 48-49
 亦参 自然主义身体与身体资本 see also naturalistic body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23
 作为男性的社会学
 家 sociologists as 23-24
 身体的强壮 strength of bodies 30, 98-100, 114-116
 亦参 社会性别化身体, 父权制/男权制 see also gendered body; patriarchy
 内(在)化 internalization 134-141, 151, 154
 内局群体/外局群体的界限 established-outsider boundaries 146-147
 内特尔顿 Nettleton, S. 66, 204
 尼克尔森 Nicholson, M. 64
 年青 youth
 年青的外表 appearance of
 参看 意象 see image
 亦参 孩童 see also children
 纽比 Newby, H. 22
 奴隶制 slavery 49-51

女性 women

- 与身体意象 and body image 5-7
 亦参 瘦身 see also slimming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40, 142, 150
 古典社会学家不是女性 classical sociologists not 24
 女性与自然主义身体(被视为较为低劣) and naturalistic body (seen as inferior) 37-43
 被扭曲的身体 distorted body 56-60
 亦参 食物项下进食失调 see also eating disorders under food
 不堪其负的身体 overburdened body 60-61
 得天独厚的身体 privileged body 53-56
 与社会生物学 and sociobiology 43-48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17, 128, 129
 与社会阶级/阶层 and social class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7-110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7, 80-81
 对女性的暴力 violence to
 参看 强奸 see rape
 亦参 女性主义, 社会性别化身体, 自我否弃 see also feminism; gendered body; self-denial
 女性的臣属地位 subordination of women 28-29
 与情感功夫 and emotion work 100-103
 亦参 控制, 支配, 社会性别化身体, 男性, 父权制/男权制 see also control; domination; gendered body; men; patriarchy
 女性身体的病理学 pathology of women's bodies 40-44
 亦参 健康与疾病 see also health and illness
 女性主义 feminism 176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37-38

被扭曲的身体 distorted body 56-60

第二波女性主义 second wave 14, 28-31

亦参 女性 *see also* under women

投票权 suffrage 41

亦参 社会性别化身体, 女性 *see*

also gendered body; women

P

帕森斯 Parsons, T. 10, 180, 185

帕斯龙 Passeron, J.-C. 119, 130

佩廷盖伊 Pettingaie, K. 102

彭宁顿 Pennington, S. 105

皮雷斯 Pires, E. 120

品位 tastes 113, 118, 124, 128

普莱克 Pleck, J. 30

普莱斯利 Priestley, J. B. 195

普莱斯纳 Plessner 154

普赖尔 Prior, L. 137, 164

普林格尔 Pringle, R. 106

普伦德加斯特 Prendergast, S. 185

普纳 Puner, M. 196

Q

齐美尔 Simmel, G. 9, 25, 200

潜势态身体 Latent body 183-187

强奸 rape 56, 150

对于强奸的恐惧 fear of 128

与种族主义 and racism 51-52

强力作为身体用法的理想型 force as

ideal type of body usage 84-87

亦参 暴力 *see also* violence

强迫性进食 compulsive eating

参看 食物 项下 进食失调

see eating disorders under food

乔丹 Jordan, W. 49-50

情感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
emotional 110

情感与文明化身体 emotion and
civilized body 131-135, 146-147

商业化的情感 commercialized

参看 霍克希尔德 *see* Hochschild

情感态身体与社会不平等 emotional

body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103-108

琼斯 Jones, C. 52, 53

琼斯 Jones, J. 97

囚牢 prisons 67-80, 97

驱力 drives, internalised 134-141

全景敞视体制 panopticism 67-70

权力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power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6-69

亦参 控制, 规训 *see also*

control; discipline

全球化 globalisation 18, 125

R

人工授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3, 33

人口 population

人口变迁 changes

参看 老年化 *see* ageing

人口调控 regulation 68-69, 78, 80

人口生育/再生产 reproduction

参看 再生产 *see* reproduction

人口学 demography

参看 人口 *see* population

人类例外论 exceptionalism, human 149

认同/身份/特性 identity

参看 自我认同, 社会认同

see self-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日常接触 encounters

参看 社会互动 *see* social interaction

日常生活 daily life, everyday life 20

死亡的挑战 challenged by death 154-156

日常生活中的仪式 rituals 108, 157, 164

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身体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in 66, 72-73

日常生活中的暴力 violence in 134-135

S

萨维奇 Sawicki, J. 70

塞利格曼 Seligman, M 102

桑塔格 Sontag, S. 43

瑟尔 Searle, G. 27, 49

森内特 Sennett, R. 32, 85, 190, 197, 198

沙特尔沃思 Shuttleworth, S. 40, 42, 43

善恶两分 good and evil, dichotomy
between 49-50

上层 upper classes

参看 支配阶级 / 阶层

see dominant classes

社会不平等 social inequalities 7, 12-13, 15,
18, 88-110, 173, 176

情感功夫 emotion work 103-107

情感态身体 emotional body 94, 100-103

社会性别化身体 gendered body

建构 constructing 94-95

再生产 reproduction of 98-100

否定身体 negating body 95-96

重构身体 restructuring body 88-94

转化身体 transforming body 96-98

亦参 社会阶级 项下 身体资本
see also physical capital under
social class

社会差异 social differences

参看 社会阶级 see social class

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121-125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50-51

社会分工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141-142

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hips 37-38

亦参 婚姻, 性 see also marriage;
sexuality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72-78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11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1-
133, 136, 139-143, 145, 150, 151

阶级 class 112-113

与死亡 and death 162

与社会性别 gender 29, 58-59

与社会角色 and social roles 74

社会建构的身体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2-87, 203-204

社会阶级 / 阶层 social class 1, 18-19, 60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1, 134-142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2-116, 127-128

改变身体 changing body 116-118

改变价值 changing value of 121-124

传递与控制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118-120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6-97

地位面具 status masks 79-80, 102

亦参 支配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
阶级 see also dominant classes;
middle classes; working classes

社会静态 social stasis 127

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参看 控制, 国家 see control; state

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18-19

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y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74-77

亦参 自我认同 see also self-identity

社会生物学 sociobiology 43-47

社会位置 social location

参看 社会阶级 see social class

社会型构 social figuration 132

社会性别化身体 gendered body 12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40-143, 147

建构社会性别化身体 constructing 94-95

否定社会性别化身体 negating 95-97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21

社会性别化身体的再生

产 reproduction of 98-100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7-100

社会化的社会性别化身体 socialized

参看 社会化 see under socialization

亦参 男性, 自然主义身体, 社会不平
等, 女性 see also men; naturalistic
body; social inequalities; women

社会性别化身体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of gendered body 98-100

社会性的生理性别 social sexes 38-40, 47-49

社会学与身体 sociology and body 1, 7-13,
17-36, 180-181, 205-210

社会意义 social meaning

- 参看 意义 *see meaning*
 社会再生产 *social reproduction*
 参看 身体资本, 社会阶级
see physical capital; social class
 社会制度 *social institutions*
 参看 制度 *see institutions*
 社会秩序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social order*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78-82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112, 117, 119, 120, 123
 身体 *Body*
 健美 参看 运动 -building *see sport*
 界定 *definitions* 35
 作为潜势 *as latent* 183-187
 作为面具 *as mask* 193-198
 作为选择 *as option* 189-191
 作为规划 参看 身体作为规划
 projects see project, body
 作为规制 *as regimes* 157-160, 187,
 191-193
 亦参 意象, 运动
 see also image; sport
 身体功夫 *work* 103-104
 亦参 非言语沟通, 身体社会学
 see also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of body
 身体的不可化约性 *irreducibility of body* 72
 身体的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individuation*
 of *body* 1, 69, 111, 131-132, 145, 151,
 162-165
 亦参 文明化身体, “它者” *see*
 also civilized body; ‘others’
 身体的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of body* 132-151
 与死亡 *and death* 162, 167
 亦参 文明化身体, 控制 *see*
 also civilized body; control
 身体的缺席在场 *absent-presence of body*
 70-71, 87, 172, 179-182
 亦参 社会学 *see also sociology*
 身体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body*
 81, 161
 黑人身体的商品化 *of black people* 50-52
 女性身体的商品化 *of women* 29
 亦参 消费文化, 意象, 身体
 资本, 社会不平等 *see also*
 consumer culture; image; physical
 capital; social inequalities
 身体的所有权 *ownership of body*
 参看 身体的占有 *see possession*
 身体的有机性 *organic nature of body*
 参看 生物学 *see biology*
 身体的占有 *possession of body* 4, 72
 精神对身体的占有 *by spirits* 34-35
 身体良心与工作 *conscience of body and*
work 110
 身体排泄物 *waste, bodily* 23
 身体图式 *schema, body* 200-201
 身体习语 *idiom, body* 77
 亦参 非言语沟通 *see also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身体性社会” ‘*somatic society*’ 1
 身体意象 / 形象 (自我呈现) *image,*
body (self-presentation) 1, 4-7, 72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5
 与消费文化 *and consumer culture* 31-32
 与污名管理 *and management*
 of *stigma* 75-76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59-60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2, 116-117, 124-126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6-98, 105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5, 72-77
 亦参 时尚, 男性, 整形手术, 瘦身,
 运动 *see also fashion; under men;*
 plastic surgery; slimming; sport
 身体与身体资本的社会形成 *social formation*
 of *body and physical capital* 112-114
 身体与死亡的悖论 *paradoxes of*
body and death 154-157
 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表征 *social space,*
representation of body in 78-81
 亦参 身体意象 *see also image, body*

身体在社会中 *society, body in*
 参看 文化, 自然主义身体, 社会
 不平等, 社会建构的身体 *see*
 culture; naturalistic body; social
 inequalities;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身体资本 *physical capital* 111-130
 身体资本的传递 *transmission of*
 physical capital 124-130
 身体资本的转换 *conversion of physical*
 capital 111, 112, 118-120
 “身体秩序” ‘*bodily order*’ 15, 63, 78-83,
 202-203
 身体作为规划 *project, body as* 4-7, 154-
 155, 158, 173-174, 187-201
 身体作为社会意义的接收器 *receptor*
 of social meaning, body as 64-66
 亦参 社会建构的身体 *see also*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身体作为消极被动的容器 *passive container,*
 body as 23
 神经性厌食症 *anorexia nervosa* 58, 81, 101
 “剩余范畴” ‘*residual categories*’ 10
 “生命态身体” ‘*lived body*’ 13
 生物学 / 生物特征 *Biology*
 受控制的生物特征 *controlled*
 参看 文明化身体 *see civilized*
 body
 社会生物学与遗传基因 *sociobiology*
 and genetics 43-48
 亦参 死亡, 健康与疾病, 自然主
 义身体, 社会不平等 *see also*
 death; health and illness; naturalistic
 body; social inequalities
 生育 *birth* 83, 176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39,
 53-55
 亦参 孩童 *see also children*
 施瓦茨 *Schwartz, H.* 27
 失业与压力 *unemployment and stress* 109
 实际的社会认同 *actual social identity* 75-76
 时尚 *fashion* 7, 57
 食物 *food* 32-33, 68, 79

进食失调 *eating disorders* 56-60
 禁食 *fasting* 83-85
 禁忌 *taboos* 111
 亦参 瘦身 *see also slimming*
 试管婴儿 *in vitro fertilization* 3, 33
 手 *hand* 90
 受时间约束的身体 *time-bound body* 155
 亦参 死亡 *see also death*
 瘦身与体重 *slimming and body*
 weight 1, 3, 5-6, 81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57-59
 双足直立 *bipedalism* 92
 斯嘉丽 *Scarry, E.* 184
 斯科特森 *Scotson, J.* 140
 斯普林格 *Springer, C.* 34
 私人化 *privatization*
 与死亡 *and death* 163-171
 意义的私人化 *of meaning* 2
 斯塔西 *Stacey, M.* 103
 斯坦利 *Stanley, L.* 47, 48
 斯特普尔斯 *Staples, R.* 51
 死亡与自我认同 *death and self-*
 identity 152-171
 死刑 *death penalty* 61
 索尔特 *Salter, B.* 120
 索耶 *Sawyer, J.* 30

T

“它者” / 他人 ‘*others*’
 危险的“它者” *dangerous* 49-53
 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界限 *established-*
 outsider boundaries 146-147
 作为行动问题的他人关联性 *other-*
 relatedness as action problem 84-85
 亦参 个体化, 种族主义 *see also*
 individualization; racism
 塔珀 *Tapper, T.* 120
 塔齐 *Tazi, N.* 26
 泰格 *Tiger, L.* 45
 坦克雷德-谢里夫 *Tancred-Sheriff, P.* 106
 汤森 *Townsend, P.* 113

特尔伯格 Therberge, N. 81
 特纳 Turner, B.S. 1, 10, 26, 32,
 35, 69, 97, 170, 185
 论老年化 on ageing 31
 论伯格 on Berger 154-155
 论身体秩序 on bodily order 63-65,
 78-82, 88-91, 179, 203-204
 论古典社会学 on classical
 sociology 21-26
 特纳 Turner, T. 82
 提前筹划 planning ahead
 参看 未来 see future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参看 运动 see sport
 同性恋 homosexuality 30, 51-52, 127
 涂尔干 Durkheim, E. 9, 22-25, 180, 208
 图尔明 Toulmin, S. 179
 徒具其表的身体 hollow bodies 181-182
 托尔森 Tolson, A. 30
 托马斯 Tomas, D. 189

W

瓦尔 Warr, P. 108
 瓦尔文 Walvin, J. 49-50
 瓦特 Watt, I. 190
 外表 appearance
 参看 身体意象 see image, body
 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
 参看 行动 see action
 万斯 Vance, C. 62
 威尔克斯 Wilkes, C. 114-115
 威尔逊 Wilson, E. 44, 45
 威克斯 Weeks, J. 30, 70
 威利斯 Willis, P. 59, 118-119
 威廉斯 Williams, S. 8
 威廉斯 Williams, J. 147
 韦伯 Weber, M. 9-10, 25, 188
 维蒂希 Wittig, M. 70
 维恩斯坦 Weinstein, H. 108
 维雷 Virey, J. 42
 维斯特 West, M. 58
 为女性保留的服务业 service work

for women 106-108
 未来 Future
 失去的未来 参看 死亡 lost see death
 为未来筹划 planning for 139
 文化, 文化资本 culture, cultural
 capital 19, 111-130
 文明化身体 civilized body 131-151
 文明化身体的社会互赖 social interdependence
 of civilized body 141-142
 文明化身体的瓦解 breakdown
 of civilized body 146-8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39, 134
 沃恩 Wearne, P. 111
 沃尔比 Walby, S. 29, 127, 128
 沃尔夫 Wolf, N. 81
 沃尔特 Walter, T. 164-165, 171
 沃森 Watson, J. 204
 沃什伯恩 Washburn, S. 46
 沃特尼 Watney, S. 52
 污名管理 stigma, management
 of 66, 72-73, 75-77
 伍利 Woolley, P. 92-93, 179
 武泰 Wouters, C. 108, 144, 147

X

希本 Gieben, B. 2
 希尔斯 Hills, S. 108
 西格尔 Segal, L. 50, 53
 希林 Shilling, C. 5, 9, 19, 23, 25, 12S,
 152, 171, 180, 187, 192, 202
 西蒙 Simon, B. 59
 席宾格 Schiebinger, L. 40
 习得能力 learning, capacity for 148-149
 夏普 Sharp, K. 92
 相互认同 identification, mutual 138-140
 相互认同 mutual identification 139-140
 想象力 imagination 99
 消费文化 consumer culture 14, 28, 32
 歇斯底里 hysteria 48, 68, 80
 辛格 Singer, L. 29
 辛哈 Sinha, M. 51, 52
 新教徒 Protestants 49, 67, 164-165

新教伦理 ethic 24-25, 79
 心理学 psychology 21-22
 心智(意识) mind (consciousness)
 心身两分 and body dichotomy 8, 12, 49, 157
 亦参 古典社会学 *see also* classical sociology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9-102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7, 71, 78
 与社会学 and sociology 8, 12, 17, 19-27
 “行动问题” ‘action problem’ 15
 性 sexuality
 与基督教 and Christianity 67-68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5, 139-140
 罪犯 参看 强奸 criminal *see* rape
 与死亡 and death 169-170
 偏离 deviation 68
 同性恋 homosexuality 30, 51-52, 127
 性的历史 history of 66-68, 70
 合法的性 参看 婚姻 legitimate *see* marriage
 手淫 masturbation 65, 69
 男性的性 of men 30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45-46, 49-51, 53-55
 性的问题与社会不平等 problem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105-107
 与种族主义 and racism 49-52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6-68, 70, 79
 遥控角先生 teledildonics 34
 男性对女性的性的限制 of women restricted by men 29
 亦参 生育 *see also* reproduction
 性别分工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53-54, 78
 性偏离 deviation, sexual 68
 亦参 同性恋 *see also* homosexuality
 羞耻 shame

参见 窘迫与羞耻 *see* embarrassment and shame

休莱特 Theweleit, K. 88, 147
 休闲 leisure 97, 103, 114-115, 117, 144
 亦参 运动 *see also* sport
 休伊特 Hewitt, M. 66
 学校培养 schooling
 参看 教育 *see* education

Y

压迫 oppression
 参看 (女性的) 臣属地位 *see* subordination
 雅里 Jary, D. 174
 雅斯贝斯 Jaspers, K. 155
 亚当斯 Adams, C. 54
 亚当斯 Adams, P. 70
 亚历山大 Alexander, R. 45
 扬 Young, I.M. 103, 186, 204
 遥控角先生 teledildonics 34
 伊利奇 Illich, I. 165
 医疗与医学话语/模型 medicine and medical discourse/model 4, 33
 与老年化 and ageing 31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7
 控制 control 2, 11
 与死亡 and death 164-166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42-44, 48, 55, 58
 与种族主义 racism 50-53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8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69
 亦参 健康与疾病, 整形手术, 移植 *see also* health and illness; plastic surgery; transplants
 伊舍伍德 Isherwood, B. 120
 移植与植入 transplants and implants 4, 97
 意识 consciousness
 参看 心智 *see* mind
 意向/预期后果 intentions/intended outcome 67, 151

意义 Meaning

 身体作为社会意义的接收器 body as
receptor of social

 参看 社会建构的身体 see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与控制 and control 3-4, 28

与死亡 and death 153-157, 161-162

意义的私人化 privatization of 2

英格利斯 Inglis, D. 181

英格利希 English, D. 98

忧惧 dread 160

 亦参 焦虑与恐惧 see also
anxiety and fear

犹太人 Jewish people 52

有礼貌的不关注 civil inattention 74

 与身体的工具性关系 instrumental
relation to body

 参看 工人阶级 项下 身体资本 see
physical capital under working classes

语言 language 133

语言习得 learning 93-95

 语言与社会学 and sociology
8, 17, 19, 21, 26-27

 语言与符号互动论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62

预定 predestination 25

欲望 desire

作为行动问题 as action problem 84-85

欲望的约束 restraint of 78-80

约尔丹诺娃 Jordanova, L. 38, 40

约翰逊 Johnson, D. 179

约翰逊 Johnson, M. 99-100

约纳斯 Joas, H. viii, x, 149, 151, 154

 运动 (与健身健美) sport (and keep-fit and
bodybuilding) 3, 6, 30-31, 33-34, 158,
166, 176, 189

与身体贸易 and body trading 18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44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58-59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16, 130

改变价值 changing value 121-123

 学校中的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19, 58-59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6-100

观看 / 旁观 spectating 144

Z

泽龙 Tseelon, E. 194, 195, 197

詹明信 Jameson, F. 125

詹姆斯 James, A. 57

整形手术 plastic surgery 1, 5-6, 33, 58

支配 domination

 支配态身体与行动 dominating
body and action 84-86

与情感功夫 and emotion work 100-103

 亦参 控制, 支配阶级, 社会性别化
身体, 男性, 父权制 / 男权制, 权
力 see also control; dominant classes;
gendered body; men; patriarchy; power

支配阶级 / 阶层 dominant classes

 中世纪宫廷社会 court society
in middle ages 131-139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4-116

改变价值 changing value of 121-124

转换 conversion 118-120

 传递与控制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124-126

亦参 中产阶级 see also middle classes

知识与身体 knowledge and body 70-71

与理智 and reason 171

与社会学 and sociology 22, 24-26, 56

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50-52

植入 implants

 参看 移植与植入 see transplants
and implants

制度 / 机构 institutions 66-69

 亦参 教育, 宗教, 国家 see also
education; religion; state

制度化状态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130

秩序 order

参看 “身体秩序”, 社会秩序

- see* 'bodily order'; social order
- 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es 1, 42, 80, 98
 与老年化 and ageing 122-123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9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5-118, 122
 亦参 支配阶级 / 阶层 *see also* dominant classes
- 中世纪宫廷社会 Middle Ages, court society 131-138
 亦参 苦行 *see also* asceticism
- 种族主义 racism 18, 27-28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49-53, 61
 与身体资本 and physical capital 118-119, 128-129
- 重构身体 restructuring body 88-94
 亦参 规划 *see also* project
- 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s 171
- 转化身体 transforming body 95-110
-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9-10, 24, 25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71-172
 与自然主义身体 and naturalistic body 47-49
 新教伦理 Protestant ethic 27-28, 90
 与社会建构的身体 and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 78, 91, 92
- 自恋型身体 narcissistic body 85
 与死亡 and death 167-169
- 自然 nature
 与文化的两分 and culture dichotomy 11-12, 22, 39-40, 175
 从自然中获得解放 emancipation from 158
 亦参 控制 *see also* control
- 自然主义身体 naturalistic body 37-61
- 自我 self
 参看 个体化 *see* individualization
- 自我呈现 self-presentation
 参看 身体意象 *see* image, body
- 自我否弃与自我惩罚 self-denial and self-punishment 58-59, 84-85
 亦参 苦行 *see also* asceticism
- 自我归类 self-classification 75-77
- 自我控制与自我审察 self control and self scrutiny 49
 亦参 文明化身体 *see also* civilized body
- 自我认同 self-identity 1, 4-7, 174, 182-202
 与文明化身体 and civilized body 136, 147
 男性 men 30-1
 与性 and sexuality 68
 与社会不平等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90, 102-103
 亦参 死亡与自我认同 *see also* death and self-identity
- 自我牺牲 self-sacrifice
 参看 自我否弃 *see* self-denial
- 宗教 religion
 与死亡 and death 154-170
 宗教的衰微 decline 2
 亦参 新教徒 *see also* Protestants
-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参看 新教徒 *see* Protestants
- 作为行动问题的自我关联性 self-relatedness as action problem 83-85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

作者=（英）克里斯·希林著

页数=270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9

SS号=12720144

DX号=000006981936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981936&d=B5CB8971907B94BB4F418B12DA648FC3&fenlei=0310030606&sw=%E9%BD%BC%E5%B3%B9%E7%B9%B1%E0%BD%62%B